

金日成

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4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4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 · 平 壤

1993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4）

언제나 인민을 믿고
어떤 조건에서도 혁명적
신념을 버리지 않으며
자주로선을 일관하게
견지하면서 광범한 인민
대중을 하나로 묶어세운
것은 항일혁명의 승리를
담보한 주되는 요인이였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始终不渝地相信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革命的信念，始终一贯地坚持自主路线，把广大的反日力量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保证抗日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金日成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艰苦的日子里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指战员们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指战员们在光复祖国的神圣的抗日战争中，排除万难，经受考验，生长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战士。



腰营沟的一个深山沟。1935 年初，我结束第一次远征北满回到东满游击区后，曾在这里停留过一段时间。

东满抗日革命斗争史上的耻辱一页



和龙县委书记金日焕

“民生团”是幽灵！

这是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在被扣上莫须有的“民生团”罪名含冤死去时的控诉。极左的反“民生团”斗争，给我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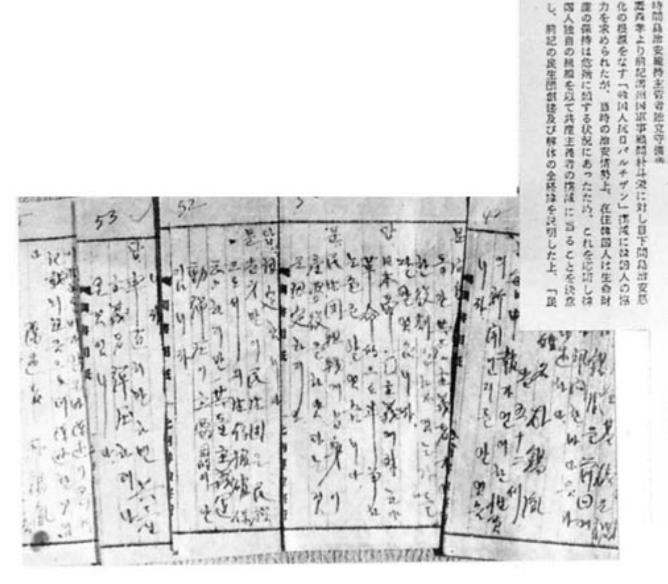
大荒崴会议的场所。我在这个会议上同民族排外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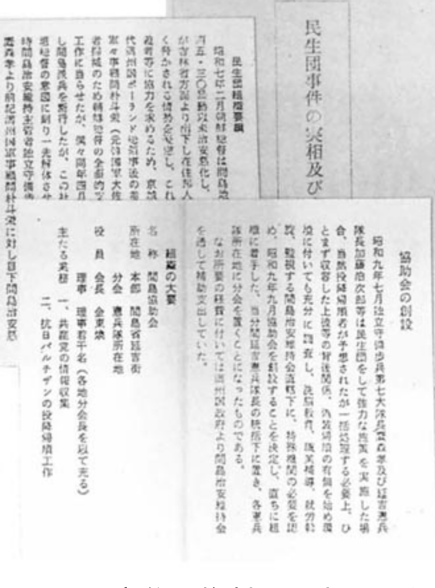
腰营沟第一区党委
组织部长李雄杰



团政委金洛天



我国司法部门对在炮制“民生团”方面起了
产婆作用的朴锡胤进行审讯的记录（1947年）



民生団事件の実相及び

民生団組織要綱

協助会の創設

組織の大要

名称　間島協助会

所在地　本部　間島省延吉街

分会　憲兵隊所在地

役員　会長　金東漢

理事　理事若干名（各地分会長を以て充る）

主たる業務　一、共産党の情報収集

二、抗日パルチザンの投降帰順工作

日寇关于炮制“民生团”和
“间岛协助会”的秘密文件



腰营沟会议的场所

设在腰营沟的我军指挥部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

유격구를 해산하고 광활한 지대에로 진출할데 대하여

요영구에서 진행된 조선인민혁명군 군정간부회의에서 한 연설
1935년 2월 27일

동무들!

우리는 며칠날에 걸쳐 반《민생단》투쟁에서 나타난 좌경적오류를 극복할데 대한 문제와 유격구를 해산하고 광활한 지대에로 진출할데 대한 문제를 토의하였습니다.

이번 회의에서 토의된 문제들은 혁명대렬의 통일과 단결을 강화하며 항일무장투쟁을 가일층 확대발전시키는데서 매우 큰 의의를 가집니다.

그러므로 이 문제들에 대한 나의 의견을 말하려고 합니다.

1. 반《민생단》투쟁에서 나타난 좌경적 오류를 극복할데 대하여

우리는 이미 다홍왜회의를 비롯한 여러 기회에 반《민생단》투쟁에서 나타난 좌경적오류들에 대하여 비판하였으며 그것을 시정하기 위하여 나서는 원칙적인 문제들에 대해서도 지적하였습니다.

우리는 반《민생단》투쟁에서 발로된 좌경적편향을 바로잡기 위한 투쟁을 반종파투쟁과 밀접히 결부시켜 진행하여야 하겠습니다. 우리는 앞으로 종파분자들과 추호도 타협함이 없이 투쟁해나감으로써 혁명대오내에 어떠한 종파행동이나 적대사상도 발붙일 틈을 주지 말아야 할것입니다.

우리는 반《민생단》투쟁에서 나타난 좌경적편향을 바로잡고 혁명대오의 통일과 단결을 강화하며 모든 반일역량을 묶어세움으로써 일제를 반대하는 무장투쟁을 더욱 힘있게 벌려나가야 하겠습니다.

2. 유격구를 해산하고 광활한 지대에로 진출할데 대하여

오늘 우리의 혁명투쟁은 새로운 발전단계에 들어섰습니다.

1932년에 반일인민유격대를 결성할 당시 우리의 전략적과업은 유격근거지를 창설하고 그에 의거하여 혁명역량을 보존육성하는 한편 무장투쟁을 더욱 확대발전시킬수 있는 준비를 철저히 갖추는것이였습니다. 이것은 우리의 무장대오가 갓 탄생하고 혁명군중에 대한 일제침략군의 탄압만행이 극심하였던 당시의 조선에서 필수적으로 제기되는 과업이였습니다.

우리는 지금까지 이 전략적과업을 수행하기 위하여 두만강연안일대에 해방지구형태의 유격근거지를 창설하고 그에 의거하여 4~5년동안 피어린 무장투쟁을 조직전개하였습니다. 반일인민유격대는 간고한 투쟁의 불길속에서 정치사상적으로 더욱 단련되고 큰 규모의 근거지방어전투들과 성시공

격전까지 벌릴수 있는 위력한 무장력량으로 장성하였으며 풍부한 전투경험을 쌓게 되였습니다. 그리고 실천투쟁속에서 청년공산주의자들이 수많이 육성되였으며 종파주의와 좌우경기회주의를 반대하는 투쟁을 통하여 혁명대오의 통일단결이 일층 강화되였습니다. 각계각층의 광범한 군중을 혁명의 편에 묶어세움으로써 무장투쟁과 당창건을 위한 대중적지반도 튼튼히 꾸려지고있습니다. 또한 우리는 일제의 민족리간책동을 짓부시고 중국인민들과의 반일공동전선을 성과적으로 실현하였으며 세계피압박인민들과의 련대성도 두터이 하였습니다.

참으로 해방지구형태의 유격근거지는 그동안 무장투쟁의 전략적기지로서의 사명을 훌륭히 수행하였습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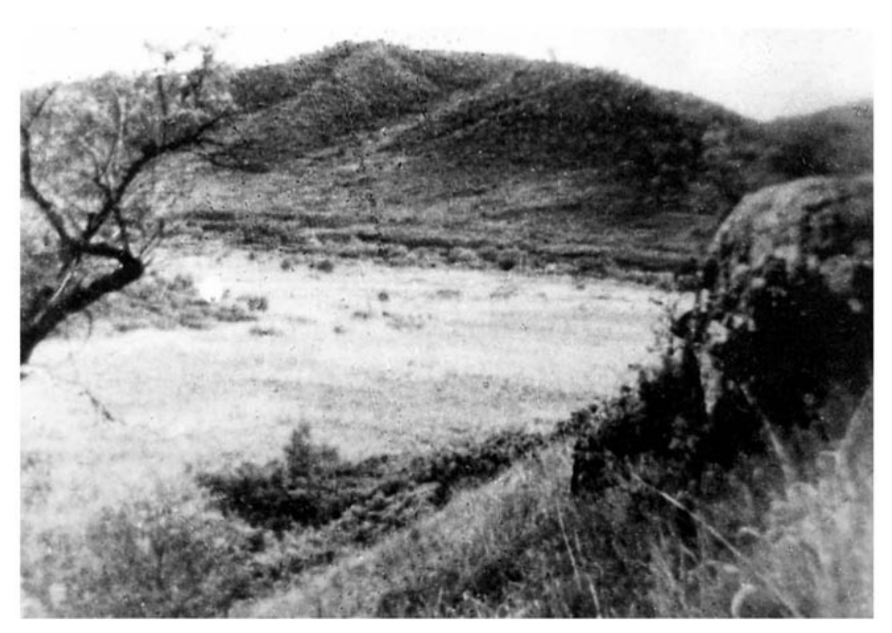
오늘 우리앞에는 이미 이룩한 고귀한 성과와 경험들에 기초하여 혁명투쟁을 가일층 확대발전시켜야 할 절박한 임무가 나서고있습니다. 이 임무는 우리들로 하여금 제한된 지역의 유격구를 떠나 보다 광활한 지대에로 진출하여 대규모적인 유격전을 조직전개할것을 요구하고있습니다. 우리의 투쟁을 보다 적극적인 단계에로 발전시켜야만 광범한 조중인민의 지지성원에 의거하여 적들에게 커다란 정치군사적타격을 줄수 있으며 당창건사업과 통일전선사업을 줄기차게 밀고나갈수 있을것입니다.

유격구를 해산하고 광활한 지대에로 진출하는것은 조성된 정세의 요구이기도 합니다.

지금 일본제국주의자들은 유격근거지에 대한 공세를 그 어느때보다도 강화하고있습니다. 일제는 수만의 정예무력을 동원하여 유격근거지를 겹겹이 포위하고 날마다 《토벌》작전을 감행하고있으며 집단부락을 설치하고 중세기적《보갑제도》를 실시하고있습니다. 또한 일제는 유격대와 공산주의에

将革命种子播在广阔大地上

我在腰营沟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图为经整理后出版的讲话。



老黑山战场遗址

1935年6月全歼穷凶极恶的靖安军部队于此山谷。





金 丽 重

老黑山战斗中缴获的迫击炮和机枪



吴 振 宇



全 哲 山



吴 俊 玉

游击队第一次用迫击炮消灭了敌人的地方——太平沟后山

我军用迫击炮在这里击中驶入大火烧铺河的敌船。

第 二 次 远 征 北 满

老爷岭层峦叠嶂，霞光映照原始林。

牡丹江蜿蜒流经茫茫草原

在严峻的抗日战争年代，我率部横渡这条江不知有多少次。

周保中部队的密营

激起人们特殊感情的满洲高粱地，
是便于游击队进行活动的青纱帐。

北　满　的　指　挥　员



金　策



崔庸健



姜　健



许 亨 植



李 学 万

帮助远征队渡过
镜泊湖的柴和老人

中国东北的名胜镜泊湖。我们有时用渡船，
有时踏着坚冰，多次跨过这个湖。

南湖头会议前夕的国际形势

纳粹的『炸弹宣言』

废除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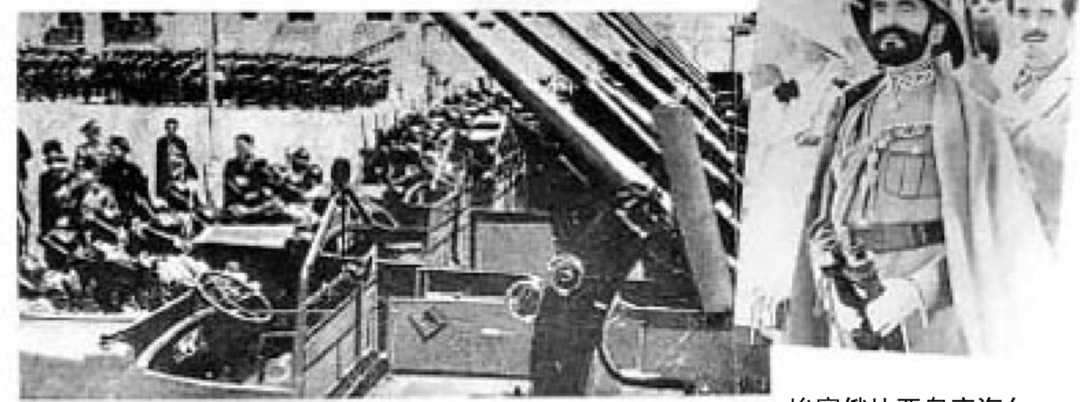
德国宣布重整军备

希特勒和空军部长戈林视察新建的飞行队

講和條約の軍事條項
獨逸 廢棄を宣言す
徵兵制度を即時復活
全歐に大衝擊！
自衛と平和保持

当时的报纸刊载的关于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消息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墨索里尼检阅开往埃塞俄比亚战场的机械化部队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视察前线

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和“二·二六”事件

日本天皇裕仁

青年將校等·重臣を襲撃

國體擁護を目的に蹶起

首相 內府 教育總監即死

侍從長重傷 藏相負傷

內閣·總辭職を決

日本强迫和尚进行军事训练

有关 1936 年 2 月 26 日青年将校军事政变的报刊资料

这起具有冲击性的事件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打开了新的侵略战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殖民地国家——满洲国

日寇炮制的以溥仪为皇帝的满洲国，在“王道乐士”、“五族协和”的美名下，加速了殖民地化过程。



掌握了满洲实权的关东军司令部（长春）



日寇安排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以平息世界各国对他们霸占满洲的谴责。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1935，夏，莫斯科）

朝鲜军事基地化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老巢——朝鲜总督府



朝鲜总督视察
朝鲜北部地区



兼二浦炼铁厂和兴南氮肥厂变成了兵工厂



将朝鲜革命推向

新的更高阶段



南湖头会议会场

1936年2月27日，我在会上所作的报告。



在迷魂阵密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们

在 迷 魂 阵 密 营 里



金 哲 镐



崔　贤



金 明 花



李 东 伯
（游击队员们戏称他为
“烟斗老头”）

挺 进 白 头 山

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进一步加强

东满各地和朝鲜国内的热血青年大批参军。曾被打成“民生团”嫌疑分子的一百多人都被编入了主力部队。



金 泽 环



李 东 学



金 正 弼



继承我国革命血统的马鞍山儿童团员

团政委金山虎。他为马鞍山儿童团员运来了大量布匹。

李 五 松

金 泽 万

马鞍山儿童团员中涌现出许多勇士



金正淑和她的会宁旧居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女战士（左三为金正淑）



张蔚华的父母

张蔚华的爱人



张蔚华烈士纪念碑。在他逝世五十五周年时建于抚松（1992 年 10 月 27 日）。



同张蔚华子女合影

（儿子张金泉、女儿张金禄）

具有历史意义的祖国光复会的成立

1936 年 5 月 5 日



宣布祖国光复会成立的东岗会议会场（抚松）

《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

宣告祖国光复会成立的革命标语

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章程

统一战线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西安事变



朝日新聞

蔣介石氏・突如監禁さる

張學良氏、兵變を指揮

對日宣戰、容共を通電す

潼關以西の交通全く途絶

西安に大部隊蜂起

南京に戒嚴宣布

國內外の通信禁止

大規模な兵變

西安事变结束了中国的内战，打开了新的国共合作的道路。图为介绍西安事变（1936.12）的报刊资料。

西班牙人民阵线

1936年,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下的西班牙人民,为反对佛朗哥法西斯叛军进行了艰苦的内战。他们对德、意国际法西斯势力所支持的叛军的英勇战斗，受到了国际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的广泛支持，大大鼓舞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和反帝统一战线运动。



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志愿兵抵达西班牙

马德里受到佛朗哥叛军的空袭



西班牙义勇军女战士

目　录

第十章

满怀自主的信念

一　狂暴的旋风

二　在大荒崴的争论

三　共青组织的产儿

四　对四道沟惨案的回答

五　将革命种子播在广阔大地上

时期：1935.2～1935.6

一　狂暴的旋风

苦难的日子像梦幻一样消逝了。曾阻拦我们前进的重重雪岭远远消失在后面，血迹斑斑的远征胜利结束了。朝鲜共产主义者面前展现了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发展革命的新前景。我拖着被病魔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上老爷岭，同队员们一起俯瞰汪清的连绵山岭，发出了欢呼声。几个月来在硝烟和严寒中的积劳，一下子云消雾散，好像回到了家乡后山一样，心潮澎湃。

可是，我回到汪清以后，由于在远征中得的伤寒后遗症，又病倒在床上，同高烧搏斗了几天。这时，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肃反"的狂风把游击区弄得满目疮痍。我的"护理兵"们也满腔怒火地向我控告左倾分子的罪行，说他们把游击区糟蹋得惨不忍睹。

仅在几个月前，汪清的党员、共青盟员和妇女会员们，还兴致勃勃地为革命到处奔波，如今他们却诅咒着那些丧心病狂的杀人脚本的作者和扮演者，离开了自己用鲜血开拓并死守的游击根据地，四处流落。

我感到浑身战栗，好像心脏都冷却了。可怕的绝望和挫折感，使我感到宇宙的一切像一下子都停止了运动，世上万物也像被冰川冲击得粉碎。

我们在罗子沟所经受的考验虽说很艰苦，但与此相比，就谈不上什么艰苦了。我带病率领只有十六人的队伍翻越天桥岭时的苦难，

虽然也很深重，可是同“民生团”问题给我的痛苦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了。那时，阻挡远征队前进的障碍是清楚的，那就是穷追不舍的敌人和我的伤寒病。

我们得到金老人这样的好人的帮助，冲过了敌人的封锁；靠赵宅周老人这样的恩人的救助，摆脱了饿死、冻死、病死的危险，是人民给我们开出了一条生路。

可是在间岛的游击根据地，却出现了革命打倒革命的悲剧。打倒人的人和被打倒的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或对立。可是，那些打倒人的人却把被打倒的人规定为敌人，无情地把他们从革命队伍中除掉了。那些被提到“肃反”审判台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惜为革命捐躯的、经过考验的战士。

那么，在这场革命打倒革命的稀奇古怪的“扫荡战”中，辨别敌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应该把什么人看做敌人，把什么人看做自己人？“肃反”指挥部给那些被他们处决的几百几千人都打上了敌人的烙印，这种判决是妥当的吗？如果这种判决是不妥当的，那么，对那些指挥“肃反”工作的人，该作何评判？我们应该支持谁，反对谁？

这是因几百几千名革命者的流血而严重动荡的东满的现实向所有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

我的身体，我的心灵，都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然而，腰营沟既没有能够治我病的名医，又没有什么好的药材，只有几个懂点民间疗法的队员，轮流坐在我的枕边尽心尽意地为我作冷敷。

小北沟的人们给我送来了蜂蜜和狍子血，中国老人们也带着热茶水来探病。他们嘱咐游击队员们好好护理我，说只有金司令身体康健，才能坚守游击区，才能继续抗日。

蜂蜜、茶、狍子血都是上好的补品，我把这些都送给了远征归

来卧病不起的战友们。他们有的闹重感冒，有的受了冻伤，有的患了大肠炎或支气管炎。

有一天，我忍着恶寒，由宋甲龙搀扶着去探望卧病的队员。那时最刺痛我心的是参加过远征的战友们披在身上的破衣服，破烂得不忍目睹。他们的军装被硝烟熏黑，被枪弹穿破，留下了战火的累累痕迹。

他们都是整个冬天在严寒中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我多么想给他们穿上一身好军装，让他们饱饱地吃上一顿油香扑鼻的美餐呀！

我急迫地叫传令兵到缝纫队跑一趟。我对他说，去年秋天部队开始远征北满时，我曾交给全文振一项任务，叫她预先做好下一年给部队穿的夏装，如果已做好了，你就先挑二十来套带回来，好给远征归来的战士们穿。

当时，缝纫队在远离大荒崴的松树沟密林里，成员只有全文振、韩成姬等几个人。全文振是在东宁县学过一点缝纫技术的老队员，而韩成姬则是在腰营沟做过儿童团工作的新队员。

和传令兵一起背着军服赶到腰营沟来的却不是全文振，而是韩成姬。她几个月来盼着去北满的远征队归来，在像一座孤岛一样与世隔绝的松树沟密林里精心照料着有身孕的全文振。她一看到我病在床上，就扑簌簌地淌下了眼泪。

我把她带来的军服分给远征队员换上之后，就打发她回缝纫队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原以为回去了的韩成姬，却端着一张放有一碗松子粥的小饭桌，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很纳闷，便问她：

“玉凤，你怎么还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吗？”

玉凤是她的小名，她还有个别名叫韩英淑。她好像犯了什么罪似地垂下了头。

“将军，请原谅我……昨天我没有回松树沟去。”

我无法相信她的话。她是个忠诚、淳朴、耿直的女子，无论在儿童团时代，还是在入伍后，从没有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如果她没有执行我的指示，那就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了。

“我是想回去的，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脚步。将军还病在床上，要是我回去了，文振姐会高兴吗？”

她为我担心的殷切心情，使我十分感激。

我把一个包着小米和裙带菜的包袱塞进她的背囊，劝她说：

“这里照料我的人有的是。你就别为我担心了，今天马上回松树沟去。要是你不回去，全文振该怎么办，听说她已临月了，一个人怎么能分娩呢？”

“将军，别的什么命令我都执行，只有这项命令……文振姐说，要是我不护理您就回去，她就不饶我。

“将军，您也得替我想想啊！您的病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可您身边没有一个女队员照料，像话吗？”她反而竭力说服我。

“成姬，我求你，你还是快回去照料文振同志吧！”

这时，李孝锡连长为她解了围。

“队长同志，韩成姬就是回去，也当不了产婆，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姑娘，怎么能接生呢！”

连长说准备派个有经验的妇女去。我也就只好依他了。

从那天起，韩成姬就不分白日黑夜地精心护理我，每餐都给我端上一碗松子粥。看来，四连的战士们是受她的嘱托，到腰营沟的松林里拣来了许多埋在雪堆里的松果。连长也每天早晨亲自带着一

根棍子去找松果。

韩成姬通夜不眠，热情地照料我。她说，如果她护理不周，不能使将军恢复健康，她就没有资格做朝鲜人。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垫在我的鞋里保暖。凭这一点，我就断定她是一个重情义，有笑有泪，不惜献出血肉的人。

血统是瞒不了的。韩成姬一家人都是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革命者。她的父亲韩昌燮是同李光、金哲、金银植等一起很早就在北蛤蟆塘一带参加了抗日革命的先觉之一。当时，她父亲作为大房子反日会的负责人，为筹措李光别动队的军粮东奔西走，于 1932 年春被日军“讨伐”队刺死。韩成姬的姐姐韩玉善也被敌人逮捕，处以火刑。她的哥哥韩松宇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我的战友韩兴权，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之前，曾和我们一起在汪清多次进行过敌后活动，后来在北满的抗日联军当上了名震四方的支队长。他就是韩成姬的堂哥。韩兴权五兄弟都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烈士。

韩成姬两姐妹为了替父亲报仇，决心参加游击队。

可是，两个女儿都离开了家，由谁来侍候母亲，操持家务啊？姐妹俩就谁去谁留的问题争执不下。韩成姬年纪小不够格，总是处在下风。

“别小看我年纪小，姐姐做的事，我也不是都做了吗？个子也不比你矮呀！”

韩成姬这样反驳姐姐，姐姐却从容不迫地反击说：

“你个子倒不小，可你那一身乳臭怎能瞒得了人呢！爬不上去的树，干脆别往上瞧。你就留在家里好生侍候妈妈，过好儿童团生活好了。”

两人相持不下，谁也不想把参军的荣誉让给对方。

当姐妹俩在被窝里为各自的未来命运争论不休的时候，母亲偶然听到了她俩的对话，便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土布裙子拆了，连夜赶制了样子和大小完全一样的两个背囊。第二天，她又做了炒面给两个背囊装得满满的。再过一天，韩成姬姐妹俩才知道，这两个背囊是为她俩准备的行装，也是母亲所能给予她们的嫁妆一样的东西。

那天，母亲把两个女儿叫到跟前说：

“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希望你们来奉养。祖国都没有光复，还讲什么孝道？你们不照料我，我也能活得下去。你们俩马上就去参加游击队吧。”

“妈妈！……”

姐妹俩哭着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她们许下感人肺腑的誓言，流泪告别了母亲。1934年春，我们把韩成姬调到指挥部直属缝纫队去了。

她是个很有前途的女队员。如果说她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她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过于温顺；作为一个军人来说，她又出奇地老实，缺乏警惕性；正因为她缺乏警惕性，才被敌人逮捕，在革命的中途停住了脚步。

那是她在接到我要她回本队的命令和其他队员一起北上之后的事，途中在宁安县二道河子的树林里被敌人包围了。几十个伪满军端着枪向他们逼近，可是，年轻轻的女队员竟毫无察觉，正哼着歌子在河边洗头发。就这样，韩成姬被敌人逮捕了。当我们挺进到抚松地区组建新的师的时候，她正在罗子沟受审讯，受尽了折磨。

在看守囚徒的敌兵中，有个有良心的朝鲜人，暗自同情韩成姬。原来他是参加过革命的，后来被敌人逮捕了，在归顺书上画了押，过着耻辱的生活。他得知刽子手们准备杀害韩成姬，便劝她越狱。

他说，他也准备把枪扔掉，一起逃出去，或者回朝鲜，或者躲到深山里去搭个草棚过日子。韩成姬同意了，并且在他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魔窟。后来，他俩成了夫妻。

我们听到韩成姬被捕的消息，都万分痛心。有些女队员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也难怪，她们失去了像亲妹妹一样爱护的战友嘛。熟悉韩成姬为人的汪清时代的老战士们，现在也在深情地缅怀她。

听说，韩成姬的子女们对母亲的经历深感惋惜：要是母亲也像别的抗日女战士们那样，在游击队队伍里坚持斗争，直到祖国解放的那一天，该多好啊！

当然，如果韩成姬没有被逮捕而继续坚持了斗争，那就再好不过了。

可是，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大道，更不像一百米赛跑那样，信号枪一响就向终点线冲刺那么容易。

可以说，在成功与失败、前进与后退、高潮和挫折的周而复始中不断奔向胜利的行程，这就是革命。在这漫长的行程中，怎么会没有坎坷与曲折呢！

听说，每当韩成姬的子女们埋怨父母的时候，她就劝诫他们说：

“爹妈的历史有污点，可你们用不着烦恼。朝鲜劳动党是不拿父母的过错来责怪他们的子女的。父母犯的罪，不能由他们的子女负责，这就是我们的领袖的政治。问题就看你们自己了。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一心为领袖尽忠好了。”

我认为韩成姬这样教育子女是很对的。她是一位完全信赖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忠诚而纯洁的女子。

我多亏韩成姬给熬的松子粥和鹿肉小米粥，第三天就从病床上站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李孝锡连长向我详细地汇报了反“民生团”斗争的狂风席卷游击区的实况。他一一列举了哪个县杀害了哪些干部，哪个县把哪些指挥员打成“民生团”杀害了。如果他的叙述属实，那就可以认为间岛各县、区的领导干部和游击队连级以上指挥员几乎全被肃清了。朝鲜人凡是有点文化的、能说会道的都被抓去杀害了。我们部队远征北满时留在汪清的指战员中，可以说是骨干的精干分子都被抓去杀害了。没来得及处决的，就把他们的书记、会长、区委等一切职务都撤了。

“民生团”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殖民统治智能化的产物。日本帝国主义搞出“民生团”的用心，是要用阴谋诡计来毁灭朝鲜革命。他们实行刀枪政治，行不通；在“文化统治”的幌子下大肆宣扬“内鲜一体”、“同祖同根”，也无效；于是便想出这条诡计，煽起朝鲜人的同室操戈，来消灭革命力量，解除他们在维持治安上的苦恼。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地方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朝鲜总督斋藤为此感到极大的忧虑，便指使作为间岛视察班成员被派到东满地区的朴锡胤、延边自治促进会的头目全盛镐、驻延吉的“满洲国军”军事顾问朴斗荣、特级反共特务金东汉等亲日的民族主义势力出面，于 1932 年 2 月在延吉制造出了“民生团”。

“民生团”在表面上打着什么“确保民族的生存圈”啦，什么“建设自由乐土”啦，又是什么“朝鲜人的间岛自治”啦等冠冕堂皇的幌子，叫嚷得好像解决朝鲜人的民生问题是它的最高宗旨似的，实际上这个组织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特务组织，其目的是削弱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陷害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人民群众中孤立他们，离间朝中人民，以便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

“民生团”的“成立宗旨”、“纲领”等文件，把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统治下的“生活的产业化”说成是朝鲜民族可走的“唯一活路”，只看这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出它的反动本质。敌人一方面把他们对朝鲜和满洲的殖民统治时期描写成“确保和扩大生存圈”的最好的“绝对时期”，把在殖民统治秩序的羁绊下变成了黑暗世界的朝鲜和满洲描绘成“自由”和“自律”的“大地”；另一方面则大肆叫嚷要在间岛一带“建设”朝鲜人的“自由乐土”，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朝鲜人欢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实行殖民统治，对间岛一带抱有领土野心，以破坏朝中两国人民、两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和革命纽带。

只看“民生团”的发起人和它的团长、副团长和理事的经历，就很容易看出它是彻头彻尾的反共走狗团体。

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为拼凑这个组织全力以赴的京城甲子俱乐部理事曹秉相、《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延边自治促进会的全盛镐、金东汉等，虽然都以大谈爱祖国爱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自居，但无一例外地都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一手豢养的民族叛徒。

朴锡胤十六岁留学日本，就开始了亲日活动。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法科和研究院、英国剑桥大学等第一流大学修业，生活十分优裕。他在英国留学时，朝鲜总督府学务局每月还给他汇去三千多圆的巨额学费。

他从海外留学归来后的职衔就更是显赫了。他任过《东亚日报》记者、《每日申报》副社长、日本外务省特约“满洲国”外交部参事官、“满洲国”驻波兰总领事等等，后来他还作为曾在苏日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成员，参加过 1932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大会。只看他如此显赫的资历，就不难看出他是受到日本统治集团多么深厚的信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

让他保持民族主义者的外衣，允许他写过非难殖民统治的文章，允许他为反对“创氏改名”同朝鲜总督正面对抗，还让他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末期吕运亨[1]主持的建国同盟，可是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对他都有“民生团”的怨恨，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好人看。

解放初，他化名朴大愚隐居阳德，后来被揭发出来，作为民族叛徒受到严正的审判。他在法庭上供认：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实现朝鲜人的“民族自治”是他的政治理念，他曾想朝鲜也应该走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和南非联邦那样的政治发展路子，从这种政治理念出发，他亲近过斋藤总督，也崇拜过日本有名的称霸世界论者和东亚联盟的精神鼓吹者之一石原莞尔。

他竭力否认成立“民生团”的宗旨是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他说，“民生团”的最初目的纯粹是“确保生存圈”，这个组织沦为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特务组织，是他离开了间岛以后的事；后来他听到反“民生团”斗争造成的深重灾难，感到十分震惊；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

朴锡胤的供词有多少真实性，是只有历史才能判断的。但是，不管真伪如何，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心腹，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

起了“民生团”的催生婆作用的朴锡胤是受日本影响很大的人；而“民生团”的凶手金东汉，则是受俄国影响很大的人。金东汉的政治生涯是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他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在俄罗斯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高丽共产党军事部委员和军官团团长，充分发挥了他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气质。可是，20 年代初，他在滨海省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当即叛变，当上了反共第一线的亲日特务。

“民生团”解散后，金东汉得到关东军许可，组织了“民生团”

的后身“间岛协助会”，还收罗了一百多个反动分子组成义勇自卫队，疯狂地对革命军进行“讨伐”。他是个彻底被日本同化的人，甚至他本人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朝鲜出生的日本人；他也是叛国叛族劣根性深入骨髓的特级叛徒，他甚至大肆鼓吹朝鲜民族应该把日本当做祖国，尽心尽意为日本效劳。仅据《满鲜日报》刊登的资料，在他的策划下“归顺”的共产主义者竟达三千八百人之多。

金东汉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吉西公园立了他的铜像和“间岛协助会”显彰纪念碑。

“民生团战略”曾声称，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间岛治安战略”推行思想谋略，“弄清了间岛省内组织的全貌，逮捕了约四千人，成功地破坏了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里有必要揭露一下这个所谓“民生团战略”的真相。

“民生团”并不是由民族主义者为解决间岛的民生问题而组织的，这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可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给这个组织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费尽了心机。他们用解决人民疾苦这一华丽词藻把“民生团”的招牌装饰得富丽堂皇，对它赞不绝口，可是东满的革命组织很快就发现这个组织的头头们频繁地出入日本领事馆的后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敌人未能长期掩盖“民生团”的真面目。我们一面用革命出版物和口头讲演及时揭露其真面目，一面开展了反对“民生团”的群众运动。被其招牌所迷惑，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民生团”的人们，很快就退出了这个组织；而那些沦为敌人的走狗参加了破坏活动的人，则被群众揭发出来处决了。

“民生团”成立不久，就尝到了解散的苦酒。日本帝国主义未能把“民生团”打入我们的队伍。

那么，没有“民生团”的反“民生团”斗争为什么得以持续？

不是“民生团”的人大量地被打成“民生团”遭到杀害的事态，为什么在有党、有人民政权的间岛游击区得以持续三年之久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由斋藤总督的全面扶持和龙井日本领事馆幕后积极活动而出笼的“民生团”，于 1932 年 4 月，根据新任朝鲜总督宇垣的意思，在驻朝日军向间岛派兵的时候被解散了，但这只不过是在形式上销声匿迹罢了。“民生团”组织虽然解散了，但使它复活的活动却以金东汉、朴斗荣等为中心，在暗地里积极开展起来。

1934 年春，延吉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日本战败时任华北特别警备队司令官)和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大队长鹰森孝同朴斗荣等亲日分子，重新讨论间岛的治安问题，决定复活“民生团”组织。这样，“民生团”第二阶段的破坏活动便开始了。

他们明确地指出，组织“民生团”是一项以满洲省委属下的东满特委为对象的思想谋略措施，并把主要活动规定为：第一，“强有力地推行促使朝鲜人游击队自行分崩离析的措施”；第二，“切断朝鲜人游击队的粮道”；第三，“积极地劝告朝鲜人游击队投降、归顺”；第四，“保护投降归顺者，监视其定居”；第五，“对投降归顺者进行职业教育，介绍生业”。这一切破坏活动均由延吉宪兵队总管。

1934 年 9 月，敌人以“统一处理”随着“民生团”活动的强化将出现的“归顺投降者”，“核实归顺者的背景关系和归顺的真伪，并进行洗脑教育”为目的，设置了一个叫做“间岛协助会”的特殊机构，把“民生团”并入了这个机构。

以金东汉为头子的“间岛协助会”，巧妙地利用东满特委的反“民生团”斗争，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

阴险狡诈的日本阴谋家们，在以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为对象的

思想谋略活动中，作为主要基础的政治要点，是利用东满抗日游击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体系的特殊性。他们把人民革命军是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武装力量这一点看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家们自作聪明地认为，中国人干部不会信任朝鲜人党员，会不断地监视朝鲜人党员，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并企图利用这一特殊性来离间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

朝鲜人在满洲流血，这同朝鲜独立和民族解放毫无关系，而你们为什么要拼命作战呢？在力量上占优势的朝鲜人为什么要受中国人指使，在无谓的斗争中流血呢？快些觉醒吧，投降归顺的道路是敞开的……他们把极力灌输这种思想作为“民生团”思想谋略活动的主要宣传要领。

“民生团”解散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特务和走狗散布谣言，说大量的“民生团员”打进了游击区，以图陷害坚贞的干部和革命者，使他们互相猜疑和疏远。敌人在题为《破坏间岛共产党的经验》的秘密文件里吐露：起初，他们把“民生团员”每十人为一组派出去打进游击队，可是都被揭发和处决了，无法再打进去，便开始施展挑拨朝鲜人和中国人、工人和农民、上级和下级，使他们互不信任的离间策略，使共产主义者自相争斗。

在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的骚扰活动中，日本的阴谋家们施展的伎俩确实是惊人的。他们用的手法中还有这样的手法：比如，东满特委的某个干部到地方去巡视，他们就在他必经的路上丢一封写给过去来当地指导过工作的县级干部或区级干部的信件。特委巡视员捡到这样的信件，会怎样看待那个收信人呢？

反“民生团”斗争之所以走上极左路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窃据了满洲省委、东满特委、县委、区委的负责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左

倾机会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具有政治野心。

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独占领导地位，企图使不断胜利发展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从属于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而那些没有丢掉派别劣根性的事大主义者，则在他们的支持和默许下企图利用这个斗争，从队伍中无情地除掉一切有碍于实现其宗派目的的人，以扩大自己的派别势力。

给他们提供了篡权夺位借口的正是“民生团”。只要一宣布你是“民生团”，应该让出地位或该死，就算完事。这种判决是不得上诉的，即使上诉也没用。

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民生团”渗透的谣言，对那些企图独占党、群众团体和军队所有负责地位的人的霸权主义、名利主义的欲望，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他们以反“民生团”为名所取得的扶摇直上的“肃反”成绩，给那些企图彻底绞杀游击区革命力量的阴谋家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总之，可以说敌我相配合残酷地摧残了游击区。这种奇怪的勾结，恐怕是世界上任何革命战争史中都没有的。

反“民生团”斗争用这种连法西斯国家的军法和中世纪的宗教刑罚都相形见绌的荒唐、残酷、粗暴的方法进行，其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奸险的阴谋和被欺骗的东满特委一些人在思想政治上的迟钝，以及他们所追求的卑鄙无耻的目的。

当时，他们识别“民生团”的标准是无限制的，将其按形态分类的话，竟多达几百种。

游击队炊事员偶或煮饭夹生、饭里杂有砂粒，也会成为被打成“民生团”的理由；让人用水泡饭吃，也会构成“企图让游击区人民生病”的证据和给扣上“‘民生团’作祟”这一可怕的帽子的理由；

你泻肚子，就说你削弱了战斗力，把你打成“民生团”；你叹口气，就说你涣散革命精神，把你打成“民生团”；你不慎枪走了火，就说你给敌人打信号弹，告诉游击队的位置，把你打成“民生团”；你说句怀念家乡的话，就说你鼓吹民族主义，把你打成“民生团”；甚至你工作好，也说你是为了掩盖真面目，假装积极，把你打成“民生团”……真是嘴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从这种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能不被打成“民生团”了。

反帝同盟和龙县委负责人外号叫“高跳”的到长仁江去做政治工作时被自卫团逮捕，和三十多名爱国者一起被拉到刑场。自卫团员们把他们排成一行，一个一个地砍他们的头。“高跳”当然也不能幸免。可是，说也奇怪，他的头没有落地，脖颈上的皮肉被刮下来贴在脊背上，浑身血肉模糊。这是比死还痛苦的致命伤。在他昏倒在地上的时候，敌人离开了刑场。半夜他苏醒了，勉强爬起来，咬着牙忍痛把翻到脊背上的皮肉扳过来贴在脖颈上，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包扎好，就连爬带滚地翻过六十多里的险山峻岭，终于回到了渔郎村游击区。可是在他的伤口还没治好时，左倾分子们就把他拉到群众审判场，说他是敌人的走狗，是为了深深打入革命队伍，故意弄伤了脖颈回到游击区的。虽然左倾分子们冗长地罗列了他的“罪行”，但被迫聚集到审判场的群众，却没有一个赞同他们的判决。这场审判的组织者们只好作出留待查看，以弄清真面目的判决。可是事后他们还是把他暗杀了。

在把反“民生团”斗争引向极左的泥坑方面，和龙县搞得最过火，最残酷。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占据党组织领导地位的人们，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任意玩弄人们命运的缘故。

“肃反”的矛头集中指向那些在革命实践中起模范作用、在群

众中有威望的人以及不献媚、不屈从、对不义之事毫不妥协的坚贞的人。

在朝鲜人干部当中，搞反“民生团”斗争搞得最“左”的是金成道。东满特委在汪清的时候，他在那里过着腐化放荡的生活。他常常带着妻子，和特委、县委的干部一起喝酒、打纸牌。他的妻子以新女性自居，懒于料理家务，家务事几乎都叫儿童团员们包下来。他说罂粟花好看，就发动群众种罂粟，制成鸦片送给他。可是，他却张口闭口大谈什么“清廉政治”。

私生活如此龌龊的金成道竟把忠诚的革命者打成“民生团”，真是荒谬绝伦。他甚至强迫儿童团员写坦白书，说自己加入了“民生团”。

在政治工作中立了很多功劳的龙井东兴村联络站负责人金根洙，也被左倾分子拉到刑场。金根洙在刑场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是‘民生团’。你们实在信不过，就把我的两只脚截断，可不要杀我。把两只脚截断了，不就不能逃跑了吗？要是这样，我还可以用手编席子来为革命作一点补贴。我只恨不能继续干革命就死了。”

可是，“肃反”指挥部反而说：“你们看，这家伙临死还起着‘民生团’的作用。他们终于用棍棒把他打死了。

“肃反”的铁锤超出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范围，还落到了游击队的头上。

杨泰玉有个富有乡村意味的外号叫“锄头刮子”，是个游击队的模范战斗员。他也被扣上“民生团”帽子，被拉去受群众审判。“罪”名是故意弄坏了枪栓。

他的外号“锄头刮子”，是在他和组织负责人一起到三蒲洞的饭馆夺取了缉私队员的枪之后得的。那时，两个缉私队员在饭馆里抽大烟，一个在门口放哨。杨泰玉就和那个放哨的搏斗。他看那家伙

力气大，打不过，就从腰里拔出小锄头狠狠地刮了一下那家伙的脸。那家伙痛得捂着脸倒下去，他趁机背起枪，气喘吁吁地往三蒲洞的山上爬。他一面爬，一面禁不住要放一枪试试，便轻轻地扣了一下扳机。奇怪，枪不响。他一看，枪没打开保险盖。他便用锄头敲打枪栓，打开了保险盖。可是，就因为他给枪栓留下了伤痕，后来被开除出游击队，驱逐到敌占区去了。

被左倾分子和宗派事大主义者硬扣上“民生团”的帽子，或处以极刑，或驱逐出游击区的人，大都和“锄头刮子”一样，是为革命不惜牺牲性命的勇敢的优秀战士。难道这样的战士为了去当“民生团”，才铤而走险，大白天拿着木头手枪或锄头去夺取武装警察的武器吗？这些热血战士既没有理由加入“民生团”，也没有必要参加反革命。那些组织审判、判他们有罪的人，难道连这一点都没有能力判断吗？不，这不是有无判断力的问题。凡是参加革命的人，怎能是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的白痴呢！

据安图的战士们作证说，仅车厂子一地就有数百名朝鲜人被扣上“民生团”帽子惨遭杀害。

同东满党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又熟知间岛实情的周保中，也在他的回忆录中作证说，被扣上“民生团”帽子惨遭杀害的人多达两千人。

指挥反“民生团”斗争的人们，为了提高“肃反”成绩，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成员以至儿童团的积极分子，对所有有“民生团”嫌疑的人，都采用了共产主义者难以想象的毒辣手段，对其施加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在“肃反”运动中带过头的金成道、宋一和金权一，后来也被判为“民生团”，遭到枪毙。

宋一和金权一本来都是好人，但因为没能树立主体，盲目追随上级，犯了不是出自本意的错误。我听到他们在刑场为我喊了万岁的消息，着实感到惊讶。他们两个人跟我常常就重要的路线问题进行过争论。显然，他们是到了刑场上才恢复了理智，冷静地反省了自己的。

朴贤淑是在汪清屈指可数的第一流新女性。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小汪清人们都叫她“明星眼”。她在文艺上颇有造诣，曾在汪清担任过儿童局长。她年纪并不大，但有比较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的公公崔昌元(崔老头儿)是县反帝同盟负责人。

在朴贤淑还没有同崔亨俊结婚的时候，由她领导的牡丹川的儿童团员们常常替他们两人传递信件。她还时常把钱交给儿童团员，让他们到商店去购买东西送给游击队。这些东西经“明星眼”的手转送到秘密游击队和忙于组建别动队的战士们手里。

秘密监视朴贤淑一举一动的敌人，终于下了缉捕令。那天，“明星眼”到一个朋友家去参加婚礼。警察闯进这家行凶，要他们把朴贤淑交出来。她藏在天棚上看到这家主人就要为她遭罪，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容不迫地走到警察面前说：“我在这儿。”

朴贤淑被关进监狱，被拷打得皮开肉绽，但她始终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乡亲们去探监，她就作几首革命歌曲装在乡亲们送给她的糕盆里带出来，反过来鼓舞外边的群众和同志们的斗志。后来，警察释放了她。

朴贤淑和崔亨俊结婚那天，百草沟警察为探出什么线索，竟派来了三个警官，说是要看看女共产党是怎样出嫁的。他们喝了酒，还要新娘唱歌。朴贤淑便大声唱了革命歌曲。警官们醉醺醺地听了新娘唱的歌，也不知道唱的是鼓吹革命的歌，还说女共产党是个了

不起的名歌手，竟然连连喝彩，要求再唱一首。

朴贤淑的爱人崔亨俊也是个忠于革命的人。他的家庭生活处理得很好，革命工作也搞得很好，后来不幸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腿，成了瘸子。打那以后，他工作得就不如从前好了，因为他没有马，没有车，瘸着腿走远道，工作成绩自然不如别人。就凭这一点，“肃反”指挥部就给他贴上“消极分子”的标签，扣上“民生团”帽子，加以监视和迫害。朴贤淑也因是“民生团”的妻子，被撤掉了领导职务。

这时候，她决心要离婚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批评“明星眼”说，“民生团”问题是暂时的，早晚会得到解决；崔亨俊做地下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到了游击区后也把工作搞得很出色，又是个很有理论水平的人，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这太不对了。

后来，我们把朴贤淑送到苏联去了。如果“明星眼”还活着，不知她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回忆反“民生团”斗争的狂风使草木都发抖的汪清时代。

游击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发生了动摇。人们苦涩地想道：所谓革命也就是那么回事，动不动就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自相残杀；在这一片荒芜的间岛大地上，开了荒的是朝鲜人，开创了革命的也是朝鲜人，可现在把这些先驱都杀掉和赶跑了，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难道这个肃清不是为了掌握领导权的吗？为了掌握权力，就连过去的情义和关系也都弃如敝屣，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人？如果这就是革命，何必去干这样的革命啊！与其玩这种鬼把戏，倒不如带着家小回家乡去种地或进山当和尚敲木鱼好呢！反“民生团”斗争的狂风就这样扭曲了人们的人生观和革命观。

这样一来，一般群众自然就放弃革命逃到敌占区或杳无人烟的地方去了。人们为了干革命来到这里，却被革命遗弃，落到了无以

托靠的境地，哪里是他们可以栖身的地方啊？干革命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死亡。革命是为了活得像个人，活得更好，才干的；死也要为正义而死，为正义而光荣地死在战场上，以死换取永生，这才叫干革命。

可是，在这里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永生啊？革命者竟然无缘无故地被昨天还同吃一锅饭的人所杀害！

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我宣布过去因反“民生团”斗争而到敌占区去“归顺”的人是无罪的。他们为了躲避不白之冤，不被那些连革命也不让干的人杀害，而离开了游击区，这怎么能说是他们的罪过呢！

残酷的屠杀染红了汪清的河川和古洞河的水，间岛的条条山沟怨气冲天，哭声不绝。

史忠恒也对这种现实感到幻灭，离开了间岛，去了北满。他说，我走了，再也不能在这里闻血腥味了，在共产党施政的地方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东满特委的领导班子给共产党丢丑了。

我看出反“民生团”斗争的严重性，为了更具体地了解真相，会见了许多人。

当时，敌人的“讨伐”十分猖狂，腰营沟人民都躲到森林里去搭起土窝棚过日子，革命军则在游击区入口处盖了兵营，保护群众。从游击队兵营到村子约有十五里地。

我带着传令兵到村子去和老人们谈话的时候，洪彗星来找我，说她有话要跟我说。我结束了同老人的谈话，去见了她。她咬着嘴唇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说：

“指挥部的人们欺人太甚了。怎么能受得了这份窝囊气呢！我来到汪清，什么苦我都咬着牙忍受了，可这份气实在受不了了。与其

在间岛受这份气干革命，不如到国内去搞地下工作。虽说不能像这儿一样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地下斗争还是完全可以搞的。至于经费，我可以把父亲的药房和全部财产都豁出来供给您。咱们回朝鲜去吧！”

我用手示意，叫她小声点。

“彗星，现在是什么时候，还随便说这种话？”

“我是相信将军，才说这话的。”

“俗话说，隔墙有耳嘛。最好不要说这种话了。”

我听了她的表白，禁不住心情惆怅，甚至心想：连洪彗星都决心离开游击区，那么留在汪清继续干革命的到底能有几个人呢？她是个比任何人都更热爱游击区的姑娘。游击区也十分爱护她。她既是大无畏的地下工作员，又是孩子们喜欢的生气勃勃而热情的老师。她虽然没有行医执照，却是一个善于诊断和治疗的非专业医生。东满特委的领导班子和汪清县委的干部中，就有不少人经过她的治疗，医好了三年未治好的疥癣。他们都很感激她，干部们也都称赞她是个才女。

洪彗星一直认为自己是游击区所需要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人。现在她却一反常态，劝我出走。只凭她这一句话，就会被打成“民生团”遭到处决。她信得过我，才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这使我很感激。游击区的空气是那样地杀气腾腾，使得那样热情、那样充满斗志的洪彗星，也决心出走了。这个遍地躺着同志们尸体的间岛，对她来说，已不是她全心全意热爱过的新天地和安乐窝了。

然而，她的建议，我是不能接受的。

“彗星，那样是不对的。我一个人是死是活，不算什么问题。到了这个决定革命兴亡的关头，经不起苦难，而选择好走的路子走，那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呢？就是再苦再烦，也要在这儿挺住，解决‘民生团’问题，继续进行革命。这才是革命者应

走的路，才是挽救革命的路。”

洪彗星听我这么一说，就揩着眼泪，凝视着我说道：

“那些话是我心里太闷、太渺茫才说的，请您原谅吧！为了向您说这些话，我望眼欲穿地盼着您从北满回来。不只我一个人是这样啊！

“人们在关‘民生团’的监狱里，也一直在想念队长同志：金队长什么时候回来？金队长那里有消息没有？能不能把东满的情况告诉金队长？您知道人们多么焦急地等待您回来吗？可是，这里老是传来这种风声，说北满远征队都死光了。日本鬼子也在报纸上这么说。”

洪彗星忍不住郁愤，双手捂住了胸口。

我望着她眼角上血滴般的泪珠，感到撕心裂肺般的内疚。

洪彗星的话使我不能不深刻地想到自己作为朝鲜的革命者所负的责任。革命就这样被葬送呢，还是重新复活起来？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如果不能制止威胁千百万生灵的“肃反”大屠杀，那么我自己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朝鲜的儿子，也就没有必要活在世上。

因此，我建议东满特委的领导为纠正反“民生团”斗争的偏向召开一次会议。满洲省委的巡视员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要召开这种会议的倡议。

几天后，我接到一张通知书，说要在大荒崴召开东满地区军政干部联席会议。

临行前，我去找炊事班的兵房，准备给洪仁淑大娘送一件从北满带来的衣料，作礼物。听说，她蒙受“民生团”嫌疑，几个月来一直很消沉。战友们警告我说，要是给“民生团”嫌疑送礼，队长也难免叫“肃反”指挥部的人抓住把柄。我不听他们的警告。难道人道主义也会成为罪过吗？岂有此理？

二　在大荒崴的争论

如果以为我同党的东满领导班子之间就“民生团”问题发生的争论，是从大荒崴会议上才出现的，那就不对了。这个争论早在 1932 年 10 月，我们的部队挺进北满到达汪清停留一些日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当时，作为在汪清的头一项工作，我对一区(腰营沟)党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我亲眼看到党的县委和区委的部分干部违背革命的原则，正在以极左的方法恣意妄为地进行反“民生团”斗争。

有一天早晨，我同一区党委组织部长李雄杰一道巡视村庄，忽然听到从区委办公室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便停住了脚步。

“这是什么声音？”我问道。

不知为什么，李雄杰现出难为情的样子，回答说：

“是县委干部抓来一个叫李宗振的人，在拷问他。”

“怎么，是‘民生团’嫌疑分子吗？”

“好像是。他本人一连三天抵死否认，可是县委干部却一直逼他招供。我一听这种声音，就整天都做不好工作。快快走过去算了。”

“说他是‘民生团’，有什么根据吗？”

“他去敌占区做工作，回来晚了几天，就成了问题。”

“什么？这也算根据？”

“队长同志，说话要当心点。在这儿，您这一句话，就够被打成‘民生团’的。皆因为这个‘民生团’，日子实在不好过。”

我不顾李雄杰的劝阻，走进了区委办公室。只见县委来的人同

一区的赤卫队员们一起，气势汹汹地对李宗振逼供。那个县委干部看到我走进办公室，就更加凶狠地拷打李宗振，仿佛要让我这个生客看看汪清人搞阶级斗争多么出色似的。

李宗振原是个给中国人地主扛了十多年长活的雇农。敌人来“讨伐”时，他失去了妻子；为了干革命，他又把两个孩子送给了人家。他来到游击区后，任一区所属的支部书记，在群众中很有威望。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加入利敌组织搞反革命活动吗？他迟回来几天，算是工作上的过失，就凭这一点说他入了“民生团”，是对的吗？

我叫他们停止审讯，然后对他们作了必要的忠告：

“同志们，据我了解，没有什么根据说李宗振同志是‘民生团’。证据不确凿，只凭工作上的些小错误，就胡乱给人扣大帽子，打棍子，是不对的。反‘民生团’斗争，必须有科学的证据，慎重地搞。”

审讯虽然停止了，但当我离开腰营沟去马村之后，县委的人终于把李宗振杀害了。

后来，地方上出现了这样的传闻：来自安图的金日成队长闯入腰营沟区委办公室，痛斥县委某某干部，下令停止了对“民生团”的审问。这个传闻甚至传到了汪清县委和东满特委那里，还越过汪清县境，一直传到了延吉、和龙、珲春一带。据说，听了这个传闻，有人担心地说：“他这样干涉人家，想招灾惹祸怎的？好不知厉害的人呀。”有的人说：“金队长原不知道汪清的厉害，他是个安图人嘛。”也有人小心地表示赞许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胆大无畏的人。”

事实上我当时在一区区委办公室里的言行，就成了我同左倾分子之间关于“民生团”问题进行争论的起点。

到了 1933 年，这个争论就更加深化了。这一年，是东满各游击区因“民生团”而掀起的肃清工作搞得最凶的一年。不少有所谓“民

生团”嫌疑的朝鲜族军政干部和革命者，就在这一年遭到了杀害或逃离了队伍。

我也险些被打成“民生团”。那些把“肃反”工作引向极左泥坑的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为了把我同“民生团”联系起来，执拗地使尽了各种伎俩。他们提出的“证据”全是荒唐无稽的捏造，其中甚至有所谓绑架图们地主事件这样一条。

当时，驻在柳树河子一带的一百多名反日部队官兵没有军装，要求我们给予协助。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去说服了一个地主。这个地主曾被救国军为募捐抓去，后来逃跑了。我们得到他的资助，弄到了可做五百套军装的布和棉花，用它给汪清地方反日部队全体官兵做了军装。这件事就被称为绑架图们地主事件。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数九寒天不给反日部队做军装，他们就有可能向敌人归顺或投降。而如果没有这些友军的合作，单凭革命军的力量孤军奋战，是很难保住游击区的。

继李容国之后当上了汪清县委书记的金权一，同东满特委的几个干部一道非难说，游击队利用地主给救国军解决冬季军装，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行为；还说，统率军队的金日成应对放任和助长“民生团”的活动一事负责。

他们竟然指名道姓地要我负什么责任。其实际用心是，要在东满地区把所有有发言权的朝鲜族干部全部清除掉。他们甚至荒唐地说什么因为金日成不认真搞反“民生团”斗争，汪清游击队里就混进了很多“民生团员”。他们处心积虑要把我揪到“肃反”的被告席上去。

这样一来，我同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正面冲突。

我竭力主张，利用地主解决救国军的军装，决不是右倾，更不是“民生团”的作用。我接着毫无顾忌地公开表明了我对反“民生

团”斗争的看法。

我批驳他们说：反对“民生团”的斗争就是反间谍斗争，因此谁也无权置身事外；我也不希望“民生团”混入我们内部，但是对借口肃清“民生团”，去杀害无辜好人的现象，是不能置之不理的；随便杀害无辜的自己人，这是破坏革命的利敌行为，我们眼看着这种行为，怎能默不作声？看看吧，你们给钉上了“民生团”标签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是在这游击区跟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生龙活虎般的战将吗？他们怎么会当反革命的“民生团员”呢！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不合情理的。

左倾分子们听了我的话，都暴跳如雷，大声质问我：“那么你是反对反‘民生团’斗争路线啦？”

我反驳说：“如果杀害忠于革命的自己人是你们的反‘民生团’斗争路线的话，我是不能支持这条路线的。要想揪‘民生团员’，就应拿出科学的证据把真犯揪出来，为什么要把那些在这深山里不怕饿、不怕苦，一心干革命的人一个一个杀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我义正辞严地把问题提得这么尖锐，东满特委的左倾分子们就指责我说：“金日成对‘民生团’认识不足。”

我说：“说我认识不足，那好。我就要去看看那些你们判定为‘民生团员’的人。如果你们想听听他们的陈述，请一起去做个见证吧。”

关在梨树沟牢房里的“民生团员”中有个叫张猎手(本名张龙山)的连长。他父亲是汪清地方有名的猎人。他过去经常跟着父亲去打猎，学到了一手好枪法，可以先和好面，出去一会儿就打回八只狍子来做片儿汤吃。在小汪清防御战中，他一个人消灭敌人就达一百多个。他是我最爱惜的指挥员之一。

看到这样的人竟然一转眼之间就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关

进了畜圈似的牢房，我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呢！

我一走进牢房就直截了当地问：

“张猎手，你要说明白，你真的是‘民生团’吗？”

“是‘民生团’。”张龙山毫不踌躇，一口承认道。

“既然是‘民生团’，为什么还打死了那么多日本鬼子？”

跟着我来到牢房想听听张龙山口供的左倾分子们，这时都以洋洋得意的表情盯着我。

我抑制住激情，有条有理地开导张龙山说：

“你想想，张猎手，‘民生团’是为日本鬼子效劳的，是日本鬼子拼凑的反动团体，你要是‘民生团’，怎么能打死一百多个日本鬼子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要照实说嘛，就是刀子逼着你的咽喉，也该说实话嘛。”

他这才一把握住我的手，呜咽着说道：

“队长同志，我干吗要当‘民生团’呀。我说我不是‘民生团’，可他们就是不信，老是打我。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承认了。我给队长的脸抹了灰，对不住您。”

“给我的脸抹灰抹黑，倒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你这个人不是硬骨头，在打你的暴君面前，就说是‘民生团’，而在我的面前又说不是。我不要这种一嘴两舌头的胆小鬼。”

我怒冲冲地走出了牢房，那些左倾分子吓得都不敢跟我搭话。

当天，我去找童长荣，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我看，你们的工作有问题。反‘民生团’斗争，不能这样搞。怎么能把无辜的人打成‘民生团’，随便关进牢房去呢？反‘民生团’斗争，应当按民主的原则搞。不应当让上头的几个有权人独断专行，而应当经过群众的讨论，正确地识别敌我。用拷问和威胁的方法硬

造出‘民生团’，是不行的。现在在汪清这个地方，把张猎手当‘民生团’看的，只有你们几个人。对张猎手，我用生命作保，最好马上放他出来。”

我接着向左倾分子们宣布，游击队内的“民生团”，不经政治部同意，不准任意处治。然后，我回到部队，处分了随便把张龙山交给“肃反”指挥部的指挥员。

这天，东满特委按照我的要求释放了张龙山。

张龙山后来被派到宁安县周家屯做粮食工作，忠心耿耿地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广为人知的朴昌吉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吧。这是我们驻在嘎呀河时发生的事。

有一天，我们宰掉一头从图们附近拉来的民会牛(所谓民会，系日伪炮制的亲日组织。民会牛，系民会强迫农民替它饲养的牛——译注)，把肉分给队员和老乡吃了。吃了这牛肉的好多人，都闹了肚子，受了不少苦。一群战友蜂拥到我的住处来，七嘴八舌，说“民生团”往井里撒了毒药，人们都中了毒，恐怕会有大批人死亡。果真如此，连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为了防备万一，我立即把全连队带到后山上，下令做好战斗准备，以击退敌人可能的偷袭。

说也奇怪，吃牛肉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我自己却一点也不感到腹痛，而且出乎预料，敌人也没有出动。于是，我召集连长、政治指导员、共青书记、青年干事等连队指挥员，问他们是否都相信“民生团”真地往井里撒了毒？

连队指挥员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像是真的。”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都吃了牛肉汤，可是我不觉得肚子

疼。别人肚子疼，我和连长也该疼嘛，可是我们都不疼，这该作何解释？”

“那或许是因为给指挥员的牛肉汤格外干净吧。”连长说。

“这就不合逻辑了。吃的是一锅汤，不可能指挥员吃的就没有沾上毒药。”

过不多时，一个巡逻的排长把个有步枪那么高的男孩子带到我面前，说查到了往井里投毒的“民生团”，他带来的这个男孩子，就是那个事件的主角朴昌吉。排长说这个孩子向村民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因为查出了犯人，全村顿时乱哄哄的像开了锅一样。有的骂那个孩子是孬种、坏坯子，有的骂他娘是该死的臭娘们。

朴昌吉是给中国人地主当猪倌儿的苦命孩子。他的哥哥，有的在游击队里当连队后勤负责人，有的做党支部工作。这样的孩子竟会干出足以消灭游击队一个连队的反革命行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我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同这个孩子谈了话。他在我面前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后来又哭着说自己没干那种事。原来他先前在老乡们面前认“罪”，是一种反抗；因为村里的一些妇女硬说他放了毒，他就赌气地承认了。

我立即把连队从山上撤下来，回村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朴昌吉无罪：

“这个孩子没有撒毒药。那么，是谁撒了毒药呢？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撒毒药，也没有一个人吃了毒药。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是有些人泻肚子，受了一两天罪。他们闹肚子，是因为好久才吃到牛肉，一下子吃得太多了。所以，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民生团’问题。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现在吸收被大家扣上‘民生团

’帽子的朴昌吉参加游击队！”

听了我的讲话，妇女们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连那些硬说朴昌吉是“民生团”的妇女也啜泣起来了。

这次，左倾分子们又无端生事，把这件事也说成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处理的。

朴昌吉入伍以后，参加了小江清防御战斗，打得很英勇。

如上所述，我在左倾分子的包围中作了几次大的冒险。其一是从监禁“民生团员”的牢狱中放出了张龙山和梁成龙；其二是宣布朴昌吉无罪，吸收他加入了游击队。

在那些只顾争权夺利的眼光短浅、头脑愚蠢的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衡量别人的价值，像检察官、法官、行刑官似地飞扬跋扈的时候，实施相信人、爱惜人的政治，把人当人、把同志当同志、把人民当人民看待，真诚地为之服务，老实说，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但又是即便牺牲性命也非干不可的。

在把什么都看做是“民生团”作祟的多疑的监视镜之下，能够保住自身安全的万全之策，是对任何事情概不过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我认为，如果见人有过，却不敢直言极谏的人，即使活着，也无异于行尸走肉，是个没有生命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存的必要。因此，凡是我认为不义的事，我就举起反旗，对它开火。如果只顾一己的安危，那算什么革命者呢！我深信，“肃反”的旋风不管多么狂暴，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奋不顾身地与之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它。

那些在肃清非“民生团”的“民生团”的过程中尝到了权力之甜头的左倾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甚至发明并且公布了与东满游击区内的党和游击队的组织体系毫无二致的所谓东满党组织

的“民生团”体系和人民革命军的“民生团”体系。

这些左倾分子为了给我们造成游击队内部潜伏着许多“民生团员”的印象，使我们无法再牵制反“民生团”斗争，竟然策划离间我和我手下队员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某个干部来到我们的部队，交给我一封东满特委组织部长的信。拆开一看，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不知组织部长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他在信中说，有个名叫韩凤善的队员在大搞“民生团”活动，甚至策划对我下毒手，此人罪状严重，应立即逮捕。

按信中所说，韩凤善的“罪状”是严重的，但不知为什么信里所讲的情节却不能令我信服。首先，说他在大搞“民生团”活动，就使我觉得十分荒唐。他作战英勇，从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怎么会突然胡涂起来，加入“民生团”呢？再说，他为人正直善良，重情义，讲礼貌，是大家喜欢的美男子，绝不是那种伤天害理，会诬陷或杀害自己上级的猛恶汉子。况且，他同我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这样一个人，能对无微不至地爱护他的上级下毒手吗？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不过，也不能因此就不假思索地否定信里写的情况。难道组织部长还能对我说谎，提供假材料吗？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不快。

我对那位带信来的干部说：我将直接进行检查和处理，请放心回去吧。

“不知什么时候要出事儿呢，你还……你真是位不可思议的人。”

那个干部说着，很不情愿地走了。

我的脑海里思绪纷乱，浮起了种种疑问：韩凤善真地要害我吗？他为什么要害我？他不是没有理由要害我吗？我没有把他送到特委

去，是做对了；不过，留着他，如有了后患不就糟糕了吗？

过了几天，我把韩凤善叫到了指挥部。

他跟往常一样，乐呵呵地微笑着问我：

“队长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是不是叫我到敌后去工作？”

“猜对了。你今天就去三岔口抓一个密探来。你的嗅觉真灵啊！”

“没什么灵不灵的。昨晚做梦，去逛了图们。我们连的同志们给我圆梦，说这是我要到敌后去工作的预兆。他们的判断才叫灵哩。”

“那好，我给你一支护身用手枪，带上吧。”

“带枪，麻烦，不带了。请放心，我会用话哄他，把他带来交给您。”

“那就把枪埋在地下藏好，回来时再起回来吧。”

他照我的吩咐，半路上把手枪埋藏好，到三岔口城里，见了我们指名要逮捕的密探。他跟密探说，你不想去共区(指游击根据地----译注)看看吗？你的安全由我来担保。他就这样把密探哄到游击区来了。

我直接审问那个密探：

“我们知道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可是我们不杀你。不过你要为我们做点事。你已经在宪兵队登记发过誓，所以，日本鬼子叫你干什么，你还是要照样干什么；只有‘讨伐’队出动的时候，你要先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不给你别的任务，你只要好好完成这项任务，将来我们会承认你是革命者。你干不干？”

那个密探哀求说，只要队长大人叫干的，不管什么事，他都干，只求革命组织不杀他，保护他的安全。

我打发密探回去的时候，也叫韩凤善把他送到三岔口去。不消说，韩凤善这回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对东满特委的干部说：

“为了考验韩凤善，我给了他一支手枪，可他没有跑。叫他去抓一个日本鬼子的走狗，他去抓来了。我给了他手枪和子弹，他要是存心害我，是完全可以下手的，可是他并没有做那种事。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是‘民生团员’吗？”

东满特委的干部们却说，“民生团”也会这么做。他带着枪，没有跑，也没有害你，为的是要博得干部的信任，更深地打入我们的内部，大搞“民生团”活动。因此，不能相信他。

我给韩凤善派了第二个任务：到图佳线铁路上去埋设炸药。

韩凤善这次也乐呵呵地、毫不犹豫地动身走了。临走时，我叮嘱他：好冒险，是你的毛病，这次你可要小心，别让敌人抓住。他回答说：“被抓就被抓呗，我不在乎，不怕。请您相信我，就是被抓住，我也不会变节的，顶多也不过是挨枪崩吧。”

在那以后，我又把韩凤善编入了突击组。那时，我们攻打汪清附近的一个集团部落，战斗十分激烈。突击组组长韩凤善，带头攻打敌人的炮台，不幸受伤，失去了一只手。这位英勇无比的乐天派，付出这样的代价，才完全摘掉了“民生团”嫌疑分子的帽子。

我经过三次检验，证明了韩凤善不仅不是“民生团员”，而且是忠于革命的好战士。假如当初我不加检验就把他交给了组织部长，他是肯定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受到处决的。当时我暂且把左倾分子的命令压下，经过检验保护了韩凤善，老实说，这是危及我生命的极大的冒险。如果韩凤善拿了枪打死某个干部，或者跑到敌占区去了，那我就免不了要负起轻信他的责任的。

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三次冒险。这种冒险，后来也没有停止过。

在那种个别干部的一道命令或一个手势就能决定几十几百人的

命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那些且不说革命者冷静的理智和分辨能力，就连起码的人性和情义都丢尽了的冷若冰霜的人们时时刻刻向我挑战的情况下，我能不为任何压力所屈服，始终按自己的信念正大光明地坚持斗争，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历史像白纸一样清白，我有作为游击队指挥员的战绩和立论根据。

间岛领导班子里的不少中国人干部，从吉林时代就深受我们的影响，因此他们没有轻率地给我扣上“民生团”的帽子。

正当骇人的反“民生团”斗争的旋风席卷东满游击区的时候，我从病床上爬起来，准备去大荒崴。由于病了几十天，身体虚弱，因而很难去出席会议。但我必须去，因为这个会议是我要求召开的。可是，四连长和政治指导员等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坚决反对我去大荒崴。

“队长同志，听说，党的满洲省委和共青组织满洲省委都派了特派员出席会议，我总觉得有些不寻常。虽然真理是在队长同志一边，但您是一个人，他们却是多数啊！”四连政治指导员悄悄地对我说道。

传令兵吴大成也深表忧虑。总之，没有一个乐观者期待大荒崴会议会向我们投以微笑、表示祝福，鼓励我去出席会议。

他们如此不放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1935 年 2 月，正是满洲省委为全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向东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了秘密指令后不久。这个秘密指令，要求大力开展肃反工作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全部肃清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这条指令下达后，东满各级党组织更左更残酷无情地开展了反“民生团”斗争。

直到这个时候，我和左倾分子之间就“民生团”问题的争论，

是在非正式的场合里以自发的形式进行的。但是这一次在党、军队和共青组织的主要干部都参加的大荒崴会议上，争论就将以正式发言的方式激烈地展开。反对左倾的势力只有我一个人，而反对我的势力就可能有十人二十人以上。“民生团”问题一提到议程上，那些有意见的人大体上也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默不做声，这已成了普遍的现象。因此，我不得不在左倾分子的包围之中面对他们全体孤军奋战了。争论可能变成对我的声讨，会场可能变成埋葬我的审判场。要给我直接扣上“民生团”的帽子，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断送我的极端的企图，也不是不可能有的。

战友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们都知道主管“肃反”的人都具有多么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正因为这样，他们都忧心忡忡地苦苦劝我不要去。

可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上了路。我对大家说：

“同志们，不管是死是活，这是我非去不可的。我不去大荒崴，那是自取灭亡。能够拯救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命运、从危机中挽救朝鲜革命的最严肃的时刻已经到了。对抗已是不可避免，黑白必须分清。”

我由吴大成和另一名传令兵搀扶着，在会议开幕两天后才到达大荒崴。

在人民革命军队员们严密警卫的第八区农民委员会办公室，满洲省委特派员魏拯民同王润成、周树东、曹亚范、王德泰、王仲山等党、团东满特委干部一起迎接了我。就在这宽敞的办公室里进行着中国人称之为党、团东满特委联席会议的大会。我国称这次会议为大荒崴会议。有些历史学家一度把它称之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这是不正确的。

大荒崴会议大约开了十天。会议期间，有不少进进出出的人，因此每天的出席人数并不均衡。记得与会者大多是中国人，朝鲜人只有我、宋一、林水山、赵东旭等几个干部。赵东旭自始至终给不大懂汉语的朝鲜族干部做翻译。我以党的东满特委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在大荒崴召开这次会议的动因，是以共青组织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来了解间岛地方工作的钟子云(小钟)向省党委提出了极其荒唐的报告，说什么东满地方朝鲜人的百分之七十是“民生团”。如果这是事实，东满的革命将会如何呢？因此，满洲省委急忙派代表到东满采取措施，是应当的。争论，白天黑夜连续地进行着。

钟子云在报告中又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东满朝鲜人的百分之七十、朝鲜革命者的百分之八九十是“民生团”或者是“民生团”嫌疑分子，游击区是“民生团”培训所。从这一刻起，争论就开始白热化了。

会场的空气倾向于支持钟子云的报告。发言的人，有的说需要加强肃反工作委员会；有的还玩弄辞藻说，肃清“民生团”，这是革命围歼内部反革命的特殊战争；有的说，要彻底地、毫不留情地铲除“民生团”撒下的种子。

我向他们提出了几点质问：

你们说在东满活动的朝鲜革命者绝大部分是“民生团”，这等于说参加这个会议的我和其他几个朝鲜同志也都是“民生团”，那么，你们现在是跟“民生团”坐在一起开会吗？如果我们是“民生团”，为什么不把我们关起来或者杀掉，反而把我们叫到这里来讨论政治？你们提出的那个数字里，包不包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革命者，假如包括的话，请问，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献出生命，为的是什么？

这应该作何解释？如果是那样，就等于说日本鬼子杀死了许多自己人，他们何必把自己好不容易豢养的“民生团员”都杀掉呢？负责警卫这个会场的一连指战员的百分之八九十也是“民生团”吗？

一提出这些质问，乱哄哄的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一片寒森森的氛围，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人们都无以对答，只是望着主席台上魏拯民的脸。

我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物质，只要与其本来的成分不同的另一种成分占了它的百分之八九十，它就变成了另一种物质。这是科学。说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百分之七十是‘民生团’，那就等于说，除了老人和妇女儿童，朝鲜族青壮年全都是‘民生团’了。这么说，在东满地区，是‘民生团’在进行革命，是‘民生团’在开展反对其主子的血战。难道是这样吗？

“有的人公然说，在东满进行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绝大部分都是‘民生团’。这也是不合乎道理的。如果他们都是‘民生团’，那么他们为什么三年来一直坚持在被封锁的游击区里，在严寒的冬天，没得住、没得穿、没得吃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艰苦斗争呢？

“别说朝鲜革命者的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即百分之八九是‘民生团’，我们也不能在这里放心地开这个会的。因为，在这个会场外面执行警卫任务的，是由全副武装的朝鲜人组成的一连指战员。敌人多年来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要消灭掉的东满地区有名的革命者和领导骨干，现在都聚在这里。如果你们的见解是对的，那么一连的队员几乎都是‘民生团’了，可是，他们带着精良的武器，却不打我们，不把我们一网打尽，这不很奇怪吗？”

那些硬说朝鲜人大都是“民生团”的人，对这一质问也无言以

对，缄口不语。

我又接下去说：

“一连本是被你们断定为‘民生团’连队的不幸的连队。我们曾直接下到这个连队了解了二十来天，了解到说他们全是‘民生团’是毫无根据的。在二十来天的指导与检查过程中，一连反而成了模范连队，而且从这个连队里诞生了一个第七连。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结果证明，东满游击区的朝鲜人、朝鲜革命者的大部分，都不是‘民生团’。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报告说，游击区是‘民生团’的培训所，党团组织都是‘民生团’的组织，李容国是‘民生团’汪清县委负责人，金明均是‘民生团’汪清县委组织部与军事部负责人，李相默是‘民生团’东满特委组织负责人，朱镇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师‘民生团’负责人，朴春是人民革命军‘民生团’参谋长。那么，请问，是不是可以把东满特委、汪清县委、人民革命军第一师都当‘民生团’组织看呢？是不是可以把东满特委的干部都当‘民生团’的操纵者和领导者看呢？”

对这一质问，听众也以沉默作回答。

魏拯民作为省委特派员，负有对这场斗争作客观的、正确的综合与分析判断的使命。只有他一个人表态说，把党团组织都视为“民生团”组织是错误的，局部与整体必须分开看。他表明的这一见解，多少缓和了会场的紧张空气。

我强烈地主张，把东满人民的大部分断定为“民生团”，是对朝鲜人的侮辱；这种观点，在这次会议上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我的这一主张，当场遇到了曹亚范的反击。

“你硬说没有‘民生团’，你这是主观主义。现在牢房里关着好几百个‘民生团’嫌疑分子。他们亲口承认自己入了‘民生团’，还

自己写出了坦白书。他们的坦白，他们的坦白书，意味着什么？难道你就不承认这些证据？”

“你们说的那些坦白或坦白书，我们都不承认。因为那些所谓的证据，大都是在刑讯室里用强迫方法逼出来的。我到牢房去见了几十个所谓坦白的嫌疑分子，他们没有一个承认自己的坦白是属实的。我不相信你们的那些证据，我相信的是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的忠诚精神。请你们老老实实地说说看，你们是怎样逼出了坦白和坦白书的，你们断定为‘民生团’的那些嫌疑分子的大多数，都是因为熬不过‘肃反’人员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才不得已地作了假坦白。现在，你们正在任意制造着不是‘民生团’的‘民生团’。”

这时，曹亚范大声喊：“不对！”

他的这一喊叫，大大激怒了我。如果是别人，还有情可原，可是曹亚范怎么敢在这里说“不对”呢？

“你说什么‘不对’？”我举起拳头用力敲了一下炕沿，说道：“间岛的朝鲜人正在注视着你，因为你滥用职权，随便杀人。安图游击队的政委金正龙是被谁杀害的？和龙县委书记金日焕是死在谁的手里的？今天在这里你要老实回答。吉林时期的曹亚范，既不残暴，也不贪图地位。我听到金日焕被害的消息时，都气哭了。他不是你的革命前辈吗？你救不了他也罢，怎么能忍心杀他呀！”

我作为金日焕的战友，真心哀悼他，为他的死而悲痛难过。我严厉地谴责了杀害他的人。

金日焕是我们开辟东满地区时争取到的头一批革命者之一，是同吴仲和堪称一对龙的人物。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曹亚范的家还是在李青山的家，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不过，在明月沟会议时同金日焕敞开胸怀通宵畅谈的往事，还记得清清楚楚。这头一次谈话，

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和他，年龄相差悬殊，但他一点也不摆架子，不摆老资格，平等待我，谦虚和蔼。

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和蔡洙恒，同样，给我介绍金日焕的也是像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地活跃在吉林和龙井一带的金俊、蔡洙恒一伙。

“踢足球得了黄牛的人。”蔡洙恒每当给别人介绍金日焕时总是这样开始的。在明月沟会议期间他向与会人介绍金日焕时，也是最先抬出了这一“广告”的。蔡洙恒本人就是遐迩闻名的体育选手，他评价一个人，常常以踢足球有多大本事作为标准。看起来，这也是个令人感兴趣的标准。

由于蔡洙恒的介绍，金日焕在东满地区的许多革命者中间，成了广为人知的体育干才。

金日焕是工作老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干部。他和吴仲和一样，在间岛地区共产主义者中是一个家庭革命化的先驱和榜样。他的家人都是有名的革命者，都是在革命斗争中殉国的热诚的爱国者。

他的母亲吴玉庆是为侍候革命者献出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他的妻子李桂笋是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朝鲜民族的骄傲和好女儿。他的弟弟金东山是地下工作者，在敌人进行“讨伐”时英勇牺牲。和龙游击队的金正植是他的堂兄弟。他岳家的人也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内兄李芝春，是早在吉林时期就来找我要求指出斗争方向的人之一。

对金日焕的印象，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可以说他是个有胆有识的人，而且是个学优才赡的稳重的知识分子。

曾经长期在和龙同金日焕一道做过地下工作的金一和朴永纯，常常回忆金日焕，说他工作作风优良，方法老练，群众关系很好。

金一和朴永纯都是在金日焕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党务工作者。金日焕常常被派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想也是因为他有这种优点的缘故。当时，和龙一带的救国军，都很尊敬他，待他特别好。

有一次，李道善部队为“讨伐”救国军，从安图突然闯进了车厂子。靖安军要搜捕救国军，把整个村子都搜查遍了。他们在搜查金日焕一家时，搜出了一个大包裹，这是金日焕的母亲准备转交给别的地方组织的重要传单。李道善声言抓到了共产党，把金日焕一家人都抓起来审问。金日焕的母亲说那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过路人暂时寄放在她家的，她虽然装得很像，敌人却怎么也不相信。李道善杀气腾腾，眼里直冒火星。正当金日焕一家不知要遭什么大祸的时候，邻近的一个地主出面替他们求情，证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是老老实实的庄户人家。他用好言好语作保，终于说服了李道善。这也是因为金日焕平时做好了地主的工作。

金日焕的特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不义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原则性。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他后来被扣上莫须有的“民生团”罪名，受到了迫害，最后被左倾分子杀害了。左倾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最忌恨的就是这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有主见，原则性强，不盲从别人的人。因为在坚持原则的地方，不义就不能占上风，一切牛鬼蛇神就不能恣意妄为。

金日焕他们村里的党组织负责人，名叫李亿万，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腐化堕落的大烟鬼。金日焕曾同志式地劝告他不要利用职权乱搞男女关系，劝他不要抽大烟。如果李亿万是个有理智的人，是该感激地接受这一忠告的。然而他却对此进行报复，怂恿上头的左倾分子给金日焕扣上“民生团”帽子，撤了金日焕县委书记的职务。

金日焕被撤职以后，仍然忠心耿耿地做工作。左倾分子们为了

考验他，派他到一个资本家经营的煤矿去做工人的工作。在考验期间，金日焕满可以带着家属到敌占区去，躲避左倾分子的迫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宁肯受不白之冤，戴着“民生团”嫌疑分子的帽子，在游击区人民面前受害，也决不愿从革命队伍中逃走，背负起逃跑分子的污名。

他在预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已经迫近的时候，对母亲和妻子说：

“我就要被捕牺牲了。我是不会加入日本鬼子的走狗团体‘民生团’的，这连想都没有想过。可是我想，宁可被打成‘民生团’死在这里，也要坚持革命者的气节，这才是对的。如果我为了活命，向敌人投降变节的话，就会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样的话，我背叛革命的罪，就将永远洗刷不掉。我的最后一个嘱托，就是希望我们全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直到我们祖国得到解放，取得独立。”

1934 年 11 月，左倾分子终于把金日焕拉到了审判场。李亿万的公诉，全属瞎编乱造：

“金日焕是反动派中最凶恶的反动分子。我们审问他已经很久，可他根本不开口。不知他肚里装的是大蟒还是毒蛇。这号人，要是放了，我们的革命过不了十年，就会完蛋，像破抹布一样支离破碎。你们说，这种人该杀不该杀？”

全场没有一个人回答。

有些人小声耳语说，把这样的人都杀尽了，怎么搞共产主义革命啊。但没有一个人主持正义起来喊他无罪。

车厂子的人们明明知道那些当权人处事不公，却都不敢开口说话。因为他们知道，谁主张金日焕无罪，谁就要被打成“民生团”。

左倾分子们对和龙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金日焕宣告了死刑。

“等着瞧吧，谁是‘民生团’，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历史一定会分清是非的！”金日焕怒视着那些左倾分子，大声喊道。

这时，孙长祥所部救国军官兵纷纷站起来，端着枪，忿怒地喊道：“为什么要杀金日焕？”“他是我们的导师和恩人!”“如果他是‘民生团’，那么不是‘民生团’的人到底是谁？”“我们为金日焕作保!”“马上取消对他的死刑判决，不然，我们决不会饶你们!……”

左倾分子们碰到救国军的强烈抗议，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对金日焕的死刑判决，并释放了他。但是，当天夜里他们又把他杀害了。

“我想问你们”，我盯着曹亚范，声音沙哑地说：“你们真地认为金日焕是‘民生团’吗？你们是不是明明知道他不是‘民生团’，却别有用心，蓄意把他枪杀了，如果金日焕这样的人是‘民生团’，那么在这间岛地区，到底还有谁不是‘民生团’呢？”

我接着压低声音说：

“同志们，不要再拿人的性命作赌注了！对人，要当人对待；对同志，要当同志对待；对民众，要当民众对待。我们是为了用爱护人、爱护同志、爱护人民这一爱的武器去改造这个世界而站起来的战士。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爱的武器，那么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土匪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继续以‘肃反’为名愚弄人，那么人民就会永远唾弃我们，后代就不会饶恕我们。被扣上莫须有的‘民生团’罪名含冤而死的烈士已达几千人，补偿这一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这种无谓的屠戮，推行爱护、信任、团结的政治，把一切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抗日。要把敌人抛给我们的‘民生团’这一钓饵吐出去，不要给宗派主义、排外主义、冒险主义以可乘之机。只有这样，才能开辟出一条新的大道，医治好这几年来由于‘民生团’问题而受到的创伤，才能拯救人民，挽救革命，才能把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

国际主义团结推向新的高度。我们两国革命者的真正团结，必须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给以阶级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必须以兄弟友谊为基础。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在共同斗争中追求霸权的现象。如果某一方只追求自己一方的利益，或者为利己而牺牲对方，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合作。一句话，我们的团结只有以爱护和信任为原动力，才能成为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大荒崴会议上，还就干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所以发生这个争论，是因为特委领导班子里的部分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少数民族不能当干部，只有多数民族才能当干部，少数民族领导多数民族是不妥当不合理的。他们主张说，朝鲜人是少数民族，因此不能领导多数民族；尤其是，朝鲜革命者有宗派习气，动摇性大，容易反动化，因此不能当干部。

就东满特委领导班子的干部人选和分配问题，满洲省委下达了一份要从过去的以朝鲜人为中心的政策转变为以中国人为中心的政策的秘密指令。这已成为众所皆知的事实。这条指令的要点是：过去，朝鲜人在民族运动中失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失败了；他们容易动摇，容易反动化，而且语言和风俗习惯也不同，因此“少数民族的革命基础”不巩固，“少数民族领导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成功”。所以，“在东满，必须把朝鲜人的基础改变为中国人的基础”。

这份指令要求，东满特委书记以下主要干部，均由满洲省委任命；除特殊情况外，尽可能不要提拔朝鲜人当人民革命军连级以上的指挥员。

当时和现在我都确信，这份指令不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志下达的。下达这条指令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突破蒋介石军

队的包围，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正处在内战持续不断的苦难中，肩负着革命战争的重担，艰苦奋斗，长途跋涉，对他们祖国的东北边疆发生的事态，无暇顾及。

满洲省委采取的措施，有不少是把王明和康生主管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令照搬过来或者根据这些指令制定的。从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所在的伊尔库次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哈巴罗夫斯克，比到井冈山或延安近得多。

有些人提出的少数民族不能领导多数民族的主张，大大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共产主义者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原则，也不符合当时东满的干部队伍构成情况。

我不得不又投入了争论。我发言说：

“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崇高的任务：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并肩战斗，直到取得胜利。因此，干部问题必须根据加强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和反日共同斗争的原则来解决，必须坚持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以本人对革命的忠诚和能力为主去选拔和分配干部的原则。

“大家都承认，朝鲜人是在东满地区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东满地区的干部和党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闭眼不看这一现实，在我们进行共同斗争已有几年的今天，却突然提出什么应由多数民族领导少数民族啦，应由多数民族的干部替换少数民族的干部啦等主张，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既不是要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主张朝鲜民族优越论，也不是要宣扬其他民族劣等论。但是，那种只凭他是多数民族的人，就不管他既没有能力又没有素质，不加考虑地提拔他当干部的倾向，是必须纠正和克服的。

“不应当把国籍、所属关系和人口的多少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只要具备了当干部的条件，就能当干部；否则，就不能当干部。”

我这么一讲，有人站起来说，朝鲜革命者大部分都是参与过民族主义运动或宗派的人，因此不能提拔他们当干部。

我立即驳斥他说：

“活动在东满的朝鲜革命者，绝大多数都是全新的后起之秀，同任何宗派都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也很清楚，我们尽心尽力培养出来的基本阶级出身的年轻共产主义者，构成了人民革命军的主力。这些新一代，在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中都当上了干部，努力工作。也有一些从前参加过民族主义运动，或参与过派别的人，但他们都已得到了革命的改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另一个人又提出新的问题来进行反攻。他说，“民生团”的老子是宗派，宗派的老子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老子是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这一离奇古怪的主张，弄得与会者们都目瞪口呆。把这一主张倒过来解释的话，就等于说，从前参加过民族运动或宗派的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抚养的儿子了。这是毫无道理的诡辩，是对吸收那些经过教育和改造的有宗派经历的人和民族主义者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不信任的表现。

我认为对这种诡辩必须给以打击，于是说：

“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也可以通过不懈的改造过程，变成共产主义者。因为参加过民族运动，就说他是宗派的老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儿子，这不是荒谬绝伦的鬼话吗？

“本来，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因此，把民族主义看做反动的，就等于把爱国主义看做是反动的了。不要

把民族主义一概视为异端。民族主义只要不被利用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就无须--概加以排斥。民族主义只有在不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时，才成为对历史的反动。

“假如有人把首创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的孙文先生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儿子，你们能接受这种狂言妄语吗？反对民族主义，这本身就是严重的民族偏见。

“朝鲜的宗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中，是有投到敌人阵营去的，但是要记住，这只是少数。

“有些人认为派别斗争是朝鲜民族的天性，他们抱着这种成见认为，凡是朝鲜共产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同宗派有某种关系。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看法。

“坦率地说，宗派并不是唯独朝鲜共产主义队伍中才有的。德国和苏联也有过宗派，中国、日本也有，共产国际也有过。可是，为什么认为只有朝鲜民族是具有天生的宗派习气的民族，为什么把朝鲜共产主义者这一称呼当做宗派的代名词？

“有些人说，朝鲜民族是过去在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失败的少数民族，因此今天在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能取得成功；还说，朝鲜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动摇性大，容易反动化，因此不能提拔朝鲜人当干部。这些都是为了除掉朝鲜人干部而编造的荒谬绝伦的论据。

“从这种排外主义的立场出发，你们已经从东满的军政干部中把多年来一直同你们在一条战壕里英勇战斗的几十几百个朝鲜共产主义者，或者除掉或者打成‘民生团’杀害了。

“许多领导骨干，只因为是少数民族，已经交出了自己的职位，可是还想继续除掉吗？

“如果你们继续顽固地走像现在这样排斥和虐待朝鲜人的道路，我们就不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

听到我这一炸弹炸裂似的话，人们都猛地抬起头来注视着我。会场空气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几乎咽唾沫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那时，如果有谁反驳我，或者作伤害我们自尊心的发言，那么争论肯定会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幸亏就干部问题的讨论没有引起更激烈的争论。

会上的讨论越深入，我同左倾分子的争论就越激烈。与会的朝鲜人干部虽然有几个，但他们都一言不发，保持着沉默。其实，他们内心是支持我的立场的。连宋一这个曾经给左倾分子起过代理人作用，留下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瘢痕的人，也来找我，鼓励我说，你单枪匹马做出了谁都不敢做的事情。魏拯民和王润成虽然没有正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在私下里对我的主张表示了理解。特别是魏拯民的理智的判断和公正的立场，对我是一个不小的帮助。

一日三餐只吃豆粥，不分昼夜地进行争论，使我变成了皮包骨头的人。从早到晚开会，深夜才回宿舍，通宵受病魔的折磨，天亮又上会场去进行争论。在我不得不单独对付好多人的情况下，我既不能缺席，也不能弃权。为了成千上万的间岛朝鲜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的命运，不管愿不愿意，我必须投入争论。

会议上争论的又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提出解放祖国的口号，这是否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制原则？这个口号同“民生团”标榜的“朝鲜人的间岛自治”的反动口号，本质上是否一致？

有人说，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和“民生团”

鼓吹的“朝鲜人的间岛自治”口号相同，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制原则相矛盾。

持这种看法的干部不止一两个。这是和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的危险的看法。如果照这种看法去做，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为朝鲜革命，而是为别国的革命进行斗争，只应完成他们的帮手或国际军一支分队的使命了。

把朝鲜革命只当做一个大国革命的附属品的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容忍的。

我指出：

“‘朝鲜人的间岛自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两国人民，从内部分裂共产主义者的队伍，给自己的殖民统治创造有利条件，而交给‘民生团’提出的口号。无庸赘言，这和间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们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是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光复祖国，使我国人民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主的新社会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为目的的。

“请问，朝鲜共产主义者只因为在别国领土上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就应该放弃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为祖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神圣权利吗？假如我们不能干本国革命，只能干别国的革命，我们何必要留在这满洲大地上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长期不懈地团结和锻炼朝鲜民众呢！有些人说，中国革命胜利了，朝鲜革命自然就会胜利。这是荒唐的说法。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有自己的道路和时刻表。如果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即使邻国的革命胜利了，本国革命的胜利也绝不会自行到来。因此，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要等待别人来帮助搞革命，而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本国革命而斗争。

这就是对待革命的主人翁的态度。

“有些人捧出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制原则，主张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应提出民族解放的口号。这种主张，实际上只能看做是不让别国的共产主义者干本国革命。

“请问，如果法国的共产党员要求在法国进行活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不要提出中国革命的口号，你们能甘心接受吗？

“凡是共产主义者，不管在什么地方进行活动，都必须提出本国革命的口号进行斗争，以此来帮助驻在国的革命，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朝鲜共产主义者为解放祖国而斗争，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不能替代的自主的权利和神圣的义务。”

在大荒崴会议上开始的争论，在同年 3 月召开的腰营沟会议上继续进行。在这个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对我们的主张表示支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意见的分歧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完全消除，作为待解决的问题保留了下来。

我们决定，将这两次会议的讨论中成为焦点的几个重点问题提交给共产国际，并且为了得到共产国际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派魏拯民和共青组织东满特委的干部尹丙道去了莫斯科。

在间岛地区因“民生团”问题而发生的混乱，犹如一场噩梦。左倾分子发动鲁莽的“肃反”运动，几乎完全摧毁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经过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打好的革命的基础。被他们“肃清”的人都是“民生团”吗？不是。敌人的文件里有这样的记录：“民生团”只有七八名。为了搜出这七八个“民生团员”，“肃反”运动竟然把为数两千多的自己人打成“民生团”杀掉了。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一大悲剧，是极端的愚昧无知与鲁莽。

那许多抱着凌云壮志，从朝鲜和海外各地云集到间岛地区来的

精明强干的人们，仅仅在两三年内，在“肃反”的枪口下全部丧生。这些不幸的受难者中，怎能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肯定什么才子都有，而“肃反”的狂风却无情地把只有我们的抗日革命才能造就的民族引以自豪的宠儿斩尽杀绝了。

我们说因“民生团”而被错杀的人，比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还多，后代人也许不相信。然而这是确凿的事实。抗日战争史册上记载着无数次的对敌作战，却没有我军在一场战斗中有二三十名战士战死的战例。然而在东满的游击区，却有过不少一天就有二三十名革命者被扣上“民生团”罪名遭到集体杀害的事例。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连块墓碑都没能立。不管我们多么虔诚地合掌礼拜，流着泪为他们祈祷冥福，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诅咒那些杀人者的。

在“民生团”解体后的间岛地区，到底有过“民生团”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回答。连那些因怕受惩处而逃离了游击区的人中，也没有“民生团”。

朱镇是“民生团”吗？不是。朴吉是“民生团”吗？也不是。朴吉是从独立军运动中投到抗日救国圣战中来的。他早年到苏联滨海省去，抛掉了自己原来的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重新武装了自己，然后奔赴争取民族解放的圣战进行得最激烈的间岛地区来，做地下政治工作，也参加了武装斗争。早在我们叫做秘密游击队的小规模游击队进行活动的时期，他已经是深受群众爱戴的政治指导员了；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正式成立后，他又当了延吉营的政治委员。他是在延吉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先驱，是善于在群众心里点燃革命烈火的能干的政治活动家和鼓动家，又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他的一家，是涌现了五六名抗日革命烈士的爱国家庭。他的父

亲朴曾元(外号老虎)，是在支援革命军方面作出了杰出榜样的模范农民。朴曾元在租种地主土地的时候，就投身于独立运动，诚心诚意地支援了游击队，甚至把作为工钱所得到的牛犊也喂成大黄牛，捐献给了游击队。

把家庭环境这么好的朴吉打成“民生团”，无论怎么说也是说不通的。尽管这样，左倾分子们却借口朴吉从前当过独立军，他的姐姐被警察抢去做过妾(后来逃跑)，终于把朴吉杀害了。

金明均是“民生团”吗？不是。金明均是汪清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他身为县委军事负责人，有什么贪求要去当“民生团”？敌人的公审文件指出，金明均在蒙“民生团”嫌疑被关进牢房之前，杀死日本人的案件有二十多起，袭击日满官署案有二十多起，抢夺武器案有八起。如果他是“民生团”，他能建立这样的功绩吗？能在逃离游击区以后仍作为教师给孩子们的灵魂灌输民族精神吗？能被日寇判处死刑吗？

李雄杰呢？他也不是“民生团”。我很了解李雄杰的为人。1932年 10 月，我们第一次进驻汪清地区的时候，牵着两匹军马头一个赶到小北沟来欢迎我们的正是李雄杰。他就是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险些被处死的一区区委组织部长。就是这位身材魁梧的壮汉，给我这个年轻的游击队长一下子牵来两匹军马，盛情款待我，使我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曾在和龙县做过共青书记的工作，也在龙井和汉城蹲过监狱，又在李光的别动队当过政治委员，是个政治嗅觉灵敏、斗争经验丰富的有资历的革命者。

我通过李雄杰领导了区委的工作，并且用推广他的模范事迹的方法深入开展了汪清地区党的工作。

1933 年春，李雄杰被控为“民生团”嫌疑分子，遭到左倾分子的逮捕。后来他留下“我与民生团无关!”的字条，逃出游击区回到了国内。他以富宁地区为据点，在咸镜南道和成镜北道一带吸收爱国青壮年组织了共产主义同盟，组织领导了反对修军用公路的斗争、反对强迫供售的斗争、反对征用(指日寇为其侵略战争强迫征用朝鲜的人力、物力——译注)的斗争等反日斗争，后来被日本警察逮捕，关进了汉城监狱。他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可见日本法官是知道他的身价的。这样的人，难道应该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而受到惩处吗？

大荒崴会议上的争论的意义，就在于给李雄杰这样的人摘掉了“民生团”的帽子。由于这个会议上的争论和后来共产国际作出的结论，那些被错杀的人也被判定为无罪了。由此，他们都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肉体生命却无法恢复了。这次会议的又一个意义，在于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是多么奸险恶毒，也控诉了被日寇所愚弄的左倾分子在政治上的拙劣性，从而紧紧地束缚了左倾分子的手脚，制止了他们的“政变”。是的，“肃反”的左倾化，是职位高的人为了消灭职位低的人而公开进行的政治暴行、向下式的“政变”。

自大荒崴会议后，我们的活动情况在东满的朝鲜人中更加广泛地传扬开了。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回忆有关“民生团”的往事，并不是有意向天下告发造成这种惨剧的肇事者，也不是为了跟他们算账。敌人企图从内部分裂和瓦解革命队伍的阴谋诡计，不仅过去有，而且今天也有，明天也会有；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和左倾分子的政治拙劣性，今天仍然像鬼魂似地徘徊在我们的周围。我的这段回忆就是为了让后代认清这一点，使他们得到有关朝鲜革命树立主体、坚

持民族自主性的教益。

通过反“民生团”斗争及其总结——大荒崴会议，我有深切的体会：自主性是民族的第一生命；为了坚持自主性，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先觉者们必须进行不惜牺牲的斗争。

人的第一属性是自主性，同样，保证民族生存的第一个条件也是自主性。不论是在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民族这个大集体的生活中，决定其命运的基本生存条件，可以说就是自主性。我们说抗日革命是恢复民族主权的圣战，就是因为恢复主权是朝鲜人民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的最大愿望，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作为纲领提出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一句话，恢复主权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总目标。

正因为这样，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一切活动都要为达到这一目标服务。在思考和实践中，我们都把维护自主性当做生命；为了维护自主性，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甘心做一只猛虎，做一个霹雳。

自主性，既不是谁恩赐的，也不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自然形成的。自主性必须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斗争来争取。只有高度发扬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的人，才能争得自主性，才能永远成为自主性的主人。因为地球上践踏其他民族的自主性的强盗太多了。认为自己具有自主性是应当的，而别人要具有自主性，就大费神经，横加阻挠，这样的人也多得很。认为自主性是唯独他们才能拥有的垄断品，这是帝国主义、支配主义的犯了时代错误的傲慢性的表现。

践踏自主性的势力曾存在于为共同目的而并肩战斗的革命队伍中，这是超越常识的、历史的恶作剧。为此，朝鲜革命经历了严重的焦虑和挫折。为了从挫折转向进攻，我们不惜牺牲性命，像猛虎一样对那些侵犯朝鲜民族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自主权利的人进行了

斗争。大荒崴会议，是朝鲜共产主义者高举自主的旗帜，为坚持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维护自主权利而进行的一场大思想战。

如果我们在无情无义的左倾的铁拳面前惊慌失措，害怕牺牲，我们就不可能从那疯狂疾驰的左倾铁甲车的履带下挽救革命。挽救革命使之摆脱了危机的，是为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共产主义的原则性和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定信念。

今天，帝国主义者大肆叫嚷什么社会主义的没落，大搞政治心理战，妄图把我们共和国从主体的轨道上推出去。在这种形势下，继续维护自主性，仍然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共和国的盛衰存亡的迫切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捍卫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为了维护自主性而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对抗中，也必将成为胜利者。

通过反“民生团”斗争，我深深地认识到，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革命斗争中，诬陷和谋害是多么有害，并且吸取了决不能同搞宗派的人一起干革命这样一种深刻教训。要想明白诬陷、谋害和派别斗争的危害性和反动性，只要回顾一下李氏王朝的五百年历史就足够了。为了争夺权力，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动刀动枪，这就是反动化的人的本性和宗派的恶习。

解放后，敌人曾企图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使用过的“民生团”手法来瓦解我们的内部。他们曾企图用伪造的信件诬陷白南云[2]、姜永昌[3]、崔应锡这些忠于我们党的、来自南朝鲜的干部。但我们没有上他们的当，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有在游击区进行反“民生团”斗争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这个经验教训，说不定我们在处理战争时期加入过敌人的治安队的人和与此有牵连的人的问题上会犯左倾错

误。我们本着维护革命利益的原则，宽大地处理了加入过治安队的和与此有牵连的人。

每当任命新的公安部长的时候，我就告诫他既不要犯右倾错误，更不要犯左倾错误，不要忘记反“民生团”斗争的教训。

左倾是政治骗子和野心家们赖以制造新的“民生团”案子的温床。这种温床的制造者，用比别人高十倍二十倍的声音大谈党，大谈革命，大谈忠实。这种超革命的作为，跟过去在游击区任意玩弄人们的政治生命的左倾分子的行径有什么不同呢？

若说右倾是公开的反革命，左倾就可以说是隐蔽的反革命；若说右倾是癌，左倾便是不亚于它的毒草。右倾和左倾都寄生在革命这棵大树上，看起来好像是互相背对背同床异梦，其实是一脉相通的。个人搞左倾，就会破坏集体；执政党搞左倾，就会丧失群众，断送革命。如果不牢记这条真理，就不可能捍卫社会主义。这是反“民生团”斗争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是由于左倾的作祟而流了大量鲜血的一系列国家的沉痛教训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呼吁。

反对和警惕用超党性的言行掩盖的左倾，保护人们的政治生命不受其危害，这是执政的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始终狠抓的永恒的主题。

三　共青组织的产儿

青年工作是我毕生倾注了心血的重大事业之一。我在吉林时期的生活就很好地说明我的革命活动是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我在被囚于吉林监狱之前已从事了青年学生运动，出狱后也以地下活动的方式做了很多青年学生工作。我在 1930 年夏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干部，从那时起我被任命为共青组织吉东地区责任书记。

当然，我在汪清的时候，青年工作也曾是我的军事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其中占有主要的地位。负责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指挥员领导军队内共青组织的工作，是属于应做的本职工作。可是，根据东满特委和汪清县委的要求，我还不得不为地方共青组织的工作花费很多时间。

当时，把党、共青组织和儿童团称为三代同盟。在这个三代同盟中、共青组织占有仅次于党的重要地位。人们把共青组织称为党的接班人、党的后备队或党的贮水池，为了突出它的使命和作用的重要性，也称它为第二党。

讨论对革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策略问题及其执行措施的党的会议，总是有共青组织的书记们参加。东满特委把这种会议叫做党团联席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共青书记充分行使与党员同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没有党员或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就主动地领导群众运动。

结束南、北满远征回到间岛后，我通过李光别动队共青书记赵

东旭、汪清县共青书记韩在春、汪清县共青组织的组织部长金重权等同志全面地了解了东满地区共青组织的工作情况。

当时，东满地区共青组织的工作中存在着影响共青组织的建设和革命发展的严重的左右倾偏向。

汪清地区共青组织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得力的领导干部。当时，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朝鲜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而能够根据这种形势熟练地组织和处理各项工作的得力的共青组织干部却极为不够。共青盟员大部分是文盲和勉强认得国文的人，具有中学毕业程度学历的人寥寥无几。

宗派分子们把青年运动局限在狭小的游击区范围内，只依靠工农阶层出身的青年进行青年工作，还大放厥词，说什么只有那些成分好、见识高的特殊人物才能做共青工作。这种倾向必然在共青组织的建设工作中带来关门主义。宗派分子们以保持共青组织的纯洁性和保密为名，把共青组织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制造种种借口把那些愿意加入共青组织的青年一概拒之门外。对于学生，他们就说年纪小或家庭出身不好而加以排斥；对于淳朴的工农青年，他们就以无知为理由而加以疏远。

当时要想加入共青组织，至少要精通《社会主义大义》，能够阅读和分析《共产党宣言》或《雇佣劳动与资本》等经典著作。如果在审查时得知谁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他们就挑剔说，“他连《共产党宣言》都不懂，怎么能过共青组织的生活！”这是一个通例。

大汪清有个青年申请加入共青组织，却因为他家被苏维埃政府没收了一头耕牛而被否决了。其理由是，他家被没收了耕牛，证明他家是个富裕家庭，成了苏维埃的没收对象，证明他没有资格加入共青组织。左倾关门主义者们连那些在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

互济会和少年先锋队里组织生活过得很好的青年，都不大肯吸收到共青组织里来。在左倾分子设下拦道木、关紧了大门的地区，成员有一百多人的群众团体只有三四个共青盟员的情况比比皆是。汪清地区，也许因为它是东满特委的所在地，在扩大共青组织方面还有不少地方主义的倾向。不管你在别的县里组织生活过得多好，如果没有组织介绍信或保证书，你就不能在汪清加入共青组织。

全文振原在东宁县城从事地下活动，后来为躲避敌人逮捕来到汪清，在游击队的缝纫队里工作得很好，可是因为没有组织介绍信，就没能接上组织关系。

有一次我到缝纫队去向她们表示谢意，感谢她们给缝制了军服。这时我发现全文振不知为什么情绪非常消沉。从那以后我多次去过缝纫队，可是她的情绪总不见好转。于是，有一天我就同她谈了话。她是个小心谨慎的女子，可她毫无保留地把心中的苦衷都向我说出来了。她来到这个她所向往的地方，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游击队，可是共青组织却不吸收她，所以她像只孤雁似地过着沉闷的日子。我这才知道她的苦衷就在于组织问题，便同有关干部商量好，让她和从前一样继续过共青组织的生活。

有些共青组织，凭借同乡、同窗、亲友等情面和裙带关系，胡乱吸收了异己分子、破坏分子、偶然分子和动摇分子。有些共青组织的干部，则又只重视家庭出身这一面，只要听说是长工出身，竟把潜入游击区做敌人密探的反动分子也吸收到共青组织里来了。趁这种左右倾的空隙被吸收进来的一些缺乏革命锻炼的共青盟员，有的经不起困难的考验，跑到敌占区去了。

共青组织的工作中出现的偏向，使不少青年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对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结果

是对游击队内共青组织的工作和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青年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爱国人民的统战工作，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游击区共青组织的工作所以出现这种左右倾偏向，是因为共青组织的领导干部没能制定出符合朝鲜革命的实际和利益的正确的组织建设路线，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著作的要求，对人家的经验囫囵吞枣的缘故。

正当主持游击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们努力摸索克服共青组织的工作中出现的偏向、改进青年工作的办法的时候，1933 年 3 月在小汪清的马村召开了共青组织干部会议。汪清地区共青组织的委员、儿童局长、来自延吉的青年代表、龙井的学生代表(地下工作员)等三十来个做共青组织的工作的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至今我还记得的有金重权、朴贤淑、赵东旭、朴吉松、李成一、金范洙、崔凤松等人。

在整个会议期间，朴吉松一直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每当回忆起这次共青组织干部会议的时候，不知怎的，朴吉松那闪亮的眸子总是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之所以对朴吉松的眼睛印象特别深，也许是因为后来他在同关东军部队的遭遇战中失去一只明亮眼睛的缘故吧。朴吉松二十六岁时作为北满杰出的游击队长壮烈牺牲了，可是，在 1933 年参加共青组织干部会议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在共青组织里没有什么地位的模范盟员。

闭会那天，县共青组织的干部和代表们要求我讲话。看来，他们已经有过讨论：金日成这个人在吉林搞过很多共青组织的活动，来到间岛地区又作为吉东地区共青组织的责任书记做了很多青年工作，也许有什么值得参考的经验，还是听听他的看法吧。我应他们一致的要求，就共青组织面临的任务作了长篇讲话。

那篇讲话中的不少内容，已在几十年前由赵东旭详细地记述在

他的回忆录中。

古今内外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无一例外地都就青年一代在改造和变革社会的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负的使命提出了很多高明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致把青年看做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后备队。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国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如何教育青年。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无论是东方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对于国家的未来青年一代，都站在重视这一代的立场上作了大同小异的评价。

将青年视为未来的生力军，在这一点上，我们当然也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青年的地位局限为革命的接班人和后备队，我是不满意的。先前的经典作家和理论家把青年规定为依靠前一代人并在他们的领导和教育下对革命起辅助作用的阶层。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规定。从朝鲜革命的历程和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认为把青年只当做辅助力量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一向把青年看做是革命的先锋。青年是在革命斗争和社会运动中承担最艰苦、最吃力部门工作的先锋队、主力部队和肩负着未来命运的骨干队伍。这一主张的真理性已通过实践充分得到证实。我对青年作为革命先锋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到了八十高龄的今天仍没有变。如果我们没有独立自主地开创革命运动，而只依靠前一代人，只做他们要我们做的事，被动地跟在他们后头消耗时光，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就不能断然同旧思潮诀别，团结在主体思想的旗帜下开辟朝鲜革命的新的前进道路，就不能建立抗日游击队，就不能作为民族的先锋、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发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抗日革命了。

看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任何时候都是青年站在最前列。他

们个个都是不怕坐牢、不怕上绞首架、不怕牺牲的勇敢战士。朝鲜的青年在三·一人民起义时作了先锋决死队，在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运动席卷汉城的大街小巷时，也作为主力高呼爱国口号。1929年11月的光州学生运动，其主体也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们不受任何人操纵，自动站起来结成队伍冲过刀枪林立的大街，怒涛般地涌向斗争的广场。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从20年代中期起作为主人翁登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在抗日革命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我的青春时代是从共青活动开始的，这已在前几卷里详细地叙述了。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和我的青年时代是相始终的。我在那个年纪率领过团，指挥过师，也统率过军。有个时期，在我国人民中有些人以为我是个白发老将。但是，在平壤公设体育场作凯旋讲话的时候，我的年纪还不满三十四岁。

游击战争既不是像古代的军队那样两军对峙，安营扎寨，鸣锣击鼓，将帅单枪匹马出战，或依靠深沟高垒，万箭齐射的旧式战争；也不是使用先进的军事器材，用电话和无线电指挥战斗的新式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几岁的老将军也能指挥战斗。但是，在游击战争中，无论是战士还是指挥员，都要同熬冰天雪地、冻肌砭骨之苦。指挥员有时也要操起机枪来打，如果情况需要，还要端起枪刺投入白刃战。没有健壮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是承担不了这种重担的。

当时参加抗日革命的战士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杨靖宇三十二岁当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陈翰章二十七岁起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身负团长重任的吴仲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也是在二十九岁的华年。

的确，抗日武装斗争完全是由青年承担和进行的，这样说绝非言

过其实。怎么能把青年一代只看做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后备队呢！

我的这种看法和立场如实地反映在那天的讲话和谈话中：

“青年是推进我国革命的主力中的基干力量。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在社会改造中打先锋的一向是青年。他们具有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斗争的前列，这就是我们青年工作的任务。

“可是，共青组织却关起大门，背对着青年群众，这不是令人痛心的事吗。有些共青组织，借口年纪小，不吸收那些优秀的青年，这可以说是关门主义的典型。柳宽顺作为三·一人民起义的英雄永垂民族青史，难道是因为她年纪大吗？

“南怡将军也曾说：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

“如果拿年纪当做问题，排斥或疏远十几岁的热血青年，那么，共青组织就不成其为青年组织，只会带来把它变成壮年组织的后果。如果修道十年、二十年成了圣贤之后才能加入共青组织，那它算什么青年组织呢。”

代表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共青组织的干部应切实树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我就这个问题也谈了很多：

为了团结广大青年，做共青工作的干部就要端正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比如说，游击队提出了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可是有个共青盟员打了五枪，却连一个敌人也没有消灭掉，这当然是缺点。对产生了这种缺点的共青盟员，如果有关组织进行批评，给予处分，能说是合适的吗？你们不应该这样简单地处理问题。如果有人犯了错误，首先就要从侧面和背面，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解：是否武器性能不好，是否准星和照门有毛病，是否没有把枪托牢牢地

抵在肩窝里轻轻地扣动扳机，扣扳机时是否调节好了呼吸？要这样一一进行了解。还要了解他有无生理上的弱点：眼睛是近视、远视，还是散光。是否不够大胆，思想上怯懦？应该这样从各个角度了解好之后再处理问题，不应该一概看做思想有问题，专搞思想斗争。

批评，必须是治病救人的。对缺点，不要迁就，要批评，但要作科学的分析，使人心服。用揭露的方式责骂和污辱是不行的。

在这天的会议上，我就加强共青队伍的组织和思想基础、改进宣传鼓动工作和教育工作、真诚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儿童团员培养成共青组织的后备队、从过去爱国青年的斗争中吸取其优点等共青组织的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讲了话，也进行了交谈。

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共青组织的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生活，在工作中要做群众的表率，做人的工作要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好母亲。

共青干部会议以后，共青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曾被官僚主义、关门主义、形式主义旧框框所束缚的共青组织变成了生气勃勃的组织，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了。

有一天，我到共青县委去找金重权。可是，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通信员。我问他：人都到哪里去了。他回答说，都下到区委和支部去了。我听了不禁感到非常满意。

从前，共青县委的干部在工作上贪图安逸，不到盟员中去，而坐在办公室里把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叫上来，交代任务，听取汇报。共青县委对下情全然不知，以至有人说公马下了崽子，他们也会相信。开个会，搞一场思想斗争，就算大功告成了。共青组织以为通过开会、进行批评，就什么都能解决。

这种老一套工作方法从共青干部的工作中开始消失了。共青干

部们到游击队和地方的支部去认真负责地帮助当地共青工作。从前坐在县委办公室里说空话、搞文牍主义打发时光的人们，到下面去和盟员们见面，参加小组会议和支部会议，帮助共青书记制定工作计划了。共青干部们只有在开会那天才聚集到县委办公室里来。

在共青积极分子队伍中，也有不少能根据情况和条件临机应变的得力人材和作风好、领导方法得当的老练的工作人员。

在延吉县当过八区共青组织部长的金范洙还参加过明月沟会议，可是他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深受青年们爱戴的得力的共青领导干部。

金范洙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他的母亲对自己的独生子能上学念书觉得很了不起，高兴得天天背着他上学，背着他回家。这样爱如掌上明珠的儿子一长成小伙子，就马上给他娶了媳妇。

金范洙的父母怕儿子参加社会活动，儿子结婚后也对他严格管束，不让外出。

金范洙虽不能随便外出，但他把自家的小后屋定为聚会场所，在篱笆上巧妙地开了个人们能出入的口子，频繁地把青年们叫到自己家来。他的父母还很高兴地以为儿子不再到外边去跑，“老老实实”做新郎了。可是，儿子却每晚都在小后屋里做青年工作，对新娘还顾不得看一眼呢。他在那个小后屋里培养了几十个共青积极分子。

共青县委书记主要到游击队里的共青组织去指导青年工作，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则同游击区的共青组织和敌占区的共青组织取得联系，指导青年运动。共青县委书记有时还根据需要同游击队员一起参加战斗，指挥群众。

这是马村战斗时的事情。部署在马村前山冈上的连队共青支部在共青县委书记参加下召开了紧急会议。面临着一场激战，共青盟

员们个个都立下了火一样的誓言。

“要用共青盟员的一颗红心坚守用鲜血争来的我们的土地!”

共青盟员的枪口连续射出了复仇的致敌人死命的子弹。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死伤数百。

和救国军一起攻打东宁县城和罗子沟的时候，共青书记也曾站在游击队队伍的前头。

在共青干部会议之后，我也常常同共青领导干部们讨论有关共青组织的工作问题。当时，就共青工作，我最着重强调的问题是：在青年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阶级教育、反帝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乐观主义教育和军事教育，使共青领导干部和共青盟员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树立共产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我们使共青组织首先关心当前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全力以赴地去加以解决。共青组织既不是学术团体或启蒙团体，也不是俱乐部。它是为争取革命胜利而教育和团结青年群众的组织。因此，共青组织的活动，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于当前的政治实践、军事实践和经济实践。只有这样，每个共青组织才能成为进行活动的生气勃勃的组织和强有力的发动机。

当时，游击区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存在着不大关心经济问题的偏向。游击区的所谓经济问题，就是指吃、穿、住的问题。照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是食衣住问题。当时，游击区群众的口粮大部分是由游击队缴获来的。游击区瘠薄的土地出产的粮食还不够农民的一年口粮。人民群众一断粮就指望着游击队。在这当中，不少的干部和游击区人民群众就产生了对游击队的依赖心理。一到断粮季节，有些人就想军队又会打击敌人夺来粮食，便袖着手坐在那里连备耕工作都不去做。

1934 年春，我到大荒崴去同三连的同志们一起过五一节。在指导连队工作的过程中，顺便也了解了备耕情况。情况很不好。春耕季节逼在眼前，可这里的人们不去做播种准备，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这些人到底想怎么办？不仅我一个人感到愕然，和我同行的共青县委书记也不满地说，人们怎么变得这么懒惰了。

几天后，我们在腰营沟的秘密联络站召开了共青县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青年在春播中的任务。像 1932 年秋天组织秋收队保障了中间地带的秋收那样，这次也组织青年生产突击队，在间岛全境的各游击区展开了春播战斗。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等游击区骨干青年都参加了突击队。他们不仅扶犁翻耕，而且把准备种子和农具的事也都包下来。破损的农具，由青年们在铁匠铺集体地修好了。在耕牛不够用的地方，就由青年们用镐和锹翻土，保证了春播。1934 年的春播就这样胜利完成了。

通过突击队的活动，共青组织在游击区的威信大大提高，青年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党组织对共青组织要做的和设想的，都给予支持，有力地推动共青领导干部大胆地开展青年工作。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从各方面支援共青组织的工作。

只要看一看 1934 年 9 月的九青节纪念活动过程，就可以知道游击区人民是多么重视共青工作的。九青节就是国际无产青年节。

全世界无产青年于 1915 年第一次纪念了这一节日，而后每年举行九青节活动。中国和我国都举行这项活动。

1934 年，汪清人们为迎接九青节，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纪念日前夕，我们一面派工作员到敌占区去邀请以村落为单位的参观团，一面购买大米、白面、肉类等后勤物资，准备接待参观团，有些后勤人员还买来了茶叶。游击队则去打敌人，缴获了筹备纪念活

动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

腰营沟广场上竖起了松枝彩门，广场周围贴出了反映游击队战果的连环画，画与画之间贴出了激动人心的标语。当时，五连有一个曾在苏联居住过的才子，特别擅长画画，书法也惊人。他画出反映人民革命军业绩的战斗简图，贴在广场周围。他画的画，每幅都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我们把政府的办公室全都腾出来作了客人的宿舍，还贴上了宣传画供参观团员们欣赏。

在九青节前夕，鸡冠砬子、影壁砬子、天桥岭、转角楼等游击区及其周边的各村庄都选出代表，派到腰营沟来。因为敌人搞了集团部落，严格管制出入，所以敌占区的代表们不能集体地来，只好个别地拿着镰刀或顶着筐，假装下地，走出城门，来到游击区。

纪念日那天，游击区的青年和群众都穿着用在北三岔口缴获的绸缎和哔叽做的衣服，向广场集合。共青县委的干部们也穿上新的西服来主持纪念活动。游击队员们个个穿着笔挺的军装，步伐整齐地进入广场。他们威风凛凛的仪容，使敌占区的代表们赞叹不已。

这天，用爆炸延吉炸弹的方式来宣布开会。爆炸声轰地一响，广场上顿时飘扬起几十面红旗，口号声、掌声、鼓声震撼了会场。参观团员们看到这个情景，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纪念报告一结束，各界代表陆续上台作了赞扬共青组织的业绩、宣传抗日的战斗性讲话。当时，把这种讲话称为发表感想。纪念活动结束后，我们为敌占区的参观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我应党县委和共青县委干部的要求，在欢迎会上作了以积极支援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军事活动为内容的讲话。敌占区的一位代表要求发言，准备致答词，可是他激动得喉咙梗塞说不出话来，只是向四周连连行礼。

参加纪念活动的敌占区代表们听了我的讲话后，纷纷报名入伍。他们个个都恳求吸收入伍，以致我们不得不竭力说服他们。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工作关系，只吸收部分代表加入革命军。

在那天的欢迎演出中，大放异彩的是五连演出的节目。曾在老黑山地下组织进行过活动的游击队员跳俄罗斯舞跳得十分精彩，这是他住在苏联滨海省的时候学的。

参观团员们离开游击区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带去了特意为敌占区人民准备的战利品。

我所以在这里详细地叙述 1934 年的九青节活动，是因为这是在游击区时期青年的节日活动中规模最大、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

当时，我们非常重视国际性的纪念日，重视同共产国际、少共国际(青年共产国际)、赤色工会国际、赤色农民国际等国际组织的联系。世界各国共产党曾有过称为共产国际的国际中央，同样，世界各国的共青组织也曾有过叫做基姆的国际中央。基姆是青年共产国际的简称。我们到哈尔滨去与之取得联系的组织也是青年共产国际属下的组织，推荐我留学莫斯科的组织也是负有共产国际青年部使命的青年共产国际组织。

通过贯彻共青组织的纲领的实际斗争，青年群众中涌现了许多在民族解放斗争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篇章的优秀的革命者。“十三连发”、“广锹”(金凤旭)、朴吉松、黄正海、金泽万、金忠镇、朱春日、李信顺、金范洙、李东华、李顺姬、朴浩俊等许多抗日英雄，都是通过组织生活受到教育成长起来的、共青组织的产儿。在这些著名英雄中，有游击队指挥员，有地下工作者，也有教育工作者。

在腰营沟秘密会议室举行的共青组织的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敌后活动的问题。

敌占区缺乏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训练有素的共青领导骨干。由于左倾分子们占据各级党组织和共青组织的领导岗位，推行了错误的政策，敌占区共青组织的活动被忽视了。共青组织的会议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要在敌人的心脏修炮台”的战斗口号，意思跟“要在敌军中修革命的炮台”这个口号大同小异。“要在敌人的心脏修炮台”，意思是要在敌人的中心建立并加强我们的组织。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许多共青干部接受敌后工作的艰巨任务，开始渗透到东满地区、朝鲜国内等广大地区去了。东满特委儿童局长朴吉松也被派到罗子沟去了。他同精明强干的共青组织积极分子一起扩大了组织，使青年们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在拥有很多少年临时工的、在间岛数得上的罗子沟酿酒厂里，也拉上了工作关系，而且把关系搞得很深。

罗子沟儿童局长崔光也按组织的指示，打进这个酿酒厂去进行了活动。

一个姓俞的人经营的这座酿酒厂，每年 2～5 月间和 9～10 月间招收临时工，却只录用童工，因为这样就可以少付工钱，让他们干更多的活。厂主给童工一天付三角工钱，还不到大人工钱的一半，而且给的还不是现钱，而是酒。三角钱只合一瓶酒。为了这一瓶酒，孩子们从早到晚做苦工；下班后，又为了卖那一瓶酒换现钱，整夜在街上转。

崔光在共青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童工开展了要求提高工钱的斗争。他进厂后把十几个孩子吸收进了儿童团。他就发动这些孩子开展了号召罢工的鼓动工作。在板棚式食堂的每个门口都放了哨，他自己也作了鼓动演说。他为发动没有参加过组织生活的孩子们举行罢工，费了很大的劲。他反复进行说服：“拿一瓶酒，怎么能过日子

呀？干了多少活就应该拿到多少工钱，大家要团结起来，要厂主付给我们应得的工钱！只要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就能使厂主屈服。”

童工们响应他的号召，一连三天没有上工。那些怕失去生计而上工的童工们听到他的演说后，也汇合到罢工队伍里来了。经过两次罢工，童工们终于使厂主屈服，把工钱由三角提高到四角。

罗子沟共青组织的委员朴浩俊以出众的组织能力和老练的群众工作，在敌占区的共青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幕后进行指导，把罗子沟酿酒厂的童工团结到反日组织里，使罢工取得胜利的，正是朴浩俊。后来他被敌人逮捕了。

敌人逮捕他后大呼快哉，好像马上就能破获罗子沟一带所有的秘密组织似的。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用任何方法都没能使朴浩俊屈服。

有一天，敌人对已被拷打得半死的朴浩俊进行利诱说：

“你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多可惜啊！你母亲孤孤单单，只靠你一个人过日子，你不可怜她吗？

“只要你说出共青组织和干部的名字，你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过上好日子。你不要对那个没有希望的革命抱什么幻想，找一条活路才是正经！”

朴浩俊冷笑着说：

“我告诉你们共青组织和干部的名字，你们记下来吧。领导我的干部姓‘共’，名字叫‘产党’。”

他望着敌人记下“共产党”这个“名字”后表现出大吃一惊的样子，就倚着墙立起身来，嘲弄他们说：

“培育了我的是伟大的干部，你们就是记下了他的名字，又能有什么用！共产党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朴浩俊就这样选择了舍生取义的道路。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一个共青盟员敞开前襟走向刑场的形象吧！他是那样地从容不迫，以致连敌军的士兵也被震慑了，不禁小声说，共产主义者真了不起。

有个爱吸烟的人悄悄地把香烟递到他的手里。姑娘们向他的脚下投去了花束。

抗日革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共青盟员，就是这样为恪守信义而战，死也死得这样光荣。

那时，在共青组织里受到教育的盟员，都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于组织和革命的利益。

共青盟员林春益也是这样的战士。

他是共青组织延吉县八区南线特别支部的书记。他是很早就组织了地下共青组织的得力的政治工作员，在领导这个组织的过程中被捕。

他也多次遭到野蛮的拷打，但他坚守了组织的秘密。

他在受审时把别的同志做的秘密工作也都说成是自己做的。因此，被捕的其他同志都被释放了。他年纪轻轻十八岁就英勇就义了。

十八岁的共青盟员发扬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拯救了组织和同志们，只身走上了刑场。据说，连敌人也对他高尚的品质敬佩不已。

共青盟员李顺姬也是抗日革命培育出来的不屈的战士。记得我和李顺姬初次见面是在 1934 年年初。那时，我到儿童团学校看望在敌人的“讨伐”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也见到了李顺姬。她原在延吉县任县儿童局长，被调到汪清县任儿童局长还不久。

我在儿童团学校操场被孩子们围住的时候，她急忙跑来向我施了礼。她眉目清秀，像河边的一朵勿忘草那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学校操场上吹来阵阵寒风，可是，围着我欢欣雀跃的孩子当中，

有不少孩子只穿一件单衣，或光脚穿着草鞋、围着破烂的短裙。也有些孩子脸上受了烧伤，可能是在敌人“讨伐”时从大火中逃出来的吧。在敌占区失去父母后来到这里的儿童团员，几乎都是衣衫褴褛的孩子。

我抚摸着一个受了烧伤的孩子的手，环视每一个孩子。

孩子们闪闪发亮的眸子好像向我诉说什么殷切的愿望。

那时我心情十分痛苦，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把那些使你们变成孤儿的日本鬼子消灭光。

我抑制着心中的痛苦，诚恳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栋梁。你们心情开朗，我们的心情也会开朗；你们茁壮成长，我们就会力量倍增……你们要快快长大，成为祖国的坚强栋梁。”

孩子们顿时喜笑颜开，有力地回答说：“是，一定做到。”孩子们高兴地闹嚷着，儿童局长顺姬却不住地淌着眼泪。

“将军，请原谅我吧！共青组织交给了我儿童局长的重任，可是我眼看着孩子们穿得那么破，却……”

顺姬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在我面前非常难为情。她满是泪痕的脸上显现出深深愧悔的神色。

孩子们衣衫褴褛，这个责任怎么是她的呢。实际上，她给孩子们缝衣补袜，修鞋，订笔记本，常常通宵不眠。

我和她初次见面时，她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她那不愧为革命者的自我反省态度，她对自己工作范围内出现的错误和不幸事件，总是从主观上找原因。

几天后，我为了儿童团员，特地跟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战利品。然后用它给儿童团学校的孩子们做了棉被和衣服，还给他们发

了鞋和笔记本。

当时，李顺姬把游击队员用鲜血换来的孩子们的新衣服贴在脸上，激动得又哭又笑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有一天，她组织一个儿童团演艺队找我们来道谢。

“将军！您给我们送来了棉被和新衣服，对这个恩情，我们想表一表我们的心意，特地组织了一个孩子们的演艺队。”

我顿时感到心里涌上了一股热流。

那天，我把游击队员和根据地人民都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愉快地观看了演艺队的演出。

演出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其中一个叫做口演的节目，尤其感人。

一个小姑娘穿着新衣服，系着红领巾，走上舞台说，我的爸爸妈妈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可是我现在穿上了新衣服，系上了红领巾，茁壮地成长，我穿的这套新衣服是游击队的姐姐和哥哥们用鲜血换来的。她这样起了头之后，伸出受了烧伤的小手说：

“将军抚摸着我这只受了烧伤的手说：你们心情开朗，我们的心情也会开朗，你们茁壮成长，我们就会力量倍增。

“游击队的哥哥姐姐们！

“我们在心情开朗地幸福成长，请你们高兴吧，拿出力量来吧！

“遵照将军的教导，我要快快长大，像共青团员哥哥姐姐们那样，拿起枪去打日本鬼子……”

听了她的口演，没有一个不流泪的。

正像从丰收的谷穗中看到勤劳的农民的汗水那样，我们从那个舞台上看到了李顺姬倾注在孩子们身上的心血。

有一天，她来找我，意外地要求我派她去做敌后工作。

她这个一向热心于儿童团工作并为此感到无上光荣的姑娘，现在却忽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使我感到惊疑。

从那以后她一再向共青组织提出这一要求，终于和朴吉松一起被派到罗子沟去了。

罗子沟三面环山，它那万重青山和肥沃的田野上，不仅印有抗日血战的足迹，还安息着从事过敌后工作的勇敢的共青盟员的英魂。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记述李顺姬的敌后工作，只想谈谈是什么精神力量使她正当芳年却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

那时，李顺姬在离罗子沟不太远的一个草棚里进行工作。她就在这个透冷风、漏雨水的破草棚里，打发了春天，送走了夏天，迎来了秋天。这期间，罗子沟的共青组织扩大了，儿童团组织也壮大了。就是说，在敌人的堡垒里筑起了一座强有力的革命炮台。

为了修筑这座炮台，李顺姬冒着敌军警的刀枪和密探的监视，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敌占区，乔装打扮，昼夜奔波。后来，她被一个叫李奉文的奸诈的密探盯梢，终于不幸被捕了。

敌人为了探听出罗子沟的地下组织，把顺姬关进阴森的牢里，对她严刑拷打。地下组织的命运完全系于李顺姬身上了。只要她开口，罗子沟的地下组织就会被一网打尽，好不容易筑起来的“炮抬”就会崩塌。

敌人企图用甜言蜜语和动听的诺言动摇姑娘的心。可是敌人从她那里只探听出她是共青盟员这一个秘密。看来，顺姬在牢里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共青盟员的意义。

负责对她的拷问的罗子沟宪兵队队长恼羞成怒，终于下了枪毙顺姬的命令。

在枪毙前一天夜里发生了一桩事。

宪兵队长想最后再施展他的哄骗伎俩，带着一些喽罗走进了顺姬的牢房。

这时，顺姬正在收拾她的衣服。那汗渍渍的衣服血迹斑斑，破烂不堪，但她是想穿得整齐一些再走上刑场的。

那个像哈巴狗一样总是跟着宪兵队长转的李奉文，走到顺姬跟前说，这可是你能活下来的千载一遇的良机，你年纪轻轻的，死了多可惜，多可怜啊。你还是把罗子沟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字招出来吧，你只招出一个也行，那你就能活下来了。而顺姬一声不响，只是梳了梳被血污凝结的头发，然后从被撕破的小袄里掏出了一个灰色小口袋。霎时，李奉文吓得面如土色，慌忙逃出了牢房。别的刽子手们也惊叫着逃出去了。原来，李奉文以为顺姬掏出来的灰色小口袋是手榴弹一类的爆炸物。其实那不是爆炸物，而是包着一把泥土的小布袋。这个小巧的口袋是她父亲在游击根据地阵亡时留给她的。

“别怕！这口袋里装的是祖国的一把泥土。你们那肮脏的命有什么可惜的，还那么没命地跑？”

身陷囹圄、怀里却珍藏着一把祖国的泥土、盼望着祖国光复的共青盟员李顺姬，和背叛了祖国的逆贼李奉文，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有些人把他们比作“凤凰和乌鸦”，我认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奉文那样的叛徒怎么会懂得那一小口袋泥土的价值呢！

第二天，李顺姬在刑场上高呼革命万岁，英勇就义。我愿把李顺姬在最后一刻唱的《共青团歌》介绍于下：

新世界将要来临，快去迎接，
我们是无产青年，一马当先，
勇敢地摧毁敌人的旧社会。

我们是无产青年，要不愧为无产青年，

我们是劳动群众的青年先锋队。

有一次，我曾和李顺姬一起在儿童团学校弹着风琴唱过这支歌。《共青团歌》，不仅共青团员爱唱，而且共产党员、儿童团员和妇女会员也都爱唱。这是因为这支歌很好地反映了劳动群众对新社会的一致向往、对未来的热爱和青年们要尽早创造新世界的坚定意志。许许多多的共青盟员像李顺姬一样在断头台上唱了这支歌。

这支《共青团歌》，不是我们朝鲜歌，是俄罗斯青年唱的歌。但是，贯穿着歌词和旋律的思想感情，紧紧抓住了全世界热爱自由和正义的青年的心。正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成了许多国家的党的党歌那样，《共青团歌》也作为国际性的青年的歌广泛传唱。

出现了像李顺姬这样的烈女，毫无疑问，是给她插上革命的翅膀、给她的政治生命以光和热的共青组织的功劳。如果没有组织，没有在组织里进行锻炼的成长过程，那么，像李顺姬那样一个年轻轻的姑娘，能在刽子手面前那么勇敢，抱着无比自信的自豪感，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装点得那么光彩夺目吗？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仍然常说，组织是培育英雄的家和大学。一个通过组织生活得到锻炼的共青盟员和社劳青盟员，具有能够战胜一百个、一千个敌人的巨大力量。我国人民之所以成为以一当百的人民，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组织生活得到锻炼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军军人之所以成为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军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在革命组织这个熔炉里从思想政治上、军事技术上不断磨练自己的军人。

今天的青年通过社劳青组织成长为战士、英雄和革命者。抗日战争时期的共青组织是培养职业革命者的学校，而现在的社劳青组

织则可以说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的基地。和抗日革命时期一样，今天青年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也承担着主攻的重任。社劳青同盟是我们党最爱惜的可靠的主力部队。这支主力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丰功伟绩和奇迹。西海水闸、北部铁路、光复大街、五一体育场、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跆拳道殿堂等等，成为我们祖国万年财富的伟大纪念碑式建筑物，它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渗有劳动党时代青年们宝贵的血汗。我国人民热爱“速度战青年突击队”的理由也在这里。

在我们时代的社劳青盟员和青年中，不断出现使万民赞叹不已的共产主义的美举。人的生命是不能死而复活的。可是，我国青年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决心做荣誉军人的手足而做了他们的妻子的姑娘，数不胜数，无法一一举出她们的姓名。在我国的社劳青盟员中还有身为未婚的姑娘，自愿做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母亲的令人感佩的事。当别国的青年们为获得首都市民权而费尽心机的时候，我们的青年却毫不犹豫地自愿离开心爱的首都，奔赴田野、煤矿和开发区。说句真心话，我真想把这些青年捧在黄金坐垫上。

每当通过报纸和广播得知我们时代青年中出现的共产主义美举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朝鲜共产主义者为青年运动付出的辛劳，想到很好地继承了这一运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在我们时代的青年中接连出现轰动世界的美谈，使亿万人激动，这可以说是社劳青同盟的功绩。通过组织生活得到锻炼的青年大军，实际上比原子弹有更大的威力。

世上没有比青年工作更有意义、更光荣的事了。如果我有幸能重新开始人生，获得重新选择职业的权利，我就一定像吉林时期那样投身于青年工作。

游击区解散后，我们又把许多政治工作员派到敌占区去了。当时，我们决定派人到安图、敦化、抚松、长白、临江等地去，建立共青辽吉边中心县委、加强敌占区的地下青年工作。辽吉边指的是辽宁、吉林、间岛的边境地区。我们还作了这样的远大构想：首先在茂山、甲山、丰山、会宁等朝鲜的北部边境地区建立地下青年组织，进而扩展到平壤、汉城、釜山等朝鲜的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共青汪清县委书记赵东旭也被任命为共青辽吉边中心县委书记，到敌占区去了。

他有丰富的共青组织的工作经验。他曾由于参加了五·三 0 暴动而被关进当时称为吉林省第三监狱的哈尔滨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他在监狱里学会了中国话，加入了共青组织。他只念过中学，可是知识却很丰富，求知欲又很强。他曾受共青宁安县委的委派，到救国军部队去做共青工作，1932 年 9 月他带领四十多名武装人员来到了汪清。

记得我和赵东旭初次见面是在那年秋天。我们任命他为李光别动队的共青组织的干事，把他从宁安带来的武装人员配属给这支别动队之后，派队员到北满接来了他的家属。他的继父张基燮是被称为“共产主义大爷”的忠诚老实的党员。

赵东旭不仅亲眼目睹了我和吴义成的谈判情况，而且在谈判期间同王润成一起积极帮助了我的工作。这次谈判后，我把他和王润成派到了罗子沟城里的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

赵东旭和王润成同各地反日部队派来的联络军官结拜为义兄弟，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支部。

通过在反日部队联合办事处的活动，赵东旭的政治活动能力更强了。他到敌占区去首先落脚的地方是安图县两江口。他在那里开

了家小商店，一面做“买卖”，一面老练地做来光顾的伪满军的工作，他同十五个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结拜为义兄弟，成功地把一个连完全争取了过来。这一个连在赵东旭的策划下举行哗变逃入山里去了。

赵东旭为了使他们跟游击队取得联系，来到了车厂子。可是左倾分子们却把他当做“民生团”嫌疑分子，准备把他扣起来。

后来，赵东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那时，东满特委的左倾分子们一见到我，就连唬带吓地审问我说，宋一被判明为‘民生团’，已被处决了。宋一任汪清县委书记的时候，你是他手下的共青县委书记，宋一是‘民生团’，你也一定是‘民生团’，在我们拿出证据之前，你还是照实说了才好。

“我决心逃出去。给我送饭的金正淑同志也支持我的决心。正淑同志还给我一些钱做盘费。我用那笔钱回到两江口之后，带着母亲到朝鲜去了。”

从那以后，他在朝鲜各地继续做青年工作。

金振的精神由李寿福继承，李寿福的精神又由金光哲和韩英哲继承。同样，共青组织的命脉由民主青年同盟继承，民主青年同盟的命脉又由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很好地继承下来了。当一些国家的青年学生成为社会的灾星、成为反革命的凶手，把祖父一代人筑成的宝塔推倒的时候，我国青年则成为革命的堡垒和盾牌，可靠地保卫和继承着先烈们开创的革命事业。

现在，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队伍里集结了数百万无限忠于金正日组织书记的领导的盟员。依靠他们的力量，定能把 21 世纪的我们祖国建设成为生活更加美好的乐园。

四　对四道沟惨案的回答

正当我们忙着领导解散游击区的工作的时候，罗子沟地下组织派联络员到腰营沟来，告诉了我四道沟惨案的详细经过。联络员带来的文件记述了令人气愤的事实：闻营长的部队把老黑山地方的靖安军引来，把四道沟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杀光了全村的居民。

文件应该是可靠的，但我弄不明白：闻营长真的会这样不顾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引靖安军来进行大屠杀吗？我不大相信。闻营长和我们的部队之间，原本有着跟今天的攻守同盟相类似的关系。

我们跟闻营长携手，是在罗子沟战斗结束以后。有一天，敌占区的地下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的一支大车运输队刚从百草沟出发，开往罗子沟。于是，我们就在鸡冠砬子附近打了伏击战。伪满军的护送兵没怎么抵抗，就全部当了俘虏。他们中还有个姓铁的连长，是闻营长的部下。这个连长虽然被革命军俘虏了，却一点也没有惊惶的神色，反而泰然自若地嘻嘻笑着，好像碰到了意料中的事情。

“你是军官，为什么不抵抗就投降了？”我问这个怪人道。

“这儿是‘高丽红军’的活动区，抵抗有什么用，打也打不赢，干脆举手投降才是上策嘛!”他也像宁安地区的人们那样，把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称为“高丽红军”。他接着说：“再说，‘高丽红军’不杀俘虏，这是全满洲都知道的。”

原来，铁连长是贫农的儿子，他听说“满洲国”的军队发的军

饷多，便想赚点钱好娶媳妇，才入伍扛起了枪。虽然有些同志说他太不识时务，但依我看，尽管他挂着伪满军军官的牌子，只要好好给以教育，他是会凭良心过日子的。当我们结束了同俘虏的谈话，正准备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铁连长向我请求道：

“队长大人，这些大车上的东西，别的都拿去好啦，只是钱和枪，能不能还给我们？要是我们空手回去，就不能给弟兄们发军饷了；再说，闻营长会枪毙我们的。”

我把大车上的东西和俘虏全都让他带了回去。我们的同志在送他们回去时开玩笑说：“朋友，我们连子弹钱都没捞回，还搭上了睡觉的时间。”

铁连长朝我们的李孝锡连长说：“朋友，请你们往这个装了萝卜干的草袋放几枪吧！”说着，他把一整箱子弹交给了我们。他显然是被我们的宽大处理所感动。李孝锡把子弹箱又装到大车上去了。这么一来，那些护送兵就自己朝萝卜干草袋放了几枪，然后把他们枪膛里的子弹全都倒出来，包在手帕里扔在草地上，就撒开腿跑了。

为这事，铁连长赢得了闻营长的特别信任。闻营长每每派运输队的时候，总让铁连长的连队护送。因为，派别的连去，总是空手回来，只有铁连长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归队。

别人护送的运输队，我们都打；只有铁连长护送的运输队，我们不打。每当他运送军需物资的时候，他总是先派人告诉我们他的运输队某日某时经过哪些地点，打的是什么标记。久而久之，闻营长也知道了铁连长是受人民革命军保护的。

有一天，铁连长悄悄地对闻营长说：“我的连在罗子沟受到人民革命军的保护。干脆，咱们营跟金队长的部队订个攻守同盟，过个安稳日子好不好？”闻营长听了起初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似地，装出

一副震怒的样子，但后来就爽快地表示了同意，说这是极好的护身之计。铁连长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又给闻营长转达了我们的意思：只要伪满军不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同意跟他们订立同盟。这是一种没经过会谈，也没签名盖章的特殊的“君子协定”。

攻守同盟的本义是双方协同，联合进攻、联合防御的同盟，而我们这个攻守同盟却是两支军事集团互不攻打、友好相处的同盟。这个同盟，一直维持得很好，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利益，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折。我们忠实地遵守互不侵犯的原则，闻营长则多次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弹药、粮食和被服，甚至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日军调动的重要军事情报。

从这种和平的同盟关系上看，也无法相信闻营长会把靖安军引来“讨伐”四道沟。于是，我派联络员到铁连长那里去打听真实情况。联络员的汇报证实，四道沟的惨案、闻营长的背信弃义，都是事实。铁连长向我们通报说，闻营长在日本主子的压力下，走上了背弃攻守同盟的道路。

对闻营长的背信弃义和他起了前导作用的四道沟惨案，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回答。要求复仇的呼声天天都飞到指挥部来，指挥员们也在鼓动队员们去为四道沟人民讨还血债。“疯狗要用棍棒打”，这是革命军爱讲的格言。

我认为队员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不消灭老黑山的靖安军和罗子沟的伪满军，就不能保证这一带人民的安全，也不能从军事上支援扎根在这一带各村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而且人民革命军挺进北满也会遇到困难；解散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也难免产生混乱。再说，罗子沟是从汪清、珲春地区的游击区疏散出来的群众要去定居的地方。

我们决定同时攻打靖安军部队和闻营长部队。为了补足兵力，

我们调来了延吉第一团和驻在车厂子的独立团。独立团一天一人吃一块饽饽，经过五天的强行军来到了塘水河子的一个村子。独立团的团一级干部，包括团长尹昌范，大部分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遭到杀害了，只好由参谋长带队来。因为失去了指挥员，队员的士气非常低落。

我们从独立团、延吉一团和汪清三团中抽调了一部分力量，先进行了转角楼战斗。因为，不消灭这股躲在厚厚的土城里为非作歹的伪满军和自卫团，就无法打通开往罗子沟的路。

转角楼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制定了攻打罗子沟的作战计划，接着在大白天朝预定为进攻基地的四道沟、三道沟和太平沟方向开始了强行军。虽然喝稀粥走了二百多里路，队员们的士气还是很高。

四道沟，本是李泰京等独立军出身的老兵和义兵出身的先觉们当做“理想乡”来开辟的地方。这个村子也叫四道河子或上房子，后来我们同李光一道把它改造成了革命村。我们让李泰京老人出面，在这个村里建立了反日会、农民协会和革命互济会。因为我们经常出入这个村子，所以罗子沟和附近的人都把这个地方叫做“共产党司令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对人民革命军的爱护和优待，的确是令人感动的。人们只要听说革命军来了，就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光着脚跑出来欢迎我们。我每次看到他们如此热情，都深受感动，钦佩不已。

与四道沟邻近的三道河子，也是深受我们影响的出名的革命村。这个村的西山脚下，有一个中国人开的烧锅。我和周保中常常在这个烧锅会见地下革命组织的干部和群众。

我们对四道沟群众的旧情，像浇灌这一片土地的绥芬河一样绵绵流长，然而这个村庄已被敌人烧成了一堆灰烬，人们被埋在了地下。李泰京老人的八间房子也烧成了灰，只剩下基石。这所房子，

是一年前在打罗子沟战斗的前夕，我们同周保中等救国军部队的指挥员一起开过作战会议的场所。

李泰京老人就在这房址的旁边盖了一所学校，专心从事对后代的教育工作。在那屠戮的枪声、呼救的哭叫声尚萦绕在耳畔的时候，这位老人下狠心办起了学校，开始了对后代的教育。他还收留了一个在大惨案中幸免于难的独立军朋友的儿子。这个青年那天出去串门，回来时在一眼望得见村庄的山上，目睹了靖安军的暴行。

四道沟惨案，是由于对罗子沟城里的地下工作人员、共青团员徐日南的非法审问而引起的。徐日南被怀疑在店铺里偷了东西，并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遭到逮捕，错误地受到四道沟革命组织负责人的审问。逮捕他的人们，无论怎么调查也查不出他是"民生团"的证据，便暂时放了他，严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徐日南一回到家里，就大发牢骚，埋怨干部无缘无故地给他扣上"民生团"的帽子。上头的人听说他发牢骚，就想再把他抓去当"民生团"处决。徐日南看破了他们的居心，便逃出去投向了敌人，并且打定主意要向虐待他、拷打他的人报仇，于是向敌人供出了四道沟革命组织的秘密。

徐日南供出的秘密，挑起了在罗子沟过年的靖安军的杀人欲。1935年元宵节那天凌晨，一百多名"讨伐"军偷偷地包围了四道沟，用轻重机枪射杀群众，放火烧房子；看到从火焰中逃出来的人，也不分男女老幼，用枪刺刺死再扔进火里。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里，他们就把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灰烬。

当三道河子的百户长闻声赶来时，只有八个幸免于难的朝鲜族小孩，在横七竖八的的尸体堆里哭泣。百户长把邻村老乡叫来，商量收养这些孩子的问题，决定各人都领回一名成了孤儿的孩子去抚

养，百户长本人也收养了一个小孩。此外，幸存的三个青年人就加入了我们的部队。

听了这起惨案的经过，我们都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这场惨祸虽然是由于那些给徐日南扣上“民生团”罪名并对他施加野蛮暴行的人们的极左妄动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首先痛恨那些把四道沟顿时变成一片血泊的靖安军杀人魔鬼。

四道沟的大屠杀，是只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使和怂恿下才能干得出来的极端野蛮、残酷、毒辣的行径。日本鬼子是那些闯入别国的王宫，毫无顾忌地杀害王妃，并为销毁罪证，放火焚尸的灭绝人性的强盗的后裔。他们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我小时候，听父亲讲乙未事变(1895 年)，禁不住义愤填鹰。我国的最后一代国王纯宗的母亲明成皇后闵妃，就在王宫里被杀害，连尸体都没能保住。当时，一手独揽朝鲜国政的闵妃成为亲俄派的首领，采取了反对日本势力的立场。日本统治者因而十分惊慌，急令日本驻朝公使三浦以日本守备队、警察以及流氓暴徒组成一个杀人集团，袭击了景福宫。三浦的走卒用日本刀把闵妃砍成了肉泥，然后为了销毁罪证，把尸体焚化，连骨灰都扔进了池塘。

本来，朝鲜人并没有怎么崇敬闵妃，因为人们认为闵妃是以开放门户招致亡国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对她身为王室的儿媳，竟然勾结外部势力把自己的公公大院君赶下台一事，表示不满。也有些天真的人说，如果大院君围起来的锁国篱笆再维持二十年或三十年，我国就不至于沦为外国的殖民地了。因此，国民对闵妃深为不满，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不管国民多么不信任闵妃，政治终归是政治，王妃终归是王妃。闵妃毕竟是我国国民的一员、王室的主人，是代国王高宗摄政的国家权力的代表。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制造乙

未事变的野蛮行径，是对我国人民自主权利的强盗式的侵犯，是对正统王室尊严的蹂躏。这对于国民意识强、崇奉国王的精神高、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的朝鲜人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又强行实施“剪发令”，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我国人民以开展义兵抗战来回答了乙未事变和“剪发令”的实施。

在以间岛大“讨伐”之年而广为人知的庚申年(1920)，日军在满洲地区大量屠杀朝鲜人。这是他们为了洗刷在凤梧洞和青山里遭到惨败的耻辱，对旅满朝鲜族非军事人员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是杀人魔鬼的疯狂发作。从西伯利亚撤退南下的日军和从罗南向满洲地区北上的日军，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放火烧毁了朝鲜人村庄，枪杀了大批的朝鲜青壮年。他们为了消灭罪证，用弑害闵妃的方式，撒上汽油烧掉全部尸体。

1923 年发生的日本关东大震灾，不仅是地壳运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也是日本国粹主义者强加在朝鲜民族头上的人为的灾难。暴徒们把大震灾当做弹压朝鲜人的绝好机会，用日本刀和竹枪，肆无忌惮地残杀朝鲜人。他们为了辨别朝鲜人，对外表上分辨不清的人，就一律强迫他说“高圆高九高森”，这是日语五圆五角五分的意思。要是说这句话发音不准，就毫无例外地把他当做朝鲜人，当场杀掉。仅在头十八天，就有六千多名朝鲜人被杀害。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极小一部分，不过是用屠杀和掠夺点缀得血迹斑斑的日本近代史的一个片断而已。就是这个历史的一个片段，在小小的四道沟重演了。

“村里有地下组织，怎么那样缺乏警惕？”我抑制不住愤怒和难过的心情，问李泰京老人道。其实，这是多余的。即便警惕性再

高，又能怎么样？这个村没有常备的游击队武装力量，怎么能站岗放哨？就是放了哨，又有什么用？那么多的兵力乘黎明前的黑暗隐秘地摸进来，能对付得了吗？

“将军，是我们太粗心大意了，我这个老朽有罪啊！有革命军的保护，一直过得平安无事，竟忘记了我们是亡国民众，忘记了我们是打独立战争的国民。四道沟的老人里还有过崇拜甘地的人呢！”

李老人不无羞涩地说道，好像说了什么违背常理的话似的。

我不禁感到惊讶，这个山沟里竟有甘地的崇拜者？

“老大爷，他是怎么崇拜起甘地来的呢？”

“听说，是一个从朝鲜来的绅士给他讲述了甘地。还给他看了朝鲜报纸上登的甘地的信。打那以后，这个老头子一聊天，就像口头禅似地大谈什么暴力如何，非暴力又如何，鼓吹不流血独立论。”

我在吉林的时候也看过《朝鲜日报》登的甘地的信，并且同朴素心一起评论过非暴力抵抗。甘地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你们的来信。我寄与你们的唯一嘱托是：希望你们绝对以正直的、非暴力抵抗的手段使朝鲜属于朝鲜。

1926 年 11 月 26 日于萨巴尔马蒂

M·K·甘地

从信中可以看出，甘地教朝鲜人要用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去实现国家独立，大概是有个受他思想影响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给他写了信。

吉林的朝鲜青年，没有一个信仰甘地思想的。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天真幼稚的幻想家，以为搞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就能使残暴

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然而甘地的思想方法，却在一些抛弃了武装抗战或脱离了独立运动的民族运动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甘地虽然仇恨英国的统治，却说无意杀死一个英国人，又说能够抑制英国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的力量，是有组织的非暴力。这一思想之所以赢得了广大印度人民的响应，可以说是因为它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印度的实际，我就不得而知了。即使它是妥帖的，朝鲜和印度也不能用同一个处方搞独立运动。这两个国家是分别以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强国作为宗主国的。总之，印度是印度，朝鲜是朝鲜。

在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活动开展得最活跃的罗子沟地区，竟然有人迷恋于那种不流血独立论，确是很难理解的。

“那个老头可能是临死的时刻才认识到不流血独立论是多么荒唐的。如果他死的时候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该多么可悲啊！日本鬼子嗜血成性，疯狂肆虐，还说什么不流血！……”李泰京老人气得两拳直抖，话都说不下去了。

“老大爷说得对。对付强盗，还能讲什么不流血呀！疯狗，必须用棍棒打！”

“将军，我们朝鲜人的命太不值钱了。我们白衣民族挨到何时才能出头啊？我们请求您，快讨还四道沟人民的血债吧。只要报了这个仇，我死了也能闭目。”

李老人在送我回去的时候，也反复求我们去报仇雪恨。

我回答说：

“老大爷的嘱托，我们铭记在心。如果我们不能为四道沟人民讨还血债，空手而回，你就别让我们走进这个院子好啦。”

我们抱着一定要把杀人魔鬼打得头破血流的坚定决心，走上了进攻罗子沟的征途。

我是一辈子为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人。可以说，我的一生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和自主性的斗争历史。我一次也没有宽恕过侵犯我们民族、侵犯我国主权的人，从没有同歧视和愚弄我国人民的人妥协过。对友好对待我们的人，我们就与之建立睦邻关系，友好相处；对那些待我们不友好、歧视我们的人，我们就筑起一道墙，与他隔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若笑脸待我，我也笑脸待人。用糕打我，我也用糕回敬；用石头打我，我也用石头回击。这是我坚持一辈子的对等原则。

过去，无能的朝鲜封建政府给住在朝鲜的日本人赋予了治外法权。他们睁眼看着日本人任意损害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能按朝鲜国法惩办犯人，就像今天南朝鲜统治集团对美军的违法行为装聋作哑，不敢动用法律一样。当时，对日本人，只能使用日本法律。但是在朝鲜人民革命军活动的地区，那种治外法权是行不通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不容许对朝鲜民族、朝鲜疆土的任何侵犯。制造了四道沟惨案的杀人魔鬼，绝不能逃脱我们法律的制裁。

我们的计划是：趁端午节，先攻占西山炮台，再一举攻入罗子沟城。

珲春团的到来，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

在革命军的各纵队继续向罗子沟行军的时候，先到城里侦察的汪清团的队员们突然带着铁连长出现在我面前。铁连长是为了告诉我们闻营长的动向而来的。他说：

“我们的营长一听到人民革命军要围攻罗子沟，吓得直哆嗦。他说是因为靖安军要他告诉四道沟的位置，他才派部下给他们带了

路，可万万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惨事。要说他有什么不对，那也不过是他拗不过日本人的逼迫，告诉了他们上四道沟的路和他的部下抢掠人民财产时他没能加以制止而已。他并没有蓄意背弃对金队长许下的诺言，因此他求您千万饶他这一次。”

听了铁连长的话，我想了许多。闻营长没有严格制止士兵的掠夺行为，派人给靖安军带路，显然是背弃诺言的行为。不过，这是处处看日本主子的颜色行事的伪军一个营长的所为，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如果除掉闻营长，其后果会如何呢？我们的攻守同盟就会完全破裂，罗子沟就会新派来比闻营长的部队更加反动更加毒辣的部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敌人是一定会这样做的。这是会引起第二、第三、第四个四道沟惨案的条件。要把汪清、珲春地方游击区的居民疏散到这一带来的计划，也会遇到困难；要继续把罗子沟地区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战略支撑点的意图也会碰到严重的障碍。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决定不惩罚闻营长，要把他更紧紧地拉到我们这一边来。同时，要给老黑山一带的靖安军以沉重的打击，叫他们看看残害人民群众的刽子手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据派到东宁县一带的侦察员的汇报，驻在老黑山王宝湾的靖安军的加强连，正是那支把四道沟夷为一片焦土的杀人魔鬼的集团。侦察员甚至探听到，这个连是属于美崎部队的一个派遣队。

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铁连长：

“人民革命军保留攻打罗子沟的计划。闻营长对我们背信弃义，这是事实，但我们还不抛弃对他的期望。他这回再一次表示要忠于攻守同盟，可是用什么来作出保证呢?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么最好让他提出一个保证，在端午节我们人民革命军在罗子沟城里举行军民联欢运动会时，由他来替我们担任警卫，保障我们的安全。你回去

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你们营长，我们在这里等他的回音。”

铁连长回去后，很快就通知我们说，闻营长完全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我们的各个团，立即把战斗队形改变成了欢庆节日的队形。制定了罗子沟进攻计划的干将们，这会儿却忙着组织体育队，编排体育项目，以保证联欢会符合军民的喜好和感情，充分显示军民一致的伟力。我们就是这样在驻有敌军的城市中心，在以“讨伐”革命军为其使命的敌军的警卫之下，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罗子沟军民联欢运动会。

这天，连地下工作员也都出来观看运动会。闻营长部队的官兵们看着这样新鲜的节日联欢，个个都入了迷。由于四道沟惨案引起的消沉下来了的群众情绪，也重新高涨起来。军民联欢运动会庄严地向内外表明了我们坚持不渝的意志和立场：对不触犯人民群众的军队，不管它的所属关系和名称，我们任何时候都愿意与之建立友好关系。

在太平沟，我们召开了连指导员以上的军政干部参加的指挥员会议，周密地制定了老黑山战斗计划，然后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悼念四道沟惨案的牺牲者。这个追悼会，成了激发革命军指战员复仇意志的慷慨激昂的讲坛。

我们在老黑山消灭“红袖头”，记得是在 1935 年 6 月中旬。所谓“红袖头”，是满洲地区人民给靖安军起的外号。靖安军都带着红袖章，他们这种虚饰的装束，可能就是这个外号的来由。

那时，我们的队员把靖安军十分巧妙地诱出了王宝湾。这支靖安军就是我们第一次远征北满时紧盯着我们穷追不舍的那支部队，又是制造四道沟惨案的极为凶残的部队。

起始，我们派小分队向靖安军挑战，但不知这支嗅觉灵敏的靖安军怎么知道是我们部队来了，不轻易出城应战。我通过这个村的人们了解到，这支靖安军只有冬天才“讨伐”游击队，夏天尽可能回避同我们交火，专打山林队或土匪。要揍他们，就得把他们从巢穴里诱出来。我们决定采用诱敌战术。于是我们故意在大白天把部队撤向了罗子沟，以便让敌人看得见。这是为了使敌人相信我们撤到别的地方去了。当天夜里，我们又隐秘地转移到靖安军驻地王宝湾附近的树林里，设了埋伏。然后，让十几个会说中国话的队员伪装成山林队去王宝湾。他们一到那个村里，就学山林队的样子，闯进老百姓家里抢毛驴，翻箱倒柜，拆掉菜园的篱笆，闹腾了一阵才回来。

可是不知怎的，头一天敌人没有上钩。我们只好蹲在埋伏地点，草草地吃了点干粮，忍受着蚊蝇的袭扰，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从前听李宽麟说过，她同张哲镐一道开辟白头山一带的时候，因为蚊子叮得厉害，不得不头上缠着熏蚊子的艾草辫去锄了土豆地。如今这老黑山的小咬也够厉害的。队员们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两腮和后颈，发牢骚说，这个老黑山的小咬也像“红袖头”一样凶残，用毒针刺人。

第二天，诱敌小组又伪装成山林队进了王宝湾村庄。他们闯进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抢了两三只鸡，故意偷偷摸摸地溜出了村子。靖安军这才开始跟踪我们的诱敌小组。看来，这天老百姓嚷得特别厉害。

靖安军很熟悉我们游击队的战法。甚至我们怎样打他们的运输队，怎样袭击城市，他们都很熟悉。要让这样的敌人上我们的当，那简直像给麻雀套辔头一样难。可他们到底被诱出来了，足见我们的诱敌小组演山林队的角色是毫无破绽的。

在与这次战斗有关的小插曲中，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那是打

埋伏的第二天，我在埋伏地点累得打瞌睡的时候，金择根的妻子把我摇醒。她是我在十里坪山沟里闹伤寒十分痛苦的时候，同丈夫一道精心护理我，为我吃了大苦的同志。可以说她给我当了一段副官。那时，她采来一种叶子很宽的草，对我说，这个草样子很诱人胃口，可不知是什么草。我一看，是马蹄叶。因为这是狗熊多的地方长的草，我就对她说，给它起个名，叫“熊曲”吧(“曲”是马蹄叶的朝鲜语音——译注)。解放后，我在大红丹又吃过一次“熊曲”。

敌军进入我军的伏击圈，不安地环视着四周，有的还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被包围，可就糟了。”等敌军全部进入峡谷后，我打响了命令开火的信号枪。我头一枪就击倒了日本指导官。敌人没怎么抵抗，就垮了。我们的宣传员们，趁敌人还没来得及选择地形地物准备抵抗的时候，就大声喊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交枪不杀!”敌人不敢抵抗，乖乖地交出了武器。这次老黑山战斗，是我们打的第一场有代表性的诱敌伏击战。从这时起，日本军警和伪满军开始把我们的战法称为“罗网战法”。

在这次老黑山战斗中我们一举歼灭了号称“天下无敌”的骄横跋扈的一百多名靖安军，缴获了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军马等大量的军需物资。在这些战利品中，还有迫击炮。敌人把迫击炮驮在马背上耀武扬威，可他们还没开一炮，就被我们缴获了。我送给赵宅周老人的那匹白马，也是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十多匹良种军马中的一匹。此外还缴获了不少军用犬。当时我们的指挥员都劝我挑几只作我的护身犬。但我没有这样做，让他们把这些军用犬都送给了太平沟和石头河子的群众。因为我认为这些军用犬毫无用处。在举行大荒崴会议的时候，同志们曾送我一只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军用犬作我的护身犬。看来他们认为这只军用犬十分机灵而又凶猛，会

有助于保护我。我很感激战友们的心意，但我没有收下，我对他们说，这狗是日本鬼子驯养的，不可能效忠于游击队长。果然，后来在一次同“讨伐”队交火的时候，那只狗嗅到日本鬼子的气味，就逃到敌阵去了。我得到过白马的很大帮助，但从未得到过缴获的军用犬的好处。

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称之为诱敌伏击战之典型的老黑山战斗的整个过程证明，诱敌伏击战是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最有效的战斗形式之一。以这次战斗为起点，创造了连战连捷、大快人心的纪录：在濛江一带消灭了工藤的部队；在长白、临江一带击溃了美崎率领的精锐部队；在最后决战的时期，又瓦解和全歼了靖安军的后身伪一师。

老黑山战斗是一场曾在固定的地区以保卫游击区为主的人民革命军，拆掉狭小解放区的篱笆挺进到广阔地区，第一次显示了大部队活动的威力的战斗。我军震撼老黑山峡谷的枪声，是一曲对腰营沟会议关于解散游击区，挺进到广阔地区，积极开展大部队活动的方针的正确性的赞歌，是预告第二次北满远征胜利的钟声。老黑山战斗的胜利，使人民革命军把保证第二次北满远征胜利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好了。

人民革命军打了胜仗的喜讯，犹如电光石火，霎时传遍了满洲大地给在靖安军的欺压下受苦受难的朝中两国工农群众增强了信心，鼓舞他们投入了斗争。当我们用缴获的军马驮着战利品回到太平沟的时候，当地群众长长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热烈地欢迎我们。三道沟的李泰京老人也赶到我们休息的新屯子来看我们，金厂和火烧铺的群众也带着慰问品来慰问我们。

在第二次远征北满前夕，我根据珲春游击队送来的情报，对驻在大荒沟的伪军的一个连队，做了争取他们哗变的工作。送情报来

的是珲春游击队的传令兵黄正海。他的父亲黄丙吉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时积极参与这一壮举的著名爱国烈士。

黄正海说，大荒沟伪军的那个连里，有一个具有联共思想的中士，对其弟兄们有良好的影响。可是他还想不到争取全连，而只想带一部分弟兄投到游击队来。要是搞得好，也可能把全连争取过来；希望我帮他们想办法。

对这个连，我早已开始注意。这个连驻在我们常来常往的路口，对我们的活动是一个很麻烦的障碍。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连的连长是中国人，给连长当翻译的是个极反动凶狠的朝鲜人。

兵变工作的主角就是那个受黄正海等工作员的幕后指挥的中士。他既不是我们派去的工作员，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在大连当工人时被征入伍的普通青年。他所属的“讨伐”队原驻在热河，后来被调到间岛来，他也随队来到了珲春。他在热河时就已经听到间岛有很多共产党的传闻，到了珲春以后就非常关心这一带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甚至想到要同共产党携起手来为自己开辟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有一天，这个中士同他的同伙一道在饭馆吃饭谈天，他大发牢骚说，妈的，跟共产党打仗有什么用？干脆，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投到那边去算了。黄正海在饭馆目睹了这一情景，立即回部队向指挥员作了汇报。从此，这个中士就成了我们争取的对象。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小分队到珲春城里做工作，其中一个同志不慎被警察逮捕。这个同志是朝鲜人，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警察把他捆起来，拳打脚踢，大喊大叫，逼他招供。正巧那个中士从这里路过，看到这个光景，就骂那个警察说，你这小子，他是共产党又怎么样？你和他都是受人欺压的人，何必这样打他！中

士打跑了那个警察，把我们的人带到他的兵营去了。

中士对我们的同志说：

“我可以马上放你走，可是现在，你还是跟我到我们的兵营去一趟。你要是个勇敢的人，就到我们的部队住一晚，给我们的连长和大伙谈谈共军的情况，这是我们很想听的。我们的连里有一个鬼子指导官，还有一个当翻译的朝鲜人，这两个家伙都是大坏蛋。我会设法把他们都骗到城里去的，你就放心好啦。”

我们的同志不知道那个中士安的是什么心，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又一想，去就去，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嘛，要死，也要死得光荣。于是横下心跟着他去了伪军的兵营。

一到兵营，那个中士就把我们的同志带到了他的朋友连长那里。三个人围着茶几坐在一起正在密谈，日本指导官突然走进连部，看到我们的人就仔细打量起来。那个中士为了不让指导官怀疑，朝连长说道：“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是来跟我要欠的酒钱的，可是我现在没钱，连长能不能先垫一下？”连长也像煞有介事地回答说：“你放心，我先给你垫好啦。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该好好招待招待，不能让他白跑一趟啊。在这儿边喝茶，边慢慢地叙旧吧。”等日本指导官到城里去了，三个人又继续密谈。

应中士的恳求，我们的同志开始了共产党的宣传。他说，游击队是朝中联军，朝鲜人、中国人都有。他说他是朝鲜人，朝鲜人也反对日本鬼子侵占满洲，你们伪满军里也有爱国者，游击队愿意跟这样的人携手。他接着解释了我们对伪军的政策，还用中国话唱给他们听几首针对伪满军的歌曲。

伪满军连长深受感动，对我们的人说，你明天回去报告你们的长官，我们无心跟游击队打仗，就是我们被调去“讨伐”，也只往树

林旁边放几枪，好叫你们躲到别处去。

中士送我们的人回来，路上说："我愿意和你保持联系，你跟我保持联系，你也不会吃亏。今天我们谈的事，请回去告诉你们的政治委员。"

这样，我们就跟他们拉上了关系，利用这种关系深入地进行发动兵变的工作。我给黄正海交代了具体任务，派他回大荒沟去了。黄正海回去跟那个中士取得联系，促进了使全连投诚的工作。那个中士对黄正海恳切地说："我们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干这份差事的。作为一个人，再没有给别人当傀儡更可耻的了。我真羡慕你们。我们已经准备好带领全连向你们投诚。只求你们快来袭击我们一下。"

我们向伪满军兵营附近派去了不是两个连就是三个连的兵力，佯装包围兵营，当伪满军士兵出来作早操的时候，就突然开始威胁性的射击，同时开始喊话。伪满军立即派代表要求同我们谈判，这个代表就是那个大连来的中士。他请求我们停止射击，并向我方代表表明了举行兵变的决心。之后，他们干掉了日本指导官和朝鲜翻译，带着全连一百五十多个官兵，吹着军号，来到了我们的游击区，还把城内敌人的全部物资装在马车上带来了。

这个连队该怎样编入人民革命军呢？就这个问题，珲春团的指挥员讨论了很长时间。有些人说，要解散这个连队，把人都分配到新的连队去；也有些人主张，不要解散，要把它原封不动地编到革命军里来。其中，前者占了压倒多数。

团指挥部就这个方案同投诚的连队指挥官进行了几次谈判。伪满军指挥官不同意解散他们的连队。珲春团的政委崔凤浩只好把这个问题提到我这里来，让我裁决。

我为了正确了解伪满军士兵的要求，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进行

了谈话。他们都反对解散，而且态度很强硬。他们听说要解散连队，都十分不安。他们又不是俘虏，是自愿投诚的。对这样的人，采用他们不喜欢的方式拆散他们，分配他们到各连队去，老实说，也不合乎礼节。最合理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要求。

我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交给大家讨论。这个方案是，连队不解散，统一编入革命军，不过要根据革命军的实际情况，把这个连分为三个连，这三个连的指挥员要在全队会议上用民主方式选举。投诚的伪满军很满意，表示同意。侯国忠团长和崔凤浩政委也表示赞成。

为投诚起到了主导作用的那个中士也当上了连长。原来的连长，我们决定派他到苏联去留学。在投诚伪军中，愿意到关内去的，我们就送他们经由苏联去关内；愿意留下来同我们一起抗日的，我们就把他们编入了珲春游击队。后来，到了北满，我们把他们交给了李延禄的部队。

敌人为了围歼在罗子沟、太平沟一带积极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的人民革命军大部队，调动了关东军、伪满军、警察、自卫团、铁路警护队等大兵力。“讨伐”军的主力从罗子沟方面直逼太平沟，另一部则在腰营沟和百草沟一带布阵，准备在人民革命军向西南方向退却时在这个狭小地方予以全歼。

1935 年 6 月 20 日，敌人终于向太平沟开始了进攻。我们把队伍部署在太平沟后山上，在靠近迫击炮连的地方设了指挥部。指挥部的下面有个天然的山洞。

敌人乘船开始强渡大火烧铺河。

这时，我们的迫击炮连开始发火了。敌人的一条船刚划到河心，就被炸飞了。敌人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停止渡河，惊慌失措地逃了

回去。我们的迫击炮手实在了不起。这说明我们说服伪满军一个连投诚，用其一部分力量组建炮兵连，是非常值得的。那些不愿让投诚的伪满军参加战斗的怀疑论者，这才认识到自己的不对。

我一把抱住炮兵连长，祝贺战斗的胜利。一些原来不大信任投诚的伪满军的指挥员，也止不住兴奋，纷纷赶到炮阵地来了。

人民革命军在大火烧铺河发出的炮声，是宣告我国炮兵诞生的历史性的宣言。这一炮声，把敌人吓得魂飞魄散，让人民高兴得跳起了舞。现在，我们把这一天定为炮兵节来纪念。

闻营长在大火烧铺河遭到我军的迫击炮洗礼，失魂落魄，慌忙逃回罗子沟，说："人民革命军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昨天缴获了炮，今天只用两发炮弹就打飞了我们的一条船，真是神奇，谁能抵得住啊！谁跟人民革命军作对，简直就是傻瓜。就是日本刀逼着我的喉咙，我也不再跟金日成部队打仗啦。"这事也是铁连长告诉我们的。

随着人民革命军在老黑山和太平沟连战连捷，各地的革命组织也都活跃地开展了活动。罗子沟反日会会长夸耀说，自从人民革命军在老黑山消灭了靖安军以后，城里的居民办结婚手续和出生登记都来找他，不再去找村政府了。

谁触犯人民群众，我们就不饶谁！

在老黑山和太平沟，我们用实际行动再次有力地表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这一意志。但是，触犯人民群众的敌人是无比凶残的。"只有消灭了共产主义，我们才能生存！"这就是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派的信条。对持这种信条的人，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太平沟战斗时敌人流的污血把大火烧铺河污染了整整一个星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据说那年，空前多的雅罗鱼沿这条河逆流而上。

五　将革命种子播在广阔大地上

当整个东满面对着“肃反”这股旋风的毁灭性后果，流着悲戚的眼泪，摸索着前进道路的时候，我们提出解散解放区形式的固定游击根据地，挺进到广阔地区去积极开展大部队活动的新路线，把它列入了1935年3月的腰营沟会议议程。这条路线受到绝大多数与会军政干部的完全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表示理解和赞同。与会的党和共青干部中，有些人反对解散游击区。针对我们的主张，他们攻击说，这到底是什么胡说八道？要解散的话，当初何必建设它？这三四年来忍饥受冻、流血牺牲，保卫了这个游击区，又为的什么？解散游击区，是右倾，是投降主义，是失败主义！那时他们提出的反对解散游击区的主张，现在学术界称之为“游击区死守论”。

在腰营沟会议上，最强硬地主张死守游击区的代表人物是李光林。他是宁安游击队创建者之一，曾在共青宁安县委和吉东局主要做青年工作；后来被派到汪清地区，同柴世荣、傅显明等反日部队司令一起，参与了抗日联军的筹建工作。记得他参加腰营沟会议是他任共青东满特委临时书记的时候。

他以下列论据来猛烈攻击主张解散游击区的人：

如果解散游击区，把革命军开到广阔地区去，那么，人民群众将怎样活下去？你们说解散游击区之后要让人民群众到敌占区去，这不是把和军队打成一片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群众推入死地吗？没有游击区这个军事政治支撑点，难道革命军能开展游击战吗？让那

些在游击区受到革命锻炼的人民到敌占区去，这不就意味着失去我们费力培养的几万名革命群众吗？一句话，解散游击区的措施，会不会招致使革命倒退到 1932 年那个起点的后果呢？

本来可以顺利结束的讨论，由于李光林的长篇大论，逐渐变得复杂了。曾对解散游击区的方针表示支持的人当中，也出现了对他的主张点头认同的人。与会者分成游击区死守论者和游击区解散论者两派，展开了舌战。争论达到极点时，一些修养差的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企图硬把对方压下去。有人甚至指责李光林的私生活，来反驳他的主张。

据说，李光林在宁安县任区共青负责人的时候，曾爱上一个姑娘。他的爱情十分热烈，而对方却一直不怎么理他。他给姑娘的一封又一封情书，总是得不到回答，都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姑娘一碰见他，就冷冷地扭过头去。他那炽热的爱慕之情，只落得对方如此冷淡无情的回报。男女之间的爱，毕竟不是只凭一方的欲望和热情就能建立的。他把那个叫他尝够了失恋之苦的姑娘赶到穆棱县去，又同另一个女人有了不正当恋情时被派到汪清来了。

这是为了反驳李光林的主张而搬出来的个人隐私，因此是否属实，是不能轻率断定的。

人们甚至使用了揭露这类个人隐私的卑鄙手法来攻击李光林，是为了证明他是个连他爱慕的女人都能忍心赶走的报复心很强的人，是个为了打击对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

有人还提醒人们：李光林是曾经热心追随过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属下某某人的“火耀派系统余党”，并挑剔说，他反对解散游击区是宗派病的复发。

揭露对方失败的罗曼史，或者给他扣上宗派余党的帽子，这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卑鄙的。不过，李光林也有责任。因为他把自己描绘成人民的最忠实的保护者、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最坚决的代言人，而给别人却乱扣右倾机会主义啦、对人民背信弃义啦、不可宽恕的自杀行为啦等等吓人的帽子。

李光林这样的人拼命反对解散游击区，我们也是完全理解的。解散游击区，我们自己也感到十分痛苦。游击区是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建立并倾注满腔心血建设起来的，而且是当做比“天堂”还好的乐园来坚决保卫的，难道有谁能毫不留恋、冷酷无情地予以丢弃吗？我们是噙着泪，抑制着无限留恋的感情决定解散游击区的。

当然，李光林也会和我们一样热爱游击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长期据守解放区形式的固定游击区，同具有庞大军事潜力的强敌正面对抗，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只能说这是冒险主义，是自取灭亡的道路。

在游击区的生命力得到最大发挥的 1933 年或 1934 年，我们是不敢提出这种主张的。那时候，我们自己也把游击区当做沙漠上的绿洲和地上天国看待。

那么，到了 1935 年，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提出了解散游击区的主张呢？这不是变卦吗？不，这既不是变卦、动摇，也不是倒退；相反，这是可以认为前进一步的气度恢弘的战略措施。

到了 1935 年，我们之所以敢于下决心解散游击区，是因为当时的主客观形势要求这样做。

建立在豆满江沿岸的各游击区，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们当做游击区的使命和任务提出的最大课题是：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为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政治军事的和物质技术的牢固基础。当然，那时我们并没有把完成这一任务的期限定

为三年或四年，只是认为这个时间越短越好。

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军队和人民都成长为不死鸟。开始时只有几十人的游击队伍已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人民革命军，能够打大规模的游击根据地防御战和攻城战。在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宝库里积累了游击战的崭新而独创的丰富经验。

游击战争是培养革命战士的熔炉，是军政大学。这个熔炉炼出了纯粹的钢。即使是被丢弃在石头地上或地主家牲口棚里的烂铁，只要进入这座熔炉，就被炼成闪闪发光的钢。抗日的军政大学把那些原本认为贫富在于手相、在于算命先生的卦象、在于巫婆的咒语的乡巴老儿和打短工的人，也都培养成了革命战士。

我曾听到金慈鳞扛长工时的经历不禁仰天大笑，因为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装点了他的经历。

那天也和往常一样，金慈鳞一大早就牵着地主家的牛到野地去，专挑芬芳鲜嫩的草挥镰猛割的时候，突然有一列火车从山弯处急速驶来。他放下镰刀，坐在土坎上望着火车，发现有个白净面孔的绅士站在车厢门口抽烟。不知怎的，他觉得这个白脸蛋非常不顺眼，于是向那个绅士挥了挥拳头。这是对吃得好、穿得好的人的一种挑衅。那个绅士也瞪起眼睛，又喊又挥拳头，结果把自己头上的凉帽给碰飞了。他伸出两手在空中抓了几次，不久也就和火车一起消失，而那顶凉帽却落在铁路旁的池塘里。

金慈鳞跳进池塘拣起凉帽戴在头上，以成了富人的心情走上了铁路路基。真走运，他在那里又发现了一方包着五分银币的手绢。这是和那顶凉帽一起飘落的。

这个十几岁的小长工整天琢磨拿这五分银币买点什么好。那天晚上，他戴着那顶凉帽出现在纨绔子弟夜夜聚赌的地方，拿那五分

钱作赌本，一夜之间竟赢得了很大一笔外财。

他用那笔钱还清了欠地主的债，还拿出一部分给了一生贫苦的邻居老大爷，手中剩下的已经不多。这个小长工满以为靠这个就可以阔阔气气地过上几年。可是，还不到一年，他又债台高筑了。他为了多挣点钱，像黄牛一样拼命干活。自以为只要勤奋，生活就会好起来，还能改变八字，甚至可以发迹。这就是金慈鳞在当长工时的世界观。可是，劳动并没有使他富起来，也没有给他开辟改善生活的道路。他虽然起劲地劳动，得到的却是贫穷和贱视。他脑子聪明，力气又大，只因没有钱，被人当牛马对待。

他同侮辱和虐待自己的人正面对抗。谁欺负他，他就揪住谁的领口挥拳痛打。然而单靠出气是摆脱不了穷困生活的。后来，他到王隅沟游击区当了游击队员，成长为在间岛屈指可数的机枪手。

在我国人民中以"不死鸟"之名广为人知的红头山战斗的主角李斗洙，有个时期也曾带着讨饭口袋沿街讨过饭。

游击区的确成了培育出成千上万的抗日英雄和战士的熔炉。即使是牙齿全掉了的老太婆，只要到了游击区就会成为呼号抗日的鼓动者。在这里，人人都是劳动者，都是哨兵，都是战斗员，都是得力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赵东旭、全文振、吴振宇、朴吉松、金择根等都是在汪清游击区得到锻炼的出色的革命者。抗日英雄们用血汗谱写了全世界为之惊叹不已的不朽抗战史。

通过反对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艰苦斗争，革命队伍统一和团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大家庭。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群众基础已经牢固地奠定下来，同中国人民的反日联合战线也已巩固得牢不可破，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建立游击区后三四年间取得的。

如果没有游击区这个策源地，难道朝中共产主义者能取得如此

丰硕的成果吗？如果没有游击区这个出战基地、兵站基地和后方基地，难道能如此圆满地、出色地完成抗日革命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吗？

金明花在作姑娘的时候，是个用马鬃做纱帽过日子的生活在最底层的女子。她也是到游击区才过上了人的生活，在抗日大战的烈火中成长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如果没有游击区，她就不可能走上如此惊人的进步道路，别说是进步，就连肉体生命也保不住的。

抗日战争培育出来的革命战士当中，有过去的猎人、屠户、教书先生、放排工和铁匠。既有林春秋那样昔日的药铺主人，也有徐哲那样的医生出身的革命者；既有受过东满青总影响的青年，也有在南满青总或驻中青总的屋顶下混日子后来参军的青年；既有来自城市的书生，也有来自乡村的蓬头小伙子。游击区把出身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的人都培养成了在一个口令下一致行动的忠实的军人，培养成了站在抗日救国的战斗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殊死战斗的时代的骄子。

在间岛的山区建立解放区形式的游击区，我们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适时的，这一点通过实践充分得到了证明。而当游击区尚在发挥其生命力的时候，我们却在腰营沟竭力强调了解散游击区的迫切性。这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根据是：游击区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和任务，不需要再死守了。

30 年代中期间岛地区的革命形势要求朝中共产主义者在路线上来个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潮流。

要照旧留在游击区唱着决死战的歌，用从前的方法固守土地的主张，严格地说，是一种不想进一步深入发展革命，只顾维持现状的想法。如果把革命比作一股流水的话，他们的主张是要让这股流

水只在湖泊或水库里打转，而不冲向大海。

革命如同长江大河。长江大河之水，撞在绝壁上发出骇人的咆哮，流入峡谷就翻银滚雪，奔腾而下，可总是把溅起来的无数飞沫都收回来抱在怀里，滔滔地流向大海。革命就像这样的长江大河。有谁见过背对着大海向山地倒流的大江吗？倒流和停止，不是大江的本性。大江只会奔流向前，有障碍就冲垮，有同道和同调就抱在怀里，一刻也不停顿地奔向遥远的终点——大海。

大江之水所以不腐，就是因为它不间歇地运动。大江只要有一瞬间的停滞，它的某一角落就会出现腐败现象，各种浮游生物就会繁殖起来建立它们的王国。

如果革命排斥革新，把既定方针加以绝对化，这个革命就和停止流动的江水一样了。革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不断地改变策略。如果没有这种改变，革命就难免踏步不前。如果有人以为某种方法五十年后也有效，一百年后也具有绝对价值，那么，还能有比这更愚蠢的妄想家吗？只能说那是一种无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观点。

策略只能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可以适用于一个瞬间、一天、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个时期。这就是策略。在一种战咯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可以有十种策略，也可以有一百种策略。为一种战略只开一种处方，这不是对革命的创造性态度，而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自缚手足的愚蠢的自杀行为。有教条主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生动而有魄力的政治，就不可能看到滔滔奔流的革命长河。

能使革命像大江那样滔滔奔流的力量在于创造和革新，这是因为创造和革新忠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要为争取自主的生活走不断进步和兴盛的道路的本质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创造和革新是

推动革命前进的发动机。不妨说，一个民族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就取决于这个发动机的马力有多大了。

朝鲜革命靠这个发动机的力量，已来到了 21 世纪的大门口。

21 世纪近在眼前的今天，我们党最着重讨论的政治主题是什么？那就是在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严密封锁中，用什么方法继续捍卫和发扬光大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

一个世纪以前，朝鲜半岛也曾处在大国的包围圈里。仁川海面经常有列强的军舰游弋。封建朝廷顽固地坚持锁国政策。每当他们采取斥洋斥倭立场时，列强就开几炮进行威胁，要求开放门户。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拼凑出亲日内阁，唆使它改革内政。国王和王后的身边有日本派来的顾问、公使和密使打转。这也是一种包围。

外来侵略者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历来就是强加于朝鲜民族的灾难。我也和我们民族一道一辈子生活在这一包围和封锁之中。这是地缘政治学上的特点决定的命运吗？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原因。假定朝鲜这块疆土在阿拉斯加或北极哪一条冰川的一端，那么，强大国家对我国的兴趣也许是另一样的。但这种“假定”是不可能成立的。哪个国家位于哪里，这并不成其为问题。不奉承大国、坚持自主的国家，不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要经常想到，有可能成为“绿色贝雷帽”的攻击目标或无数“托里塞利法案”的牺牲品。

因此，决心一生坚持自主的人要经常想到会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并为突破这种封锁作好准备。

1935 年，间岛的各抗日根据地仍处在敌人水泄不通的封锁中。这一年，敌人的封锁达到了极点。我们决心改变路线，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敌人则企图最大限度地缩小封锁圈，取得肃清“共匪”的决定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调动成千上万的精锐兵力重重地包围

游击区，每天都进行消灭抗日根据地的一切生物体的“讨伐”作战。

在敌人为切断革命军同人民的联系而采取的措施中，主要的就是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在人民革命政府管辖之外的所有行政区域的居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搬进用土城和炮台围起来的密集部落里去，在五家作统法或十家连坐法等反动法令和中世纪式秩序的统治下过田鼠般的生活。

敌人纵火烧毁分散在满洲各地的成千上万个小村庄，下最后通牒般的拆迁令，将居民无情地赶进了平原地区的土城村。其目的固然在于稳稳地坐在有军队、警察和武装自卫团常驻的“安民村”，平平安安地进行统治；但更主要的目的是要用土城、炮台，壕沟、木栅、探照灯、铁丝网等人工壁障，永远切断“剿灭共匪”的最大障碍——军民一致的血脉。敌人也很清楚，游击队是人民的保护者；人民是游击队的后方和重要情报来源。

把人民全都赶进土城里，就能大批地征调他们去修路，构筑工事，还能严格保守秘密，又能随时不费力地征发人员、资金和物资。

敌人利用建立集团部落的机会强化了反共宣传，说什么你们不能在心爱的本乡本土住而到集团部落来，这都怨共产党，怨革命军；因为他们跟你们勾通一气，扰乱治安，所以当局不得已撤除分散的小村庄，建立“安民村”，好叫你们不受“共匪”和土匪的折磨。

敌人修筑了方形的土城，一个土城收容一二百户人家。为了便于军警监视，敌人把住房盖得一排一排的，像现代工厂区的宿舍一样。原来住同一个村的人们一迁到集团部落，敌人就把他们分开，不许作邻居；亲戚朋友也不许挨着住，把他们分散到东南西北去。这是为防止志同道合的人搞有碍于治安的谋划，或搞秘密结社。

敌人对集团部落居民的分裂、离间活动搞得多么恶毒，只要看

一看他们的五家作统法就可以知道。敌人把居民以五户为单位分成组，一个组里只要有一家勾通游击队，就对这个组的五户都加以处罚，甚至全都杀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家作统法。

统治集团部落的行政官吏和武装军警对粮食严加控制，以防落入人民革命军手里，哪怕是一升米也罢。居民到城外去做活，敌人每次都把他们带的午饭打开检查有没有多带了准备送给“共匪”的，只要有多一个人的饭就一律没收。集团部落里的农民为了不耽搁农活，想大清早下地去干活，天亮之前却出不了城门，而且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来。这样，革命军就无法得到集团部落农民的口粮支援了。

游击区生产的粮食压根满足不了军民的需要，何况敌人又不断扰乱农事。敌人把这里的人和农作物都作为焦土化作战的对象：刚出苗的庄稼，用军鞋踩；正成长的庄稼，放火烧；成熟的庄稼，派武装队牵着牛马来全部抢走。这是企图把那些用枪炮无法消灭的游击区军民完全饿死的卑鄙无比的饥饿战法，是卡脖子的封锁战法。

“民生团”虽已解体了，但敌人企图从内外分裂和瓦解革命队伍的破坏活动却比从前更恶毒了。

诱降的传单上甚至出现了美人的裸体照片和描绘男女猥亵的春画。被收买的美女们装成罗莎·卢森堡或贞德那样的女战士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来，竭力进行腐蚀活动，企图麻痹军政干部的灵魂，把他们拐到警察署或宪兵队去。

所有这些都是敌人企图把间岛游击区变成完全与世隔绝的孤岛，窒息它，并将它焚为焦土的大规模杀人把戏。

如果看不到这种大势，只顾保卫已暴露的游击区，那么，革命军就会在军事上陷于被动，被拖入无休止的消耗战，以致无法保存

多年培养的革命力量，使其支离破碎。倾尽全力死守狭小的游击区，这只能迎合敌人的需要，招致帮敌人用立体战扼杀红区所有军民的后果。

与会者的过半数批评游击区死守论是冒险主义，这个批评是对的。我至今还觉得奇怪的是，当时在腰营沟会议上固执游击区死守论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教条主义思想和左倾情绪浓厚的自以为是的人。说也奇怪，他们对那些持创造性的革新立场的人敬而远之，对那些善于发明创造的人、善于提出倡议的人和富于理想的人也以冷眼相待。

但是，我们在腰营沟会议上终于说服了这些过激的、自尊心强的人。与提交共产国际的反“民生团”斗争问题不同，解散游击区的议题当场就作为会议的决议通过了。这是我们在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成果。

腰营沟会议成为人民革命军由死守游击区的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转折点。由于这次会议的决定，我们迎来了跳出游击区这个狭小的范围，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广大地区积极而灵活地开展大部队游击战的新时代。原来局限于间岛五个县的人民革命军活动舞台扩大了几十倍。我们的活动舞台越扩大，只顾封锁狭小地区的敌人就会越陷入困境，这是无须赘言的。包围五个县，可以说比较容易；要包围东北其他好几个省，问题就不同了。当时，敌人可以把游击区封锁起来，自己蹲在固定的地方吹着口哨享清福；可是从今往后，敌人就不得不跟着人民革命军团团转，打既无先例又无操典依据的仗。

敌人扬言我们解散游击区的措施是“皇军分散部署彻底讨伐的结果”，“意味着间岛共匪的衰退”；可又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根据新

的策略为转入广泛的游击运动而采取的主动行动，是进攻性的措施。这一新的战略性措施给敌人造成了不安和恐惧。

敌人得到我们决定解散游击区的情报后，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他们一面加强军事封锁，防止游击区军民撤离游击区；一面散布种种谣言，说我们撤销红区意味着武装斗争的终止，说共产主义者解散游击区就是放弃游击运动，大肆进行诸如此类动摇民心的思想攻势。敌人的这些阴谋活动，给游击区的解散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困难岂止这些。最叫人焦急的是，人民群众不愿解散游击区。像李光林那样的军政干部都没有立刻赞成新的路线，何况那些群众，他们是不会不经过心理上的痛苦就欣然接受的。有些人哀求我们不要解散游击区，他们说，直到昨天还宣传根据地是“天堂”，今天为什么忽然要解散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泰熙老人甚至代表十里坪人民向我们提出了不要解散游击区的恳求书。

游击区里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判断。过一夜就有一两种不知是谁传播的不祥的消息流传，使人们如堕五里雾中。有的说，革命军撤销红区是为了减轻保护民众的负担；有的说，放弃间岛是为了到朝鲜的狼林山去在国内开展游击战；还有些人说，革命军太疲劳了，可能要深入到苏联或中国关内去休整一下，把队伍大大扩充之后再回到间岛来。这种种臆测，再加上敌人的宣抚工作队散布的谣言，游击区的舆论混乱到简直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们在腰营沟举行军民联合大会，耐心地向群众说明了解散游击区的迫切性和正确性。下到东满各县和革命组织区的特派员们也召开同样性质的大会，对军队和人民进行了教育；群众很快理解了不解散就要灭亡的道理，承认它是正确的战略性措施。

可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大多数群众坚决不肯迁到敌占区去。

他们哀求说，在这里吃草吃兽皮也好，决不到敌占区去；与其到敌占区去，不如在游击区饿死；怎么能迁到敌占区去受日本鬼子的折磨呢，死也要死在游击区，千万不要把我们打发走。

我们提出“说服，说服，再说服”的口号，每天挨家挨户去进行说服，还在各区各个组织分别开会反复进行了说服，可是仍有不少群众固执地不肯迁到敌占区去。

我是熟知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和鼓动有何等伟大的力量的人之一。有些同志甚至说这个力量是无限的。但这句话不能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妥切的。只看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很多群众没有迁到敌占区去，而是到深山沟里去了。

有些群众为了不到敌占区去，要求加入游击队。还不到参军年龄的儿童团员和少先队员也缠着我们要跟革命军走。那时，黄顺姬就缠住游击队员，要求带她走；说要是不带，就要求开枪打死她。她这股犟劲，延吉游击队拿它没办法，只好允许她参军了。她身子矮小纤弱，却经受住武装斗争的艰苦考验，闯过了千万次生死难关，直至今天，仍作为老革命战士，使自己的一生发出光辉，也许就是多亏她的这种犟劲吧。太炳烈、崔顺山这些老战士，也是在游击区解散时参军的。

当时我们吸收许多青少年参加了游击队。多年在游击区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党务工作者、共青干部和人民革命政府的干部，也扛起枪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些人自愿报名要加入缝纫队、兵器厂和医院，跟着革命军走。通过解散游击区一事，人民革命军的队伍就这样迅速扩大了。

人民革命军部队在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下，为了作好到广阔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准备，为了确保后勤物资，改善武器装备，尽

了最大的努力。妇女会员们把衣柜里的家当全都掏出来，尽心尽意地给即将离开游击区的革命军战士做了军服、背囊、手帕、裹腿、烟荷包等。

我们也为人民群众的疏散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加紧作好迁移的准备。只看间岛各游击区在疏散居民之前所登记的户口调查表，就可以知道当时迁移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周密、扎实了。调查表上无一遗漏地记载着疏散居民的姓名、年龄、职业、亲友的地址和姓名、担任的工作、文化程度、有无技术、迁移目的地、粮食保有量等事项。

游击区的领导干部根据这个户口调查表，指定哪一些人迁到敌占区和朝鲜国内去，哪一些人迁到深山里去种庄稼。同时把可以投靠亲戚的人、不能投靠亲戚的人、无依无靠的孩子和病人一一区别开，各编成队伍，每个队伍都由武装小组负责护送。

对迁到敌占区、朝鲜国内和深山里去的居民户，每户分配了三十至五十元的生活补助金，还供应了布、鞋、器皿等生活必需品，包括炊事用具。为了确保分给居民的钱和物资，我们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至今在我记忆中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大汪清集团部落袭击战，这是同吴白龙狠揍自己叔父的稀罕事件连在一起的一场战斗。

吴白龙给他叔父一记耳光的事，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史中的一出悲喜剧。

那时，我们攻打集团部落缴获了大量的物资。二十多支三八式步枪、四十多头牛马、几十袋大米和白面、几万元的钱……战利品太多，单靠军人是很难运走的。指挥员们到离战场五六百米远的村子去请来了村民。“快速袭击，快速脱离”，这是游击战的一项重要战术原则，如果不迅速处理战利品，部队的撤离就要拖延，有可能

给敌人以反击的机会。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刻，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农民大发牢骚，不肯背东西。这个人甚至阻止别人背东西，说：“你们呀！你们知道不知道替游击队背东西要遭什么殃吗？人要留个后路，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吴白龙实在看不下去了，冲口说了一句：“喂，你不愿背东西，回去好啦。”

可是，那个小胡子却不回去，还在继续大喊背这些东西要遭殃。

吴白龙终于失去了自制力，狠狠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问一个身旁的远亲：“这家伙是不是反动派？”

“你呀！他可是你的亲叔叔吴春三！”

吴白龙听了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叔父竟然不像个朝鲜人，会做出这样的丑事来；更没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见过一面的亲叔叔竟在这里不期而遇。原来，吴白龙还不懂事的时候，吴春三就离家流落他乡。因此，叔叔不认识吴白龙，吴白龙也不认识叔叔。吴白龙成长为革命者的时候，吴春三却变成了害怕革命的懦夫。他是一个不仅自己不参加革命，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革命的胆小鬼。

吴白龙非常后悔自己打了叔叔的耳光，可也没办法当面道歉，只好写一封短信托远亲送去了。信是这样写的：

> 叔叔，我连叔叔都不认识，做了无礼的蠢事。不过不知者不罪，请您忘了这事吧。
>
> 您要是不想让年轻人小看您，就来参加革命吧！

后来，吴春三果然照侄儿的劝告，全家都革命化了。他不仅自己做了革命者，而且让妻子儿女也都参加了抗日运动。他的儿子吴

奎南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听说，吴春三后来一有机会就对亲友们说：

“侄儿的一巴掌，把我的人生给摆正了。”

当然，吴白龙由于影响了军民关系，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叔父虽是仅次于父母的至亲长辈，但是，从人民革命军的角度来看，吴春三也是民众的一员。因此，吴白龙是应当受批评的。尽管演出了那样一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吴白龙还是动员群众运回了战利品，这都是对撤离游击区的居民的将来生活很有帮助的宝贵物品。

解散游击区的措施起到了给30年代后半期不断高涨的抗日革命锦上添花的作用，它的正确性在朝着祖国的解放向前发展的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雄辩的证明。

由于人民革命军部队主动解散游击区，挺进到广阔的地区去了，敌人企图把我们的革命力量压缩到间岛的狭小山区里令其窒息的阴谋就完全破产了。人民革命军的大小部队在南北满和朝鲜北部广大地区勇敢地战胜了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这也就是说，人民革命军解散解放区形式的游击区而挺进到广阔地区去，就如同龙归大海，可以大显神通了。

在武装斗争这一雄伟的背景下撤离了游击区的人民，扎根在广阔的原野上，开始扩大了组织，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除了几个在归顺书上盖了章的人以外，大家都成了烈火燎原的火种和火星。政治工作员也都打进敌占区，搅乱了敌人的后方。

1935年5月开始的解散游击区的工作，在那年11月初随着车厂子游击区的解散而结束了。

车厂子游击区的解散比其他地方晚了半年左右，这首先是因为

敌人对这个游击区设下重重包围，实行严密的封锁，立等居民全部饿死；其次，也因为这个区的干部们工作不负责任、平庸无能。

在明月沟会议上选定游击区的时候，最强烈地主张车厂子最合适的是来自和龙县的人们。安图县的代表金正龙也说车厂子是最好的地方。这一带土地肥沃，森林茂密，山势险峻，是敌我双方都眼馋的理想天然要塞。车厂子和间岛其他地方毫无两样，也是个冷落偏僻的山区，可是在游击战争中学会了一点军事的新式风水先生，却把它的价值大大提高了。

从车厂子这个地名的由来看，它也不是什么与军事有关的神秘地方。据本地人说，车厂子这个地名，有造大车的意思。和龙的人们为了证明车厂子适合于作游击队的军事要地，说洪范图部队把日军引诱到古洞河边的青山里加以消灭，也是因为这一地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为了用武力保障车厂子游击区的建设，1934 年春我们向安图派去了独立团。金日焕、金一等政治工作员也到车厂子去了。

独立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驻扎在车厂子附近的伪满军一个连，成了那地方的新主人。以这支武装力量为后盾，渔郎村游击区的居民拥到车厂子来，在古洞河对岸盖上了和龙县人民革命政府办公室。接着，王隅沟和三道湾的居民经由神仙洞陆续来到这里，在东南岔沟口升起了延吉县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子。于是，车厂子一地出现了同时存在两个县人民革命政府的奇异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持续了一年多。

车厂子游击区犹如装了两台发动机的汽车或套了两匹青骢马的大车，气势磅礴地突飞猛进。初期，粮食情况也不很紧张。

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定，解散车厂子游击区的工作，由安图派

来的党的领导班子负责领导。可是，这些人没有把解散游击区的方针告知军队和人民，甚至企图把在车厂子工作的特派员打成“民生团”加以处决。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

车厂子是间岛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延吉、和龙、安图地区的革命群众——所依据的最后一个支撑点。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吧，负责领导解散这个游击区的干部们竟采取了优柔寡断的态度。

在那令人窒息的封锁中，车厂子人民同革命军队一起把游击区坚守到 1935 年 11 月，的确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前面已提到过一些，当时车厂子的空气并不平稳。左倾分子们以反“民生团”斗争为名把游击区搅得一片混乱，又加上饥荒严重，许多革命群众忍受了莫大的痛苦。

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开始大部队联合作战的时候，金平、柳京守、吴白龙、朴永纯等同志常常回忆他们在车厂子忍受的饥饿。金明花、金正淑、黄顺姬、金哲镐、全姬等女同志在解放后每当聚到饭桌前的时候，也常回想起车厂子，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当时，金明花和金正淑在军部做炊事工作。这个游击区的情况也如实地反映在军部的饭桌上。为了保障王德泰等军部指挥员的伙食，炊事员们每天一大早就上山去剥松树皮。她们弄回豆秸捆大小的两捆松树内皮，才够军部的一天口粮。把松树内皮放进草灰水里煮三个多钟头，等煮烂了再捞出来放到河水里冲洗，然后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捶，捶软了再用水冲洗。这样反复多次，一直搞到晚上。最后掺些米糠熬成粥或做成饼。这就是车厂子的上等吃食了。

吃了松皮饼，肛门就堵塞。孩子们大便非常痛苦，做妈妈的就哭着用木签子替孩子把粪便抠出来。大人们也常常为拉不出大便叫苦，可是第二天还是要吃松皮饼。

没有盐，只好吃淡的。粥和饼没有盐，还能勉强咽下去；可是，野菜和菜汤没有盐就很难咽下去。间或有路过车厂子的通信员，从腰间的小口袋里掏出几粒盐来，送给他们。一粒盐，由几个人轮流用舌尖只舔一下。喉咙里简直要长毛了。

松树内皮吃光了，就到碓房去弄些米糠来熬粥喝。这个米糠粥比起陈草熬的粥，还好咽多了。陈草熬的粥又粗又硬，吃起来直扎喉咙。就连这样的粥，也都吃不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人们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他们相信，只要到了春三月，慈悲而富饶的大地就会把可怜的生灵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但是，春天也没能挽救他们。春天赐予他们的是积雪下萌发的柔嫩而稀少的新芽。单靠这些新芽是维持不了游击区居民的生命的。

人们开始捕捉还在冬眠中的蛇来吃。接着就捉老鼠吃。在车厂子，啮齿类动物灭种了。青蛙和蛙卵也成了居民的口粮。后来金哲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煮熟的蛙卵像黄米饭一样粘糊糊的，味道很好。我听了，仿佛那粘糊糊的东西已弄痒我的喉咙，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和队员们一起什么杂食没吃过啊，只是那煮了的蛙卵，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该是何等的味道。

北方人穿的乌拉鞋也下了锅。游击区居民喝一碗煮过乌拉鞋的汤下地，像士兵们匍匐前进似地，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着播下了种子，可是今天播了种子，过不了一两天就忍不住又把它挖出来吃。人民革命政府和群众团体派人在播过种的地上放哨，以防人们把种子挖去吃掉。可是这些步哨忍不住饥饿，也把种子挖出来下了肚。

一到夜晚，孩子们就悄悄地溜进军部厨房窥探。他们以为这是军长和高级首长吃饭的地方，会有吃剩的东西。然而这是他们天真

的奢望。他们不知道自己饿肚子的时候，王德泰也饿着肚子。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军部厨房总该有点锅巴之类的东西。如果连这点希望都没有，孩子们也许早就绝望地屈膝于死神脚下了。

炊事员给他们一些锅巴，他们就呜咽着，狼吞虎咽地一口吃掉，然后很难为情地连连说再也不来打搅了。可是到了第二天，炊事员还是照样看到一些小鬼们在厨房外头东张西望。

车厂子的人们忍受着这般饥饿，下地去爬在地上薅草。他们用手薅草，薅着薅着就倒下去了，可是又挣扎起来继续薅，把手指头都薅破了。薅了二遍草，大麦抽穗了。人们没命地把刚刚灌浆的麦穗捋下来充饥。他们连站起来走动的力气都没有，趴在地上吃力地伸出手去拉过麦秆，一粒一粒摘下麦粒塞进嘴里嚼。

车厂子的人们处在这样的饥饿之中，却仍能保持住纯正的人性。这可以说是因为有着多年来支配他们思考和行动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着能够为集体牺牲个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这些思想和道德把间岛的所有革命群众造就成了圣人君子。人吃人那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车厂子根本没有它上演的舞台。

一到麦口期，孩子们最先熬不过饥饿，一个两个地死去。接着就在男人中陆续出现饿死者。而妇女们却自愿承担着宁愿自己饥肠辘辘也要为丈夫和孩子尽最后一份力气的义务。她们的不幸，比死去的男人、孩子的不幸更大。她们没有棺材，只好用落叶掩埋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面对着死去的亲人，她们悲痛欲绝，想痛哭一场也哭不出声音，淌不出泪水来。

车厂子如此严重的饥荒，其责任完全在于封锁这个地区、反复进行野蛮“讨伐”的日本侵略军。

游击区的干部们也没有为养活群众作出拼死的努力。“饿也要挺

住，决不要屈服！死就是投降！”——混进指挥部的反动分子和不纯分子用这种超革命的言词来愚弄群众。

车厂子的人民虽然被打成“民生团”遭杀害、饿死，但没有一个人逃到敌占区去，都为保卫游击区战斗到最后一息。他们发挥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时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仍在打动我们的心。

当解散这个游击区的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 1935 年 10 月，金一一家、南昌洙一家、李桂笋一家、权一洙一家等二十多名“民生团”牵连者的家属，组成“联合家庭”，在东南岔山沟里坚持斗争，直到 1936 年夏。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摘掉“民生团”帽子的。所谓“联合家庭”，指的是由许多户人家联合起来共同生活、共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在一所原木房里，把家什都合起来，一起过日子。他们选定负责人，每日、每周、每月都给每人分配适当的任务，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总结，这样过有组织的生活。

参加“联合家庭”的那些人家是把车厂子保卫到最后一刻的保卫者。

敌人改变从前侧重于焦土化“讨伐”的战术，转向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全面进行大封锁的战术。他们为了把车厂子夷为平地，调动几千名兵力反复进行了“讨伐”，但他们每次都遭到了惨败。

1935 年 10 月的大“讨伐”，敌人投入了几千名兵力。

车厂子勇敢的保卫者们这次也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他们甚至创造了用狙击武器击落敌机的奇迹。

那年 11 月，车厂子人民解散了游击区，大部分都和军队一起转移到奶头山方面去了。

白鹤林是在敌人的封锁中长期和群众一起挨过饿，闹过病，共同战斗过的车厂子保卫者之一。他现在也说：

“不知道车厂子人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经历的苦难，就不要谈什么生活上的苦；不知道车厂子的军民在敌人的封锁中怎样忍饥受冻，战胜了敌人的‘讨伐’，就不要夸耀自己克服了什么困难!”

我们通过解散游击区的组织工作及其执行过程，更深入地认识到了我国人民的组织性、钢铁般的纪律性、对革命的忠诚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并且产生了只要很好地发动和领导这样的人民，就能排除万难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

人民，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民只要为打倒不义而全体奋起殊死战斗，那么，任何封锁和焦土战术对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的一个有力的经验教训。十四国武装干涉者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封锁落到了何种下场，这是世界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的。希特勒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未能得逞。在敌机狂轰滥炸的艰苦条件下，列宁格勒保卫者们照常烤出了面包，造出了坦克，增加了生产。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大声预言列宁格勒就要陷落的1943 年，这座城市的劳动者却创造出奇迹，取得了比 1942 年更高的生产效率。

蒋介石军队对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封锁和“围剿”，也都遭到了惨败。业已持续了三十年的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当然也未能得逞。美国为了封锁这个小小的岛国，消耗了莫大的精力，但未能取得多大效果。最近，古巴提出的关于反对“托里塞利法案”的决议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这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犯有时代错误的封锁政策的冷笑。卡斯特罗说：“遇到危险时刻，人体内就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一种增强心脏机能的激素。在这里，肾上腺

素象征着古巴共产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现在，美国、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国实行封锁。但朝鲜共产主义者也充满着能够有效地粉碎这种封锁的主体的活力素。如果以为能够从军事上征服或从政治上经济上窒息、扼杀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那是如同以卵击石的痴心妄想。

游击区解散后，小部队和政治工作员向国内挺进也更加积极了，在满洲和朝鲜的广阔大地上播下了无数的革命种子。

游击区解散后，我从没有忘记过汪清，也没有忽视过间岛。

游击区虽然解散了，但间岛的五个县仍然是我们所重视的主要抗日战区。崔贤部队等人民革命军的大、小部队仅在汪清一带就进行了北蛤蟆塘上村集团部落袭击战、四道河子袭击战、百草沟仲坪村袭击战、大梨树沟袭击战、张家店伏击战、上八人沟袭击战、太阳村袭击战、大荒崴袭击战、夹皮沟伏击战、小百草沟涌邱村袭击战、十里坪采伐工地袭击战、春芳村石头河战斗、罗子沟上老母猪河袭击战等无数次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敌人为了抵制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队的攻击，倾尽了全力。在间岛地区的主要铁路干线上，为了保证军用列车和客运列车运行的安全，每趟列车都派有重武装的装甲车开路。客运列车在夜间经过山区的时候，总是放下窗帘，严格管制灯火，每个车厢都有宪兵、便衣警察、铁路警护队严密地监视旅客，如有人掀开窗帘朝外看一眼，就给他一个耳光，说他是通匪分子。

敌人加强集团部落的警备，强迫群众去站岗。有些开拓民部落甚至给居民发了木枪和安有导火装置的爆炸物，以对付革命军的袭击。日本警察把集团部落的夜间警备任务完全交给中国人自卫团员

和朝鲜人自卫团员，他们自己却每晚都换地方睡觉，足见敌人对我们人民革命军的猛烈军事行动是多么胆战心惊。

在日本警察官和“满洲国”的自卫团员中，染上了厌战厌军思想的鸦片中毒者屡见不鲜。

30 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狼狈相，只看在石岘地区发生的“松村事件”就可想而知了。松村原是在日本当教员的知识分子，后来因为同教员赤色劳动组合案有牵连而流亡到了满洲。他拿到两千元定钱，答应在日本人经营的白头山伐木场当工头。他去当工头没几个月，遭到了我们部队的袭击。他扛着革命军的战利品跟我们来到部队，还见到了我，也观看了我们的文艺演出。他说他清楚地看到了革命军的威力。他回到伐木场，就向老板提出辞呈，往他的家乡走去。因为他断定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由于受到游击区影响的伐木工人的活动，在汪清及其周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火车翻车事件。游击区虽然解散了，但游击区精神却依然回旋在间岛大地上，使敌人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第十一章

革命的分水岭

时期：1935.6～1936.3

一　远路访问北满战友

人民革命军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准备工作，经过老黑山战斗和太平沟战斗已完全就绪。由汪清团、珲春团的部分连队和青年义勇军组成的远征队，于 1935 年 6 月下旬在当地群众的热情欢送下，从太平沟开拔，踏上了征途。远征队经过石头河子和四道河子到达了八人沟，从此开始了翻越老爷岭的艰难行军。宛若一条长河滚滚向前的行军纵队里，还有从安图来的独立团的部分成员。现在能够回忆第二次北满远征的人，恐怕只有当时的汪清四连的队员吴振宇一个人了。参加第二次北满远征的战友中有韩兴权、全万松、朴泰化、金泰俊、金丽重、池炳学、黄正海、玄哲、李斗赞、吴俊玉、全哲山等人，他们都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第一次远征北满时的老爷岭是白雪皑皑的雪岭，第二次远征北满时的老爷岭却是青山绿树，万木森森，呈现出一派仲夏的景色。1934 年 10 月，我们是冒着狂风暴雪翻过了这座山岭；而 1935 年 6 月，我们则是忍受着烈日炎炎的酷热和蚊蝇的袭击翻越了这座山岭。酷寒和风雪固然是难以忍受的，但骄阳和汗水也是不好对付的。

战马驮着迫击炮和重机枪，艰难地行进在坡度大、草木丛生的山路上。每当马匹被杂乱的草木阻挡，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就用刺刀披荆斩棘，用锯子锯断横倒的朽木，一步一步地前进。

当我们翻越老爷岭的时候，在中国关内，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正在胜利地进行历史性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 5 月 30 日，红军来到大渡河，经过激烈的战斗，抢占古老的铁索桥——泸定桥，为数万长征勇士开辟了前进道路。5 月 30 日，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石达开曾试图强渡大渡河的日子，也是上海五卅惨案十周年的日子。就在这历史性的日子，英勇无比的红军敢死队飞夺泸定桥。这实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有关贵州战役的报道和强渡大渡河的消息接连传到间岛来，大大鼓舞了我们。泸定桥战斗后，红军接着克服了长征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大雪山、夹金山等天险，进入了甘肃平原。

那时候，长江泛滥淹死数十万人，台湾发生大地震几千幢房屋被毁等等悲剧性的消息频频传来，但我们更重视布鲁塞尔举行万国博览会、莫斯科地下铁道开始通车、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哪里攻占了什么地方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我们越过老爷岭，是和中国工农红军翻越大雪山一样的大事。大部分远征队员，一听到休息口令就随地躺下，呼噜呼噜地打着鼾沉睡。正如跟饥饿不能妥协一样，同睡魔也是很难妥协的。但是，没有一个队员为行军强度高而发牢骚，也没有一个人要求放慢行军速度。一个个都像齿轮一样，按照指挥员的命令有规律地行动。因为事先过细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队员们对远征北满的目的都有正确的认识，都做好了排除万难的思想准备。

人民革命军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地方，在老爷岭以南的东满和南满地区也有的是。那么，人民革命军为什么要离开东满这个自己的诞生地和乐园，把北满定为游击区解散后首次远征的目的地，艰苦跋涉，吃力地翻越老爷岭呢？这里有什么动机呢？是什么政治军事因素使我们决定率领远征队向日军和伪满军集中驻扎的北满进发呢？

最主要的动机是要同活跃在北满一带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强联系，实现同他们全面的合作、协同和配合。

在东满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领导者和倡导人，大部分是朝鲜人；同样，在北满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人物，大部分也是朝鲜人。在北满开展游击运动方面，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们起到了先驱的、核心的作用。

周保中一有机会就高度赞扬朝鲜人为东北革命付出的辛劳和他们建树的业绩。他说：

“1930 年时，东北各地的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大部分是朝鲜同志。不消说延边各县，宁安、勃利、汤原、饶河、宝清、虎林、依兰等北满许多县的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基本上也都是朝鲜族干部。”

抗日革命进入最后阶段的某一年春天，他跟我在紧靠黑龙江的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北密营的沙滩散步的时候，感慨万端地回忆抗日联军时期共同战斗的往事，说道：

“不谈朝鲜同志的业绩，就谈不上抗日联军的发展史。第二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朝鲜人，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组建第一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和第七军的主人公，也是李红光、李东光、崔庸健、金策、许亨植、李学万等朝鲜同志。老魏和杨靖宇牺牲后，这许多年来，金日成司令不仅统率第二军，还统率第一军，领导着抗日战争……我们作为东北革命的主人，真想向您低头作揖啊。我们决心，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定在东北建立一座朝鲜族烈士的纪念碑。”

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保中真地通过吉林省委作出一项决议，要在吉林和延边地区建立朝鲜族烈士的纪念碑。

朝鲜人流亡到北满地方，也在日满官厅官吏和土著地主的欺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由松辽平原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和荒地构成的南、北满大地，虽然是每年出产几千万吨粮食的世界闻名的大粮仓，但是贫穷的朝鲜侨胞和开荒人却一年四季无一日不为衣食住犯愁。

朝鲜战争停战后，我曾在某一次便宴上看到李永镐噙着眼泪回忆他小时候在北满挨饿受冻的往事。他说那时候他家不是住在五人班就是住在三岔口或饶河，可见是 1915 年前后。他们一家断了口粮，用洋白菜帮子充饥，熬过了一个秋天。开始吃洋白菜帮子的时候，还觉得像蜂蜜一样甜，可是一连吃了三天，就开始恶心，咽不下去。小永镐避开父母的眼睛，偷偷地把菜帮子都吐在脚下，光喝那稀菜粥的汤。他母亲看了这个情景，忍不住伤心地用裙子掩住脸哭了。

那时候，李永镐因为家里穷，穿的裤子也是用麻袋做的。那条麻袋原来印有“白米”两个挺大的蓝色字样，剪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里外，结果这两个大字就出现在右边的裤腿上。可是小永镐一点也不嫌弃，也不知道这两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反以为那是母亲爱他的奇妙的标志，把它深深地印在自己的心里。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裤子，他天天穿着这条印有这两个大字的裤子到处跑，可是，可怜的永镐在幼年时代从未尝过一次这两个大字所注明的白米饭。

这是说明过去侨居北满的我们同胞穷苦生活的一个小片断。

早先，李敦化在给《开辟》杂志写的文章《南满纪行》中写道，到满洲去看，那里马贼出没无常，无恶不作。比起东满和南满，北满的马贼更凶残狠毒，是和随时来“讨伐”的日军或伪满军相差无几的祸害。北满的胡匪杀人不眨眼，视同儿戏。当手持匕首、短枪的几百名胡匪像一群寒鸦似地扑来杀人、放火、掳掠的时候，我们

的侨胞们就陷于恐惧和不安之中，不得不频繁地迁移住地。胡匪常常绑架居民，掠去作人质，胁迫其亲人用钱来赎人。他们把人带到深山里去，割下他的一只耳朵，或者截下他的一个手指或脚趾，送回他的家去，告诉他家里人这是你家儿子的耳朵，限你们某日某时将多少钱送到什么地方来，否则就杀掉你的儿子。这样，那一家人就只好忍气吞声，把家产都变卖了，换成钱去赎人。如果不按时把钱如数送去，他们就把人质杀掉，把尸体送回去。

北满既不是“王道乐土”，也不是“五族协和”的世界。支配这片大地的只有泛滥的社会罪恶与弱肉强食的法则。朝鲜人来到这块地方仍然免不了要当为日本的高官显爵、军阀、财团、银行家、大商人的利益卖命的奴隶和牛马。这种令人诅咒的现实，迫使北满地区的朝鲜人很早就起来参加了争取祖国的自由与独立的抗日救国战线。

在北满，同在间岛一样，朝鲜的先觉们很早就主动地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凡是有点文化、头脑清醒、感受力强的朝鲜人，几乎没有不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凡是有头脑的朝鲜人都把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信仰，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本家的口号，投身于革命运动。

北满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从30年代初起就开始了用实力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抗战的准备。在宝清县，在崔庸健的领导下成立了有二百多名朝鲜青年参加的训练班，开始了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奠基工作。这个训练班，是对青年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培养他们成为革命军骨干的军官学校。跟我过去上过学的华成义塾一样，这个训练班也有历史课和战术课，还有射击训练。训练班共有十个中队，崔庸健任司令兼总参谋长，朴振宇(本名金振宇)任政治委员。

《千里行军》的作者、外号叫“批准胡子”的金龙化也是这个训练班的一个中队长。记得他得“批准胡子”这个外号是在我们的抗美大战胜利之后即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开始，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显眼的是那些留胡子和长头发的、剃光头的、穿短裤的人无影无踪了。政府并没有发布应穿什么样的裤子、不应留胡子和长头发的法令，可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却自发地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然而，唯独担任人民军兵器厂厂长的抗日战士金龙化少将，照旧留着安昌浩式的小胡子。几位战友劝他把胡子刮掉，妻子儿女和他的顶头上司也都对他开展“喊话”攻势，可他只当耳旁风，完全无动于衷。他反而天天早晨对着大镜子，加倍精心地修饰他那个胡子。

有一天，金龙化问我说：

“首相同志，您对我的小胡子怎么看？”

“我看，是个挺漂亮的杰作嘛。没有小胡子，你再漂亮也不成其为金龙化喽。没有小胡子的金龙化，我从没有想象过。”

“那么说，我的胡子，您是批准啦？”

“什么批准？人民虽给了首相很大的权限，可没有给管人家胡子的权限。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你觉得好，就留，觉得不好，就不留嘛……”

“这就好啦。老实说，首相同志，我为这个胡子受了不少罪呢，可是从现在起，就不怕了。”

他满面春风地回去了。几个月后，他又要来见我，可是因为那两撇小胡子，在内阁办公楼的门口他被警卫军官阻住了。衣冠不整、不够卫生的人，警卫军官就不轻易放他进我的房间。我听见门口有人吵架，便打开窗户问：

“军官同志，什么事情？”

警卫军官回答说：

“我跟少将同志说，不刮胡子就不能进去。可他说这是‘批准胡子’，硬要进去。他说最高司令官同志批准了他留胡子，是真的吗？”军官不相信似地朝金龙化瞥了一眼。

“是这么回事，你就别再惹少将同志生气啦，他的胡子是不可侵犯的。”

从此以后，金龙化在军队里就得了个“批准胡子”这个外号，没有人再叫他的本名了。

金龙化九岁结婚，十一岁扶犁种田做了一家之主，十三岁当了洪范图的联络兵，参加了死伤几万人的著名的伊曼市激战，是个战绩显赫的老战将。

宝清的训练班，最初是一色的朝鲜青年。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多数人认为，要争取朝鲜的独立，就应由朝鲜人建立自己的部队，如果有别国人夹进来，队伍里就会发出杂音。但是后来，另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即认为，如果建立纯粹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同中国反日部队实现联合就会有困难，也可能在中国人民中间陷于孤立。这样，主办训练班的人们就吸收了两个中国青年。但这两个中国青年不久就叛变了，把训练班的全部秘密泄露给了敌人。训练班为躲避敌人的缉捕，只好搬到距宝清有三百来里的地方，盖起了新的校舍。但他们在这里也躲避不了敌人的“讨伐”，终于解散了。

崔庸健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转移到饶河，同朴振宇、黄继兴、金龙化、金智明等战友一道，在三义屯小学重建了大约有七十名青年参加的训练班。他们从学员中选拔政治、军事方面素质好的骨干分子，组织了以处决走狗、保护军政干部、获取武器为基本任务的红

色特务队(一名红色恐怖团)。后来，崔庸健以他们为骨干，组织了饶河工农游击队。

在汤原、饶河成立游击队时，在宁安、密山、勃利、珠河、苇河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由金策、许亨植、李学万、金海山等人领导的武装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抗日长征。

金海山和李光林是和周保中一起打下了第五军的基础的人；金策、许亨植是同张寿篯、赵尚志一道建立了第三军的老将；崔庸健、李学万、李永镐、安英、崔一等人是和李延禄一道在组建第四军和第七军方面起了旗手作用的大功臣。

南自老爷岭，北至黑龙江，东自乌苏里江，西至大兴安岭，在这幅员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的北满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响起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唱的军歌。

当金策以包括哈尔滨东部和东北部的滨江一带为中心领导游击活动的时候，崔庸健和李学万则把完达山一带作为根据地，不断地开展了攻打敌人的集团部落和后勤基地的袭击战。

30 年代后半期，许亨植与金策、马德山联合，组织了西北远征队，然后为了同侧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果断地挺进到海伦等许多县，开辟了活动区域。姜健以老岭山脉为活动基地，驰骋于牡丹江两岸山区和开阔地区，大快人心地打击了敌人。姜健虽是个年轻的指挥员，但头脑聪明，热情充沛，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很有前途的军事指挥员。

在深入发展北满游击活动方面，可以说来自间岛的战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东满的实际斗争中得到了充分锻炼和考验的金策、韩兴权、朴吉松、安英、崔一、全昌哲等人，到了北满仍作为积极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领导者，艰苦地开辟了抗日战争的前进道路。

北满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总是以极大的关心注视东满革命的发展，为了同东满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经常得到东满的消息。

给北满人介绍东满情况最多的是周保中。以宁安为活动基地经常来往于宁安与汪清之间的周保中属下的第五军通信员和第二军派到第五、第三、第四、第七、第六、第八、第九军等北满各部队的人，也积极宣传了东满的斗争情况。

吉东局的领导(吉东省委)也起了介绍东满情况的重要宣传中心的作用。北满的战友们就是通过吉东局收到了东满发行的红色出版物和《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等秘密文件的。

当时的吉东局还起到了把东满、南满和北满相互联系起来的类似电话总机的作用。

据李永镐说，他在饶河县委任宣传部长的时候，也在吉东局领到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他回去后把通过吉东局收集的有关东满的资料全部介绍给了战友们。这些文件的原件都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了，他为此深感惋惜。

在北满的战友中，最积极地介绍和宣传我的是金策和崔庸健。他们向人民革命军队员、工人、农民积极地宣传和解释我为朝鲜革命的胜利提出的总路线、战略与策略以及当前的任务，经常强调要学习我们的战斗成果和道德风貌。

“东满地区的革命斗争，现正按照金日成队长的智略胜利前进。金队长是位年轻的领导者，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因为没有领导者而受苦受难的我们白衣民族，现在有了他的领导，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是多么想特意抽出时间去见他一面啊！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呢，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干着急啊。”这是崔庸健在

组建饶河游击队时向队员们说的话。

他曾给我写了四封信。可是带着他的信从北满出发的联络员都牺牲在路上，一个也没有把信送到我手里。其中有一人，九死一生，奇迹般地来到了我们的活动地区敦化附近，可是他也没来得及完成任务就牺牲了。如果他没有被敌人捉住，再坚持一两天，是能见到我的。要是这样，我和崔庸健的会晤，就不是在 1941 年，而是早在 30 年代中期，在我们的活动地区间岛或者在南、北满的什么地方就能实现了。

1941 年，我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见了金策和崔庸健。当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他们对我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了解得非常具体。他们甚至知道我脸上有酒窝，嘴里有重牙，是日本密探十几年来一直搜寻的可以一获千金的目标，我是敌人悬赏几万元缉捕的对象。

正如他们对我们很了解一样，我们也通过多种途径对北满的同志们有多方面的了解。就像金策知道我在吉林坐牢时受到孙贞道牧师多方帮助一样，我也知道金策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坐牢时得到许宪[4]很多帮助的事实。他们都是饱经沧桑的革命者，他们一生的经历中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不同凡响的逸闻与插曲。这些故事和逸闻，越是劳苦功高者的，就越是丰富多彩。那些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不劳而食者，还能有什么值得一听的故事呢！

有一次，我们部队的一个通信员从北满回来，带来了一条可笑的逸闻。他说，第七军军长李学万，小时候吃奶一直吃到十一岁。我们听了都不禁捧腹大笑。队员们都攻击那个通信员：荒唐也该有个限度，人长到十一岁，都快要娶媳妇了，还吃什么奶？这是胡诌，瞎吹。当然，我也觉得通信员说的未免太夸张了。

后来，我在哈巴罗夫斯克北密营第一次见到李学万的侄子李永镐的时候，曾问过他，听说你叔叔吃嫂子的奶长大，一直吃到十一岁，是真的吗。李永镐回答说是真的。

“他吃了嫂子的奶，就是吃了你母亲的奶喽。那么大个头的岂不把该你吃的奶都给剥削了？”我这么一说，李永镐慌忙袒护他叔叔说：

“哪里！我还能受他的剥削？叔叔吃一头，我吃另一头，各不沾边嘛。”

“你瞧，该你吃的奶被剥削了百分之五十。这既不是二八分，也不是三七分，你遭到这样的掠夺，还袒护你叔叔啊！”

李永镐听着我的玩笑话，笑得都流出泪来了。

“我吃一头的奶足够了。我母亲的奶好像特别多。她生了我以后，乳房总是胀鼓鼓的，我吃不完，她就把剩下的挤掉。用手挤，生疼，又挤不净。有一天，我奶奶叫我叔叔吮一吮我妈的奶。叔叔就吮了。头几次，他吮一口吐一口，没咽下去。后来有一次他就像闹着玩似地咽了一口，觉得嫂子的奶也和妈妈的奶一样甜，打那以后就天天吃我母亲的奶了。”

“你叔叔的脸皮也够厚的哩。”

“是啊，他性格很特别。我奶奶有些担心地跟他说，给石松吃的奶叫你都吃光了怎么办。叔叔就回答说，我光吃一头的奶嘛。石松是我的小名。我长到两岁或是三岁的时候，我叔叔才断了奶。可是他一看我吃奶，就坐在我母亲旁边咽口水呢。”

这天，李永镐还谈了其他几件他叔叔的逸闻。

我被李学万的为人完全迷住了。但可惜的是，那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李永镐第一次见面是40年代，那时北满抗日队伍中的

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成了荒野的幽魂。

曾在北满的许多抗日联军部队里作过战的安英，有一天一一呼叫着掩埋在北满旷野的战友们的名字，悲戚地流下了眼泪。

当我们结束了太平沟战斗，翻越老爷岭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在北满的广阔平原和高山峻岭中纵横驰骋，以猛虎雄狮般的气势到处打击敌人。正是他们这些北满战友引领企踵地盼望着同我们会晤，因为他们不仅需要和我们合作，而且在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不少苦衷。我们也有不少需要向他们倾吐衷肠的话语。我们在东满为“民生团”问题而伤透了脑筋，而他们在北满也有他们的问题，使他们暗费心思地忍受痛苦。

这些情况，催促我们加速了第二次远征北满的行军。我们对北满战友只有一个期望，那就是希望得到同一民族的情意。反“民生团”斗争，把由爱和信任的伦理支配的间岛游击区变成了失去人情的不毛之地。这几年来，就在这不毛之地上，我们一直忍受着对人情的饥渴，像沙漠上的旅人渴望着绿洲一样期望着能得到人情。老爷岭再高再险，也阻挡不了我们的心像朵朵白云一样飞向北满的战友。

我们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又一个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在第一次远征北满时打下了基础的同北满地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联盟，并根据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搞好同他们的联合斗争。进入 30 年代中期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在进步人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帝反战斗争面前吓破了胆，开始加强反对世界自主力量的国际联合。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日本，为了把人类推入世界大战的惨祸，正在急于结成反共反和平的联盟。

在这种形势下，要想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发展抗日革命，就必须加强同各国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团结。这是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满洲各地的抗日联军部队要丢弃闭关自守的孤立的活动方式，互相加强联系，以联合的力量战胜敌人——这也是共产国际一贯的要求。

当时，东北地区各军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因指挥员的能力和水平不同，各军的战斗力和准备程度也就有一定的差距。各军同友邻部队没有联系，大都据守在固定的地区孤军奋战。这种分散状态，使我们无法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综合地使用满洲各地游击队的力量。这是一个弱点，有可能使分散在各地孤立地进行活动的游击部队被敌人各个击破。

在这种情况下，东满和南、北满的各游击部队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同其他地方的游击部队取得联系。满洲的所有游击部队都面临着这样一项战斗任务：从过去在固定的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保卫有限的地区、孤立地进行活动的旧方式中解脱出来，互相密切合作、积极支援，在更广阔的地区大胆开展军事政治活动。不这样，就不可能把满洲地区的游击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就不可能使它统一地深入地发展下去。

通过反“民生团”斗争，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有可能阻碍共同斗争的不和与不信任的现象。我们到北满去搞好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就能彻底改变这种不自然的关系。

率部到北满去转战几个月，魏拯民和尹丙道也会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结论的。会见他们两个人，是我们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又一个重要目的。

翻越老爷岭的时候，珲春团由投诚的伪满军士兵编成的三个连

队吃了很多苦。他们没有山地行军的锻炼，因此，开始行军才两个钟头就累垮了。我命令汪清团的张龙山去负责帮助那三个连投诚士兵的行军。张龙山曾在转角楼和三岔口之间当过放排工人，是个膂力过人的大力士。他的刺刀一闪，一丛丛的杂灌木就齐刷刷地倒下来。他一个人背起两三个人的枪和背囊爬山，如履平地，行走如飞。

“同志们，谁过不了这个岭，谁就该改姓；两腿当间的‘小少爷’也该趁早一刀割掉！”张龙山还开这样的玩笑鼓舞大家。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翻越了老爷岭。但是，到 7 月才在山东屯附近找到了周保中的住处。这位先前的绥宁中心县委军事负责人，如今担起了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的重任。仅在几个月前，他还拄着拐杖弓着背迎接我们，如今早已扔掉了拐杖，赶到离他的密营有十多里的老泉沟来接我们了。

周保中拥抱着我，不等我开口，就兴奋地一口气介绍了宁安的情况：

“我的伤口已经好了。你们远征队走后，我们新建了一个军。从那以后，宁安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也都活跃起来了。这一切多亏去年金司令的远征队来帮助了我们。”

“周兄的伤口治好了，我也放心了。过去的几个月，好像都是为周兄效劳的。你还当了第五军军长，发生了多少值得庆贺的事啊！”

我这样祝贺了周保中之后，问了平南洋的情况。来到了北满，心中不由得生起了一年前在战斗中与平南洋结成的友情。那个与我相处只有一两个月的粗犷暴躁的武人，此刻像竹马之交一样在我的记忆中稳稳地占据了一个位置，这确实是使我感到惊异的。

我们一到第五军的宿营地，就和周保中就联合行动问题交换了意见，没想到在这里发生了小小的磨擦。这个磨擦是由于周保中对

珲春团的团长侯国忠像下命令似地提出了我们远征队的行动方向而引起的。双方的对话一时陷入了僵局。当时，第五军的政治委员胡仁率队在穆棱一带活动。周保中是要求我们远征队先到穆棱帮助胡仁作战，然后挺进到五河林地区去掌握这个地方。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难办的要求，但自尊心很强的侯国忠却一口拒绝了。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周保中的要求不是要求，而是一种指示。安吉和金丽重也跟他持同样看法。他们怒冲冲地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远征目的和路线，干吗对我们指手画脚？五军是五军，二军是二军嘛。他们这样发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是代表第二军来北满的，决不能因为要搞联合斗争而盲目地随着别人的指挥棒打转。

周保中说，游击队带着炮和重机枪这样的重武器进行活动，是不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是一种冒险。

我承认，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同时我认为，重武器到底适不适合于游击战，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本来，我们在开始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曾提出了游击队使用的主要武器应当是轻武器这样一条原则。但是，自从在太平沟战斗中用过迫击炮，看到了它的威力以后，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不能因为是打游击战，就一概不用重武器；根据环境和条件，适当使用重武器，反而会有更大的效果。实际上，有苏联的游击队在他们的国内战争中使用过大炮和马克辛重机枪的先例。这个时期中国的部分游击队也在使用大炮，虽然这是局部的现象。周保中说我们的远征队带着炮和重机枪活动是一种冒险，我觉得他的这一看法是过分的。

为了缓和紧绷绷的气氛，我提出建议说，对联合行动问题，大家再酝酿酝酿，等酝酿成熟了，再聚在一起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周保中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定的时间，

可以一面研究同北满部队进行联合作战的具体方案，一面让在行军中筋疲力尽的远征队员休息一阵了。

山东屯是有一百多户人家的中国人村庄，因山东人聚居而得名。敌人为了封锁这个村庄，在十五里外处常驻了二三百名“讨伐”队。我在山东屯的时候，还同宁安县委书记和山东屯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山东屯见到了李延禄军长。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的家里，房东虽是地主，却是一个厚道的人。所以，房客都愿意帮他家多做点事。

有一天，我们下地帮助房东收麦时下了一场雨。为了不让割好的麦子挨雨淋，我们把麦捆都垛好了才回到住处。我们刚回来，刘汉兴就说，今天天气不好，雨霖霖的，趁便吃顿午饭，休息休息。他亲手做了好几道菜，摆上了一桌丰盛的午餐。早在李延禄的部队来汪清暂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做菜的好手艺。刘汉兴这位中学毕业的知识分子还有连专门厨师都吃惊的做菜本事，确实是稀罕事。他不光做菜手艺好，而且很能喝酒，堪称大酒瓮，我们喝一杯，他就喝三杯。我们就着他烧的菜下酒，还吃了片儿汤。也许是因为菜好吃，这天我也喝了几杯酒。

我们吃片儿汤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响声。跑出去一看，只见麦秸堆旁边躺着几十条蛇。这是房东当福蛇养的，不料都被手榴弹炸死了。这家主人对蛇进到屋里在饭桌下爬来爬去都不管。这个地方有一种把蛇当守护神看的习俗。

这天在院门口站岗的是分配在我们队里一起来到北满的青年义勇军的队员。他们刚换岗的时候，雨住了，天上洒下了阳光，蜷缩在麦秸堆里的蛇也都开始露出了头。不知道当地风俗习惯的哨兵看到这些蛇，吓得不顾一切地朝那群蛇投出了一颗手榴弹。

房东夫妻看到这些蛇都死了，十分伤心。仿佛这是什么灾难的预兆，吓得脸色煞白。尽管周保中和刘汉兴用好话安慰他们，他们那恐惧不安的神色还是不见消失。这样，我们连饭都没吃完，就不得不走出了这一家。

1935 年 7 月下旬，敌人听到从东满来了“高丽红军”，就用伪满军和警察队编成一支混成骑兵队，像漫天乌云似地拥向了山东屯。匆匆估摸，也足有几百名的样子。

当时，第五军的主力都在穆棱和宁安县的西北方向。第四军军部的兵力也没有多少。在数量上，敌人占优势，比我们多两倍。

是打，还是避开？

周保中和刘汉兴问我的意见。

我决定打。我们同第四军、第五军的联合作战，不是在桌面上，而是在敌人的骑兵队扬起漫天尘土扑上来的散开队形面前，不费周折地达成协议而且付诸实践了。避实击虚是古代兵家的教诲，也是游击战的一条规则，但在运用上，不应该强求一律。在北满显示一下我们的威力，这在实现我们远征北满的目的方面，可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再说，从当时的各种情况和地形条件来看，也是有胜算的。于是，我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打一仗，并开始了战斗行动。

为了不给人民群众造成损失，我们把阵地设在敌人打进山东屯以前就能予以迎头痛击的地方，给各部队指定了相应的战斗任务。曾在太平沟战斗中大显身手的迫击炮连的炮手和重机枪连的神枪手，为了打击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预先测好了射击数据，只等我的命令。

沿着凉水岭子村河的峡谷猛扑过来的敌人，为了抢占山东屯西北地区，爬上了山。我们等敌人爬到离我们只有一百五十米到二百

米的时候，一齐开了火。幸存的敌人慌忙逃窜。他们渡过河，沿着南边山脊再扑过来。我们守在那里的勇士们一顿痛打，又把他们击退了。这样的攻防战反复了好几次。

敌军指挥官为了扭转不利的形势，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当敌人集结在指挥所的时候，我们的迫击炮连长下了射击口令。霎时，一颗颗炮弹尖厉地呼啸着飞过去落在敌群中。残余的敌人都骑上马准备往宁安方向逃窜。我们的迫击炮又朝着逃窜的敌人开了火。敌人犹如瓮中之鳖，无路可逃，在炮火下东奔西窜，嚎叫着“做梦也没想到共军会有炮”，乘黑逃散了。

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使用迫击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敌人说我们得到苏联的援助，还配备了迫击炮。他们只要一听见“高丽红军”这个称呼，就吓得索索发抖。我们在老黑山战斗中缴获的迫击炮弹，在这次山东屯战斗中全部打光，只好把迫击炮埋下了。

在山东屯战斗中吓破了胆的敌人，从那以后不敢再跟我们交火了。他们关紧了城门，不敢出城。他们接到我们的信，还乖乖地给我们送来了粮食、油盐、鞋等物资。

在北满大地上再一次敲响了胜利战鼓的山东屯战斗，同拿手榴弹炸死了蛇的稀奇故事一道，成为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战斗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听了我们的炮声，敌人心胆俱裂，惊恐万状；人民欣喜若狂，宛若岩浆喷发。同北满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斗争就这样一开始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一战果奠定了巩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斗联盟的坚实基础。从那以后，周保中再没有谈起过使用重武器妥当与否的问题。

我们离开山东屯到了叫斗沟子的地方，在一个姓方的人家同北

满共产主义者们再次讨论了反日联合斗争问题。根据我们主动提出的倡议，同周保中达成了协议，决定把北满远征队分成几个编队，到第五军的活动地区去开展联合斗争。远征队的一部分去了第五军政委胡仁进行活动的穆棱地方，另一个小分队去了平南洋活动的地区。周保中给我们开往马厂、团山子、沃粮河、石头河子等地的编队分别配备了五军的部分成员。这几个地方是我们在第一次远征北满时下力量开辟的革命区。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积极开展了军事政治活动。

沃粮河的地下组织，不仅在村庄的邻近地区，而且在距离很远的东京城，也布下了自己的网点。我们得到这个组织的很大帮助。每当想起沃粮河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位中国老大娘的面容。我们第一次到北满的时候，这位老大娘对妇女会的工作非常积极。她已是快六十岁的老人，却日夜不停地为部队缝军装，照料我们远征队的生活。她的形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母亲和祖母。听说，她一天见不到我，就问我的传令兵："金司令怎么看不到了？"听到我们的人回答说我很好，她才在夜里安心睡觉。

这次，她听说从间岛来了"高丽红军"，就带着一只雄雉和一盆冷面，赶到斗沟子来看我们正忙着准备开拔的部队。

"去年秋天，没能好好招待金司令，心里总是过意不去，这回带来了冷面，是我这个老太婆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收下，我就再高兴不过了。"这是她对我们的队员说的。

不知她怎么勾通我的传令兵的，连我喜欢吃冷面的嗜好都探听到了。这天，我和周保中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渗有老大娘一片心意的冷面。雉肉做汤、雉肉和蔬菜做面码儿的冷面，真是别有风味，特别可口。周保中一下子吃了两大碗，半开玩笑地说："金司令，你

到北满来什么时候还拐上了这样一位中国老大娘啊？你那团结群众的本事，我一向深感佩服。”他接着恳求道：“我们的几个连现在分配在你的部队里，借这次机会，希望你好好教给他们做政治工作的方法。”

这年 9 月，我们的部队在额穆地区进行活动的时候，第五军政委胡仁向我们正式提出了进行联合作战的建议。但是，为了对向苇河转移的金策做工作，我们把他的建议暂时保留下来。后来，由于情况不允许，我们没能满足胡仁的要求，但我一直很感激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我们表示的信任。

在开辟北满方面，我们所重视的又一个地方是额穆。这是一个我们没怎么去过的地方，中国人的部队曾经到这个地方去发动革命，但因为发动不起来，终于放弃了。尽管这样，为了同金策所属的第三军进行联合斗争，我们必须去开辟这个地方。它的西北与第三军的活动地区苇河、珠河毗连，西边与第一、第二军的活动地区相接。这个像谜一样令人不解的地方，是敌我都垂涎的地区。

北满的许多武装部队去开辟额穆都遭到了失败，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有根深蒂固的反共情绪。虽说宁安也曾是反共情绪很强烈的地方，但是跟这个地方相比，就有天渊之别了。额穆成为这样一个被反共思想污染的地区，ML 系统的宗派集团也有责任。他们曾经以这个地方为据点，发动八・一暴动那样莽撞的左倾动乱，给共产主义抹了黑。因为八・一暴动，额穆地方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严重摧残。从此以后，一提起共产主义者，他们就直摇头，不予理睬。

日本鬼子派出宣抚班，在人民群众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一个原在额穆县青沟子密林里烧木炭、后来入伍的小伙子经历的一段故事，雄辩地说明这个地方的人中了反共宣传的毒有多么严重。由于传染病肆虐，他过早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孑然一身在那残酷无情的世上流浪乞食，漂泊到额穆地方，被强征到修筑公路的工地上做苦工。那时他跟工地上的一个工人学会了一支革命歌曲，这是他出生以来头一次学到的歌曲。后来，他在任家沟附近的一个庄户人家打零工。有一天，村里有个人家举行婚礼，他跟着东家到那个办喜事的人家去向新郎和新娘表示祝贺，还应主婚人的邀请唱了一支歌。他唱的正是那首在修路工地上学会的革命歌曲。就是因为那一首歌，办喜事的人家出了一场乱子。有个乡绅听了那首歌，就骂那个小伙子是共产党，还对那个雇佣小伙子的中农指手画脚地训斥道："你这个人，雇零工就该雇个像样的，干吗雇了这么个共产共妻的共产党啊！"那个中农当天就把小伙子赶走了。悲剧就在于那个小伙子明明唱着共产主义者作的歌却全然不知那是一首宣传共产主义的歌。有人说这应该怪他无知，其实这不能怪他无知而应怪那里人们的反共情绪。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土匪和马贼干出来的事也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干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远征队决心去开辟额穆，老实讲，不能不说这是一桩近乎冒险的事情。我们渡过镜泊湖刚走进额穆县境，就受到了居民的冷遇。我们到的村子，可以说是额穆地方的东方关口，是一座只有中国人居住的恬静的村庄。我们一走进村子，人们就喊着"红胡子"来了，带着孩子逃走了。留在村里的只有一些年迈有病的人，就连他们也怕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我叫部队在离村子稍远的林子里搭帐篷休息之后，就走进了村

子。到小学校舍去一看，连教师和学生也都躲起来了。对我们这些为了在额穆地方点燃革命火焰而千里迢迢赶来的东满客人来说，这种待遇的确是太冷酷了。

我把学校的风琴抬到操场上，一面弹风琴，一面同青年义勇军连队的队员们一起唱起了《苏武歌》和杨贵妃的歌。我们的队员唱汉族民歌也是很出色的。这两首歌，是中国的劳动群众特别爱唱的名曲。《苏武歌》是我在吉林时期学的爱国歌曲，原名叫《苏武牧羊》。

苏武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忠臣，是声望很高的真实人物。他奉西汉皇帝之命出使北方的匈奴，却被匈奴当人质扣留。匈奴威胁他，若不投降就不放他回去，说什么公羊不下崽就休想回国。他就这样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一直坚贞不屈。

一句话，《苏武歌》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我们开始弹着风琴唱起了《苏武歌》和杨贵妃的歌，那些躲藏的小学高年级学生都惊异地抱着好奇心朝我们围过来，而且和着我弹的琴声一起唱起来了。接着，教师和大人们也一个个悄悄地向我们聚拢。可能是他们为我们这些“高丽红军”唱中国歌唱得那么流畅而觉得惊奇了吧。尤其是看到我们唱这些歌，感觉到他们和我们红军之间存在的某种模糊的共同点了吧。不管是哪一点起了作用，反正这些待我们那么冷淡的人开始以亲切的有所期待的眼光看我们了。

当逃跑的人们都聚到学校操场来的时候，我对他们用中国话作了号召抗日的讲话。听了我的讲话，群众才开始和我们开诚相见，赞扬我们说，“高丽红军不是土匪，也不是马贼”，“高丽红军是真正爱国的革命军，是英姿勃勃的军队”。

可以说，那时候我们用《苏武歌》感化了北满大地上的中国人。

通过这一事实，我深深地体会到，文学和音乐对感动人、唤醒人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我们重视文学艺术，把它当做革命的武器，可以说是以当时的体验为根据的。

第二次远征北满时在镜泊湖畔的这座中国人村庄里的体验是那么深刻，以致我在解放后为了弄到《苏武歌》的歌词，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直到不久以前，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弄到了中文歌词。收到这首歌词的时候，我高兴得甚至忘记了我是八十高龄的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歌。一个八十岁的人，唱又能唱得怎样呢！虽然嗓子发噎，发不好声音，但我唱着它，心中就油然升起了对早已消逝在遥远的天边云外的青春时代的怀念，像泉涌一般浮起了对我们在苦难中开辟的北满大地的深情的怀恋。

每当怀念起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开展艰苦的联合斗争的那些年代时，我就常常用风琴弹奏这首歌。有时也吹口哨吹这首歌，但不再像二三十岁时那样能吹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了。

现将《苏武歌》的歌词抄录于下：

苏 武 牧 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匈朝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心存汉社稷，旄荡犹未还，
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夜坐塞上时闻笳声，入耳痛心酸。

苏武留胡节不辱，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
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任海枯石烂，大节不少亏。
宁教匈奴惊心破胆，拱服汉德威。

在额穆得到的印象中至今难忘的是，在叫做三棵松的地方同全州金老人结识的往事。我们在三棵松的时候，把指挥部设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地主家里。离这地主家有五百来米远的地方，住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靠种一小块水田过日子。据传令兵了解，他很像朝鲜人，可是不说朝鲜话，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只说不够流利的中国话。

有一天傍晚，我到这老人家里去串门。我们互通姓名，证实了他是朝鲜人，原籍是全州，我们是本家。他原在洪范图的部队里当兵，参加过青山里战斗。后来部队解散了，他也就流落到额穆这个地方，娶了个老婆，过着隐遁的生活。他听到我也是全州金氏，就掩饰不住高兴地说，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见到了同宗本家，真是感慨万端，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他叫老伴用脚踏碓舂了点稻子，给我做了大米饭。这是我到了北满以后第一次吃到大米饭。

“起初，我们的抱负可大哩。在洪范图将军指挥下取得凤梧洞大捷的时候，我们以为朝鲜马上就能独立了。那时候做梦也只做通过独立门跨入汉城的梦。可是如今，落到了像草野的一颗砂粒一块石头一样的地步，成天无所事事，脸上的皱纹却不断增多，你看这多么糟啊。要说我这个老头子还有什么乐事，那就是在这汉族世界，

北满的一个角落里，像淫雨连绵的雨季里见到星星一样见到了朝鲜同胞。要是金将军的部队不回间岛，永远驻在额穆地区该多好啊！”

金老人说着，还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当年胸怀光复祖国的凌云壮志，扛起火绳枪投入沙场的气概，随着无情地刻在他脸上的皱纹的增多而渐渐消磨了。想到这，我也禁不住感到一阵凄楚。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为了实现这位老人当初的凌云壮志，我们年轻人也必须排除万难，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位老人少一只耳朵。饭后跟他天南海北地闲聊时我顺口问他怎么少了一只耳朵。他苦笑着回答说，是在牡丹江凿开冰窟窿打鱼时弄掉的。那天他钓到一条大鲤鱼，就一把抱住了它。那鲤鱼一阵扑腾，把老人冻僵的一只耳朵给打掉了。对老人的遭遇，我十分同情。我在三棵松停留了一个星期，每晚都到他家去听他讲洪范图的故事。

经过这样的交心了解到，额穆人也跟间岛人一样，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他们所以被反共思想污染，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革命组织的引导。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和青沟子四号村的百家长刘永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连指挥部也搬到了他家。

最初，刘永生看到我们的部队不打扰老百姓，一到晚上就生起篝火，开娱乐会，不分男女，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学习，就觉得我们是一支奇怪的军队。他过去所见到的军队，不论打的是什么旗号，都是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发号施令的一群兵痞。而这支从间岛来的“高丽红军”却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还给孩子们理发；上下级毫无差别，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全村人都在低声细语，说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

某一天夜晚，刘永生给我们通报一条不祥的消息说，驻在六号村的日军守备队和伪满军正准备攻打四号村。我接到这一通报，就下达了全队就寝的口令。虽然还未到就寝时间，队员们也只好躺下睡觉了。

百家长为此深感惊异。要是别的军队，准会避开敌人，逃之夭夭，而这支“高丽红军”却不仅不想逃跑，反而留在村里，准备睡觉。这究竟是什么军队如此令人莫名其妙啊！他怕敌人马上打进来，不安地跑进跑出，一夜没合眼。

我把他拉到身旁坐下，说：

“百家长，我们的军队像铁桶一样保护着村子，你就放心地好好休息吧。”

“啊？天还没黑就钻进被窝的军队，还能像铁桶一样保护村子？”

百家长仍不放心，不知所措。

“有岗哨嘛。‘高丽红军’可不会吹牛啊。你今晚好好睡，准没事。明天早上，等我们走后，你就去找敌人告我们，说‘高丽红军’来过。就照你看到的，都说给他们听。”

“去告你们？我可没有心思去告你们‘高丽红军’这么好的军队。”

“不，百家长，我这是真心托你，你不要拒绝，就照我的话去做吧。这是我们的活路，也是百家长和全村人的活路。你瞧着吧，过后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让百家长去向警察如实地报告我们“高丽红军”的行踪，其目的在于把集团部落里的敌人全都诱出来。第二天早晨，我们撤出四号村，沿着通往额穆的公路开始了行军。半路上，我把一个连

的兵力部署在路西南的山脊，设下了埋伏。敌人听了刘永生百家长的报告，立即派出好几百名的“讨伐”队，气势汹汹地追上来了。

这样，我们远征队自到额穆以来，第一次打了诱敌伏击战。参加这场战斗的日军守备队(一说宪兵队)全部被歼，没有一个幸存。原来有一个鬼子躲掉人民革命军的子弹活了下来，被他们的飞机救走了。可是连他也因为飞机着陆时失事坠毁而上“天堂”去了。1959年我国的考察团去访问额穆时，看到当年日本鬼子立在青沟子六号村的“忠灵碑”还保存着。

1935 年 12 月，我们在官地附近又打了一仗。这场战斗，又叫柳菜沟战斗。在这一仗中，二百多名敌人大部被歼。被我们打得丧魂失魄的一个敌军军官急得钻进了棺材的故事，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发生的。

一一叙述我们在北满进行的无数次战斗，是不可能的。1935 年秋天，当我们积极开辟额穆地区的时候，共产国际通过周保中通知我们说，指挥第二军和第五军协同作战的联合指挥部已组成，任命我为联合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兼苇河部队的司令员。看来，我当过营、团、师政治委员的经历，使共产国际选拔我当了第二军、第五军联合指挥部的政治委员。

这个任命，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不是做官，我急切渴望的是同战斗在北满、起骨干作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会见。然而，联合指挥部政治委员这一出乎意外的职位，使我无法顾及这个愿望了。我不仅要领导远征队的活动，还要去管别的军的政治工作。我肩负着这样沉重的担子，不得不把同北满战友的会面推迟到南湖头会议前后，为了两个军的政治工作，我不得不忙忙碌碌地来往于宁安及其周边各县之间。

在这过程中，我们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就在更巩固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收获，比我们在开始远征时所预计的还要大得多。

要说我们有什么感到惋惜的事情，那就是同金策、崔庸健的直接会面没有实现。而这是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中最首要的一项，可是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去了。我们在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保持接触的日子里，也始终没有忘记在北满大地上历尽艰辛、浴血奋战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爱国者。同他们的会晤越推迟，我对他们的怀念就越深切而热烈。

东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南、北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头一次聚在一起，在洋溢着关怀和激情的气氛中互通姓名，热烈拥抱，是在1941 年年初。从这时起，我们就在同一个密营里，同吃一锅饭，准备了解放祖国的决战。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后，我们又投入了重建祖国的如火如荼的斗争。

他们都是在 20 世纪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年代里，和我一起进行了抗日战争，又一起进行了抗美战争，一同坚忍不拔地进行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等艰苦斗争的忠实的战士。

曾经奋战在北满的老战士们，今天仍然和我同甘共苦，为了使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光芒四射而努力奋斗。他们都是在半个世纪多的漫长岁月里，始终不渝地拥护我和我们的事业的忠臣。我祝愿他们的未来光明和幸福，祝愿他们的过去永远成为圣洁而美好的回忆。

二　奇缘

北满的额穆地区是我们在吉林时就建立了联系的地区。我同姜明根取得联系，在蛟河建立了叫做丽新青年会的革命组织，还做过这个组织的工作。当时，蛟河、新站和杉松都属额穆县管辖。据说，这个县是在 30 年代末期才改称为蛟河县的。

在第二次远征北满时，我们仅在额穆一地就进行了数千里长征。青沟子、琵琶顶子、南天门、三道沟、马鹿沟、新兴屯、官地、柳菜沟、三棵松、牡丹江村、黑石乡、驼腰子等地，都是我们那时开辟的地方，是记录着北满远征队武功的令人难忘的战迹地。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不少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也见过很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在第二次远征北满时，这一带还有很多革命风暴未刮到的空白点。因此，我们在讨论远征额穆时，周保中表示过担心，这并不是偶然的。他说：

“金司令嘛，连那个出名的老顽固吴义成老头儿都被你说转过来了，你当然会有办法的。可是我们今年春天到额穆时，却被人家说成是‘红胡子’，到处吃闭门羹。”

吴义成曾经疏远过共产主义者，骂过周保中是“红胡子”。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词就成了对共产党军队的詈词。

周保中的话果然不错，我们率领远征部队一踏进额穆县境就被当做了“红胡子”。额穆的人们一看到远征部队就说“高丽红军”来

了，便四处逃散，村子里空无一人。这说明他们像害怕“红胡子”一样害怕我们。

显然，在他们看来，“红”字就是道德败坏、残忍的代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远征途中只好腾出很多时间做群众工作。时间用在做群众工作上，这并不是浪费。由于我们的努力，曾经疏远人民革命军的人们，变成了我们的亲密朋友和帮助者；曾经和我们作对的人们，也走上了联共、亲共的道路。这时，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一获千金都不能相比的喜悦。

正当我眼前常常浮现出腰营沟会议后人民群众挥泪撤离游击根据地的情景，脑子里为革命的前途而思绪纷纭，身心疲惫不堪的时候，在额穆取得的这些收获，不能不是我们极大的喜悦。对于干革命的人来说，最大的喜悦就是获得同志和朋友，最大的悲哀则是失去同志和朋友。

我们在踏入额穆县界之前，就已经在镜泊湖畔小山咀子结识了一个叫柴和的中国渔夫，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镜泊湖。他在认识我们以前，也是疏远革命军的。这个从十九岁起，将近三十年在镜泊湖以捕鱼为生的淳朴渔夫，早先听信了日本鬼子的欺骗宣传，把“高丽红军”当成了“土匪”。可是当他亲眼看到远征队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又看到我们的队员谦虚、平易近人时，就改变了态度，热情地对待革命军了。

常言道，隔江千里，阻挡军队远征的江河是和上千里路相等的障碍。因此，柴和避开敌人，全力帮助远征队顺利渡过镜泊湖的劳苦，是我们毕生都不应该忘记的。

1959 年，我们的考察团到中国去考察时，得到了他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柴和已经是满脸皱纹的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可是他那修长

的身材和长脖颈，却依然如故，这使我产生了无限的感慨。

青沟子战斗时冒着危险给我们提供了后勤物资的百家长刘永生、在黑石乡附近把儿子送进游击队的俞春发老人等，都是我们在额穆地区结识的好朋友。我们在这里争取到了大批群众。

我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做各阶层群众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同一个伪满军团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这大概是 1936 年年初的事情。我们远征队为了攻打敦化县的一个木材所，连夜强行军，当东方麻麻亮的时候，才在大路旁的一户地主家歇脚。这户地主看来很不一般，他家四周围了一道高高的土城，还修有炮台，只是没有家兵，因为当时已有了伪满军，而且日本人也不允许私设武装力量。这家有两栋房子，一栋住进了队员们；另一栋住进了指挥部成员和后勤人员。我们组织三个队员扮成长工，轮流在大门口放哨，让其他队员都休息。

下午四点钟左右，哨兵报告说，有一辆马车正朝这边驶来。不一会儿，马车来到大门口停下了，车上一个阔太太由一个士兵搀扶着走了下来，说是要暖暖身子，就径自走进了这户地主家。

我往外一看，只见一个穿着两套狐皮大衣的美貌的少妇站在雪花纷飞的院子里。队员们看到她那豪华的装束，怒目圆睁，一窝蜂拥到院子里把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围起来盘查。

我问是什么人，年轻的哨兵好像抓到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高级特务似的，洋洋得意地回答说：“司令官同志，她是个可疑的女人。”说罢以锐利的眼光直盯着那个女人。

那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吓得面如土色，全身直打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厉声禁止了要搜她身的哨兵，然后命令道：

“你让这位夫人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那女人进到屋里仍不敢抬头，恐惧地瑟瑟发抖。

我用中国话叫她放心，说道：

“夫人，不要害怕，好好暖和暖和吧！我们的哨兵年纪小，看错了人，冒犯你了，请原谅吧!”

我一面请她喝茶，一面把火盆推到她面前，好让她暖和身子。然后说：

“不知夫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是被这里的人们称做‘高丽红军’的人民革命军。夫人听说过‘高丽红军’吗？”

“听说过一些。”那女人低着头，用勉强听得见的细微声音回答说。

“那好。我们‘高丽红军’可不是日本人诬蔑的那种伤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土匪’。我们革命军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人民武装力量。我们只是对侵略了朝中两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作战，丝毫也不侵犯人民的生命财产。夫人，你放心好了。”

那女人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但她的脸上仍然表现出不安、恐惧和半信半疑的神色。

我继续对她讲，直到她消除了紧张的情绪：

“我们决不会因为夫人带着伪满军士兵而问罪或惩罚你。夫人怎么会有护兵，我们也不想过问。你一个过路的客人，既不危害老百姓，又不危害革命军，我们干吗要向你问罪呢！我们也是得到这家主人的谅解才在这里歇脚的过路人。你不要多心，烤暖了身子再回去吧!”

那女人这才舒了一口气，小心地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顿时，她眼里闪过了惊愕的神色。她双手捂着胸口，焦灼地咬着嘴唇。

“你怎么啦？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我忙问她。

“不，不是，……只是队长的面容，……我早就知道队长是仁慈的人……”她没头没脑地咕哝着，又仔细地端详着我。

就在这时候，审问了那个护兵的吴白龙，像个捉到了老虎的猎手，兴冲冲地跑到门口来，用那中国女人听不懂的朝鲜话小声报告说：

“将军，据护兵说，这个女人是伪满军十二团团长的老婆。一条大鱼自投罗网了!”

“白龙，别那么太得意啦。是大鱼还是小鱼，要等着瞧呢。”

话虽这么说，但听说她是伪满军团长的老婆，我也着实吃了一惊。团长这个职位可不是简单的。从伪满军的军队等级来看，团长这个职位，从上往下数是第四位；从下往上数，要爬十三个阶梯才能到达。伪满军一个团的管辖区域，有的包括好几个县。管辖这么广大地区的指挥官的权限之大，就无须赘言了。那时，总部设在蛟河的伪满军第九混成旅所属的第十二步兵团，就驻扎在额穆县。

当时，我们把瓦解敌军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因此，在这里遇见了一个伪满军团长的夫人，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了。当然，我是不会因为面前坐着伪满军团长的老婆而改变脸色的。

“夫人，你以为因为你是个伪满军团长的妻子，我们就会严厉地惩罚你吗？”

那女人很难为情地搓着手说：

“哪里！哪里！……不知是不是我看错人了，队长，恕我冒昧，您是不是叫金成柱？……”

这意外的问话，着实使我吃了一惊。在这个离间岛有数百里地

的北满，偶然遇到的一个伪满军团长的妻子，竟然知道我的小名，这本身就是件不能马虎过去的非同寻常的事。一个素昧平生的阔太太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呢？我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也产生了想破这个谜的强烈好奇心。我说：

“来到额穆忽然听到我的小名，真叫我吃惊啊！我既是金成柱，又是金日成。不过，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

伪满军团长的妻子顿时羞愧难当，飞红了脸。我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她心里有话要说，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成柱先生在吉林领导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在那里念女中。从那时起我就认识您。”

“哦！原来是这样！真叫人高兴啊！”

我这才明白她第一次抬头看我时眼里闪现出的蓬勃的热情意味着什么。总之，在额穆这个陌生之地能见到吉林时期的女中学生，确实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吉林这个地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种近乎乡愁的麻酥酥的感情。对这座我生活了好几年的城市，我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当时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她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在回忆往事，这才恢复了平静，声音平和地说：

“1928 年秋天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成柱先生您还记得吧。那年秋天，吉林是多么热气腾腾啊！您可能不大相信，那时我也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游行。在省议会的院子里，听成柱先生讲话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说着，这位过去在游行队伍里高喊口号的吉林女中学生，今天用狐皮大衣裹着全身，带着护兵去娘家探亲的伪团长的夫人，眼里不禁流下了泪水。

我恍如隔世，重新端详着伪团长的妻子。一个昨天还高喊抗日的女子，今天却搭上了亲日的列车。我开始深思，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女子变成了这个样子的呢？是因为对本民族的未来感到绝望而堕落的吗？不，我看着她回忆吉林时那深沉的表情，感到她心里还有着对过去抗日时的迷恋。尤其是她在我面前用泪水表示了忏悔，回忆了她的学生时代。她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为什么那样吃惊，那样不寒而栗呢？也许是她在良心面前感到羞愧，心情恐惧吧？

“成柱先生，您怎么不说话啊？请您原谅我吧！您讲话的时候，曾经举起拳头响应过您的那个少女，如今却落到了这个地步……今天看到戎马倥偬的成柱先生，我真是感慨万端……羞愧难当啊！”

说着，她的眼里又扑簌簌地淌下了泪水。

“夫人，镇静一下吧！自轻自贱可不对啊！时局太严峻，不容我们陷入那种绝望、自暴自弃的境地。内外的形势号召所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中华儿女和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哪有做了伪满军团长的妻子就不能抗日的道理呀？”

我这么一说，她就揩了揩眼泪抬起头说：

“那么说，像我这样的人也能抗日？”

“是的。你只要好好地影响你的丈夫，让他不去‘讨伐’革命军，这就是对抗日的贡献。坦率地说，伪满军团长这个官可是不小的。但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官有多大，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丈夫虽然是个团长，但这并不是他心甘情愿去做的。他也珍藏着一颗民族良心。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好好说服我丈夫，让他不驱使部下去‘讨伐’游击队。请您相信我的话吧！”

“要真能这样，那就好了。一个伪满军团长由亲日转向反日，

这就意味着他的部下也都走上了爱国的道路。你和你丈夫再生的道路就在这里。”

我向她介绍了几个在间岛当过伪满军军官的人由亲日走向抗日的事例，给了她信心。

她说：“今天我能见到成柱先生，是天赐的幸运；听了您的话，我思绪万端；今天您让我恢复了吉林时期的精神，引导我们夫妇走上了再生的道路；我终生不忘您的恩情。”她表示决心说，一定要活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女儿。

我给她看了我们的宣传品和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表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就是第一次远征北满时吴平在宁安周保中的草棚里给我们看的那个《六大纲领》。

伪满军团长的妻子看了看手表，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白纸包的东西放在我面前。那是中国钞票。她说这是卖鸦片换来的钱，让我们用作军费。

她的一片心意，使我十分感激，但我没有收下：

“这笔钱，你拿回去吧，今天我遇到了失去的反日学友，这就等于得了一大笔财产。”

伪满军团长的妻子听我这么一说，又流了眼泪。

临别时，我们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位伪满军团长的夫人。夫人在离开地主家时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我，可惜现在已经忘掉了，只记得她姓池。

不久后，我们收到了那个伪满军团长的信。那是一封笔调十分悲壮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你们是世上最高尚的人；你们保护了我妻子的生命，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让我走上了爱国的道路。我将以结草报恩的决心尽力帮助你们。那个团长也只记得

姓张，名字记不清了。

后来，我们为了过旧历年，派军需官到额穆县城附近去办年货。军需官为了购买冻猪肉等过年物资进了城，可是没等完成任务，他就被县警察逮捕了。这个消息不知经过什么途径传到了那个伪满军团长那里。团长向警察署说，人民革命军的“罪犯”应该由军队来处理，于是把军需官要走了。

起初，军需官以为伪满军团长会把他带去枪毙。可是，那团长却让他的妻子做了丰盛的饭菜，把军需官待如贵宾。团长首先表示感谢，说，感谢金司令的部队对他妻子的帮助，并说，他用生命来担保，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决不“讨伐”革命军，要我们相信他的话，如果遇到了我们的部队，他们就向空中放三枪，让我们装作没看见径自走过去。他还说：“我死也不会忘记金司令的恩情，请把我衷心的问候转达给金司令。”

后来，这个伪满军团长忠实地履行了对我们许下的诺言。

当我们停留在三棵松的时候，官地方面驻有日本军队，额穆方面驻扎着伪满军一个团。这两支部队虽然常出去“讨伐”，但那个团长指挥的伪满军第十二团，一旦和我们的部队相遇，就故意躲开，不跟我们交火。我们也专门找日军打。

当时，区别日军和伪满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钢盔。戴钢盔的是日本军队，没戴钢盔的就是伪满军，这是游击队各个部队都知道的事。但是，后来伪满军也戴钢盔上战场了。于是我们就警告伪满军说，凡是戴了钢盔的，我们就将当做日军来打，你们要是不想跟游击队打仗，就把钢盔摘掉。从此，伪满军一遇到我们，就摘下钢盔，表示他们是伪满军。

戴钢盔的家伙如果走在队伍的前头，游击队就打前头；如果走

在后面，我们就打后面。日军发出悲鸣说：“游击队真会神机妙算，专找我们打。”我们要求伪满军出去“讨伐”时要用故意走火等方法向我们发出信号，他们也照办了。如果情况不允许这样做，他们就用几十几百人聚在一起叽叽嘎嘎大声叫嚷的方法，把他们的位置告知我们。

张团长还给我们送来了不少后勤物资。有时，他说是要出去“讨伐”，拉一大车猪肉、冻饺子等物资离开驻地，派部下送到和我们接头的地点，他自己则带着部队到根本没有游击队的地方去转几个钟头再回驻地兵营。

下面谈的是我们部队驻在官地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几个指挥员来找我汇报过年前夕队员们的情绪，然后请求我允许他们到村子去弄点荞麦或土豆粉来，过年好压冷面给队员们吃。

我考虑到这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便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且几天后我下了部队转移的命令。当时，这个村的群众都忙着准备过年的丰盛物资，说是要和金司令的部队一起过年。这样，弄不好，群众会为准备我们部队节日的饭菜耗费几个月的口粮。因此，我们突然带队撤离了这个村子。这虽然是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但队员们还是一肚子不高兴，个个鼓起嘴巴。

远征队转移到黄泥河子山沟，把木材所工人住过的草棚收拾了一下，就在那里过年。说是过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只摊到一碗小米饭。队员们吃了那一碗小米饭，都觉得不过瘾，就在这时，那个伪满军团长给我们送来了猪肉和饺子，使我们高兴极了。

那个团长随着同我们友情的加深，后来甚至还给我们远征队送武器和情报。我们对他妻子的真诚相待，竟带来了他衔环结草般的

厚报。这位伪满军团长虽然戴着伪满洲国给他的团长帽子，但他以勇敢的联共行为在历史和人民面前将功赎罪了。

以争取占绝大多数的下层士兵群众为主、也争取中下层军官和部分具有民族良心的上层军官、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军官——我们这条瓦解敌军的方针，在做那个伪满军团长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确实是超过了我们预想的巨大收获。连一次也没有和我们接触过的伪满军团长，受到他妻子的影响，由反革命的帮凶转变为联共爱国人士。由此看来，吉林女中毕业的那位团长夫人，为了改造她的丈夫，一定做了许多积极的思想工作。她确实是个很好的妇女。

不久后，那个伪满军团长被调到桦甸地区去了。我把他介绍给了魏拯民。从那以后，我很长时间没能听到那个团长的消息。直到 1941 年才通过在桦甸辅佐魏拯民工作的郭池山听到了有关那个团长的片断消息。

郭池山告诉我们，在桦甸的伪满军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知道他们迟早是要被调到热河方面去的，因此这两个团的团长都表示愿意在被调往热河之前，将部队并入抗日革命军。但是，当时桦甸地区既没有能够同时收容两个团的部队，也没有能够对这两个团长所提的建议作出决定性回答的干部。郭池山来找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决定这件事。自从魏拯民牺牲以后，二军所属的军政干部对有关部队活动的大小问题，都来请示我们决定。

我把在伪满军被调往热河之前尽快让他们起义的紧急任务交给郭池山，打发他回桦甸去了。可惜，因为耽误了时间，两个团的起义都未能实现。后来得知，那个团长在桦甸的时候，把全团交给了姓杨的新任团长。他把部队交给新任团长的时候，说服新任团长要走反日

的道路，还利用交情劝告第十三团团长也要好好帮助反日革命。

从那以后，我一直未能得到有关伪满军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被调到热河方面以后的消息。最近看了一些有关对日作战时伪满军崩溃的资料，才知道这两个团在关键时刻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敌军中有一个有良心的朋友，可以使我们争取到成千上万的朋友。因此，我们早在抗日武装斗争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在敌军中修筑革命炮台”的口号。所谓在敌军中修筑革命炮台，意味着在敌军中构筑我们的阵地。就是说，以瓦解敌军为目的，在敌军中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

当时，瓦解敌军的工作，一般都称做对敌政治工作。用枪弹消灭敌人和用对敌政治工作瓦解敌人，这两者可以说是抗日斗争的两条战线。无论是哪个时代、哪场战争，也无论是哪一方，对敌斗争一向都是在这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一条是用武装力量进行的战斗，另一条是以精神、思想宣传进行的战斗。

日本帝国主义在所谓治安肃正中，也提出了治标工作、思想工作、治本工作三个方针。概括起来说，这也是用武力的所谓“剿匪工作”和用宣传安抚的“思想工作”这两个方面。敌人对我们的革命队伍也是疯狂地企图从精神上加以瓦解的。

但是，为了做对敌政治工作，我们第一次提出要在敌军中建立革命组织时，却有不少人没有表示同意。

当然，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因为怕死而反对瓦解敌军工作方针的懦夫。有些人之所以没有欣然赞同，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方针脱离了阶级路线。他们摇头说，我们是工农军队，对方是资产阶级军队，敌我是水火不相容的，水和火不可能和睦相处，这是连三

岁孩子都懂的十分明白的道理，可是我们却要在敌军中建立革命组织，这行得通吗？

那些经常背着满满一口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则批评说，在敌军中建立革命组织，是一种近似阶级调和的右倾越轨行为。他们固执地说，那是同处于不相容的矛盾关系的阶级敌人搞调和的行径，经典著作里可没有什么有关瓦解敌军的论点。这些话，现在的青年们听了，可能会非难说他们是些捂着鼻子喊气闷的人，可是在那个不靠经典著作里的论点就寸步难行的时期，这种片面的立场是相当有势力的。

当时，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人们对阶级敌人有血海深仇，因此，有谁坚持那种片面的立场，也没有多少人把它看作是什么严重的越轨行为。许多人是从憎恨阶级敌人的感情出发参加革命，忍受了种种困难的，因此，在阶级问题上不肯作丝毫的让步。加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教条主义的解释，不少共产主义者的感情中，憎恨的成份强于爱的成份，主张惩罚和谴责的不妥协性胜过包容和宽恕的度量。基至那些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无条件的不妥协性看作是革命者的唯一特征，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青年变成了心胸狭隘的人、毫无人情味的“红胡子”。由于这种弊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经历了曲折，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左倾分子和教条主义者们，在维护阶级利益、坚持阶级斗争的不妥协性的口号下，只强调阶级利益这一面。然而他们眼看着许多人背弃共产主义革命，投到敌人的阵营去，却又不予阻止。

问题并不在于经典著作里有无关于瓦解敌军的论点，而在于人们不想根据革命的根本利益去制定路线和方针。

我们认为应当从热爱本国人民的立场出发去进行革命，因此，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我们没有首先努力去找不妥协性，而是首先努力探索了爱和团结的思想。

我们之所以认为能够在敌军中建立革命力量，是因为敌军的士兵和中下层军官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这些人自不用说，就是部分上层军官中，也会有赞同我们的革命、同情剥削阶级社会的受难者的有良心的人。如果把他们都争取到革命一边来，变成我们的友军，那么，敌人就会相应地被瓦解，我们的革命力量就会成倍地壮大。这将是不开枪、不打炮就能大量歼灭阶级敌人的大进攻战，也将是一场大宣传战，使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才是具有谋求人类的幸福与和睦的崇高思想的人。

我们抱着这种理想和意志，提出了“要在敌军中修筑革命的炮台”这一口号作为对敌政治工作的基本口号。

我们认为能够在敌军中修筑革命炮台的思想，是以对人的本性的主体立场为基础的。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伟大的存在，同时也是维护和向往正义的美好的存在。从本性来看，人追求善良与高尚，轻蔑恶毒与丑恶。这一固有的本性就是人性。因此，只要我们以宽大的胸怀给敌阵人员以良好的影响，那么，除了极少数反动的上层人物以外，多数中下层人员和部分上层人物，是能够变成革命的支持者、同情者和帮助者的。即使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的人，只要有人性、有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的气质，就是我们能够争取的基础。

我们认为除极少数反动派和歹徒外，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团结在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我们的这一政策，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

解放后，我国人民说金九是恐怖活动的魔王，把他看作反动派，说他和李承晚是一丘之貉。他是一个大半生抱着反感敌视共产主义

者的，这是事实。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要不，怎么会出现金九和李承晚头戴南瓜进猪圈(意即“飞蛾扑火”——译注)的漫画呢！降仙炼钢厂的工人甚至在厂的烟囱上写下了“打倒金九”的标语。当时，在我国人民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金九是可以改造的。但是，金九本人却在四月南北联席会议[5]时受到了我们的影响，由反共分子变成了联共、亲共人士。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改造，固然是因为受到了我们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亲眼目睹共和国北半部现实的过程中，他坚持了一辈子的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被强烈地激发起来，他的人性得到了最大的启发。

如果不考虑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和人性，我们就不会同在反共第一线上跟我们交过锋的崔德新携起手来；也不会同今天的南朝鲜执政者们进行对话。我们之所以为了用对话的方法统一祖国而同南朝鲜的统治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进行协商，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尽管是有局限性的——民族良心和人性寄以期望，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两者早晚会在民族团结的大花园里开出绚丽的花朵。

当时，我们就争取的对象和方法问题也进行了不少争论。尤其是关于以日军为对象的对敌政治工作的争论，没能达成协议。大部分同志都认为，伪满军的中下层是可以争取的，但从小就被灌满了“大和魂”，盲目崇拜“天皇”，习惯于强制性纪律的日本军人，是根本不可能争取的敌人。他们摇头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朝鲜独立军头领的反共思想尚且很难拔掉，何况是日军官兵呢！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否定了他们这种看法。

有一年，间岛的农村瘟疫蔓延，日军干下了把病人关在屋里活活烧死的暴行。患病的童长荣所在的村子，也闯进来了“讨伐”队。

一个日本军官看到躺在屋子里的童长荣，就马上命令部下把门

锁上放火烧。一个日本兵忙着准备点火。童长荣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便决心作最后一次宣传，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他用拳头敲着炕面，用他在日本上大学时学的非常流利的日本话，对那个日本士兵说：

你也该是工农子弟，为什么到这里来乱杀穷人？杀了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怎么能这样灭绝人性？哪有这样杀害病人的道理？

这一声敲击良心的呼喊，打动了那个日本兵的心。那个日本兵就把后门踢开，避开上级的眼睛把童长荣悄悄地放出去，然后才往房子上点了火。童长荣藏在垄沟里，才得以死里逃生。

这个事例把那些固执地主张日军不能作为争取对象的人的嘴巴给封住了。

从此，我们抱着信心，选拔一些坚定、勇敢、精明而强干的同志，大胆地派到敌军中去了。

许多有名无名的工作员在敌军中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坚守革命的节操，出色地进行了对敌政治工作。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伪满军和自卫团中几乎每天都发生哗变。

我们让所有的游击队员都作好准备，无论谁都能运用喊话、散发出版物、教唱歌曲等传播舆论的形式和方法，积极进行对敌政治工作。

我们积极进行对敌宣传，既在敌军内部进行，也在敌军外部进行；既用个别的方法，也用集体的方法。由于我们的这种热烈而富有感染力的宣传攻势，许多伪满军部队回避同我们游击队作战，成了我们忠实的“武器运输队”。

只要给伪满军寄去一封信，他们就给我们运来武器、弹药和粮食；在战场上只要对他们喊一声“要枪不要命”，他们就乖乖地交枪

投降。

敌人的“讨伐”队打进来大肆屠杀我们的人，可是我们俘虏了敌兵，不管他是伪满军还是日本军，都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亲切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还给路费放他们回去。这样一来，伪满军中甚至有被我们俘虏过七次的士兵。我们对他开玩笑说，你这个老兄又来啦。他就笑嘻嘻地回答说，我是来向革命军缴枪的。

我们在东满进行活动的时候，争取了汪清县罗子沟闻营长部队的连长等许多敌军连长级以上的军官。

1934 年钱连长打入南蛤蟆塘的马桂林部队，出色地进行了瓦解工作，他也曾是伪满军连长，后来受我们的影响，被改造成了共产主义者。

日军中也有很好地帮助了我们的难忘的朋友。

小汪清防御战斗时，吴白龙出去打扫战场，在一个日本侵略军汽车司机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张写给游击队的信。写信人是工人出身的日军汽车司机，是日本共产党员。他往车上装了十万发子弹来找我们车子开到游击区近处一个山脚时被敌人发觉了，于是他写下了这张遗书放进兜里后自尽了。

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精神，使万众深受感动。

他把可爱的父母妻子留在日本，渡过茫茫大海，越过险山峻岭来支援我们，却在中途无声无息地倒在异国的山脚下牺牲了。这位日本共产党员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据说，小汪清的人们以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命名当地的小学，不知现在是否还保留着那个校名。

后来，我们根据在额穆争取伪满军团长的经验，在安图——敦化交界的大蒲柴河，又灵活地进行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

大蒲柴河驻扎着在“讨伐”游击队方面臭名昭著的伪满军一个营。这个营战斗经验丰富，指挥体系和部队管理都很严密，是支极反动的部队。我们想派工作员打进去，可就是打不进去。为了找到空子，我们对这支部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果，了解到这个营的营长因为薪俸少，对上级不满，他因为手头紧，叫副官去做鸦片生意。这是我们能够对这支部队进行瓦解工作的有利线索。

有一天，我们的工作组埋伏在路旁，当那个副官买了大量鸦片路过的时候，把他抓来了。副官怕革命军抢走他们营长的鸦片(当时鸦片可以和货币一样通用)，非常担心。可是，我们的同志对鸦片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就放他回去了。副官为此深受感动，回部队后向营长汇报说：我们听信日本人的宣传，把共军当作“土匪”来看待，这次我见过他们才知道他们都是稳重、文明的人。营长听了，也十分感动。

后来，我们又通过那个副官给营长送去了我的名片和信。信中说，游击队不愿跟你们打仗；虽然你们对革命军做了很多坏事，可是我们无意算这笔账；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不要伤害老百姓，不要伤害人民革命军；你们如果愿意将功赎罪，同革命军友好相处，那就常常给我们送来《铁军》之类的出版物。

作为对这封信的回答，那个副官给我们带来了《铁军》杂志，并商量好了今后递送出版物的秘密场所。自那以后，他们定期地把在队内和队外发行的期刊和重要情报资料给我们放在一棵空心枯树的洞里。我们拿出钱托他们去替我们购买部队生活所需物品和军用品，他们也都照办。

伪满军营长被我们的好意深深感动，还自愿为游击队的伤员治伤。他把我们的伤员藏在兵营里，尽心款待，精心治疗，直到伤口

完全愈合。

那个营长认识到人民革命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加深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还给我写来了一封题为《告山中战友》的信。

崇尚真实，赞美情爱，是人本来的良心。

我经常对同志们强调说，敌人企图用欺骗、伪装、威胁和恐吓来瓦解我们的队伍，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必须以真诚和情爱来打动敌军的心。

牢记着我的这段话，认真做好了对敌政治工作的工作员中，有个叫任银河的年轻女游击队员。世人广为知晓的话剧《向日葵》，就是以她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

我和她初次见面是1936年春在迷魂阵密营。

当我们讨论有关组建朝鲜人民革命军一个新的师和筹建祖国光复会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时，她想到自己也将跟着我们到白头山地区去，高兴得有些飘飘忽忽的。

她是个文静、刚毅、俊俏可爱的姑娘。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身材像小女孩一样矮小。

“将军，这回可一定带我去啊!”

她一见到我，就缠着要我把她收进我率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

可是，为了照顾病弱的魏拯民，我们还是把她留下了。

姑娘要跟着我们到祖国去的希望破灭了，眼里霎时汪满了泪水。

我安慰她说：

“你不要太难过。我们到白头山方面去站住了脚跟，就来把魏拯民同志接去给他治病，那时你就可以一同去了。”

“将军，我知道了。请不要为我操心。”

她反而安慰着我，可她自己却像泄了气似地，呆呆地凝望着南方的天空。

几天后，我们离开迷魂阵，到小富尔河附近宿营。在这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偏僻山村，我们遇到了意外的不幸。凌晨，驻在大蒲柴河的敌人突然向这个村子扑过来了。

我们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打击敌人，可是在山沟对过宿营的同志们却没来得及转移。魏拯民和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新派到我们这里来的李主任、曹亚范的爱人和任银河还都在一座房子里。

我们在击退敌人后搜查战场时，在那家天棚里找到了魏拯民。他大腿受伤，伤口还在流血。由于这天魏拯民病情恶化，无法动弹，任银河好不容易才把他隐蔽到天棚里，然后自己跑到山上去躲避，不料腿被打伤，被敌人逮捕了；而曹亚范的爱人和李主任则牺牲了。

敌人把任银河带到驻扎在大蒲柴河附近的伪满军连队里。起初，日本指导官对她严刑拷打，要她说出秘密，可是未能得逞，便改变战术，叫她做洗衣做饭等杂活，企图用哄诱的方法套出她的秘密。

任银河虽然只身陷在敌营中，却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终于想出了争取伪满军全连投诚的大胆计策。

她决心先用她优美的歌声来打动那些在痛苦的士兵生活中性情变得怪僻的男子汉的心。她为了多和伪满军士兵接触，故意把晾衣绳架在兵营院子里，经常到那里去一面拾弄晾上的衣物，一面唱能够勾起人们乡愁的悲歌。

那时我们有专门为对敌政治工作编的好歌曲。这是一首古代的悲歌，原是一个妇女为被强征去修筑万里长城而死在那里的丈夫唱的。我们给这支悲歌的曲子配上了革命的歌词。

有军官在场的时候，任银河就唱别的普通歌曲；而在士兵面前，

她就唱这支歌。

原来，这个连的士兵过去是救国军，后来因为头领叛变，才被编入伪满军的，因此士兵们的反日情绪都很强。

任银河那优美动听的歌声，打动了士兵们的心。连军官们听了她那充满哀愁的歌，也茫然地遥望着天空，陷入沉思。

称赞被俘的游击队姑娘是个好歌手的风声，很快就传开了，有些士兵还特意来找她，请她为他们唱支歌：

“游击队小姐，给我们唱支歌听听吧。”任银河微笑着回答说：“唱歌也不是什么要花本钱的事，要我唱一百遍也可以。”然后就清清嗓子，凄切地唱起来。那凄婉的歌声满含着在日本鬼子的迫害下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的仇恨。

古时候，修筑万里长城的苦役埋葬了无数中国民夫，如今日本鬼子的刀枪又在堆砌我们的坟墓。起来吧，前进吧！为洗雪中国人的怨恨……

姑娘唱着唱着，不由自主地淌出了眼泪。那些魁梧粗犷的士兵，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任银河不仅给士兵唱歌，还给他们缝补军衣，常常把他们喜欢吃的食物留下来分给他们吃。

在这过程中，任银河和士兵之间建立了亲密的感情。这些士兵中有几个把她当姐姐爱戴的小兵。他们是早年失去了父母，流浪乞食，后来为了混碗饭吃才当了兵的。

任银河也无微不至地关怀这些孤独可怜的小兵。这些从未体味过骨肉之情的小兵，不知不觉间竟把她当作亲姐姐、亲妈妈了。

有一天，其中三个小兵来找她，要求她跟他们结拜为义姐弟。他们说：

“银河是我们的大姐。只要是为了姐姐，我们做弟弟的，生命都可以豁出去。”

这些小兵的誓言恳切而严肃。

银河一口答应下来，热情地握住他们的手说：

“只要是为了弟弟们，我这个姐姐也不惜献出生命。”

银河以他们为骨干进一步扩大义姐弟的队伍，逐渐把它发展成为反日会组织。同时，为了起事，还接近了连长。连长也是救国军出身，看到日本指导官专横，心里总是愤愤不平。

任银河敏锐地抓住他的这种情绪，有一天去找他，有声有色地专门对他讲了许多向游击队投诚的伪满军军人的生活，然后大胆地提出：

“连长，你也带部下投诚吧！”姑娘这突如其来的提议，起初使连长十分惊慌。“你们这样给人当牛作马，受欺压，要挨到什么时候啊？连长，你最疼爱的士兵老王，昨天不是被那个日本指导官打得死去活来吗？可是，你对那日本鬼子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任银河见连长怒火中烧，随即单刀直入地说：

“快些投诚吧！我可以帮助你，你的部下都是我的义兄弟，都是反日会会员。”

连长惊异地望着目光炯炯的姑娘，心想这个小小的游击队姑娘其间都做了些什么事啊！矮小的身材，却有如此大的胆量。这使连长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生为男子汉，真惭愧啊！”连长只说出这么一句话，就像逃跑似地离开了姑娘。

第二天，受任银河影响的士兵发起集体的抗议斗争，要求发放拖了六个月的军饷。日本指导官却对士兵代表拳打脚踢，破口大骂。

银河认为这正是决定性的时刻，便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号召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处决那个凶狠残暴的日本指导官吧！

抛开这耻辱的伪军生活，跟我一起去投抗日游击队吧！

伪满军士兵响应她的号召，处决了日本指导官，迅速排成队，启程去找抗日游击队。他们带的武器弹药有三挺捷克造机枪、十九支步枪、一支手枪和四千七百多发子弹。

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争取到敌人一个连投诚，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文件中也写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异的事件。

任银河是按照我们的意志，以真诚、情爱和共产主义者的度量引导伪满军士兵走上了正路的游击队之花，是胸怀宽广的朝鲜的女儿。

从 30 年代后半期起，我们的对敌政治工作就更加活跃了，革命组织甚至打入了最反动的靖安军。还有不少自卫团和伪满军警是由我们的组织掌握的。因此，在光复祖国的对日作战中，伪满军大都掉转枪口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自行解散了。

非正义的军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和伪满军落到这般可耻的下场，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人生道路，不管是笔直的还是曲折的，也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总是要走向正义和真理的。

我至今还不知道我在额穆结识的那个伪满军团长的生死安危。但是，我深信不疑，那位团长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如果还活着，一定会为自己的祖国和中华民族忘我奋斗的。

三　在镜泊湖畔

满洲首屈一指的名胜镜泊湖的南岸有个小村庄叫南湖头。南湖头，即以其坐落的位置而得名。湖北岸的村庄叫北湖头。沿着流入镜泊湖的小家琪河往上游走几十里地，就是一处很深的峡谷。峡谷一面的山坡上有两座旧原木房。其中一座就是 1936 年 2 月我们当会场用过的房子。

听说现在那里草木丛生，连房址都很难找到。但在五六十年前，那座房子的前面有一棵大岳桦树和一棵海松，成了给前来开会的人指路的目标。我们在 30 年代后半期的历史，就是从这座我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小家琪河原木房”的房子为起点的。

我们结束第二次北满远征后来到这个地方，是 1936 年 2 月中旬，立春已过而雨水未到的时候。按节气说，已经是春天了，但北满的严寒仍然疯狂肆虐，骇人的大陆风无情地吹打着我们。镜泊湖里不时地发出冰块崩裂的声音，小家琪河岸的密林中阵阵传来柞树、檀木冻裂的巨响。这个地方的寒冷不知有多么厉害，就连那些能干的炊事队员在露天烧饭，没有不烧出夹生饭的时候。锅里的米，底下的烧煳了，上面的却抵不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怎么也烧不熟。北满是我一生中吃夹生饭最多的地方。

抗日大战开始以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年。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成长，斗争前景也很乐观。经历了曲折与艰险的抗日革命，正在朝着新的转折点奋勇前进。

远征结束后，我不待消除征途上的疲劳，就加快脚步奔向了指定同魏拯民会面的南湖头。一路上，我心中想着革命的未来，思绪万千，无法平静。

别说整个远征北满期间，就是远征结束后住在小家琪河的时候，我也一直望眼欲穿地等待半年前去了莫斯科的使者们回来。

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议，由魏拯民提交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形式上是有关在东满除掉了几千名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民生团”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朝鲜革命的主体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问题：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朝鲜革命的口号进行斗争，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制原则矛盾不矛盾。以现在的思想方法看，这都是不言而喻，无庸置辩的。但是当时在有共产国际、有不可违逆的一国一党制原则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容轻易判断是非的复杂而严肃的难题，也是决定我们生死命运的重大问题。

某些人挥舞着一国一党制原则，说朝鲜人提出朝鲜革命的口号是与共产主义者的称号不相容的异端邪说，是反党的宗派行为。他们的这种论调，是令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的。他们的意思是：共产主义者就是国际主义者，怎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俘虏，只埋头考虑自己的那个连党都没有的故国，而不想为自己的党籍所在的国家的革命献出一切呢！这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亮出“保卫祖国”的招牌是一样的立场；列宁早就谴责“保卫祖国”论者，把他们规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叛徒、敌人；你们朝鲜共产主义者如果继续坚持朝鲜革命论，就会被判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因此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当然，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怎么操心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我对魏拯民要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结论大体上心中有数的。这是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魏拯民也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我深信，对我们就朝鲜革命的根本问题提出的意见，共产国际的干部是会给予应有的肯定答复的。

我之所以确信共产国际会站在真理的一边，正大光明地体谅我们的苦衷，固然是因为我坚信我们通过魏拯民提交到莫斯科的问题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符合革命原则和革命利益的，同时也同当时共产国际正寻求新的路线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1919 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只有一个俄国共产党。虽然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的革命左翼势力在组织共产党，但它们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还很不成熟，还没有壮大成为足以负责进行本国革命的一支力量。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砍断资本的锁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但它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失败了。尽管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形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但各国的主体革命力量还没有成长壮大到足以压倒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程度。

这种情况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以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和俄国共产党为轴心，重新改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组织上加强这一运动。它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要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个国家的党和革命运动必须绝对服从于国际中央的指示。

由于对这一要求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在部分共产主义者中就出现了离开本国革命的目的和民族利益，盲目遵从莫斯科的事大主义倾向，结果各国革命运动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尽管这样，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各国的革命运动还是有了发展，各国的革命力量还是有了壮大。各国共产主义者开始作为能够独立进行本国革命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了。

自20年代初起，在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陆续出现了共产党；在这些党的领导下，民族解放斗争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在这过程中，许多国家的党开始有了发言权，要求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党的路线的呼声高昂起来了。共产国际坐镇莫斯科，把着世界革命的操纵杆，给分布在各大洲的国家及时开出切合他们具体实际的处方，根据千变万化的形势和条件驾驭和领导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由好多国家的人联合组成的共产国际，在制定和下达路线、政策方面，是难免受到一定限制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斗争方面，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是必要的。革命是不能输出和输入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紧紧地团结成统一的力量。这种情况、这种迫切要求，使各国共产主义者深切地认识到了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政策时必须树立主体、坚持各个党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性。这种发生了变化的形势，是使共产国际承认朝鲜革命的主体性的重要保证。

魏拯民于1935年夏天经珲春赴苏联时跟我约好，他回来时经由哈尔滨或穆棱到宁安来跟我会晤。因此，我们一结束额穆远征，就开往了宁安。

我们加紧朝南湖头行军的前后，是国际上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性日益增大的时期。西班牙内战，由于法西斯势力公开的武装干涉而开始变成了带有国际性质的热战。在东方，日本列岛变成了新战争的策源地。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一天比一天加深。继1932年“五·一

五”事变之后，斋藤内阁成立了，政党内阁下台，军人内阁取而代之。自此，日本毫无顾忌地向全世界发出了“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样的叫嚣。

日本的法西斯趋势，随着在我们举行南湖头会议的前夕即 1936 年 2 月 26 日发生的事件达到了顶点，导致了少壮派军人的海外扩张主义开始变为现实的令人气闷的局面。当时，参加叛乱的青年将校和一千多名士官与士兵袭击首相和许多大臣的官邸，杀害或打伤了内大臣、大藏相、教育总监、侍从长等政府要人，占领了警视厅、陆军省、参谋本部、陆军相官邸，控制了“日本政治的心脏”。

在“尊皇讨奸”的口号下发动的这场武装叛乱，第四天就被镇压，主谋分子被处以死刑，至此，政局才归于平静。然而这一事件，却成了预示日本军国主义将飞扬跋扈的危险信号。

以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表现出来的日本军部内部矛盾的产物——“二·二六”事件，证实了日本的法西斯化和靠军部专政确立军国主义体制已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国内的蠢动，蕴含着向新的战争和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发展的危险性。

我们高度警惕地注视着日本的这一事态发展，预料着它的后果，重新审核了我们的斗争战略。叛乱虽然失败了，但它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多么强横地参与他们国内的政治生活，多么猖狂地开辟着对外侵略的道路。事实上，从那以后还不到一年半，日本就正式发动了中日战争，朝着更大规模的侵略狂奔急驰了。

日本的法西斯化，加速了殖民地朝鲜的窒息过程。在朝鲜半岛，他们为扼杀朝鲜的一切、消灭一切形式的反日运动和反日因素，发动了疯狂的大歼灭战。不说日语讲朝语、不穿有色衣裳穿白衣、不挂“太阳旗”、不去参拜神社、不背诵“皇国臣民誓词”、不穿木履……

一概视为反日、叛逆、反国家的罪行，给予惩处，加以罚款，抓去坐牢。

昨天的爱国志士被扼杀民族的狂风恶浪吓破了胆。他们为了苟全性命，竟然昧着良心，高喊着“同祖同根”“内鲜一体”，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那是一个爱国则亡、卖国则昌的岁月，整个朝鲜在走向死亡。

朝鲜在走向死亡！这一令人肝肠寸断的现实就是我们非开赴白头山不可的最迫切的理由，它要求我们上白头山去证实朝鲜还活着，朝鲜还在战斗，朝鲜必将光复。

南湖头会议前后，在国际和国内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变化。

那些国际事件使我们受到了沉重的压迫感，但我们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反而抱定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腹地，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行军是艰苦的，疲劳是难忍的，但是，一想到在白头山地区驰骋的日子近在眼前，队员们就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我们听到与镜泊湖有关的珍珠门村庄的故事，并对这故事的寓意进行了争论，记得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故事的情节是很有意思的。

古时候，镜泊湖畔有个村子叫做珍珠门，村里住着贫穷的父女二人。女儿不满二十岁，十分美貌，堪称国色，远近的年轻小伙子都渴望着跟她定为百年好合。

姑娘的父亲有一种神秘的本领，能够把千丈深渊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天，他对女儿说：

“前些日子我去钓鱼的时候，看见很深很深的湖底有一面金制的镜子。要捞出那面镜子，就得先打死长了三个脑袋的妖怪；要打

死那妖怪，就得有一个勇敢大胆的助手。这几天，我正为寻找一个能当这样助手的人，费着心思呢。”

极为孝顺的女儿说道：

“要是有个能够帮助父亲捞上那面金镜子的小伙子，我情愿嫁给他。”

父亲十分赞赏女儿的提议，于是向邻近村庄的人们宣布了他女儿的许诺。听了这个消息，委实来了好多小伙子。但是他们仔细听了姑娘的父亲打捞金镜子的计划后，都望而却步了。这时候，有个姓杨的年轻后生自告奋勇，说自己要当这个助手。姑娘的父亲当即表示了同意，并且说好，只要打捞金镜子成功，就把女儿嫁给他。

一天，天朗气晴，万里无云，老人领着杨家后生来到湖畔，把一条小船靠在岸上。然后，他把大中小三口宝剑交给杨家后生说：“我头一遍浮到水面上来的时候，你要交给我短剑；第二遍浮上来，你要给我中间的剑；第三遍浮上来，就要把长剑给我。要记住，交剑时动作要像闪电一样快，绝不要害怕。捞上金镜子以前，中途吓跑的话，别说我活不成，你的命也保不住！”

后生回答说：“大伯，这个没问题，请放心。”

老人立即跳进湖里。后生坐在船上注视着湖底，姑娘在岸上注视着小伙子。片刻后，老人苍白的脸倏地冒出了水面，后生立即把短剑递给了他。老人接过短剑又沉到水下去了。霎时间，湖水的底层开始翻滚起来，老人提着一颗人头大小的血淋淋的鬼头浮上来，接过第二把剑又钻到湖底去了。不一会儿，湖面掀起了惊涛骇浪，仿佛要吞没那只小船似的。只见变得血肉模糊的老人，这回提着一颗有马头那么大的鬼头浮上来，接过第三把剑，再次跳入了波浪滔天的大湖。此时天上雷鸣电闪，湖上巨浪排空，后生所乘的小船在

浪涛中剧烈摇摆，看去马上就要翻了。岸上的姑娘眼看着这个情景，心急如焚，手捏一把汗，不知所措。后生终于吓坏了，他忘记了对老人许下的诺言，也忘记了对姑娘的倾慕，使出全力把船划到了岸边。岸上的姑娘被激怒了，她厉声呵斥后生，终于说服后生掉转了船头，并且自己也跳上船划回湖心去找父亲。不一会儿，风停了，浪也息了，然而父亲再也没有浮上来。姑娘和后生声嘶力竭地呼唤着父亲，不管怎样呼唤，已成水底孤魂的老人再也不能回答他们了。姑娘淌着眼泪责骂那个背约负心的后生。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年轻人的身影也在雾霭中无影无踪了。

这个传说，额穆人说的是一个样，宁安人说的又是另一个样，各地的说法彼此有所不同，但情节大致都是这样的。看来，镜泊湖这个名称也可能是由这个珍珠门的传说而来的。这传说，使我们对人世间的情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想了许多。当时，我们的同志们都骂那个后生是无情无义的胆小鬼。这个传说给我们留下了长久的回味，以至于每当队伍里出现懦怯分子的时候，队员们就骂他是个“镜泊湖的杨家后生”。

为了完成处在生死岔路口上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向我们提出的历史使命，当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为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我决定在开往白头山之前在小家琪河召开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

2 月中旬，我一面等待去莫斯科的使者们回来，一面动手起草会议报告。某一天傍晚，快要写完草稿的时候，有人不声不响地推开了原木房的门。我一看，魏拯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他颇为抱歉地说，因为治病住了几个月的院，回来晚了一些。尽管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但他能够康复而归，确是值得庆幸的。许

是因为在莫斯科住了一段的缘故吧，他的身体壮实多了。未曾细谈，我就从他的外貌和怡然自得的表情上，预料到他的莫斯科之行是有好结果的。

魏拯民的归途很不顺利。他乘火车经由哈尔滨到达宁安，会见了周保中第五军的同志们之后，就接着前来南湖头。在路经湾沟村附近时不幸碰上了巡逻的警察。警察盘问了他几句，觉得很可疑，便要带他到警察分署去。魏拯民的行李里装有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如果被拉去查出来，一切都完了。于是他掏出五十块钱，塞给了警察，才好不容易摆脱了危险。

魏拯民开玩笑说，他原以为自己的身价有几万元，没想到实际上却只值五十块钱。

他一反常态，提议说：

“金日成同志，让我再握一下你的手吧。”

我不禁感到惊诧，便道：

“不是刚握过手嘛，还要再握？”

“有值得祝贺的事嘛。这可是很有意义的握手啊。请你高兴吧，金日成同志！共产国际接到你的意见后，经过慎重讨论，作出了承认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完全正确的结论，并支持你的意见，作了几项重要指示。所有问题都按照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愿望得到了解决。”

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猛地搂住他的两只胳膊：

“是吗？”

“是的。共产国际指出，在反‘民生团’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东满党的工作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对这个问题，共产国际负责干部和驻在那里的中共代表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承认并且支持说，朝鲜共产主义者直

接负责进行朝鲜革命，是绝不能让给任何人的神圣权利。共产国际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今后要分工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者搞中国革命，朝鲜共产主义者搞朝鲜革命。”

不知为什么，魏拯民突然把话打住，说不下去了。我看出，他沉浸在一种深深的内疚和悔悟之中。可能是在回忆过去脸红颈涨地各自论证各自主张的正确性的往事吧。在大荒崴和腰营沟的会议上和会场外，我们曾进行过多么激烈的争论啊！

如今，由于魏拯民的莫斯科之行，那么错综复杂的问题全都顺利地、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解决。

有关魏拯民莫斯科之行的资料，说他的任务不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而是以学习与考察为目的，率领十名地方党团干部由珲春出发的；又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汇报“民生团”问题；此外还有别的一些资料，但都不符合事实。共产国际档案室里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有关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

魏拯民说，他一到莫斯科，就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关于满洲游击斗争的具体文字材料，标题为“冯康报告”。他在莫斯科时除了用魏拯民这个本名外，还用了冯康这个别名。

有关反“民生团”斗争进行得过左的问题的材料，说法不一。有的材料指出，反“民生团”斗争搞得极左的责任在于魏拯民；而另一些材料则指出，自从魏拯民被派到东满特委当了书记之后，才开始纠正反“民生团”斗争的偏差。

我并不认为反“民生团”斗争的所有严重后果的责任都在于魏拯民。

老实说，1934 年冬，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作为省委巡视员来

到东满的初期，碰上“民生团”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时摸不着头绪，惊慌失措，是事实。那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囿于老一套的思想方法，认为革命组织和游击队内部既然有很多“民生团”分子，就必须彻底肃清。后来他坦率地说，起初他也曾怀疑过大部分朝鲜人好像都是“民生团”。

就拿他在共产国际汇报我们情况的材料来看，也可以看出他的话大体上是真实的。他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金日成，朝鲜人，勇敢而积极。中国话很流利。是游击队出身。说他是‘民生团’的供词很多。他喜欢和队员们谈话，颇受队员们信任和尊敬，在救国军中也深受信任和尊敬。”

不管怎样，他虽然在起初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还是去莫斯科要来了共产国际关于“民生团”问题的正确结论，对纠正肃反斗争的极左错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样评价是对的。事实上，在大荒崴会议时，他对我的关于“民生团”问题的立场是表示了理解的。

他超越民族观念，向共产国际正确地报告了东满的实际情况，并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解决了所有问题，这是值得感谢的。

“谢谢。谢谢共产国际，更谢谢你魏拯民同志，你拖着病弱的身子到莫斯科去为我们付出了辛劳。这个恩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这是我真诚的见面礼。

魏拯民说我过奖了，并且很不好意思地说：

“东满特委及其属下的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犯了看问题太狭隘、处理人的命运过左的严重错误。事实上，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受了冤枉。对于没有正大光明地进行反‘民生团’斗争的问题，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共产国

际也作了深刻的批评。”

我认为魏拯民的话是真诚的自我反省。

“老魏，共产主义者也是人，怎么能不会犯错误呢？‘民生团’问题搞得复杂的根本原因，我倒认为在于日本鬼子的民族离间政策。”

“对。归根结底，我们上了敌人的当，闹出了骨肉相残的悲剧。自己人打了自己人嘛……”

魏拯民接着说：“我初到东满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朝鲜人主张间岛是他们的，想收复间岛，你千万要警惕，他们一定会依仗日本鬼子的势力来侵占间岛的。起初，好像我也多少听信了这话。”说罢，他苦笑了。

我望着魏拯民的脸，产生了某种恻隐之心。

“老魏，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嘛！别再提过去的事啦。老实说，在送你去共产国际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相当沉重的。可是当你表示诚恳地接受我们的建议，并且表明一定要认真负责地把它转达给共产国际的时候，我相信你是诚实可靠的。”

“谢谢，我也相信你是会信任我的。”

共产国际作出明确的结论说：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朝鲜革命的口号不是过错，这是共产国际应当交给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是一国一党制原则也不能剥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权利。

我的心情犹如鸟儿从笼子里飞出来，赢得了尽情翱翔于蓝天的无边的自由。我们已经有了翅膀。有了翅膀，朝鲜革命就有飞跃发展的前途了。

魏拯民还给我们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当时共产国际面临的燃眉之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强有力地开

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大利和德国为轴心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法西斯主义，这使许多欧洲国家发生了阴森可怖的政治变化，给人类带来了新战争的乌云。由意大利墨索里尼炮制的“法西斯党”开头的法西斯主义，到了德国的希特勒和由他炮制的纳粹党达到了狂妄不可一世的地步。

法西斯主义鼓吹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促使德国变成了引起新的世界大战的祸根。法西斯主义的极端的反共思想同反犹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古今内外所有反动思潮中最凶恶、最危险的思潮。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等一系列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为不可忽视的势力登上了舞台。

德国大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像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独裁者强有力的铁拳，才能克服德国所经历的一切危机，才能压制共产主义，实现德意志帝国的复兴。

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作为第一项工作开始了反对德国共产党的阴谋活动。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臭名远扬的国会纵火案，就是由这一阴谋策划出的举世罕见的鬼把戏。

希特勒和戈林之流在放火烧毁国会大厦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以这次阴谋的可耻失败而落空。他们虽然通过这一阴谋，把共产党打入了地下，使国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存在，但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最反动、最露骨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德国法西斯匪帮在全世界面前被打上了挑衅者、独裁者、战争狂人的烙印。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猖獗，唤醒了进步人类。

面临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爆发新战争的危险，共产国际提出了

防止共产党与社会党分裂，以统一的步调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战略任务。这样，就在国际上蓬勃地展开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

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附属国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则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全民族的力量团结成统一力量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形式开展起来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从这样的战略目标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

魏拯民说，他对季米特洛夫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印象很深，对季米特洛夫产生了崇敬之情。

我们认为耸动世界视听和进步人类所注视的莱比锡法庭的主人公季米特洛夫，是当代的巨人。他的关于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号召，以强大的力量抓住了进步人类的心灵。

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接替苏联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马努伊尔斯基占了共产国际的首位，这可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一种象征，是表明共产国际进入了根据独立自主的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进行工作的新时代的生动事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在相当程度上允许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这可以说反映了这种时代的要求。

大会完全承认了朝鲜共产主义者进行朝鲜革命的权利和责任，这的确是值得庆幸的大事。

我听着魏拯民的归国报告，更加坚定了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和对我们路线的正确性的确信。魏拯民交给了我们一份载有杨松撰写的文章《关于满洲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机关刊《共产国际》和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王明和康生联名的共产国际致吉东地区负责

干部的信。

他说这些文件都具体说明了共产国际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

杨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尽早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提出中、朝、蒙、满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还强调指出，中朝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推翻日本傀儡满洲国的统治，建立间岛朝鲜民族自治州，让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队作为中朝反日联合军之一，为朝鲜民族的独立而斗争。杨松就是我在第一次北满远征时在周保中的窝棚里会见的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平。

共产国际不仅给了我们精神上和路线上的支持，而且还给了我们行动上的支持，即给我们指出了有助于我们今后能够大力推进朝鲜革命的几项措施。其中的一个指示，是要把至今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的反日游击部队分成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进行重新整编。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有关朝鲜共产主义者对朝鲜革命的责任和权利问题的核心，对坚持朝鲜革命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满洲所有游击部队中把朝鲜人都调出来组成纯粹朝鲜人的部队，那么只用这支力量也能够同驻朝鲜的日军两个师进行血战的。如果我们用以一当十的精神同日军进行血战，那么朝鲜青年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如果他们都同我们联合起来，那么战局就会发生变化，祖国的光复就会大大提前。

然而我们作为多年来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进行了联合抗日的共产主义者，是不能背弃兄弟的情义和战友的道义的。

如果只顾对自己有利而全部抽走朝鲜人的话，那么朝鲜族军事人员占百分之九十的第二军这样的部队，就会自行瓦解的。

除第二军外，其他游击部队虽然大半数是中国人，但他们大部分是反日部队出身，没有多少共产主义者，而且不管哪个部队，指挥员大多数是朝鲜人，各部队的骨干也都是朝鲜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朝鲜人和中国人分开，各自建立各自的部队，那么，抗日联军部队马上就很难维持了。

自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组成抗日联军，在反满抗日的旗帜下组织进行了共同斗争，从而卓有成效地发展了抗日武装斗争。不能因为在新的形势下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要挺进到国境地区主要致力于朝鲜革命而削弱同中国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共同斗争。

正当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针对法西斯分子联合起来的势力，把支持人民阵线的所有进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将朝中抗日武装部队分成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是不符合时代趋势的，也是违背道义的。

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如果把朝鲜人分离出来另行组织部队，那么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也会不如从前的。

我们所要求的是自主的权利，而不是分权。我们要求的是承认并尊重朝鲜人不受限制、不受束缚、不受妨碍地进行朝鲜革命的自主权利，而不是要划分势力。

对这一点，魏拯民等中国同志当然也很清楚。可是看来魏拯民以为他从莫斯科回来能送给我的最大礼物是这个分权。他一再问我，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研究一下按民族分别组织部队的方案好不好。

“魏拯民同志，我充分理解你的心意。可是我觉得看问题不应该只看一面。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本着革命的原则，从阶级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朝鲜共产主义者谈论本国革命，绝不是为了某种狭隘的民族利益。我们认为革命的民族利益任何时候都应当同国际利益相结合，而且也绝不会有违背民族利益的任何国际利益。如果这样看问题，我就不能不慎重地考虑：照旧保留多年来在同一个战壕里联合作战的统一的武装部队——朝中抗日部队更有利于革命呢，还是按民族分开更有利于革命？

“要把抗日武装部队按民族分开，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尊重朝鲜共产主义者而提出的，可是我们看问题不应只顾形式。再说，我们虽然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起进行斗争，但实质上是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活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搞形式上的分离是没有必要的。”

魏拯民掩饰不住高兴，却以担忧的口气问我：

“那不就等于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从道义上看，我们也没有权利把朝鲜同志拴在抗日联军部队里啊。”

“这倒不用担心。我的意见是，仍按联军体制进行活动，只是我们到了朝鲜国内和东北的朝鲜人聚居的地方时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到了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就用抗日联军的名称。这样，不就既保持了联军体制，又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么？你看怎么样？”

“谢谢你，金同志，我还没想到你会如此宽宏大度地表示谅解。朝鲜共产主义者以这样的度量对待这个问题，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莫大支持。”

我笑着握住魏拯民的手，说道：

“老魏，我们共同斗争已不止一两年了，而且将来也不会共同

战斗一两年就分手的，不是吗？只要中国仍然是我们的邻邦，是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我们的友谊将是万古长青的。”

“谢谢，金同志！我能和你这样的朝鲜同志战斗在同一个队伍里，是我的光荣。往后，我很想做金日成司令的政治委员，愿意和朝鲜同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帮助朝鲜革命。”

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欢快地笑了。

在南湖头同魏拯民会晤以后，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魏拯民也常常对自己过去的失误表示歉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满洲地区党的组织体系进行了调整，他调任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委员。可是他长期不在中国同志指挥的部队，而在我统率的部队里进行活动。正如他半开玩笑说的那样，他算是当了我指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委员。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总是愿意和我在一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官方资料说魏拯民(魏明胜)是我的政治委员，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和我一起长期驻在长白地区，也多次来过白头山秘密根据地。

自从南湖头会议以后，他对我们提出的路线或建议几乎没有表示过反对。

由于反“民生团”斗争而一度经历了考验的朝中共产主义者的联盟，到南湖头会议的前后，迎来了新的阶段。

从此以后，我们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及中国反日力量共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一面推进了朝鲜革命，一面积极支援了中国革命。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互相支持、互相团结的历史，就是这样从 3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中国有位领导人在评价朝中人民的这一兄弟友谊和互相支持时说，朝鲜人民对中国的支持是细而长的，中国人民对朝鲜的支持则

是粗而短的。我认为这是对我国人民作为小国人民长期支援了兄弟中国人民的业绩所作的由衷的评价。

同魏拯民的会见，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正因为他的莫斯科之行在扫除横在朝鲜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至今一直很感激他。

这里有一桩使我和魏拯民的会见更加难忘的轶事。

当我们为举行军政干部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某一天晌午，传令兵跑进来说，有一只大老虎正在威胁我们的了望哨，请允许开枪打它。他说，他们在监视条件好的一处陡壁顶上设了个了望哨，可是那个陡壁下面有个老虎洞，洞里有一只大老虎和两只小虎。哨兵们怕老虎，本想把了望哨挪到别的地方去，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加上那只老虎也没有要伤害人的动静，所以凑合着过了一些日子。可是从昨天起，那只老虎突然发起脾气闹得很凶。

我想，老虎突然发起脾气来，总是有缘由的。于是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从陡壁顶上往下一看，果真有一只很大的老虎卧在洞口前面。据了解，是我们的哨兵惹怒了老虎。他们在洞口看到晒太阳的小老虎，便逗它们玩，一个战士不小心被虎爪抓破了手背，于是当作逗乐子，轻轻地打了两只小老虎的嘴巴。不料被觅食而归的母老虎看见了。从此以后，母老虎暴跳如雷，每天都怒吼着朝了望哨跳跃，直蹦到相当高的陡壁中腰。

“没什么可怕的。老虎这样逞凶，是怕你们害它的崽子，向你们显示它的威力，等于警告你们，如果再来欺负它的崽子就绝不饶你们。老虎也不愿跟带枪的人作对的。你们放心好了。”

我这么一说，哨兵们才取消了打老虎的念头。他们决计要和那只凶猛的山中之王和睦相处了。作为第一着，他们往峭壁下丢了一

条饱子大腿，然后一连几天扔给它们一些吃食。果不其然，老虎就停止了示威，成了哨兵的友好邻居。据说，我们离开南湖头转移到白头山地区之后，留在这个地方的人民革命军队员们仍继续保持了同这只老虎的“睦邻关系”。

据林春秋说，最初发现这个老虎洞的，是驻在大家琪河谷的崔仁俊的连队。大家琪河谷里有医院、兵器厂、通讯处等等，后勤部门的人也驻在那里。

1935 年年底，林春秋接到我们的通知，由汪清出发找远征队来到了南湖头一带，一时利用小沟的一所空草棚开医院医治患者，后来在大家琪河岗子上发现了更好的地方就搬到了那里。草棚就是隐居山中的人住的。他们大都年轻的时候进山，独自一人在这草棚里离群索居过日子。他们的生业就是打猎、采草药、种鸦片。他们大都长寿。长寿者也要归天的。他们那孤独的人生一告终，那个草棚就变成无主的窝棚空下来。

林春秋的医院不仅医治了我们的游击队员，还医治了第五军的伤员。汪清团参谋长柳兰汉就曾在这所医院治病，后来在这里病故。

崔仁俊指挥的汪清三连肩负着保护他们、供他们给养的任务。有次三连为获得武器和粮食袭击了驻在附近的一个伪满军兵营，缴获了一百多支步枪。他们在选择保管武器的地方时，在设有医院和通讯处的岗子下面的峭壁上发现了一个岩洞。崔仁俊就把那一百多支步枪存放在这个岩洞里，再用石头草草地堵住了洞口。他们下山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个岩洞，就是那个老虎洞。

我每当回亿南湖头会议的时候就想起魏拯民，也想起在那次会议期间成了有趣的插曲的大家琪河密营的那只老虎。

1936 年 2 月下旬起，我们在小家琪河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举

行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又称为南湖头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魏拯民等中国同志和金山虎、韩兴权、崔春国、全万松、崔仁俊、朴泰化、金丽重、林春秋、全昌哲等朝鲜同志共三四十名军政干部。去过共产国际又在苏联的医院治过病的尹丙道也出席了会议。他在小家琪河心情激动地遇见了分手好几个月的魏拯民。

魏拯民向与会者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我们在大荒崴和腰营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和指示。

与会者一致向拖着病体去莫斯科取来好的结论的魏拯民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我在报告中总结了30年代前半期我们在豆满江沿岸地区开展的军事政治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加强和发展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任务和执行这个任务的新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提出了关于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挺进到国境一带和白头山地区、把武装斗争逐步扩大到国内的方针，进一步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方针，积极推进建党准备工作的方针，把共青同盟改编为反日青年同盟的方针等把抗日武装斗争及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整个朝鲜革命引向大高潮的新的途径，并提交会议进行了讨论。

发言的人对报告提出的各项方针一致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和赞成，几乎没有发生争论。自从开始抗日革命以来，我主持过许多次会议，但从没有看到过会议对路线问题的讨论如此顺利，与会者的情绪如此高昂。这是一次在笑声中开始、在笑声中结束的会议。与会者们盼望着挺进白头山的日子，盼望着挺进国内腹地同敌人展开决战的日子，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发言。

挺进白头山，挺进国内腹地，这是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

把所有力量总动员起来，用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路线。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关于挺进白头山，增强主力部队，首先掌握国境地区，进而把我们的斗争舞台扩大到国内腹地的方案，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绝对的支持和赞同。

只要我们把白头山建成一个根据地，在国境地区和国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把光复祖国的曙光带给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军事法西斯统治下的我国人民，就能给一日千秋地渴望看到我们革命军一面的两千万同胞以胜利的信心。这将是胜过千言万语的有力的示威。

会议通过了我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祖国光复会，促进建立共产党的工作。

以南湖头会议为分水岭，朝鲜革命迎来了新的高涨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南湖头会议是划分 30 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朝鲜革命的分水岭。由于有了南湖头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朝鲜共产主义者便树立了能够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把整个朝鲜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新的里程碑。

南湖头会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一次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第一次完全确立了主体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后来在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使朝鲜共产主义者坚持了主体立场，在任何逆境中都把自主性当作民族的第一生命坚持下来了。

南湖头会议也可以说是一次胜利者的庆典。这一胜利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祖国、为人民、为历史、为时代献出无数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由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派别斗争、朝鲜共产党的解散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民生团”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曾被共产国际、

兄弟党和我国的部分人民群众所疏远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以南湖头会议为转折点，脱掉瘢痕，开始乘胜前进了。

在小家琪河，为贯彻会议的方针举办了为期一个星期左右的讲习班，还召开党的政治干部会议，讨论了实现建党方针的措施。

我们在上述讲习班和会议上具体地解释了南湖头会议的方针，提出了反映会议基本精神的当前口号："挺进祖国，吹响军号"，这是我们为了把我国革命推向高潮而提出的口号。

南湖头会议以后，我们威风凛凛地踏上了挺进祖国的征途，抗日武装斗争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　战友北上我南下

我们在结束南湖头会议后，告别小家琪河，向白头山地区进发。这天早晨，风特别大。系紧鞋带踏上南下之路时，在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我国的一句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从小家琪河原木房的院子起程，在刚下了鹅毛大雪的雪地上留下了行军的第一个足迹。

在我们的一行人中还有王德泰、魏拯民等中国人军政干部。

魏拯民因心脏病复发，曾到苏联的医院接受治疗，不久前才回来。这天，连他也和王德泰一起以愉快的心情开着玩笑跨步前进。虽然天气阴森寒冷，行军速度却很快。

根据南湖头会议的决议向白头山地区挺进，本应沿着从小家琪河经过老爷岭、尔青牌、明月沟、安图直达白头山的直线路程南下，可是我们却在沿着从小家琪河经过额穆县青沟子、官地、安图、抚松县到白头山的迂回路线朝额穆方向前进，这条迂回路线的路程比直线路程远一倍。

我们不得不沿着迂回路线走，是因为同我们一道参加过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同志们正在新开辟的额穆县青沟子密营等待着南湖头会议的消息，从东满来找我们的游击队员、老弱者、伤病员和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也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南湖头会议的决议，对因"民生团"问题而在间岛的游击区发生的一切极左妄动敲响了丧钟，向全世界宣布了朝鲜人进行朝鲜革

命的自主权利。这项决议在青沟子也必将引起激动人心的欢呼。许多年来，他们在东满和北满的广阔大地上浴血奋战，心中一直想的是祖国，是向祖国进军。

可是，在官地一带和青沟子密营的战友中，大部分不能和我们一起走进军祖国的南下之路，反而要到更遥远的北方去同北满部队进行共同斗争。自从朝鲜革命以南湖头会议为起点进入了转折期以后，占据白头山一带，把武装斗争扩展到国内腹地，就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最大愿望。但是，我们是把同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作为抗日革命的重要战略任务提出来，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的，因此，我们不能中途放弃这一共同斗争，全都到白头山去。如果我们只顾本国革命，把朝鲜人游击队队员全都带到白头山去，那么，东北地区的游击斗争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

北满各部队迫切地感到军政干部和骨干军人的不足，所以他们一再要求东满各部队同他们进行共同斗争。对这一要求的回答，就是我们的两次远征北满。在小家琪河召开南湖头会议的时候，北满各部队也要求我们提供人力支援。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在南湖头会议上把对北满地区抗日联军部队提供战斗支援的问题作为附带的议题提出来，并为之采取了具体措施。

正是根据这种理由，我在向白头山地区挺进的决定性时刻，决定同多年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作别，先踏上了迂回之路。向白头山地区挺进这一历史性壮举，使我们迫不得已地首先尝到了同多年来费尽心血培养的战友们离别的苦味。

他们不能跟着我们到白头山地区去，却要到离祖国更遥远的北方去，他们的心情该是怎样呢！

我从告别小家琪河时起，就为这个问题思绪纷乱。

回顾起来，我自开始从事革命斗争以来，经受了无数次这种生离死别之苦。我十三岁就和万景台家乡的人们离别；到了桦甸，刚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就又不得不同刚刚建立了友情的同志们离别了。

这次离别不久就成了互相紧紧拥抱、热烈握手的重逢。在桦甸离别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第一批成员，在吉林重新见面，开始把青年学生集结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集结在这面旗帜下的青年，都是些不惜赴汤蹈火的大丈夫。这些同志个个都是情逾骨肉、义重千金的珍宝。

然而，我刚出狱就要把斗争舞台从满洲中部转移到满洲东部，因而又要尝离别之苦了。三五成群到处活动的战友们肩负起新的任务分散到中满、南满和北满的广阔大地去了。这次离别不同于在桦甸的离别，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面，是一次令人痛心的离别。

同崔昌杰、金园友、桂永春、康炳善、朴素心、崔一泉、高在凤、朴一波的离别是这样，同陪我一起到哈尔滨去的韩英爱的离别也是这样。我在结束同共产国际联络站的接触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韩英爱来找我，要求我带她到东满去。她哀求我说，既然要干革命，就愿意在一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干革命，千万不要拒绝她的这个愿望。那时，她已接受了我交给的任务，处理我没来得及处理的两件事：一是留在哈尔滨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线，二是对满洲省委巡视员做工作。

我自己也很想和韩英爱一起去东满，可是为了工作，不得不拒绝了她的要求，我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离开了哈尔滨。我心想，我承担共青组织吉东特委责任书记的工作，在两三个月内是可以再见

到她的。我抱着这种乐观的估计离别了她。

我所以不顾她的愿望，把她任命为哈尔滨地区的特派员，让她留在哈尔滨，是因为我相信她那种只要是组织派她做的事就不问难易总是认真执行的高度责任心，也是因为她的这种责任心是为推进哈尔滨一带的革命工作所迫切需要的。说也奇怪，我总是把亲密战友留在他们不愿待的地方或派到他们不愿意去的远方去。

就这样，我到南方去，韩英爱却留在了北方。这次离别十分凄凉。我把韩英爱这样一个连自己摊到的一块菜饼也都分一半让给我的真挚的战友留在北满的一角，只跟她说一声再见，挥一下手就离去，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看来，每当革命面临新的局面时，离别就像影子一样总是伴随着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我们全力培植起来的某地革命组织，就不能不把通过斗争培养出来的人留在那里，而我们则要到新的地方去继续做培养人的基础工作。这好比是，我们做连续开垦新处女地的拓荒工作，而同志们则把我们开垦的处女地侍弄成肥沃的果园和良田。

正是革命的这种要求，使我们的离别成为不可避免的。然而，那些甚至我们要他去死也能毫无怨言地去死的忠实的同志，为革命需要离别的时候，却常常发牢骚，不愿听从。

我把斗争舞台转移到东满的时候，像小孩一样纠缠着要跟我走的并非韩英爱一人。当然，三四年来一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战友之间的离别，是不可能像萍水相逢的人之间离别那样的平常。对他们，不管怎样晓之以理，甚至批评和责备，也是无济于事的。本应最体谅我的车光秀，反而说："我们一直生死与共，难道是为了这样的离别吗？让我们找出一条永不分离、共同干革命的最佳途径吧。"他缠住我不放，一直跟了二十里路。文朝阳要和我离别，难过

得像个女人一样竟放声大哭起来。

那时，我反复自问，难道革命就是这样苛刻的吗？难道就没有像车光秀说的那样永不分离、共同干革命的途径吗？然而这种途径是不可能有的。

我说服同志们说，我们不久就会重逢，离别是暂时的，心想着重逢的那一天，忍住离别的悲哀吧，不要流泪，要笑着离别。不是说离别有一百次，重逢也有一百次吗。

然而，现实常常是与我的预期背道而驰的，同我别后重逢的同志实在没有几个人，就连这几个同志也匆匆地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

有人说，生活是离别和重逢的不断的循环往复。然而对我们来说，一去不回的离别太多了。老实说，由于这种原因，我在与人离别的时候常常感到不安，产生不祥的预感。

现在去青沟子密营又要同多年在东满并肩战斗的战友们离别了，这不能不说是隐藏在向白头山地区挺进的喜悦中的悲哀了。

向白头山地区挺进前夕，魏拯民看到我这个应该比谁都高兴的人神色忧郁，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不仅无法用一句话表述心中纷乱的思绪，而且也不愿把这种心情透露给别人，便回答说没有什么心事。

“听说，金日成同志是最近才听到哲柱弟去年牺牲的消息吧？有什么办法呢？要坚强，不要太伤心。”

魏拯民这样猜测我心情忧郁的原因。当然，这个损失给我的痛苦也是难以忍受的。当时，我在那人地两生的满洲，连仅有的骨肉英柱弟的生死安危也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这种悲哀再加上与同志们的别离，我脸上的阴影就更浓了吧。

魏拯民为了扭转我的心情，开起了玩笑：

“金日成同志，心烦的时候，最好的药是说笑话。为了金同志，我讲个过去我们夫妻吵架的事吧。听听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琐事，作个参考是会有好处的，因为你总不能老是过独身生活嘛。”

王德泰为了改变我的情绪，也插进来说：

“对嘛，男儿二十四，可以说已经过了好时辰。不过也难说，金司令也许是因为要和恋人离别了才伤心呢。”

魏拯民就更起劲了：

“对，也可能。既然谈到了离别，我就不讲夫妻吵架的故事，讲讲有关离别的中国古代故事‘折柳’吧。”

他说，只要按“折柳”这个故事里的方法去做，就能交上好运。“折柳”这个故事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汉朝的首都附近有一座桥。汉代的人送别亲朋好友时，送到那座桥上就折一柳条送给亲友，祝愿他交上好运。从那时起折柳就成了中国人赠别亲友的一种风俗。魏拯民的家乡也流传着这种风俗。

他说，跟贴心人离别时折下柳条送给他们，就一定会交好运，劝我也这么做。

这个故事里的柳条可能是象征家乡的。我猜测这个故事包含着即使离别了也不要忘记生育了自己的家乡和家乡人的意思。

正当北满严寒逞凶的时候，要给每个离开的同志赠别，就需要足足一个背架的柳条，上哪儿去折这么多的柳条呢？就算是那样送了，难道就能使我消除忧郁吗？不管怎么样，魏拯民为了安慰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心意，使我十分感激。

早些时，崔昌杰同我分手时在孤榆树的柳堤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崔昌杰要像南岗和丹斋的离别那样，不拘格式，不设别筵，悄悄地离去。”

崔昌杰说的南岗是李升薰，丹斋是申采浩。我已经谈过，南岗李升薰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富翁，他把一生献给了爱国教育运动和慈善事业。定州的五山学校是他建立的，这事后代人也都知道。他在那里资助流亡海外的独立志士的过程中，同丹斋申采浩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申采浩有拗不过南岗的强留，有一个时期在五山学校教过国史和西方历史。他讲历史课讲得特别好，他的名声一直传到海外，在吉林也常常成为学生的热门话题。

我国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庚戌年前夕的冬天，丹斋忽然对南岗说：

“我还是得离开这里。”

南岗颇感惊异，挽留他说：

“这么冷的天气，你忽然想到哪里去呀？就是走，也该等解冻了再走嘛。”

“什么解冻不解冻的，我实在看不惯日本鬼子，一定要走。”丹斋固执地说。第二天他连话都没说一声就离开了定州。据说，那时他经由中国去了俄国。

丹斋的出走，使南岗十分难过，他自言自语地埋怨说：

“这个人真是……也不要一点盘费，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南岗每当送走独立运动者的时候，都设盛筵饯行，还给他们足够的盘费，可是丹斋连手都不握一下就走了，南岗当然是无限难过了。

崔昌杰上柳河去时所说的南岗和丹斋的离别就是指这件事说

的。

金赫责难丹斋，说他不辞而别，太无情了。崔昌杰却说，不了解申采浩的为人，就不要责怪他；申采浩才是比谁都爱惜南岗的热情人。

他解释说，不辞而别，是为了不麻烦独立志士，是为了避免离别的痛苦。

崔昌杰说得对。丹斋是个火一样热情的人，是特别爱惜南岗的人。

别说要效仿丹斋和南岗的离别的崔昌杰，就是金园友、桂永春等其他战友也都一样，他们接受了任务之后就像申采浩那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

我的战友都是些这样的人。

后来我在东满从事武装斗争的时候，也把我们培养出来的得力的军政干部和可爱的传令兵以及宝贵的队员派到军事力量薄弱的南满和北满各部队去了。每当这时，惜别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心里，使我心如刀绞。尤其是接到这些同志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次战斗中怎样牺牲的噩耗时，这个噩耗就成为永远使我们的身心痛苦的伤痕。

我通过这种离别体会到革命同志之间的友爱是多么深厚，清楚地认识到在革命者的一生中同志所占的比重有多么大。

解放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也常常对干部们说，世上有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等各种爱，但其中最珍贵的爱是革命同志的爱。这是根据上述亲身体验说的。

真诚的同志爱，不经过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共命运是体会不到的。

过去，我们的同志在一连几天以水代饭进行血战的最恶劣的环境中，偶尔在雪堆中拣到一个野果，也先塞到同志们的嘴里。

正如牛郎织女的传说所表明的，感情越深，离别的悲哀也越大。正因为这样，革命同志之间的离别也那样令人感到难忍的痛苦。

但是，不管离别是多么地令人悲伤，如果不离别就不能干革命，那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想着下了命令就要各自奔向东南西北的各个同志，我思绪万千，仿佛烈火把我的心都烧成了灰。

小传令兵吴大成和崔金山不知道我的心思，还以为这回准要到祖国去了，高兴得飘飘然地跟着我。可是我不得不把其中一人派到北满的部队去。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过晌才到了青沟子密营。众人从密林中的原木房里拥出来，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兴地问这问那，好不热闹。他们是将要留在北满的汪清和珲春的同志，此外还有将要送到苏联去的伤病员和老弱者。

一个小姑娘喊着我，箭也似地跑过来缠住了我的胳膊。

“这是谁呀？你也在这里啊！”

我把她一把抱在怀里，端详着她的小脸蛋。她是梁成龙的女儿梁贵童女。她在汪清游击根据地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奶奶。

“听说将军要到这里来，我就赶来了。将军，您是要到白头山去吧？”

“嚯，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

“是李应万叔叔说的。他说，我们都要跟着将军到朝鲜去哪。”

我朝她指的方向一瞧，只见李应万拄着双拐站在队员当中乐呵

呵地笑着。

我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原是汪清游击队的连长，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从素质和能力来看，他是能够指挥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好指挥员，可惜被截去了一条腿，只好退到了二线。他拖着伤口尚未愈合的腿，在兵器厂里修理兵器，乐观地生活着。

“将军，我说的没错儿吧？我住在这儿，也能听到那边说的话呢。”

李应万扯了一阵后，性急地要我告诉他南湖头会议的情况。

我卸下行装后，把密营里的全体军民都召集到一块，向他们传达了南湖头会议的决议。

原木房里的人都高举双手喊了万岁。共产国际承认过去在间岛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是极左的，并宣布朝鲜人进行朝鲜革命是任何人不得诋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听到这里，他们都流着泪说，这回可以回到祖国和家乡，在自己生长的祖国大地上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战了。在国外出生的人也抑制不住兴奋地说，真想尽早到祖国去看看。不知是谁，向大家夸耀起白头山来了。

看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会留在北满。人们越激动，我就越不能不把真情告诉他们，这使我处在更加为难的境地。

但是，我不能不把要离别的事告诉他们。

“同志们，请你们回顾一下。

“每当作为武装斗争的辩证过程而出现新形势时，离别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

“这在南湖头会议以后朝鲜革命进入了转折期的今天也不例外。因此，大家对离别都要有个思想准备。日本的军部法西斯集团

在制造了‘二·二六’事件后，更加明目张胆地侵略北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齐齐哈尔和中国北方其他地方之后，为了制造侵略苏联的借口，在苏满国境不断地进行挑衅。这是同志们都知道的。针对这种情况，北满的游击部队正在努力加强抗日力量。可是他们因为缺乏骨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们多次要求我们支援。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都到白头山方面去，那就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为了让听众有时间品味我的话，暂时停下来环视了一下。从群众中传来了表示不安的耳语声。起初只在一个角落里开始的耳语越来越多起来，终于席卷了全场，使会场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骚动起来。虽然是预料中的反应，但我还是不免有点惊慌。我预感到同战友们的离别有可能遇到严重的困难，这使我无法和缓地把话说下去。

不过，群众很快停止了耳语，注视着我。

我断定宣布离别的时刻到了，便毫无顾虑地宣布了从离开南湖头的时刻起琢磨了几十遍的人事变动计划。

“从现在起，汪清团要到崔庸健同志进行活动的地区去，珲春团要到第三军进行活动的地区去。金策同志就在第三军。汪清团和珲春团的部分力量要同周保中属下的第五军一起在宁安、穆棱、苇河一带进行联合作战。伤员和老弱者要到苏联去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同志们，请原谅！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带你们到白头山去，而是为了向你们道别。”

人们在一片静默中盯视了我几秒钟。我原以为场内会发出一片不满的呼声，可是出乎意外，场内却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人们在这令人窒息的静默中以沉着的目光凝视着我。这使我感到十

分惊讶。

我觉得这沉默比千万句怨言更可怕。

不过这一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从这里那里响起的抽泣声，打破了那奇异的寂静。

我茫然地站在因为宣布了离别而泄了气的队员们面前。

还是在我手下当了几年政治干部的崔春国度量大。他安慰我说："将军，这里由我们来收拾，您就放心地去歇息吧。"其实，他也得跟我们离别，去另编一个独立旅进行活动呢。

我让崔春国去对那些将要留在北满的人做工作之后，去看了将要到苏联去的伤员和老弱者。在几年来的游击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出现了不少伤病员和体弱者。游击区还存在的时候，伤病员是完全由根据地医院负责治疗的，可是游击区解散以后，对伤病员的治疗就成了老大难问题。因此，把大部分的伤病员和老弱者暂时送到沙河掌和镜泊湖附近去治疗，等建立了青沟子密营之后，就把他们都集结到那里去了。但这也不能说是万全之策。

幸亏魏拯民同共产国际的有关组织进行交涉，按照我们的要求圆满地解决了我们最伤脑筋的伤病员和体弱者的治疗问题。从此，人民革命军的伤病员和体弱者暂时可以到苏联去接受治疗了。魏拯民同共产国际谈好了交接我方伤病员的事务性程序问题；也靠他的努力，圆满地解决了派我们的留学生到共产国际办的学校进行学习的问题。汪清团和珲春团的同志们向着北满部队出发的时候，留学生小组也将和伤病员小组一道到苏联去。

我们决定首先把我们部队的伤病员、老弱者和无依无靠的孩子分成两个小组，分两次送到苏联去，并由王润成率领部分队员把伤病员护送到国境线去。

我们在南湖头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可是，青沟子的伤员们还不知道。

我正朝伤员们那里走去，李应万拄着双拐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

“将军，世上哪里有这样的晴天霹雳呀？难道我李应万也要去苏联不成？”他一开口就粗声粗气地说，激动得连腮帮子都不住地抽搐。

“应万同志，你别激动，坐下谈!”

我扶他坐在一棵横倒的朽木上。

李应万扯着我的胳膊哀求道：

“将军，我求您让我在您身边干革命一直干到牺牲吧。我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能打枪，又能修理兵器。我还有一张嘴，能作号召革命的演说。难道您以为我李应万是个当同志们流血奋战的时候愿意到苏联去享福的人吗？”

当然，我早已料到，这个火性子的前游击队连长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他是为革命截去了一条腿的人啊。

我握住他的手恳求他说：

你要是这样，别的伤员就会更纠缠不休的。想到将脱离抗日武装斗争队伍的同志们，我也非常痛苦。但是，你们不是因为身体条件而在生活上经常受到限制吗？有游击区的时候，虽然有点不方便，也还能凑合着过下去，可是在解散了游击区、像洪吉童[6]那样纵横驰骋的新的战斗环境中，拖着残废的身体怎么能跟着部队行动呢？

我劝说了他一个多钟头，可总是像东风射马耳那样不起作用。

“将军，我可不想到革命已经胜利的国家去，吃人家的面包，过舒适的生活。要是不想干革命想坐享清福的话，我干吗把家产全

都卖掉，买了一箱子白郎宁手枪投到游击队来啊！我求您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吧！我不愿做一个落伍者。”

李应万认为在革命队伍中落伍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他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过，他的思想方法是有点过激的。我们要他到苏联去，并不是要他抛弃革命，也不是要他去享福。我们只是让他到安全的地方去受到充分的治疗，能安上假腿回来，就十分满意了。

我对他的恳求作不出任何回答，只是无限感慨地回忆着和他一起保卫游击区的汪清时期，默默地走在密营的雪地上。在痛苦中持续的沉重的沉默，反而触动了李应万的心。

他观察了一阵我的表情，忽然把脸偎在我的肩上呜咽着说：“将军，您在为我操心啦，那我去苏联就是了。我在那里每天向着白头山祝愿将军打胜仗。”

同梁贵童女的离别也和同李应万的离别一样使我非常难过。这个小女孩听说她也要被送到苏联去，就哭个不停。

所以，我在青沟子密营期间一直带着她，吃饭也一起吃，睡觉也睡在一个床铺上。

我们离开青沟子密营的前夜，这小女孩躺在毛毯下谈个没完。

“将军，听说苏联比这儿更冷，是吗？”

这孩子也许是从大人那里听说苏联有冷得可怕的冻土带吧。

“不怕，你去的地方气候和这儿差不多一样。”

我听着原木房外呼啸的北满凄厉的风声，给孩子作了这样的回答，心如刀割。把一个没有爹妈的小女孩从一个他乡又要送到另一个他乡去，我觉得这个现实未免太残酷了。

但是，在这女孩子的心目中，那只有雪花和寒风这两种表象的

气候恶劣的大地，却是既没有日本鬼子、又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土。

这孩子到那里去，将同迫害好人的可恶的世道诀别，生活得像云雀一样愉快、像山鹰一样自由、像鸽子一样幸福。将来长成大人，就会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进行革命。这是我们把她这样可怜的孩子们送到苏联去时心里所抱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安慰。

“李应万叔叔说，将军到白头山去打仗，每月还一定要来看我一次。是真的吗？”

可能是因为这孩子赖着不肯去苏联，李应万不得不撒了这样的谎。

我盯着那孩子明亮的眼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碰到孩子们的问话，我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处于为难的境地。幸亏，这孩子又主动地给我解了围。

“要是将军离开白头山，到我们这儿来，日本鬼子就要去杀朝鲜人，那怎么办呀？将军，别来看我啦，您就在白头山吧。”

“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听你的话，不离开白头山，我要在那里给你的爹妈报仇。”

我不由得一把抱住了那孩子。

梁贵童女像只小鸟似地钻进我的怀里，莫名其妙地浑身颤抖着。也许是因为这个目睹了无数爸爸妈妈被残酷杀害的少女，眼前又一下子浮现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吧。

这孩子叫我不要离开白头山，我觉得这句话里包含着全体朝鲜人民的愿望和嘱托。

过了一会儿，她又叫我：

“将军！听说白头山太高了，我这样的小孩子上不去，所以，

我就不能去白头山，要跟着应万叔叔到苏联去。”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抚摸着孩子的头。我在心里说：贵童女啊，到时候你也到白头山来吧。那时候，我们朝鲜也会变成像苏联那样生活美好的国家。

那天我一夜未曾入睡。天一亮就要出现的挥泪惜别的情景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折磨着我。怎样跟他们离别呢？是真地按“折柳”的方式把这里的树枝折下来分给每个人呢，还是像丹斋那样悄悄地离开？

拂晓时分，崔春国来找我说：

“将军，准备什么时候走？”

“早早吃了早饭就走。官地的连队正焦急地等着我呢！怎么样，这里同志们的情绪安定了一些没有？……你们也该马上行军北上啦。”

一夜对我说个没完的小女孩仍在梦乡中，甜睡着，还不知道天快亮了，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

“将军，对我们的同志，您就放心吧。我们在北满一定好好打仗，请您放心地走吧。”

“都是好同志啊。所以，我也依依不舍呀。现在，跟春国也要……”

我说不下去了，默默地望了他好一阵，才一把握住他的手，说：

“跟你分手，还来得及这样说上几句话，算是不错哩。可是那韩兴权，我见不着他了，心里真不好受。以后你到了北满部队见到他的话，请转达我的心意吧。”

那天，我们以简单的早餐代替了别筵，饭后就分手了。

正如崔春国说的那样，青沟子的同志们以笑脸送我们走上了去

官地的路途，唯独梁贵童女在悲伤地啼哭。

我一想起把不愿分离的九岁女孩子的小手交给李应万，迈着千斤重的步伐离开青沟子密营的往事，现在也感到难过。

据汇报，李应万和梁贵童女后来属于第一批或第二批去了苏联。从那以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把他们的消息第一次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游击队缝纫队员全文振，当时她也从青沟子密营离开部队去了苏联，解放后才回国。虽然很晚，但我得知他们还活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梁贵童女现在大概快七十岁了。这个年龄，可以说是人生的黄昏了。我现在也常常回忆起被扣上“民生团”帽子忧心忡忡地过日子的原营长的女儿梁贵童女。不过，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而是九岁的少女。我无法想象已成了老太太的贵童女。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地说要跟着我到白头山去的那少女的面容。

在青沟子，多亏崔春国成功地说服了他的队员，离别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但把官地的金丽重连队和吴振宇所属连队派到北满部队去的事，却让我费了很大劲。吴振宇所属连队跟我纠缠不休，非要跟着我们到白头山去不可。

经我们一再说服，他们终于同意到北满部队去，不过再三要求我们允许他们把我送到安图县界。这样一来，珲春青年义勇军一个小队的同志们也跟着要求允许他们一起到安图去。那个小队里的黄正海过去受我们的指示在珲春做过策动伪满军哗变的工作，就是他带头想得到我的许诺。

我举出北满地区的实况，劝说了几个小时。

魏拯民非常喜欢黄正海所属的珲春青年义勇军小队，所以，决

定把那个小队交给他。吴振宇所属连队的同志们有些沮丧地离开了迷魂阵。

同魏拯民一起在风声凄厉的土冈上送走噙着眼泪启程的吴振宇所属连队同志的时候，我的心也被惜别的泪水打湿了。

同那些个别地派到北满抗日联军部队去的同志的离别，就更令人心痛难忍了。创建不久的北满抗日联军部队因缺乏军政干部，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派去了韩兴权、全昌哲、朴吉松、朴洛权、金泰俊等干部，甚至把我的传令兵吴大成也派去了。这就等于把我们在间岛精心培养的干部全都交给了他们。

吴大成是吴仲洽的弟弟。他原来在十里坪从事少先队工作。他眼看着哥哥们一个个地都参加了游击队，心里急得不行，便自告奋勇当了我的传令兵。

我叫他到北满部队去，起初他只是嘻嘻地笑着。看来他是以为我在开玩笑呢。后来他知道不是开玩笑，就哭丧着脸冲我说：

“将军，为什么要派我去呀？我不去！我这么一个小兵不去北满部队，难道革命就搞不成了？让我留在您身边吧！”

平时，一有指示，他就乖乖地只答应一声“是”，就去执行，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可是这一次，他却表现得十分粗鲁。

我经过几十次的说服才把吴大成送到遥远的北满部队去了。这个一直赖着不肯走的吴大成，在离别的时刻却像大人似地安慰我。他看到我两眼湿润，便开玩笑说：“将军，我走了，那金山能像我一样照顾将军吗？”

离别的前夜，吴大成和我的另一个传令兵崔金山彻夜低声细语，谈心作别。

平时我过了午夜才睡，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可是这一夜，为了

要走远路的传令兵，我早早地熄灯躺下了。彻夜窃窃私语的两个传令兵，大清早就到外面去了。

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鬼呢？我起了好奇心，便竖起了耳朵。

“金山，我走后，你可要更细心照顾将军啊！”

吴大成小声说。金山却只是叹气。

“你到了白头山地区，一定要弄些辣椒酱，每餐都要给将军摆上。那里朝鲜人多，只要费点神就很容易弄到的。你知道将军多么喜欢吃辣椒酱吧？可是我们还没能让将军吃过一次辣椒酱。真的，我们没资格当传令兵。现在要离开将军了，这些事就挂在心上放不下去。”

“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你放心走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崔金山的声音有些哽咽。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对啦，金山，你到了那里一定要先到平安道人的家去看看。平安道人可能有腌制品。将军很喜欢吃腌制品。瞎，我本想到了白头山一定弄到这种食物来好好招待将军的……”

天亮后送走了吴大成。他走后，我发现了他夹在书页里的字条。上面写道：

“将军！

“将军为了光复祖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可我作为传令兵却叫您操了不少心，现在要离开，感到十分内疚。我到新的地方去，一定好好工作，英勇战斗，请您不要挂念。

“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将军常说的那句话：‘为了光复祖国，要忍受痛苦’。我发誓决不玷污在您的爱护下培养的爱国气节，不惜献出生命为光复祖国的神圣事业作出一份贡献，请您放心。祝您身

体健康。”

作为一个年幼的传令兵，吐露在信中的感情是很深沉的。我的战友都是这样重情义、感情深厚的同志。

那天，魏拯民噙着眼泪说，从南湖头经过青沟子、官地到迷魂阵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朝鲜同志相互之间的情义是多么深厚。

“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金日成同志的战士个个都勇敢，情义又格外深厚，我真羡慕啊。就看那黄正海吧，是个多么叫人喜爱的青年啊！”

我把炊事队员任银河同珲春的青年义勇军小队一并交给了魏拯民。

黄正海跟着魏拯民同我们分手的时候，也和吴大成一样非常难过。

可是，他也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安慰我，要我放心，他一定遵照将军的嘱托好好照顾魏拯民同志。后来，他真地按照自己的誓言，忠诚地保护了魏拯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当魏拯民病重的时候，黄正海一直背着他走，每当遇到敌人的“讨伐”时，黄正海就展开殊死的血战保护了他。

正因为这样，魏拯民临终时亲切地叫着黄正海的名字，深情地说：“我到了阴间也不会忘记正海，不会忘记朝鲜同志的至诚。愿你们英勇作战，陪着金日成同志凯旋回归祖国吧。”

但是，魏拯民那么感激、那么念念不忘的黄正海也未能回到我的身边，他成了满洲荒野的幽魂。

现在我每当想起黄正海的时候，我眼前首先就浮现出从南湖头到白头山的迂回几千里的南下行军路线。

在青沟子密营像个小孩子一样跺着脚要跟我走的黄正海，到了

迷魂阵才跟魏拯民走了。从青沟子密营到白头山的遥远的南下行程，我和黄正海同行了很长一段，在这过程中，我对他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

从南湖头到白头山的几千里路上，我向北方派去了多少战友啊！

朴吉松、韩兴权、张龙山、全万松、朴泰化、崔仁俊、吴大成、吴世英、金泰俊等数不胜数的许多战友，把青春的鲜血洒在南北满的山野上牺牲了。

枪法好、又很重感情的张龙山的牺牲自不用说，小小年纪为照料我而日夜奔走的吴大成，别后再也未见到他，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惋惜。吴大成是吴仲洽最疼爱的弟弟。

我们和吴大成分别的时候，吴仲洽在一师二团参加了远征蛟河，未能见到被派往北满的弟弟。

我到了白头山地区，多亏金山的努力，有一次就着糠虾酱吃了煮熟的青玉米，吃得很香。就着糠虾酱吃煮青玉米，固然是搭配得再好没有了，不过，我想到这里面蕴藏着吴大成的心愿和情义，便特意吃得很多。

那时候我一直深信，吴仲洽和吴大成他们哥俩，虽然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相隔很远，分别战斗，但在祖国光复那天，他们是一定会欢聚一堂的。但是，他们都牺牲在异国荒野上，未能回到祖国来。

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正如我们所相信和期待的，在南北满各地战斗得很好，充分表现了朝鲜革命者的气概。

自从在青沟子密营同战友们挥泪作别以来，过了一年半见到了崔春国，有些同志过了五年或六年又见了面，有些同志则在解放了的祖国才久别重逢，他们都深情地缅怀牺牲的战友。

活下来的同志们都立了赫赫战功回到了我们身边。

有些同志成为百战百胜的英雄支队长名震四方，有些同志成为连长、旅长、师政委等干练的军政干部，立了赫赫战功。不过，年轻时的娇憨气却依然如故，他们拭着眼泪说："离开了将军，就像离开了父母一样，常常想您都想哭了。"

他们看到我念念不忘未能生还的战友们，就和抗日革命时期一样亲切地安慰我说：

"将军，不要太伤心啦。在光复祖国的征途上怎么会没有牺牲呢。当年同他们的离别虽然变成了永别，可是它带来了祖国的光复，他们是不会为自己的牺牲后悔的。"

我就在这样的战友们的爱护之中度过了八十个春秋。未能回到我们身边而永别的战友们，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可是他们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为我们的抗日革命史和祖国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因此，我也不为在抗日的日子里把战友们派往北方和南方那种悲痛的离别而后悔。

五　百战老将崔贤

我们离开南湖头开往白头山的时候，选择的路程中一个重要的必经之地是迷魂阵。它位于敦化——安图县界的牡丹岭山脉，是人民革命军独立一师的后方密营基地。就在这千里树海中，分布着我们大大小小的纵深的密营，我们计划同王德泰、魏拯民等第二军的主要指挥员在这里聚会，讨论贯彻执行南湖头会议方针的一系列措施。

迷魂阵是来过一两次的人也极容易迷失方向的深山幽谷。座座山峰，条条峡谷，形状相似，难以分辨，初来的人，晕头转向，如堕烟海。古人称这千古密林为迷魂阵，足见他们的洞察力是令人惊叹的。

起初，我们也没有及时找到密营，东跑西跑吃了不少苦。幸亏在名叫牛心顶子的地方遇到朴成哲所属的独立一师一团一连的同志们，要求他们把我们带到迷魂阵去。可是他们不愿意，说迷魂阵现在是伤寒病蔓延的地方，有几十名伤寒病患者聚集在那里，把首长们带到那里去，不能保证安全。

“那些病人中，不知有多少已经死去。怎么能把将军领到那里去呀！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他们就这样一口拒绝了。

当时，由于传染病的蔓延，人民革命军的人员损失惨重。在游击区发生的斑疹伤寒和伤寒病，在游击区解散以后仍然形影不离地紧紧跟随着我们的队伍，无情地夺走了我们许多同志宝贵的生命。

这是削弱人民革命军战斗力的最可怕的劫难。

“伤寒病是在人身上发生的，不管怎样，人是能够制服它的，难道传染病还能战胜人嘛！因此，不必那么害怕。我看你们把伤寒病太神秘化了。”

尽管我这样指责了他们，可他们还是强调伤寒病的危险性，执意不让我们去迷魂阵。

“人哪能战胜传染病啊！在那种病面前，没有强者和弱者之分，都是猫爪里的老鼠。连长崔贤同志，他的身体多棒啊，可他也得了伤寒病，在迷魂阵躺了好几个星期，至今还起不来呢！”

“啊，他这个铁打的战将也得了传染病？他害伤寒受到折磨，那我更应该去迷魂阵。我来到牛心顶子，如果怕传染病就不去迷魂阵，径直去了白头山，那崔贤知道了该多么难过呀！你们为我的安全担心，可是，我在汪清已经患过了伤寒，有免疫力了，你们可以放心。”

我这样一说，一连的指挥员才派了一个排左右的队员给我们做向导兼警卫，行前还一再叮嘱我们，到了迷魂阵千万不要走进伤寒病人的房间。

老实说，当时我听到崔贤害了热病的消息，非常担心。我虽然在口头上说伤寒是人能制服的病，但实际上它是令人胆寒的可怕的疾病。这可恶的疾病决不会因为患者是革命军的指挥员而赐以恩典。在崔贤这样急性子男子汉的肉体里，各种疾病反而会更加疯狂肆虐，逞性妄为。病菌会袭击所有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性格急躁、缺乏耐性的人，危害更大。一个宝贵的战友，生命危在旦夕，这使我一刻也放心不下。

“金司令，你在想什么呀？是不是在为崔贤同志担忧？”

王德泰看到我默然地挪动着脚步，神色忧郁，便悄悄地问我。他不善于交际，沉默寡言，是个比较古板的军事指挥员，但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的能力。

“是的，你怎么猜得这么准？”

我心里感谢他打破了沉默。因为人在缄默不语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重重心事的。

“这还猜不着吗？你身边走着我王德泰这个朋友，你却一句话也不说，只顾默默地走路，这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你心里正牵挂着一个人的命运吗？”

“你的判断很准确。我是在想崔贤的病。他要是没事儿，该多好！因为不知他的病情怎么样，所以我心里着急呀！”

“请放心吧！崔贤是一定能战胜病魔的。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嘛！”

“他会好吗？那该多好啊！”

“这么看来，崔贤是个真正幸福的人。在别人的梦里有他，在别人的记忆里有他，在别人的关心里有他……这样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王德泰这朴实而深刻的言谈，使我深为感动。我对这位军长的看法表示了完全的赞同。

“你这句话，真是语重心长啊！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在这个时刻，恐怕崔贤也在想着你呢！他平时就非常思念你，我都有些嫉妒你了。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你和崔贤只见过一次面，可是你们的友情却那么深，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只在一起度过两个夜晚，就成为莫逆之交了。在那短时间里，我完全被他迷住了。不知道这是

不是叫害了单相思……”

“哈哈，怎么会是单相思呢。崔贤这个人，自从到马村听你给他吹了一次风以后，老谈金司令的事呢!”

说崔贤到马村吹了一次风，指的是他到小汪清马村跟我第一次见面时我跟他谈的许多话。关于我和崔贤第一次会见的情景，《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里已有过介绍，在这部回忆录第三卷里也简略地谈过了。

为我和崔贤第一次会见提供了机会的是东宁县城战斗，这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由于通信员没能及时送到要他参战的命令，结果他来晚了，没能参加上战斗。他听到东宁县城战斗已经结束，感到十分遗憾。他把通信员痛骂了一顿，才消了点气，他问我：

“汪清、珲春的游击队，甚至救国军也都参加了东宁县城的战斗，只有我们延吉的笨蛋们没有参加上，连东宁县城门外都没去过，这简直气死人啦！队长大人，还有没有攻打另一个地方的计划？”

“我是年轻人，别叫我大人，就叫我金日成好啦。”

我这么一说，这位戎马倥偬的老将忽地跳起来，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似的。

“年纪大小有什么关系。我从心底里拥戴您为朝鲜军队的首领，已经很久了。因此对您用尊称是理所当然的。”

“你这样夸赞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就会骄傲自满，头脑发昏的。你要是继续这样捧我，我就不再理你了。”

“呵，我是个脾气犟的人，可您也是不同一般的人哪！好，从今往后，就听您的，不用敬词啦。”

从那以后，崔贤对我改换了称呼。他是个具有典型的军人气质的男子汉，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他对我使用敬词，只在正式

场合上。这在我们的关系中消除了多余的礼节和形式，使我们的友情更加真挚、亲切了。

正像从海里开采珍珠那样，一个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同志，成为我国革命的“黄金”，成为扩大和发展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就在这样的时候，得到崔贤这样的大丈夫做我的同行者，的确是在我的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和幸事。

在马村的会见，一开始我就感到很满意。作为初次见面来说，给我的印象的确太深了。奇怪的是，与我素昧平生的崔贤，竟一见如故，像个老相识，我总觉得他的嗓音是那么耳熟，他的容貌、举止都那么熟悉。甚至感到好像在哪里，曾经和这位英姿飒爽的好汉讨论过抗日、议论过救国似的。

我之所以觉得崔贤是我的老相识，也许是因为他的一切跟我脑子里一直想象和描绘的典型的武官形象非常相似的缘故吧，同时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到间岛常常听到关于崔贤的种种传闻的缘故。

在亡国的厄运极其悲惨的 1907 年，崔贤在异国间岛的荒凉大地上接过了人生航道的船桨。1907 年是悲痛的多灾多难的一年，它在我们民族史册上留下了无数耻辱的记载。李俊在海牙剖腹自杀，是这一年；高宗退位、宣布解散朝鲜军队，是这一年；缔结《丁未七条约》和强行“次官政治”，使我国的一切内政权力转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也是这一年。

在带有空前破坏力的经济危机的浪涛猛烈冲击的大地上，崔贤诞生了。他的父母为这新生命的未来担忧，惴惴不安。“韩日合并”、三·一人民起义和庚申年间岛大”讨伐”，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时局变化使年幼的崔贤热血沸腾。

如果说在那绝望的黑暗年代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在间岛

一隅存在着开展艰苦的武装斗争的独立军。洪范图和任秉国是崔贤的先辈和导师。崔贤的少年时代，是同这些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老将的活动息息相关的。他从这些老将那里学到了枪法和马术。崔贤的父亲崔化心是洪范图手下独立军的干将，他在崔贤十一岁时就让儿子担负了通信联络的任务。就在这一年，崔贤接过了父亲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支手枪。

庚申年大屠杀，在朝侨聚居的间岛各地留下了腥风血雨的痕迹。在这次“讨伐”中，崔贤失去了母亲。他和父亲一道跟随任秉国的部队，到了苏联滨海省。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他立志毕生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任秉国队长任命他为通信兵，派到手下的一个支队。善于骑马的崔贤，纵马驰骋在本部和支队之间，忠实地履行了通信兵的职责。当这个年仅十三岁、个头矮小的少年在旷野纵马疾驰的时候，俄罗斯人都以惊叹和羡慕的目光望着他。

有一次，他接受了一项通信联络任务，偕同骑马的三名同事，穿过弹雨，冲向最前线。一行中三名均中弹牺牲，崔贤的胳臂也受了伤。

但是，他顾不得伤痛，冒着弹雨，勇敢地向前奔驰，及时准确地向本部传了信息。任秉国给他的胳臂缠上绷带，称赞说，崔贤是个可以当独立军将领的人材。

这支独立军失败后，崔贤回到间岛，经过后来的独立团团长尹昌范的介绍加入了东满青总。东满青总时期，可以说是他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这个转变，在他七年多的延吉监狱生活中，得到了促进。1925 年，反动军阀当局突然把他抓起来，以经济募捐事件的嫌疑犯判处他无期徒刑。

五·三〇暴动和秋收、春荒斗争的浪潮平息后，那些站在斗争前头领导群众的间岛革命的先觉和爱国者，爆满了延吉监狱。这些乐天派们，虽然自由受到了约束，但在这约束中仍然昂着头，气宇轩昂地生气勃勃地生活。这个小社会，是对崔贤的成长和进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学校和熔炉。他在这个监狱里加入了牢里的地下组织——反帝同盟，还加入了赤卫队。狱中苦楚，终于把独立军时期的通信兵——一个民族主义者完全改造成了共产主义者。

崔贤被关的延吉监狱，军阀当局称为吉林第四监狱，他在狱中的轶事和冒险故事，传遍了东满各个游击区。

他的狱中生活是从整治牢房的“帝王”——“戆头”开始的。他被关进的牢房的“戆头”，是一个虐待囚犯成性的强盗杀人犯。每有新的囚犯关进牢房，他就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抢去据为己有；饭菜送进牢里，他就把别人的那一份抢去填饱自己的肚子。

崔贤决心狠狠地教训教训“戆头”。有一天，他掏出老刀牌高级香烟，自己叼上一支，对牢房里的其他囚犯也每人分给一支，惟独没给“戆头”，为的是故意招惹“戆头”发火。

“戆头”恼了，便喝令崔贤把带来的东西全交出来。崔贤理都没理他，只顾从容地吐着满口的烟气。“戆头”沉不住气了，就要动起手来。这时，只见崔贤飞身跃过几个人的头顶，用带着手铐的两个拳头，朝“戆头”脸上狠狠一击，厉声喝道：

“你这个坏蛋，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在外面杀人，坐了牢，又欺负这里可怜的弟兄们，哪里还有像你这样恶贯满盈的坏蛋呢？难道你不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平民的儿子吗？这次饶了你，往后你可要放规矩点。从现在起，你就呆在那便桶旁边，这边的上座是我的。”

“戆头”自知自己打不过崔贤，便乖乖地到便桶旁边，小心翼

翼地抱膝而坐。打那以后，从“戆头”的欺压下解放出来的囚犯们都把崔贤看作恩人，亲近他了。

崔贤被判无期徒刑不久，军阀当局经常组织大成中学、东兴中学、永新中学、永新女校、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许多学校的学生参观牢房。敌人企图用这种方法清除青少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压制他们的斗争气势。这是因为在这一地区，各类思想团体和反日反军阀团体相继出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活动的缘故。

崔贤通知各牢房预先准备好水枪，等到学生们来参观牢房的时候，就向带队的反动教师和看守一面射出便桶里的臭水，一面破口骂：

“你们这些兔崽子把学生拉到这儿来，想让他们看什么？”

出其不意地遭到袭击的反动教师，吓得慌忙带着学生溜出了监狱。

监狱当局为找出主谋者，费尽了心机，但没能找到，因为所有囚犯都说自己是主谋。

崔贤在延吉监狱时当过狱中制鞋厂的制鞋工、石印厂的排字工、服装厂的高级西服裁缝，后来还当过木工厂的木工以及给囚犯、看守、看守长、监狱长理发的理发员。他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对那些无缘无故虐待和折磨他的人，不管是谁，都决不宽恕，给以严厉惩罚。有一天，他准备拿用来制作桌椅的鼠李木来做象棋子儿，被监工发现，挨了一顿毒打。那个监工把打囚犯当作家常便饭。崔贤气得抽起正要装配的椅子腿，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监狱当局给了崔贤一个星期的禁闭处分，但从那以后，监工就再也不敢对囚犯行凶了。

崔贤的狱中斗争，最放光彩的是越狱斗争。他同尹昌范等几个

同志一起，帮助了独立军时期的老上司任秉国等几个革命家越狱成功。为了主持正义，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千仞削壁也敢于跳下去，这就是他天生的骨气，就是他在风浪中培养起来的性格。

崔贤出狱后，加入了太阳帽赤卫队，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晋升为人民革命军延吉游击队的连政治指导员。

我在马村会见崔贤以前，对这个出名的硬骨头的情况，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

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互道寒暄后，他对我说：

“事情既然成了马后炮，那我就在汪清呆两天，听听金队长的高见再走。不会妨碍你吧？”

我欣然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得情投意合，不知不觉谈到了天明。

次日早晨，岗哨给指挥部发出信号，敌人就要打进游击区来了。我把部队部署在高地上，临上山的时候，求他谅解说：

“我去打一仗，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他一听，像冲足了气的皮球一样跳起来说：

“有了露一手的好机会，我怎么能坐在屋里！要是我崔贤不跟着金队长去，呆坐在屋里，那就不是崔贤啦！今天老天爷也看中了我崔贤。我真想在金队长指挥下打一仗啊，请你把我带到高地去吧！”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起打一仗吧！”

崔贤笑呵呵地跟着我攀登到了高地。

敌人不敢向游击队埋伏的一线攻来，只是在远处乱打一阵枪后，开始放火烧凝聚着游击区人民血汗的谷垛。

我命令游击队员进行远距离狙击，狠狠地打击敌人。然后转向崔贤说：“听说崔贤同志是个神枪手，让我们欣赏欣赏你的本领吧！”

他用步枪只一发就击中了一个挥动着火把扑向谷垛的敌兵。敌人离我们约有五百米，但他弹无虚发，每枪都打中了敌人。他的射击本领确实令人惊叹。

“你没能参加东宁县城战斗的遗憾，现在消除了些吧？”

战斗结束后，我对他这么说。他砸着嘴摇头说：

“消是消了些，不过，还是不过瘾。”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通宵谈话。话题的中心是，朝鲜革命的当前任务及其途径的问题。我提出了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建立新型的主体政党的问题等几个路线上的重要问题，还同他反复讨论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实践问题。

崔贤对这次谈话表示非常满意。他说：

“现在，没能参加东宁县城战斗的遗憾消除了些。我虽然没赶上参加东宁县城的战斗，可是来到马村收获很大，足以弥补了。”

我在送走崔贤的时候，送给了他在东宁县城战斗中缴获的四支大抬杆和一个琥珀烟嘴，作为我们第一次会见的纪念。那个烟嘴成了他最心爱的随身携带物。

每当他为决定战斗和战役的局面而紧张思索的时候，那个琥珀烟嘴总是喷出浓浓的烟雾。他的周围有不少对那个烟嘴眼馋的嗜烟者，他们为了把那个烟嘴弄到手，用尽了种种手段和方法，有的想凭力气硬抢，有的想用甜言蜜语求取，也有的想用交换的方法得到，贪心更大的人甚至想趁崔贤喝醉酒时，偷偷地从他的口袋里掏走。可是，这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解放后，身居党政要职的嗜烟者中，甚至有人跟他讨价还价，说：“崔贤同志，听说用那个烟嘴抽烟，味道就像蜂蜜一样甜，让我们也用它抽一口吧！我们会缴上优厚的‘租金’的。”这种讨价还价，

对崔贤这个老顽固也行不通。只有金翊善在罗津休养所和他一起休养时，相处熟了，才成功地借用了一天。

如今，那个琥珀烟嘴陈列在朝鲜革命博物馆里。起初，文物工作人员以为，只需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服崔贤把那烟嘴拿出来。谁知，他们打错了算盘。当崔贤一知道他们是来要那个他保存了几十年比珍珠宝石都珍贵的烟嘴时，就大发雷霆，把他们赶走了：

“什么，你们说什么？要把我崔贤的琥珀烟嘴陈列在博物馆里？这烟嘴可不是全民所有，是我个人所有。烟嘴是我们的将军送给我用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看、可以摸的公共物件。你们真想要什么，就干脆把我的胡子拔去好啦。”

文物工作人员在他的呵斥面前吓坏了，可是他们没有失去希望，一再去找他。直到他们第五次上门，才成功地说服了这位顽固的老将。老将军几天前还像老虎一样发威，可是这一天却变成另一个人了，和和气气地接待了客人。

“从今天起，这个烟嘴不属崔贤个人所有，归全民所有了。让我最后一次用它抽一支烟再给你们吧！请稍等一下。”

崔贤往烟嘴里插上一支香烟，划了火柴点上，一口一口贪婪地吸着，把烟雾不慌不忙地向空中吐出。老将军眯缝着眼睛，凝望着遥远的北方天空。在那天空下，有我们第一次会见的马村，有他直到将近四十岁还挎着盒子枪，纵横驰骋的游击斗争时期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历史性的三天两夜，使我和崔贤以一个纽带联结在一起，成为永恒的同行者，在我们的友情史上筑成了任何力量和手段都破坏不了的友谊的长城。

在这次会见中，崔贤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为人十分诚

恳坦率，平易近人。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男子汉。他的思想和感情都显露在脸上。对这样的人，欺瞒、做作和外交手腕都是行不通的。他像孩子般单纯的秉性，具有一种把别人的心都能净化的奇异的魅力。我被这一魅力所吸引，不能不把我的内心向他和盘托出来。

我一到迷魂阵密营，首先就去看住着五十多名热病患者的半窑洞式的病房。我那么想见的崔贤就在这些病号中。

驻守密营的后勤人员，打开病房门告诉他们，金司令来了。崔贤一听，就吃力地坐起来，爬到门口来等我。

他脸上瘦削不堪，只剩一把骨头，实在太惨了，简直看不出是在马村印在我脑子里的那个面貌。

“金队长，我求你，不要进来！不能进来！”

他挥动着双臂，以炯炯的目光直盯着我，使我不能不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

我跟他开玩笑说：

“哟，迷魂阵的人情太刻薄了。我是远道来看望崔贤的嘛，你却门前逐客，太不近人情啦。”

可是他根本不听。

“你说我刻薄，那也没办法。金司令，难道你不知道这儿是阎王殿的门槛吗？”

“哈哈，真没想到，打过足有一百草袋子弹的崔贤，原来是这样一个会装蒜的人。”

崔贤一看跟我说不通，就骂起为我带路的后勤人员来：

“你们这些饭桶，这儿是什么地方，竟随便把金司令领到这儿来。这样接待金司令可不行啊！”

后勤人员都吓得从门口四散逃走了。

崔贤正在骂后勤人员的时候，我就迈着大步走到了病房中间。

“檀木棒槌那样结实的崔贤，得了伤寒，是怎么搞的？”

我坐到他枕边，要和他握手，他却慌忙把手缩进毯子底下，说：

“金司令，我身上净是伤寒菌，千万别碰我。你怎么到像个传染病库似的迷魂阵这个鬼地方来了？”

“为什么来？就是想看看崔贤嘛。真是怪事，崔贤也会得传染病！”

我把手伸进毯子里，一把握住了崔贤那像火炉一样发烫的手，好久没有松开。他的眼眶里立时噙满了泪水。

“金司令，我真高兴。没出息的崔贤算得了什么……我原以为，见不到你就要去黄泉了呢。”

刚才他还恳求我别靠近他，而现在却像钳子般地攥住我的手不放了，俨然像是一个小孩子。

他向我问了有关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几个问题，然后讲了一阵伤寒病的为害情况。

我把话题转到了与崔贤的命运有关的个人问题。

“听说，这期间你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受了不少委屈，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他郁郁不乐地点了点头，就急匆匆地讲起了他被扣上“民生团”帽子的经过：

“金队长在马村就统一战线谈了许多。我就认为，这条路线是独一无二的正确路线了。回延吉后，我就向我们部队的同志们宣传了这条路线。连王德泰军长也说，不搞统一战线就活不了。可是，

我就因为要搞统一战线才被扣上了‘民生团’帽子的。”

我们踏上第一次远征北满的征途后，崔贤率领连队开赴敦化——桦甸交界的地区，为扩大游击活动区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军事活动。要在这个地区扩大游击区，先决的条件是做好在大荒沟山沟里的反日部队的工作。

当时，分别拥有八十人和一百人左右的两支山林部队驻扎在大荒沟山沟里。有八十人的山林部队表现很好。这是因为游击队地下工作员打进这支部队深入进行了反日宣传的缘故。这支山林部队跟附近的自卫团的关系也很好。这一地区的自卫团由亲日转向反日，用各种形式和方法积极支援那支山林部队。

但是，那支有一百人的山林部队不仅专事掠夺人民的财物，而且勾通柳树村的敌军警，准备集体投降日军。一个要抗日、一个要投敌，这两支山林部队之间的对立，孕育着有可能触发流血冲突的危险。如果对那支企图投降的山林部队放任不管，那就既不能引导其他的山林部队走上抗日的道路，也不能促成同他们的反日联合战线。

崔贤以居中调停为名，设宴邀请了两支山林部队的指挥官。当企图投降的那支山林部队的指挥官们走进宴会场时，崔贤的连队就迅速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对另一支山林部队却没有触动。对跟这支部队有友好关系的自卫团，也没有使用武力。

崔贤没有打击那个自卫团，是符合统一战线路线要求的光明正大的做法。但是，军部政治主任等一些上层左倾分子硬说：“不打自卫团就等于向敌人投降。”于是对正确处理这件事的崔贤横加罪名，撤了他的政治指导员职务，甚至收去了他爱用的匣枪。这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连王德泰也说：“如果崔贤同志是‘民生团’，那么，

我们二军里不是‘民生团’的到底是谁，”崔贤在受到撤职处分以后降为战士，后来在王德泰军长手下当了一年军部的军需处长。到1935年底，他才当了连长。

“我崔贤是托金司令的福才活下来的。如果金司令没有在大荒崴豁出性命保护我们，我就终生戴着‘民生团’的帽子，过田鼠般的生活了。金司令，你说说，没打那个自卫团，难道就是投降吗？”

崔贤霍地坐起来，迎面注视着我。他那严肃的面孔顿时涨得通红。

我用两只手亲切地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头。

“那为的是反日统一战线，做得对嘛，怎么能说是投降呢！……他们把你打成‘民生团’，降了你的职，是毫无道理的，是荒唐的。”

“就是嘛。难道我崔贤还能当‘民生团’？这帮臭小子，真气死人啦！”

“像你这样被打成‘民生团’受处分的和无辜牺牲的竟有几千人哩，真是令人痛心！”

“都是胡说八道。像尹昌范和朴东根这样的革命者怎么会是‘民生团’呢！他们就是专门把那些工作积极、作战勇敢的人打成‘民生团’，判处死刑，还好像立了什么大功似地洋洋得意呢！如果这样搞就是共产主义的话，我根本就不会从滨海省回间岛来的。”

“反‘民生团’斗争，是在我国抗日斗争史上不能重演的大浩劫。有多少朝鲜共产主义者死于冤狱。幸亏共产国际正式指出我们在大荒崴会议上所表明的立场是正确的，东满特委领导的反‘民生团’斗争是极左的，并提出了要早日拨乱反正的任务。”

崔贤听了我的话，流下了眼泪。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真想在这里三呼万岁了。金司令，谢谢

你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洗雪那些蒙受不白之冤而牺牲的战友的冤屈，怎样弥补我国革命遭受的这一严重损失。你说对不对？”

“对。金司令，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成为种子，力求弥补这个损失。”

我听了他的回答，感到十分满意。他是个不仅懂军事，而且懂政治的指挥员。通过此后几十年的工作过程，我认定：他不但是军事作战的能手，而且是具有独到见解的强有力的政治活动家；既是得力的军事家，也是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和鼓动家。他军事外交搞得好，还善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他掌握的伪满军警，不仅给人民革命军部队系统地供应了武器弹药，还经常提供情报。

如果只把崔贤看作是战将，那只能说是目光短浅的评价。有一次，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兵们看了苏联影片《夏伯阳》以后，有人在谈感想时说：

“夏伯阳活像我们的崔贤大将，好像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语气、举动、思想方法、战法……样样都像。”

崔贤听了怒气冲冲地驳斥说：

“什么夏伯阳？我崔贤就是崔贤嘛!”

这是他对别人那些看法公开表示的不满。他们惯于把他只看作粗鲁豪放的军事指挥员。把崔贤和夏伯阳等同看待，这不能说是正确的评价。在评价崔贤的时候，应该记住，他首先是历任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之一，而后才是军事指挥员。

我以信赖的目光望着充满热情和信心的崔贤的眼睛，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继续说：

“……要是我们这些种子争取到十人、百人、千人，千人又争取到万人，那么我们早晚就会争取到最广大的群众。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首先必须完成的大业。为了完成这一大业，我们就要像在南湖头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挺进到与祖国接壤的长白地区和白头山地区去，建立新型的根据地。”

他听到新型的根据地这句话，急忙支起上身，抖动了几下眉毛，说：

“什么，游击区刚解散，又要建立新的游击区？”

我对他说明了建立新型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将要新建的根据地同从前的根据地的不同点。崔贤的政治感受力实在令人惊叹，他对很多事情都能够当即理解，并把它很快接受下来。崔贤对在主体地发展朝鲜革命方面将成为一个强大推动力的南湖头会议的各项方针，表示了绝对支持。这次会议的决定把迷魂阵密营中的崔贤等所有热病患者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

崔贤对我说：

“害热病期间，我经过了多次生死关头。病情恶化的时候，也有过寻死的念头。有时还胡思乱想：死了，一切都完事，也就不再受这种痛苦了。今天见到金司令，这种杂念都烟消云散了。看着金司令的面容，就有想活的念头，有了活下来干到底的胆量。”

他对和我的会晤作了高度评价，同样，我也十分重视同他的会晤。

“你说，你看到我的脸，获得了力量；我倒觉得看到你的脸，获得了力量。我能见到在反‘民生团’的狂风中幸免于死的崔贤，有说不出的高兴。在目前的形势下，保全了性命本身就是个功劳。”

那天，我同李东伯一起巡视了密营的各个角落。

密营的医疗条件和粮食情况实在看不下去。驻在迷魂阵附近的一师七连的同志们间或弄些粮食送来，但靠那点粮食是很难供几十个人吃的。断了粮，连稀粥都喝不上，只好把霉烂的玉米芯搓搓，冲上开水喝。这种粗劣的食物也不是经常有的。

虽然有一个负责管理密营的人，但那个叫金某的人却是只顾自身安全的胆小鬼。崔贤在被护送到医院后，要那个姓金的担任负责管理密营的司务长。然而，姓金的却寻找种种借口，玩忽职守。1935年秋，崔贤在敦化地区袭击地主家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副食品埋在密营附近，可是那个人却叫苦说没有粮食，对患者一天连一两顿豆粥也不正常供应；还把照料患者的工作推给几个缝纫队员去做，自己则生怕传染上病，而跑到十多里以外的另一个密营去，吃着白米饭和荤菜，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姓金的还把站岗放哨的任务也全交给了女队员。

那时，金哲镐、许成淑、崔顺山等迷魂阵的女队员，为了护理患者都累坏了。密营里虽然有什么金副官啦、郭副官啦、刘副官啦等后勤人员，但他们搞外勤工作，无暇顾及患者。女队员们只好轮流搞缝纫、站岗放哨和护理病员。

日夜受病魔折磨的伤寒病患者，神经过敏，不断地折腾护理人员。他们喝不到凉水，渴得都要发疯了。不知什么缘故，当时人民革命军队员中传说伤寒患者喝凉水就等于是服毒的自杀行为，因而忌饮凉水。崔贤也向密营医院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喝凉水，并威胁说，违禁者要严惩不贷。追究起来，这也是因为把这一说法绝对化了。

可是，热病患者渴得失去了理智，一股劲儿地要喝凉水。甚至有些人避着护理人员的眼睛，把挂在屋檐下的冰柱摘下来解渴。这

些在游击队的纪律面前那么顺从和忠诚的人们，面临口渴，却失去了耐性，任性行事，好似一群脱缰的马。患者要凉水，女队员们就盛碗稀粥给他们。他们就把粥碗扔出去，还破口大骂。尽管这样，女队员们还是断然拒绝热病患者的要求。她们轮流站岗，睁大眼睛，守着水缸，不准患者来喝水。

有一天夜里，名叫孟孙的通信员忍不住口渴，不顾一切地朝水缸爬去。那天夜里，站岗的是女队员许成淑。她一发现孟孙，就急忙跑到水缸前，把水瓢从他的手里夺过来，扯开嗓子大声斥责说：

“孟孙同志，你忘了命令啦，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快回你的床铺去。”

口渴到极点的孟孙实在忍不住了，拿起锅台前的一大块劈柴朝许成淑的小腿狠狠地打去，然后贪婪地喝起缸里的水，喝足后，就回床铺蒙上毯子，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个通宵。

许成淑生怕孟孙保不住性命，换岗后仍没有入睡，坐在孟孙的身边熬了一个夜晚。其他的患者也为孟孙担心，怕他出事。但是，天一亮，原以为已经到阴曹地府去了的孟孙，却掀开毯子一骨碌坐了起来，一把抱住许成淑说：

“成淑同志，谢谢你。我活过来了。我喝水的时候，亏你装没看见，现在我已经退烧了。高烧都哪儿去啦？”

“从汗毛孔挥发出去的呗。你看，毯子都直冒热气哩!”

许成淑高高地举起老孟汗湿的毛毯，环视了一下病房。醒来的患者都看着那条毯子。

这样，不许喝凉水的禁令撤销了，患者开始随便喝水了。迷魂阵的许多患者都脱险了。病愈的人们和女队员一道，像过节似地准备了饭菜。

我们同刘副官一起在密营附近找到了崔贤在敦化缴获的大量粮食和肉类。从那以后，密营的人们开始吃到了有油性的菜。在多次的远征和战斗中得到锻炼的战友们，顾不得解除长期远征的疲劳，代替迷魂阵的女队员，每天站岗放哨。

当人们都怀着从病魔中得救的喜悦阔步而行的时候，我们同王德泰、魏拯民一起在迷魂阵召开了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贯彻南湖头会议方针的具体措施。金山虎、朴永纯、金明八等人民革命军连政治指导员以上的许多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解散了固定的解放区形式的游击根据地以后，开始把活动舞台扩大到满洲一带和朝鲜半岛全境，在这种形势下，南湖头会议决议提出了 30 年代后半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狠抓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性的措施。

我们准备将来把白头山地区作为朝鲜革命的中心策源地，自由地流动于南、北满洲和朝鲜腹地，开展积极的大部队军事攻势和政治活动，把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一句话，我们决心大张旗鼓地干一番。要实现这一构想，先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决人力问题，即党的力量、军事力量、全民族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力量，只有充分准备好这三种力量，才能把革命发展到新的高度。

为了满足这一时代要求，我们在迷魂阵会议上讨论了人民革命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并划定了新建的师和旅的活动地区。

会议决定，首先新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把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力量由从前的两个师增加到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根据这项决定，划分了各部队的活动地区：新组建的三师(后改为六师)，在以白头山为中心的鸭绿江国境沿岸一带进行活动；一师在抚松、安图和临

江一带进行活动；二师在间岛和北满一带进行活动；新编的独立旅，则在北满地方流动作战，逐步挺进到鸭绿江沿岸，压制出没在边境一带的敌人。这确实是一项富有战斗性的决定，它要求在短时间内雷厉风行地把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增强到两倍左右。

与会的军政干部坚决支持了这一决策，认为人民革命军的改编将推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向前迈进一步。但是，也不是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解决。在讨论执行措施的时候，有些人发出了干扰会议进程的杂音。那个杂音的基本调子是为缺乏干部而发愁。

有些人一面无条件地欢迎人民革命军的改编，一面又苦于缺乏干部而对改编工作的前途表示忧虑。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反“民生团”斗争中，人民革命军的许多军政干部被除掉了。极端的军事民主造成的后果，也是干部不足的一个因素。那时，有不少现职干部身上仍贴着“民生团”的标签。人民革命军的许多部队，不时地发出要求调派指挥员的呼声。

我们按照大胆信任和大胆提拔的原则，拟定了给新编部队派送的干部分配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三师成为我们的直属部队。安凤学留任一师师长，崔贤由连长提升为一师第一团团长。

我们在迷魂阵会议上还讨论了祖国光复会筹建委员会的组织问题。

如果说南湖头会议是划分3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革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那么，迷魂阵会议就可以说是同东岗会议、西岗和南牌子会议一道把朝鲜革命引向了40年代大变革的磴桥。从南湖头开出的革命快车，经过迷魂阵、西岗和南牌子，朝小哈尔巴岭全速急驰了。迷魂阵、西岗和南牌子是从南湖头通往小哈尔巴岭的历史进程中难忘的中继站，是寓有我们的情谊和灵魂的地方。

我对崔贤提升为团长表示祝贺，然后和他道别：

“下回在白头山地区见面吧！希望你顽强奋斗。”

崔贤抓住我的胳臂，像小孩子似地缠着我说：

“你不把我带走，我就不放开你的胳臂。我巴望着到白头山地区去，在金司令手下打仗啊！”

“崔贤同志，我对你也是恋恋不舍的呀。我也是个有贪心、有人情的人啊！可是，都到我的身边来，那别的部队怎么办呢？像你崔贤，还有崔庸健、李学万、韩兴权这样的指挥员，都各自负责一条大的战线去进行斗争，我国革命才能在广阔的大地上展翅飞翔嘛。你说是不是？我不愿意看到当了牛尾的崔贤，而愿意看到成为老虎的崔贤。”

“哎！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老虎呢？”

他连连发出几声叹息，而后眯缝着眼睛，凝视着远方。

“好吧，这回我就不再缠了。下回可不行。你做梦也不要忘记我这个崔贤啊！我做梦也要做我在你身边的梦。”

我和崔贤第三次会见，是在抚松县西岗的杨木顶子密营。不用说，崔贤企图继续搞在迷魂阵没有谈成的讨价还价。可是这回他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他一见我，就犟着要求调他到主力部队去，可还是没能说服我。

他终生希望生活在我的身边，并为此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他的种种努力，每次都给更为迫切、更为现实的诱惑让了位。这里说的诱惑，就是他愿意到我所最操心、最关注、最严峻的前线去，这表现了他的那种水晶般纯洁的良心和忘我的服务精神。

希望在我的身边辅助我，但又认为自己应当最先奔赴我所关心的最艰苦的岗位去的特有的事业心——这就是崔贤不愧为忠臣的面

貌，他的人情味的特出魅力也就在这里。在他的一生中，这两种欲望一直像双胞胎一样并存在他的心里互相较量。崔贤想同时实现这两种愿望，但一旦有了艰巨的任务，每次他都欣然离开我的身边，握紧拳头奔赴我所关注的岗位。

这是贯穿着崔贤一生的一个愉快的矛盾。他除了晚年在担任人民武装力量部和政务院的部长时，辅佐我工作以外，可以说他的一生一直是在硝烟弥漫的最前线度过的。仅在30年代后半期，他就进行了几百次战斗。三道沟战斗、五道沟战斗、小汤河战斗、黄沟岭战斗、金厂战斗、红岩战斗、黑瞎子沟战斗、间三峰战斗、那尔轰战斗、老金厂战斗、木箕河战斗、富尔河战斗、苇塘沟战斗、天宝山战斗、大沙河——大酱缸战斗、腰岔战斗、寒葱沟战斗等数以百计的大小战斗，都同崔贤的名字连在一起，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卓越的军事指挥员的才智和无比的勇敢精神。

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秘密资料中常常看到的“凶悍的男子汉”，就是敌人给崔贤起的外号。日本军警只要听到“赛根”(崔贤这两个汉字的日本音——译注)部队来了，就吓得浑身发抖。“赛根”这个称呼，成了使敌人惶恐不安的无敌将军的代词。

解放后，崔贤在一眼望得见三八线[7]界桩的最前线，武装保卫了新祖国的建设，在击退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他在东线指挥了一个军。在祖国和人民所注视的激战场上，随时都能听到崔贤满怀信心地号召战士们冲锋的号令。

崔贤离我越远，我就越感到他可亲、可爱。有句格言说，千里毗邻。就是说心近咫尺，身去千里也如同咫尺；心隔千里，身在咫尺也如同千里。我觉得，人对人的爱和尊敬，时空的远近不成其为问题。崔贤虽在比别人离我特别远的地方，但他是最贴心地辅佐我

的忠臣。从开展建国运动时起，他就一直把我的照片夹在小本子里带在身上。那照片只有普通火柴盒那么大吧。可笑的是，连我这个照片的主人自己也不清楚它的出处。可能是他被任命为旅长，前往三八线的时候从正淑那里哄出来的，这是否属实，还只能说是个未知数。他在敌后开辟第二战线，用游击队的方式开展活动的时候，一想念我，就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他决心以自己的名义表扬一个在敌后活动中立了大功的班长。班长名叫金万成。他的班在敌后活动期间取得了辉煌战果，缴获了二十二辆中卡和二十八辆炮车，杀伤敌人一百五十多个。论其军功，可获得最高一级的勋章。

然而，军部跟最高司令部失掉了联系，军指挥部里既没有勋章，也没有奖状。崔贤一旦拿定主意，就决不拖拖拉拉，立即把金万成叫来，把自己从解放初就一直带在身上的我的照片授予了他。

“这是比勋章更高的褒奖。金日成将军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你知道吧？在间岛打游击的时候，他也是我们的领袖。当年我们是多么怀念他呀。你把这张照片珍藏在身上，子弹就打不穿你的心脏。”

这段话可以算作是崔贤在把我的照片授予金万成班长时的祝贺词吧。

后来，崔贤到最高司令部来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听后挖苦他说：

“真是的，你崔贤还是那个老样儿的崔贤。可是那个金万成班长就吃了大亏啦。不管怎么说，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张照片，怎么能比得上勋章呢！”

“你说得也太刻薄了。除了我崔贤，还有谁能给予他那种褒奖

呢！将军，照片的事别再提啦。不过，将军也该表示表示意思呀，要以最高司令官的名义。”

这个反击太突然了。我不知不觉中竟上了这个诱敌战能手设下的圈套。

无限热爱战士的“老军长”，那宽广的胸怀，使我感动得差点流了眼泪。

“好，就那么办！给他照片是你的情份……我以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授予勋章吧！”

通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崔贤其人了。这则轶事里凝聚着他崇高的世界观。崔贤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要更忠实地记述他作为一个人的魅力，那该再谈些什么呢？真不知该从何谈起。他那被硝烟缭绕、被风雨吹打的历史里，可歌可泣的事迹实在是太多了。

崔贤是一个一辈子从未悲观过的乐天派，是一个在任何风浪中都毫不动摇而勇往直前的像坦克一样的男子汉。

他爱的是哪类人呢？是坦率的人、单纯的人、勤勉的人、大胆的人、诚实的人、度量大的人、不背后说人的人、善于下必要的决心的人……他爱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最讨厌的是，拍马屁的人、卑怯的人、懒惰的人、多嘴多舌的人。他对那些怀揣十二个口袋和披着十二层外皮的人，时刻保持着警惕。

他是个出名的象棋迷，这是举国皆知的。他下棋下输了，就非常窝火，以致吃饭都不香了；可是，如果有谁为了使他高兴，故意输给他或者和棋，他就更不高兴了。崔贤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电影迷。他是那样地喜欢看电影，以至于金正日组织书记还送了他一部

放映机。他最喜欢的影片是战争片。但他不喜欢死人多的战争片。

崔贤临终的时候，我多次去看望了他。他在与病魔的搏斗中精疲力尽，身躯显得非常瘦小，使人不禁联想起十多岁的少年。

当时甚至我心里想：这个瘦小的人果真是冲破两次大战的汹涌波涛，打得敌人一筹莫展的“凶悍的男子汉”——百战老将崔贤吗？他那原来木板一样坚硬的手，肌肉松弛，老茧消失，变得像小孩子的手一样柔软了。我握住他的手说：“喂，崔贤，原来像只老虎的‘赛根’怎么能这样倒下去呢？”。崔贤一听，顿时嘴角抽搐，呜咽起来。

我用手绢揩拭他的眼泪，让他镇静下来。

“崔贤同志，别哭啦。哭会伤气的。”

“主席，我是想起了迷魂阵才……那时，你也是这样握住我的手的呀！”

“迷魂阵，对，我也不由得怀念当年哪。那时虽然很苦，但我们都曾是精力旺盛的二十几岁的青年啊！你那时是三十岁吧？”

“是的。照现在的计算法，是二十九岁。我还记得当时和主席手握手立下的誓言：‘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吗？”

“记得。怎么能忘呢！”

“可我不能信守那个誓言了，就这样先……主席，我真对不起你呀！”

“不，是我对不起你。要是我对你照顾得更好些，你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只顾让你工作，而且又专找艰巨的工作叫你去做。我真后悔啊！”

“不是的。是我一辈子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即使我死了，你可要健康长寿，统一祖国。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呀！这是我崔贤的最

后请求。你太不顾自己的身体啦。”

据说，崔贤在去世前只讲了我的事。

每当辅佐我工作的干部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问！“领袖身体好吗？金正日组织书记同志健康吗？”

我让崔贤一辈子做艰巨的工作，我感到万分痛心，便指示摄制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故事片，在全国放映。这就是故事片《革命家》。

崔贤在家庭里的功劳，是把妻儿培养成了一心拥护党和领袖的忠臣。

他的爱人金哲镐是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百折不挠的老战士。她在敌后搞过地下工作，也和我们一起搞过武装斗争。金哲镐作为一个女同志，冒着零下四十度上下的严寒，在满洲的崇山峻岭和林海雪原里，手持武器同敌人展开历时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比北极探险更要难。敌人来“讨伐”的时候，她被枪声惊动，在雪堆里生了孩子。在没有接生员的情况下，她自己掐断婴儿的脐带，接着就同追来的敌人展开了枪战，她是一个不死鸟般的女同志。她是那样地珍视打游击时那些饱经风霜的战斗岁月，因此每月一定有一两次给孩子们熬整粒玉米粥吃，一直坚持到去世。

崔贤是引导金哲镐走上光明道路的忠实的发动机，而金哲镐则是使崔贤多灾多难的一生百花盛开的温暖的光照。

她和丈夫怀着在白头山的雪堆上锻炼孩子的心情，对孩子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她生育的儿子们，现在都在金正日组织书记给分配的岗位上，为以民为天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增光添彩，为培养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成为忠臣而积极工作。

青年总队长崔龙海是崔贤的儿子，在举办将成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纪念碑的第十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方面立下了殊

功。他的母亲金哲镐逝世那一天，他用很短的时间参加葬礼后，就马上赶到人民文化宫参加旨在促成联欢节的国际筹备委员会会议。我听到这一报告，心想，真是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啊！

苹果树结苹果，梨树结梨，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也完全一样。在白头山下，必然出生具有白头山精神的后代。革命的第一代人在狂风暴雪中呕心沥血开拓和发展的朝鲜革命，由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在金正日组织书记的领导下，以忠孝一心的精神不断地继承和完成，这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我确信，我们的后代一定会无限忠于先烈的那种理念。优秀的前辈的怀抱里，必然有优秀的后代成长起来。

第十二章

为了早日迎来
光复的新春

时期：1936.3 一 1936.5

一　新师的诞生

我们一行离开迷魂阵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人。包括两个小传令兵和吴白龙等十名警卫人员、金山虎以及在和龙的一个偏僻山村当过私塾先生的“烟斗老头”，这些人就是我率领的全部人马了。从官地就跟随我们来的江清团的一个连，也为了同北满部队汇合而开往依兰县方面去了。

我虽然轻装简从，但一想到长期的愿望就要实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尽快挺进到抚松去吧。到了马鞍山，那里会有二团的同志们在等着我的。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一个无敌的新师。”这就是我离开迷魂阵时的心情。

组建新的师，这是在贯彻我国革命的主体路线方面必须最先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现在谁也不敢指责或毁谤我们致力于朝鲜革命了。在我们长期以来探索并铺设的朝鲜革命的轨道上已没有任何拦道木了。只要沿着这一轨道径直向前奔驰，就能到达欢庆祖国光复的广场，也能到达人民的国家这一新天地。为此，就要制造将在这一轨道上奔驰的火车头和车厢，建立起有力的调度指挥处。

朝鲜革命的火车头是什么？可以说就是我们要新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师。

我们要建立的祖国光复会可以比作是挂在火车头后面的列车车厢。我们即将要占据的白头山则可以说是朝鲜革命的调度指挥处了。

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去执行这些任务。

那时我们构想的新师，并不是只开展军事活动来压倒日本帝国主义军警的那种本来意义上的师。这个师既要开展军事活动，又要作为政治工作队，具备新的面貌，执行新的任务：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去，把党组织网扩大到国内各地，并通过祖国光复会和其他各种反日组织，领导全体人民投入反日抗战。当然，这是别的师也应当执行的任务，但必须有一个站在所有部队前列起带头作用的主力师。因此，我将这个新的主力师的特征规定为朝鲜革命的火车头。

那么，该用何种方式组建将起朝鲜革命的火车头作用的强大主力部队呢？

和我商量过这个问题的人，大体上都主张要把分散在抗日联军各部队的朝鲜青年全都调回来编成一个大集团军，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去。有些战友则力主从第二军所属各部队中，特选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组成主力部队。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意见的提倡者毫无例外地都没有考虑到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并肩战斗的中国同志的命运和我们的联合斗争的发展前途。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是先组成主力部队再说。按现在的说法，就可以说是部队本位主义了。

最后，我决定把随我去过北满的几百名远征队员分给苇河地区的各部队，我们则到抚松去，以那里的第二团的人员为基本成员，再吸收东满和国内的优秀青年，建立新的主力部队。

我们离开迷魂阵的时候，王德泰把他们袭击敌木材所缴获的二十多匹马送给我们，说：

“金司令把精心培育的勇士们都分派给北满部队，现在匹马单枪离去，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请你们骑上这些马，权当旅伴吧。看来这些马是受过训练的，会有用处。”

我们一行骑着这些马上了南行之路。行军途中曾丢过三匹马，那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放这些马随便吃草。其中三匹马走入我们视野之外的树林里去了。我看准附近没有敌情，便叫传令兵放两枪。枪声一响，那三匹马就从这里那里直冲我们跑过来了。

我们在一个山沟里遇到了过去的车厂子游击区人民，便把这些马都给他们用做役畜了。

这一年的南下行军从北满的小家琪河山沟出发，到我国北端的偏僻山区小白水山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次行军中，使我们吃了最大苦头的，就是从迷魂阵到马鞍山这段路程。

我们一行人数虽不多，却到处都有敌人挡路，这就迟滞了我们的行军。我们从离开迷魂阵的第二天起，每天都要打一两次仗，有时甚至打三四次仗。敌人有时连做饭补衣的时间也不给我们。那“烟斗老头”，说是饭可以不吃，烟一天也不能不抽。就是这样的人有时也整天没能叼过一次烟斗。敌我交战是多么频繁，就不难想象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能找个幽静的地方，匆匆做饭，烤烤湿鞋。但就是在夜里也得不到充分休息。因为人员太少，派岗哨也有困难。一次至少要派一名门前哨、两名山脚哨和两名了望哨。除开伤号和护理人员，换岗就缺人了。所以我也替队员站过多次岗。有一天夜里，金山虎在查岗时发现我在站岗，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似地闹了一阵。他说司令官太娇纵队员了。金山虎一闹起来，就很难说服他。于是我抓住他恳求说：

“你千万不要这样。你想想那些小战士们。他们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又要站岗，该多么累啊。我替他们站岗，又能站几个夜晚呢。只要到了马鞍山，人就多了，我就再也不会有替人站岗的机会啦。”

金山虎看到无论怎样劝说也没有用，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哨所。

我心想：快去马鞍山吧，到了马鞍山就会有无数战友来拥抱我们，就会得到温暖舒适的安息处，那时，我们经受的艰难困苦就会结束了。

虽然我们饿着肚子，又得不到休息和睡眠，疲于连日的行军和战斗，但这一希望给了我们力量，使我们鼓起了勇气。

地处南下行军路程中间的安图和抚松，无论哪个山沟或山岭都是我熟悉的山川，一木一草都勾起我深情的回忆。松江、兴隆村、十五里、小沙河、刘家粉房、富尔河、大甸子、柳树河、南甸子、杜集洞、万里河、奶头山等地，都和我的青春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阔别多年，重新踏上这熟悉的山山水水，我不禁心潮澎湃。

我们一行登上了大西北岔的西边山峰的时候，我眼前突然展现了勾起我无限感慨的奇景。山脚前的小小村庄，是在加紧筹建抗日游击队的日子里我乔装长工做过地下工作的难忘的村子。我脚下的这座山峰，也是当年我和地下组织员开过无数次会议的地方。的确，这里的每棵树、每丛草、每块岩石，都使我不能漠然视之的，感到亲切。

我回忆着往事，向南远眺连绵不断的山峦，忽然曾在四年前宣布抗日游击队成立的小沙河台地映入了我的眼帘。从那个台地上再往下走不远，母亲的坟墓就在向阳的山脚下。

沿着这条留有当年脚印的山路，径直到母亲的墓前磕个头，然后再到抚松去如何呢？这种深情的迷恋紧紧地缠住了我的心。

我向草皮疏疏落落的母亲坟墓告别，挥泪离开土器店沟，不觉已经快四年了。四年了，坟头上草皮可能早已扎下根，现在，新芽也可能在枯叶间露出了脸吧。我恨不得马上飞去把脸贴在那嫩芽上，

同九泉下的母亲说说话，哪怕是短短的一瞬也好。一行人都下山了，我还不知道。呆呆地站在山上。

也许是因为节气已近寒食，我对母亲的怀念就更加强烈了吧。听说，在阳地村的我父亲的坟墓，由康济河先生一家人每年两次去上坟扫墓。可是在土器店沟的我母亲坟墓怎样了呢……

“将军，您为什么不下山？”已经下山的崔金山又转回来，用惊疑的目光望着我问。

我这才从冥想中醒来，向前迈出了步子。

崔金山两手作环状贴到我耳边小声说：

“将军，您怎么啦：听说您母亲的坟墓在小沙河，或许……”

在年轻传令兵像透视人的内心般的惊人判断面前，我不得不倾吐自己的心声了。

“对！我是在想念母亲来着……”

“将军，那不就得去探望一下吗？”

“我真想去看看，可是时间不允许呀。”

“小沙河近在咫尺，却因为时间紧，就不去探望母亲的坟墓，岂不太那个了吗。听说，您还有个弟弟，也在土器店沟呢……”

“即使有时间，我也不能去呀。我母亲不希望我那样做。”

“这就怪了。母亲为什么不希望那样做呢？”

“我母亲留下遗言说，朝鲜还没有独立，就不让我迁移她的坟墓。今天我不去探望土器店沟的母亲坟墓，就是因为尊重她的遗言。”

崔金山听了这段话，还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

“难道说去探望了母亲的坟墓，就不能实现朝鲜独立了？遗言归遗言，将军，还是去一趟吧。”

“不，不能。母亲生前，我未能尽孝。母亲已经去世，但我还

是应该为母亲尽一片孝心。你不要再劝我了。再说，我还没干出什么大事，怎么能去探望母亲的坟墓呢？”

金山虎和吴白龙也来劝我去一趟，可是我没有听从他们。然而我的心还是飞到土器店沟的母亲身边了。我一面下山，一面从心里向母亲敬了礼。

“母亲，我此行实在匆忙，不能到土器店沟去了。母亲的坟墓常年累月受风吹雨打，可我没能在坟墓上添一把土，芟除一根杂草，现在重新踏上安图的土地，我实在惶恐不安。这其间，两个弟弟，我也没有照顾好。哲柱去年阵亡，连他的遗骸在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母亲，朝鲜革命面前展现了康庄大道。我准备到马鞍山去组建一个大规模的师。我将率领这支部队占据白头山大干一番。我要是不能光复祖国，就遵照您的遗言，决不去探望您的坟墓。请您相信我，等着我吧。我一定光复祖国，把您的坟墓迁移到万景台去。”

我们朝马鞍山加快了行军步伐。我们对这次马鞍山之行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在林海中出现了形似马鞍的山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马鞍山！”

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人参圃。地头有两个简陋的原木房，里面空无一人。天麻黑，才在深山沟里又找到了一个小原木房。在那个有两三个人避居的原木房里，我们见到了正在烧土豆吃的一师政治部主任金洪范。

“二团哪里去了？”

“这个月初，远征蛟河去了。”

金洪范从容不迫的回答，对我来说无异是个晴天霹雳。二团不在，这意味着我们从在南湖头时起就一直盼望组建的主力部队，就

不可能组建了。这就等于我们指靠的大树倒下了。

第二团，是从作为独立团进行活动时起就以英勇善战的“高丽红军”出名的清一色的朝鲜人部队之一。这个团是从东满的延吉、汪清、和龙等各县游击区各选出一个连组成的。部队的大部分人员都和我有密切的关系。团长尹昌范，团政委金洛天自不消说，权永壁、金周贤、吴仲洽、金平等团的骨干分子也都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

1935 年 5 月，第二团的战斗员们响应我的召唤，来到汪清县塘水河子，这是我同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十多天，组织他们学习和训练，也叫他们打过仗，他们的进步很快，并不亚于我率领的部队的战斗员。他们就是把车厂子游击区牢固地防守到最后、创造了“不屈的车厂子”这一新传说的英雄。

在我们踏上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征途、车厂子游击区解散后，第二团就挺进到南满，这年年初又经由安图县奶头山转移到抚松县马鞍山来了。原定第二团把指挥部和后勤基地设在马鞍山，在抚松地区等我们一个冬季。这就是我们在南湖头得知的有关第二团活动情况的全部内容。开往马鞍山的时候，我把远征北满的全体指战员都分派给了别的部队，是因为估计到接收了第二团，就可以以它为基础组建一个新的师。

“没收到我们给二团的信吗？”

我一到迷魂阵就曾向二团派去通信员，指示他们不要移动，要在这里等我。

“没收到。二团去远征后，谁也没来过这里。”

那么说，通信员肯定在路上遇到了不幸，即使他安全地来到了，也是见不到二团的。

“二团远征蛟河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那我也……”

“他们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说。”

“谁带去的？”

“团长张传述和团政委曹亚范。”

“都去远征了，那么留在马鞍山的只有你们几个啦？你们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转过话题这么一问，金洪范竟作出了令人更吃惊的回答：

“那个人参圃密营里有一百多名‘民生团员’，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监视他们。”

“什么‘民生团员’那么多？人参圃旁边的原木房是空的呀。”

“‘民生团’嫌疑分子现在都到临江蚂蚁河方面弄粮食去了。”

“既然可以去做筹粮工作，怎么会是‘民生团’呢？”

“总不能让他们饿死嘛。”

“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都有证据的。有坦白书、供词、审讯文件……”

金洪范从幽暗的屋角落拉出一个偌大的文件包裹，说：

“这些都是那种文件。”

为了见到二团的同志们，我排除万难，千里迢迢赶了来。可是，马鞍山给我的“见面礼”却是这个“民生团”文件包裹。包裹那么多，放满了一屋子。

当我面临的不是欢呼声和热情的拥抱，而是一个偌大的霉味扑鼻的装满犯罪记录的包裹时，我浑身发颤，好像陷入了被欺骗和被愚弄的深渊里。

一听说“民生团”这个字眼，就令人毛骨悚然。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曾在游击区猖狂肆虐的搞反“民生团”斗争的魔鬼，还在兴妖作怪，折磨那么多的人呢？再说，这个破古董般的文件包裹又怎么跟到这儿来了呢？

自大荒崴和腰营沟的激烈争论后，快有一年了。我们在一个半月前才听到共产国际下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内容，也许还没有传达到这里。可是，“民生团”是捏造的，这一呼声响遍东满大地已经很久了，以反“民生团”为名的鬼把戏，怎么到现在还在持续？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甚至把金洛天这样的人也都干掉了，怎么还嫌不足，又要把那一百多名好端端的人置于死地呢？

我命令金山虎立即向临江蚂蚁河方面派去通信员，把他们全都找回来。然后我解开“民生团”文件包裹，开始一页一页地查阅那些文件。

我通宵不眠地查阅了那些文件，第二天也继续看，我越看就越深地陷入了迷宫。在这些纸张上那么生动地记述着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严重“罪状”。

“啪”的一声我把文件阖起来了。查阅这种文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如果相信这些纸张，那就只能带来失去这许多人的后果。我们不相信不管是什么墨水都吸收的白纸上的字。

到临江县蚂蚁河方面去的有“民生团”嫌疑的人们，一接到我们的口信，就马上启程，翻越险峻的龙岗山脉，用两天时间就走完几百里路程，回到了密营。

我接到他们已到达人参圃密营原木房的报告，便带着金洪范去看他们。

我打开了结满冰花的房门，只见衣着褴褛不堪的人们挤满了一屋子。没有一个人向我行礼，也没有人作迎接报告，连抬头望我一眼的人也没有，屋里一片沉默，鸦雀无声。这的确是一场没有激情、没有欢呼、没有眼泪的奇特的重逢。我心想：难道他们被压制得这样惨吗，难道连抬头看人的权利、向人问好的资格都丧失了吗，就是犯了再大的罪，也不能这样垂头丧气，也不能这样寒碜啊。

“这其间，你们可受苦了。……”不知怎么，我喉咙哽咽，说不下去了。“我见到了你们，连句问好的话都说不出来。虽然如此，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为了和你们见面，从北满的镜泊湖畔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了。”

对我的寒暄话，没有任何反应。屋子里仍是一片沉默，连呼吸声和咳嗽声都听不到。开始抗日战争快四年了，队员们从没有这样迎接过我。

我接着说：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见到第二团的同志们，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挺进到白头山去打仗。可是，我来到这里，听说，有用的人都到蛟河方面远征去了，留下的都是坏人。我查阅过你们的‘民生团’嫌疑文件。

从文件来看，你们没有一个不是‘民生团员’。我认为，单凭文件是不能对你们做出判断的。只有听听你们亲口说的话，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不要害怕，也不要看人家的眼色，坦率地说实话吧。”

我的呼吁，没能打破厚冰般的沉默。

我问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青年：“你先回答吧，你加入了‘民生团’是真的吗？”

他低着头，犹豫了一会，支支吾吾地说：

“是，是真的。”

我没有期待他作这样的回答，而是期望他会捶胸流泪，大声疾呼，说自己不是“民生团”。这个青年的回答，使我大为失望。

我又问一个大个子的青年：

“李斗洙，你说，你加入了‘民生团’是真的吗？”

这个年轻的排长是江原道春川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有血海深仇。他的右大腿上有个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有一次，我问他是在哪次战斗中受的伤。他说那是被狗咬的。

他说那是他十来岁时的事。在以粥充饥的麦口期，有一天，他了解到家里连一勺盐都没有了，便上山打了三捆柴禾到集市去卖，用这笔钱买了一升盐。他把盐袋挂在背架顶上，得意洋洋地往回走。当他路过一个日本人家的门前时，一只凶恶的狼狗突然扑上来咬住了他的大腿。放狗咬他的日本孩子躲进屋里，大门上了闩。目击者们义愤填膺，背着浑身是血的斗洙到警察署去控告和抗议，大腿被狗咬掉了一大块肉，伤口惨不忍睹。人们把他背到医院，让他住院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医院的治疗，还顿顿吃大米饭。这个喝粥喝厌了的蓬头少年，为能吃到大米饭太高兴了，生怕伤口愈合得快。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住院会给他自己和他家带来偌大的灾难。他以为治疗费是由狗的主人来付的。

不久后，医院宣布，不付钱就不再给他治疗了。治疗费竟要二十圆钱。每月两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小学只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的穷少年家，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

李斗洙的祖父、父亲和哥哥轮流去找狗主、警察署和医院，求

过情，提出过抗议和控诉。可是，哪儿也不理被害者的诉苦、抗议和控诉。他们说，被狗咬，其责任在于被咬的人。他们都是些日本人，不会替朝鲜人着想的。

到头来，还是借来二十圆钱付了治疗费。这笔债利滚利，两年后，把他家祖传的房子卖了也还不清债。

李斗洙一家被债逼得再也无法在春川过日子了，只得背井离乡，踏上了北行之路。债主们发现他家夜里出走，就一直追到二十里外，从斗洙祖母的包裹里抢走了他家仅有的家产一匹丝绸。

他家原是李朝王室的后裔，曾住有厢房和下房的八角大瓦房，还有几町步的土地，受到过众人的尊敬和羡慕。可是现在，失去了王朝、祖国、家园，最后连仅有的一匹丝绸也被抢去，变得一贫如洗，踏上了流浪之路。

在流亡异国的斗洙幼小的心里勾起亡国的悲哀和离乡的悲痛的，是从元山开往清津的轮船食堂招待员凄凉的声音：

流亡异国的父老兄弟们，你们的悲哀和痛苦已到极点流浪者的血泪犹如东海海水，可是用叹息和眼泪是打不开活路的，望大家忍着悲痛，吃一顿用祖国的米和水做的告别饭吧。

招待员的几句充满同情的话，使少年李斗洙喉咙哽咽。

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失去了家园和故乡，被迫别离可爱的祖国山川，少年李斗洙的心里充满了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下定决心，将来长成了大人，决不让一个日本鬼子、甚至他们的一条狗、一只猫出现在我们朝鲜的土地上。

李斗洙还没长成大人，就扛起枪参加了游击队伍。这样的人是决不会加入“民生团”的。然而，他的回答却和前一个人完全一样：

“是，我加入了‘民生团’，是真的。”

他的回答和态度，同我去小汪清梨树沟关押“民生团”的监狱时张猎手起初对我说的话和态度，一模一样。

我克制着心中怒火，对他说，你如果加入了“民生团”，就向大家具体地说说，是怎么加入的。

他吞吞吐吐地照坦白书和供词的内容，讲了一遍加入“民生团”的经过，他讲得那般合情合理，根本没有置疑的余地。

“民生团”嫌疑分子都一致承认了自己的“罪过”。

我耐心地再次问李斗洙：

“李斗洙同志，你因为日本人的狗，欠了债，丢了家，失去了故乡。日本鬼子的一条狗，不只咬掉了你身上的一块肉，还残酷地破坏和践踏了你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你因为日本人的狗，落到了连狗都不如的境地。到了现在，你却自动投入敌人的怀里去，变成了残害自己同胞、咬自己同志的疯狗，难道真是这样吗？你连敌人的一碗淘米水都捞不到喝，却当了敌人的走狗，难道这是真的吗？”

李斗洙只是掉眼泪，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咬住嘴唇呜咽得浑身发颤。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续了很久。我走出了那个可诅咒的原木房。新鲜的空气逐渐解消了我心中的烦闷，消了火气，迷迷糊糊的头脑也清醒了许多。

我同那些“民生团”嫌疑分子谈话，发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现象。

被敌人拉到刑场的我们的战士们，大都受到过中世纪宗教刑罚似的毒刑，但他们对自己干的事也一口咬定说“不知道”。这种果断精神在死刑面前也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们在与他们一样的共产主义者面前，却对自己没做的事也说做了，不对的也说是对的。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我在林中踱着步，反复琢磨“民生团”嫌疑分子作自戕式的回答的理由究竟何在？

那些人都没有加入“民生团”，这是天不能变成地、地不能变成天一样的真理。可是，他们为什么自己给自己头上加罪名，说自己加入了“民生团”，承认自己干了“民生团”活动呢？

嘎呀河的少年朴昌吉、马村的张猎手也曾把自己的假供词硬说是真的，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被打成“民生团”嫌疑分子的时候，起初他们都曾照实说自己没有加入“民生团”。可是他们的这种真情实话却给他们招来了更大的灾祸。真情被看做是虚假，实话被当做是欺瞒，坦率被认为是狡猾。越是老实坦白，捏造的罪状就越加严重，拷打也就成正比地加重。

当野蛮的拷打和烦恼达到极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质变呢？

他们可能陷入这样的自暴自弃状态：既然受到了多年来同甘共苦的革命同志的不信任和虐待，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要想活，就得丢掉枪下山去在归顺书上盖个章，或者当敌人的走狗。我们名为共产主义者，怎么能干出这种背叛行为呢？还是听凭处理是上策。

受到为共同目的而战的同志的冤枉、误会和不信任，这就是驱使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陷入极端的绝望和自暴自弃状态的根源。

革命者的集体不是为了金钱和追求利润而结合起来的，而是以共同的理念为基础，以思想和情义紧密结合起来的。在这个集体中，互相信任可以说是保证这个集体的统一团结和巩固发展的第一生命。靠互相信任的力量，集体的每个成员爱护同志，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这种共产主义道义支配着整个集体。

对朝鲜的革命者来说，信任是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我们过去用信任这个武器获得了同志，团结了人民；今天也靠爱和信任这个有力武器可靠地保持着我们社会的一心团结。在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我们社会，信任是支撑着社会的牢固基石。当组织信任自己、同志们信任自己时，我们的党员和劳动者就感到最大的光荣。但是，认为组织不信任自己、同志们疏远自己时，他就感到最大的痛苦。我每当和干部们见面时，一再强调要做好人的工作，其理由就在这里。

资本家没有钱就活不了，而共产主义者则得不到信任就活不下去。在我国，互相信任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是集体主义的存在方式。认为组织信任自己、同志们信任自己的人，就能在为党和祖国而进行的工作中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信任育忠臣，猜疑出逆贼，这个格言不就是反映了这个道理吗。

在寄居异国进行联合斗争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的队伍中破坏了互相信任原理的“民生团”毒瘤，给一心信赖组织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战士们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和损失，这是任何人都可想象得到的。那时，敌我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只要翻一座岭，过一条河，就有敌人。如果那些失去了信任的人说，革命嘛全由你们包下吧，便跑到敌占区去，那也拿他没有办法。给无辜的革命同志扣上“民生团”的帽子，这无异于把他们都一脚踢到敌阵去的妄动。

挽救陷于绝望的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解除成为不信任这个绞索的“民生团”嫌疑，彻底销毁这个绞索不留痕迹。光靠说空话是不能使人们的政治生命复活的，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我走出树林，朝原木房走去。这时，有个女队员突然从树后走

到我的面前。她身材苗条，面貌清秀，两眼炯炯有神，看来性格也爽朗大方，却满脸泪痕。

“将军，我不是‘民生团’。”

女队员的这一句话，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惊喜。

“我是因为同有‘民生团’嫌疑的人结了婚，才被打成了‘民生团’的。可是，他不是‘民生团’，我当然也不是‘民生团’。我们怎么能当日本鬼子的间谍呢？我和张哲九大娘都是因为丈夫才冤枉地被打成了‘民生团’的。”

这位勇敢的女队员就是金确实，后来，她在抚松县城战斗中一下子刺杀了六个敌人，得了“女将军”的外号，作为嘉奖被授予金戒指。

她是火田民的女儿，在车厂子参加了游击斗争。车厂子游击区东南岔的密林里有朴永纯同志负责的武器修理所和朴洙环同志负责的缝纫队，金确实为这两个单位的二十多名成员当炊事员。

有一天，不料武器修理所发生了爆炸事故。修理所房屋顿时淹没在滚滚的硝烟和火焰之中。在那里工作的人们都被爆炸声吓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可是炊事员金确实却冲进烈火熊熊的屋里去，把一个受烧伤昏倒在地的青年背出来。这个青年叫姜渭龙，是被打成“民生团”开除出武装队伍到武器修理所工作的。他在做步枪子弹再生作业时，火药突然爆炸，受了伤。他脸部烧伤严重。可是，军医只是用消毒水消毒后，把烧焦的皮肤剪下，再敷些凡士林，缠上绷带就算了事。在那以后就由金确实做护理员给他治伤。她给伤口贴上涂了蜜蜡的纸，还给他擦掉眼眵，帮他洗脚。金确实在精诚护理他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了感情，小伙子也爱上了她。不久，他们的结婚问题提到了日程。可是，因两次走火事故被打成“民生团”

嫌疑分子的姜渭龙，怕连累金确实，只是秘密订婚，对正式结婚却犹豫不决。朴永纯和朴洙环鼓励他们说：“这有什么可犹豫的，既然订了婚，就一鼓作气，结婚嘛。”这对恋人从中获得了勇气，到车厂子人民革命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可是这个结婚就成了问题。肃反工作委员会认为同“民生团”嫌疑分子结婚就是使“民生团”人数加倍的反革命的利敌行为。他们结婚还不到半个月左倾排外主义者们就把金确实同姜渭龙分开并赶到王八脖子去了。他们不让金确实参加组织生活，当罪犯对待，后来，把她撵到“民生团”嫌疑分子他们那里去了。

金确实被迫同爱人离别九个月后，得知姜渭龙随武器修理所转移到了近处，可是因得不到曹亚范和金洪范的允许，还没能同爱人见面。

不久后，姜渭龙被曹亚范逼着随二团远征蛟河去了。远征队必需有掌握武器修理技术的人，这使“民生团”嫌疑分子姜渭龙也被拉到蛟河方面去了。

“如果老姜真是‘民生团’，那我就决不会跟他结婚，也决不会从烈火中把他救出来。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在敌人‘讨伐’时被杀害了。他打仗也打得很好，不然，怎么会连救国军都在公审大会上为他辩护呢。”

金确实向我作这样的表白，我十分感激。

金确实同张哲九一样，因爱情成了“罪犯”。

我带着金确实回到了原木房。人们和刚才一样，都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环视了一下屋内，有力地说：

“同志们，抬起头来吧。我不是来向你们问罪，向你们宣布判

决的。我是来找将要一起到白头山去作战的战友的。我是来看战友，来找革命同志。可是有人说，这里的同志都是不能成为我的战友的亲日叛徒和反动分子。我不相信这话。如果你们加入了‘民生团’，那就该投奔日本人那里去，何必在深山里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受难呢？回家去娶个媳妇或找个丈夫，种庄稼，在热炕头上过日子，该多舒服，何必在山里受苦呢？你们自己说说，难道你们是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才多年来自找苦吃的吗？你们在这荒凉的满洲旷野，在冰天雪地上风餐露宿，难道就是为了当日本鬼子的走狗，害自己的骨肉和同志吗？李斗洙同志，你说说，你就是为了变成一头像咬了你大腿的日本人的狗一样的畜生，才艰苦奋战的吗？”

李斗洙呜咽着大声说：

“我，我……怎么能做日本鬼子的走狗啊！我不是，我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不是‘民生团’！”

接着，喊声此起彼伏。

“我也不是‘民生团’。”

“我也不是。”

屋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集会，谴责那些捏造莫须有罪名的人，控诉在“肃反”的矛头下所受的痛苦。

所有的人都挥动着拳头，流着泪，倾诉了心中郁积的怨恨。

集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金洪范叫来，指示他准备焚烧“民生团”文件包裹。金洪范大惊失色，说：

“那是肃反工作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性文件，怎么能不经允许擅自毁掉呢？烧了它，会惹出大祸来的。”

金洪范是早在参加武装队伍以前就专做党务工作的老政治干部。他延吉师范学校毕业，有知识，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不善

于创造性地思考、能动地判断和处理问题。

“不要搬出什么法律，快去把‘民生团’文件包裹拿来。哪里有别人做不到的事我们也不该做的道理。”

“那是根据组织的决定，经过必要的程序制定的文件，如果追究我为什么眼看着文件被烧毁，没有制止，那我怎么交代呢？那时候，将军就不在这儿了，我怎么能负起这个责任啊？”

金洪范的脸变得煞白，两腿直打战。我没有怪他。其实，我也没听说过：有人擅自烧毁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却没惹出祸来。这种事，恐怕是很罕见的吧。

但我的决心是坚定的，一定要彻底烧毁这个只会给一百多名“民生团”嫌疑分子带来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绝望的罪恶的文件包裹。

我很清楚，我下这一决心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只有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肃反”运动、写成了审问记录的当事者才有权处理的事，竟然由我来处理，这确实是一种冒险。那些“肃反”的凶手们具有巨大的权限和无限的捏造本领，他们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看做是“民生团”干的勾当。他们单凭烧掉一张审问记录的“罪过”，就可以惩罚我千百次。他们是些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我这个把反“民生团”问题提到共产国际去的人进行报复的人。

我叫金山虎把那个文件包裹拿来。

烧毁“民生团”文件包裹，这确实是个果敢的决心。当时我决心，要是我舍弃个人的生命就能挽救这一百多名同志，那么不管什么事，我都去做。

做好烧毁文件包裹的准备后，在结束集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说：

“今天很难断定谁是‘民生团’，谁不是‘民生团’，因为谁也不能证明它。但是，今天我向大家明确宣布的是，现在这里没有一

个‘民生团’，因为你们都否认自己是‘民生团’。我相信你们的话。大家要知道，从这一时刻起，你们把过去化为一张白纸，一切都重新开始。不清不白的过去，已不再存在了。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作为革命者的真正价值，不是凭过去，而是凭今后的实践活动决定的。现在你们都拿到了人生的白纸。在这张白纸上能留下多么有意义的生活和斗争的记录，这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重新开始，在这张白纸上写下可以在祖国、人民和历史面前夸耀的斗争业绩。现在我声明从这一时刻起，完全取消曾百般折磨了你们的‘民生团’嫌疑，同时宣布你们大家都站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队伍里。”

我从所谓的“民生团”嫌疑分子的人中选出几个人，让他们把文件包裹堆在院子当中，然后由我点了火。

在放火烧那些文件的时候，我心里强烈希望，不仅要烧掉强加在所谓“民生团”嫌疑分子们身上的不光彩的历史，而且还要永远消灭一切恶行的精神根源——憎恨人和不相信人的思想。

时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仍不能忘怀当年的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心里的祈求太大、太深刻的缘故吧。当文件包裹熊熊燃烧的时候，队员们都放声大哭起来。

那时望着那火焰失声痛哭的人们，真正理解了我的心。

所有在场的人都变成了另一个人。队伍里形成了真心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爱护的新风气，连金洪范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第二天，我有意安排了狩猎作为休息。金洪范得知这事后，把藏起来作护身用的一百多发步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他把自己护身用的子弹全都送给那些直到昨天还当做囚犯对待的人，

这确实不能不说是一大变化。

原来给他们只发了套筒这类只能当做木棍用的武器和三四颗潮湿生锈不能用的子弹。他们的弹带里插的是用木头做的假子弹。看来，那些人害怕如果他们得到了能用的枪和子弹，他们就会进行报复。

金洪范望着烧得只剩了些灰的“民生团”文件的痕迹，沉思了片刻，对我说：

“昨天将军在这里点火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偷偷地离开了这里。因为我想到，单凭烧毁文件时在场这一点，就足以把我打成违法大罪的同谋者而遭到杀害。”

“现在不害怕了吗？”

“我一想到因支持正义而死是光荣的，心里就不害怕了。”

“你这么说，我很感激。”

“不，是我应该向您表示感谢。将军拯救了我，使我做了新人。您对我也是恩人啊!”

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金洪范比我岁数大。

“你不要把一个年轻人捧到天上。”

我这样抢白了一句，他却摇摇头说：

“不，不是的。我真钦佩您的度量和宽大胸怀！这决不是奉承话。”

“少说捧人的话，今天咱们也一起去打猎好不好？”

金洪范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这天的狩猎特别有意思。我把警卫人员的枪都借给他们，让他们都用好枪放了一枪。

多亏赶围的人多，这天打了七八只野猪和狍子。在女队员中金

确实只一枪就打中一只狍子，露了头角。

我指示队员用野兽肉和还剩的玉米、白面做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还开了娱乐会。

那天在马鞍山人参圃密营破败不堪的原木房里举行的晚餐会和娱乐会，虽然十分俭朴，但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新的师虽没能按当初计划以二团为基础组成，却在把充满不信任这种罪恶的文件烧成一堆灰的烈火中诞生了。

“民生团”文件包裹被烧毁、新师诞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四方。避居各地的人们都闻讯赶来了。

最先来的是避居在大碱厂山沟的和龙的反日自卫队员们，后来当了司令部传令兵的白鹤林、以“黄莺”出名的金惠顺也在其中。

朴禄金(本名朴永姬)来找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当了暂编在新师中的第一个妇女连的连长。

在抚松县老母顶子，我把那些患伤寒的青年们编入了新师。我以这些青年组成一个排，任金正弼为排长。在安图县五道扬岔附近的树林里进行活动的金周贤一伙也找我们来了。车厂子方面的金泽环的小分队也赶来了。

我正式组编了团和连。我任命外号“楞头青”的李东学和金泽环为连长，任命金周贤为政治指导员。金山虎担任了团政委的工作。从此，他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到马鞍山的时候，我们的队伍还只有十五六个人，可是到了东岗，已增加到几百人了。

为了改善新组建的主力部队的武器装备，我们开展了积极的斗争。

前面已经谈到过所谓“民生团”嫌疑分子们带的武器大都是套

筒。我组织以十至十五名为一组的小组，并指定其负责人，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能打仗的准备。我对他们说，从现在起，要在一个月内补充好子弹，换上枪。日本鬼子那里有的是枪。可以在树林里设伏，当敌人路过的时候，猛扑过去用枪刺刺，或放它一枪，夺取敌人的武器。当时，他们腰间都佩带了一把枪刺。他们没用一个月，而只用了半个月就都胜利完成任务回来了，补充了大量的子弹，枪也换上了新的。有的队员还缴获了机枪。

我以他们为基干组织了一个团。后来又根据这个经验，一个一个地吸收队员，组建了第六师和第二方面军，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把主力部队的武器装备一下子全部改善，是在继西南岔战斗又进行了西岗战斗之后。这次战斗的目的之一，就是完全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

当时，西岗驻守着伪满军一个团。这个团装备的精良武器，使我们极感兴趣。

西岗是个交通不便的偏僻的地方，加上四周是茫茫的林海，有利于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敌人考虑到这一弱点，用合抱粗的原木在兵营四周筑了有三人多高的围墙，四角还修了炮台。

在很难从正面攻入城内的情况下，我决心用火攻战术给敌营造成混乱，威逼敌人投降。敌兵营营房完全是木造的。

天黑后，我命金泽龙等投弹能手，将浇了煤油的棉团点上火投到敌兵营屋顶上。因为下了初夏的毛毛雨，淋湿的屋顶没有很快着火，但火攻战术还是成功了。我们的战士趁机对敌人喊话：缴枪不杀。要他们放枪，走出城来。但是敌人却以负隅顽抗回答了我们。我派几个队员到离敌人地下炮台最近的民房去，从这家厨房朝地下

炮台底下挖地道。同时又派侦察兵去把伪满军团长的岳母带来。我们劝这位老太婆说服女婿停止无谓的抵抗，缴枪投降。

这位老太婆听从我们的劝告欣然进城去带来了她女婿的信。伪满军团长在信中说，只要允许他带半数士兵撤到抚松去，他就同意投降。

我断然拒绝他的提议，要求他彻底全面的投降。老太婆再次进城见过女婿后回来说，她女婿表示愿意减少他要带走的人员。很明显，他们的居心是要拖延谈判，等待援军到来。

为炸毁敌地下炮台而挖的地道已挖了一半多。我让老太婆看看地道和炸药，然后叫她向她女婿传达我们的最后通牒：要是不投降，就把炮台全都炸掉。

第三次进城的老太婆，笑眯眯地回来对我说，她女婿请求我们允许他只带两个警卫兵走。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伪满军团长命令全体部下排好队，解下武器堆在一块，然后带两个警卫兵经北门慌忙逃走了。那些武器全都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如果没有组建新的师，我们就不可能攻打像抚松县城那样的大城镇，也不可能后来在鸭绿江沿岸和白头山一带连续高奏凯歌的。

事与愿违，我们计划在马鞍山接收的第二团没有为新师的诞生及其成长壮大作出任何贡献。这个二团，是在过了半年多以后，当我们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开始活动的时候才到来的。那时，主力师已初具规模了。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了，可是又能够同吴仲洽、权永壁、金平等老战友同吃一锅饭了，这使我无比高兴。姜渭龙也以健康的身体安全地找新师来了。我想到金确实心中的最后一个创伤也可以痊愈了，

就感到万分庆幸。

他们回到主力师的第二天，我找了姜渭龙。

“听说你爱人是金确实同志，是吗？”

大高个子姜渭龙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看来，他不好意思回答说自己有爱人。

“确实同志不住在这里。她在离这儿几十里外的横山后方密营缝纫队。你到那儿去见她吧，我马上给你派个带路人。”

他磨蹭了一阵后很不自然地笑着说，以后再去看吧。

“要是通知确实同志到这里来，你们相会的时间就会拖后一倍，最好还是你去见她吧。”

“我们不急，慢慢去见吧，不要紧的。”

姜渭龙不冷不热的态度，反而使我感到很遗憾。

“你可以慢慢见她。我可是不忍心看着金确实同志为了你而消瘦下去。你二话别说，马上动身吧。”

可是他还是低着头，稍后他以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我，说：

“我还没分配，怎么好意思先去见爱人呢。我是为了干革命才扛起枪的，不是应该先去做革命工作吗？我不能去。”

我心想，应该给他找一个借口。

“现在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你带着和二团同来的女同志们到缝纫队去，做冬季军装。要是你在完成任务之前回来，我可要处分你。”

姜渭龙这才没词儿了，只好说遵命了。被左倾排外主义者长期强行分离的这对爱人的动人的重逢，就是这样实现的。

在马鞍山烧毁“民生团”文件包裹，这不仅带来了新人的出现、新师的诞生，也带来了爱的复活、新的爱的诞生。我们由于相信人，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内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朝鲜革命的领导核心，已成普遍现象，以这一领导核心为中心的思想上和情义上的真正团结在斗争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巩固，可以说这是靠这种信任实现的。随着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诞生，我们的一心团结的历史根子在相信人、热爱人、施德于人的过程中，不可动摇地深深扎在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心田里。

先前在马鞍山的那一百多名“民生团”嫌疑分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效忠于革命，在时代和历史面前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纯洁无瑕的良心和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

他们建树的宝贵的斗争业绩，在我们光复祖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芒。

二　二十元钱

在马鞍山西边密营里，左倾分子们翻弄“民生团”档案的时候，在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的马鞍山东边密营的背阴处，却有数十名孩子在疾病折磨和饥寒交迫中呻吟呼号。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孤儿。他们曾在堪称间岛革命的最后堡垒的车厂子同大人们一起饱经风霜。游击区解散后，他们在经过奶头山西征的人民革命军的保护下，辗转来到这个敌人魔爪还没有伸到的南满后方密营。在马鞍山密营的小居民中，还有来自延吉地区的儿童团员。

游击区解散时，这些孩子没有到敌占区去沦为挨门讨饭的乞丐，或在街头、小铺、集市上掏人腰包来糊口的扒手和流浪儿，而是千里迢迢来到抚松的深山沟，这真是令人赞叹的事情。

可是，怎么就在人民革命军部队管辖的后方密营里，竟然出现了受共产主义者保护的孩子们啼饥号寒的惨状呢？难道是负责抚育这些孩子的人员突然变成“继父”、“继母”开始虐待他们了？要不然，就是孩子们变成碰到困难就哭哭啼啼或发牢骚的娇哥儿了？

不，决不可能是这样！我在心里把这两种假设都否定了。

那么，那些孩子的呼号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饥寒所致的生理上的痛苦已达到极限的无言信号呢？可是，这种痛苦，他们不是过去在游击区曾饱尝过吗？我们的儿童团员，不是那种吃点苦就哭哭啼啼的纨袴子弟。对这些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兄弟成了孤儿的孩子来说，饥寒并不是什么难忍的痛苦和烦闷。

然而，在马鞍山密营里，孩子们过着辛酸的日子，这可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组建新师的会议即将结束的某一天，朴永纯把一张便条悄悄地塞进我的手里。便条上写道：

“将军，开完会之后能不能为马鞍山儿童团员们抽出一些时间？那些孩子的情况太惨了。我希望，您编好新师之后跟我一起到马鞍山密营去一趟。孩子们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将军的到来哪。”

我到了那个密营的时候，金正淑也具体地向我汇报了马鞍山儿童团员们的惨状。在马鞍山的孤儿当中，有不少受过她辅导的儿童团员。她在符岩洞的时候就担任了儿童团辅导员。在游击区的时候，孩子们就非常爱戴她。

金正淑素来很疼爱孩子。车厂子游击区人民遭受严重粮荒的时候，她和孩子们之间结成了难忘的亲密关系。当时，金正淑是军部的炊事员，快要饿死的孩子们一到夜晚就来找她要点吃的东西，有时，还背着炊事员偷偷地进厨房，翻碗柜，掏米缸。每当这样的时候，金正淑就把自己留下的锅巴或松皮饼塞进那些孩子们手里。她为了那些饿得发慌的孩子，自己每天都少吃一顿，背着同伙们留下来，给那些来讨饭的孩子吃。

在车厂子受尽苦难的儿童团员们，终生没有忘记她的善行。这些孩子跟着游击队到了奶头山的时候，金正淑在那里做儿童团的辅导工作。她泪流满面地向我汇报马鞍山儿童们的生活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受共产主义者保护的几十名孤儿在听不到炮声的革命军后方密营里，竟然流着眼泪熬日子，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非常事件。我心情非常焦急。孩子们那么急迫地等着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孩子们的眼泪，代表着正义。某种不正义势力愚弄和残酷蹂躏

正义的时候，孩子们就忍不住义愤，放声大哭。这种痛哭，包含着对侮辱和虐待他们的人的控告，代表着对一切不正义事物的反抗和声讨，也代表着被不正义势力损伤的自尊心和被侵犯的权利。孩子们以眼泪诉说自己面临的灾难，并要求从灾难中拯救他们。哭泣，是孩子们向爱护或可以爱护他们的人倾吐的最大的控诉。人们之所以在这个哭泣面前感到焦心，侧耳倾听，是因为爱护和照料孩子是人的本性中最基本的本性的缘故。

在马鞍山的儿童团员，都是战友们托给我们的比金子还宝贵的孩子。战友们留下遗言，托我们照料他们子女的未来，替他们把他们的子女造就成为革命者。我们的双肩和良心负有神圣的义务，把这些可怜的孩子培养成为世上最好、最坚决的正义事业的维护者。

我为马鞍山儿童团员们的命运操心，并不是单纯的同情，也不是小市民的感伤主义的表现，而是他们的父母去世时交给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即使他们的父母还活在世上，我们也不会对他们的眼泪袖手旁观。这是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有的人道主义感情。

战友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就是战友的儿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我疼痛的时候，同志也感到疼痛；同志疼痛的时候，我也感到疼痛。我饿的时候，同志也感到饿，同志饿的时候，我也感到饿。这就是使共产主义者成为世上最高尚的人的伦理道德。

某水产副业作业班的负责人看到一个同志的女儿落了水，便奋不顾身地把她抱起来向岸边游去，这时他又发现他自己的女儿也落在水里拼命挣扎。要是一般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女儿先抢救到岸上，然后再去救班员的女儿，即便这样，也不会有人责难他。可是这位负责人还是先抢救了班员的女儿，然后才游到女儿那里去，可是他

的女儿已经淹死了。村里的人们赶来流着泪深情地安慰他，他却指着那班员的女儿，从容地说：

“我不认为我的女儿死了。这孩子也是我的女儿。”

这是思想浅薄、只知利己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伟大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发扬了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却把这只当做寻常的事，当万众高度评价和赞扬的时候，他反而红着脸感到难为情。这就是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魅力和朝鲜民族的美德。

当初我们的计划是，组建了新师就马上经由抚松径直到长白去，可是，马鞍山儿童们的不幸遭遇，使我们不得不改变了当初的计划。我觉得不去看看那些孩子，即便到了长白，也不能从不安心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迷魂阵会议结束后，我去找在马鞍山东边密营的儿童团员们。那天给我带路的是马鞍山武器修理所负责人朴永纯。我很感激他主动做了我的旅伴。

此次行程，成为使我能够全面地了解朴永纯的好机会。我们曾在马村建立的友情，通过这次相逢进一步加深了。我记得，朴猎手第一次口述他那足以写成多集长篇小说的家史，就是在这次相逢的时候。

朴永纯的祖辈们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在金谷村开始过异国生活的第一代人的代表，又是在这一带开荒普及朝鲜式耕作法的先驱。到了他父亲一代，他家还开了简陋的铁匠铺。他在少年时代就在这里当父亲的助手，这成了后来使他成为兵器部门名震四方的杰出技术人员的底子。每逢农闲，他的父亲就扛着猎枪去打猎。朴永纯也从十七岁起当做消遣，对打猎产生了兴趣。不过只是间或瞒着父亲去打猎，因此很不过瘾。他的父亲对猎枪保管甚严。大儿子去打猎，

他倒不加过问，可是，从不轻易容许老二朴永纯使用猎枪。老二摸摸枪管，他就瞪起眼呵斥。但是从朴永纯十八岁那年起，情况就变了。金谷村的山里有一只老虎，老猎手们多次去打都失败了，却叫朴永纯一枪给打死了。

朴永纯拔了几根虎须，得意洋洋地带回家。这几根虎须，就等于是他靠自己力量费力地弄到的猎手执照。全村人都拥到他家来观赏虎须。他父亲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猎手的本领。从那天起，金谷村的老猎手们都开始叫他“朴猎手”了。朴猎手当然也得到了使用猎枪的许可。后来他到鸡林煤矿和堡格砬子矿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直到这时为止，他用这支猎枪猎获了数百只野兽。

我听到朴永纯得了“朴猎手”这个外号的经过，心里想，如果他不做兵器厂的工作，而做人民革命军的狙击手，那就会消灭比他猎获的野兽数目更多的敌人。使我惊叹的是，他的铁匠手艺超过了他的射击本领。他在部队里可能是被认为可有可无的平凡人物，但在兵器部门却是被推崇为必不可少的人。

朴永纯跟着我启程的时候，背着装有五六只野鸡的草编网兜儿。我一看这个鼓鼓的网兜儿，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过去李光背着装有粮食的沉甸甸的背囊，上面还放上几只野鸡赶到明月沟来找我的情景，使我无限感慨。

“朴猎手同志，现在还打猎吗？”我指着网兜问道。朴永纯蹙着眉头提了提网兜说：

“早就不干了。这是用套子套的。不好意思空手去看孩子们，便下了几个套子。”

“你可真疼爱孩子们啊，疼爱孩子，是好事。”

“什么，疼爱？”朴猎手反问了一句，不知为什么，苦笑着说：

“我没资格接受这种称赞。我这个朴猎手是个卑怯的人。”

“卑怯？你这是什么话？”

“一想起这事，我就感到羞愧。可是，对司令官同志，就厚着脸皮照实说吧。有一次，我打了十来只野兔去看马鞍山的孩子们。孩子们看到野兔，高兴极了。我心里也很高兴。可是，第一师政治主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地发火说，你是什么人，不经上级批准就到这里来晃荡；谁叫你发这种慈悲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孩子身上贴着什么标签吗？说罢，就像赶苍蝇似地把我赶出来了。”

“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只好把野兔重新装进兜子里背回兵器厂。”

“怎么，害怕了？”

“是啊。又气又怕。现在胆子大了，才这样说大话，可是那时候，怎么敢呢！如果政治主任无中生有硬说我是帮了小‘民生团’的反革命分子，那不就得遭殃吗？幸亏没有发生那种不幸的事。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去过孩子们的住处。现在想来，真叫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啊！”

朴猎手说着，很不满意地望着脚穿草鞋走在前面开路的第一师政治主任金洪范的背影，蹙起了眉头。

“现在怎么样？还害怕吗？”

“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司令官同志在我身旁，我感到浑身是劲。几年来反‘民生团’的妄动，搞得人忍气吞声地熬日子。一想起这些，就切齿痛恨。”

“那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梦。你背着装了野兔的兜子去找了孩子，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接受后代的敬礼。爱护和同情后代，这是多么美好、高尚的感情啊！”

听了我这段话，朴永纯才舒展开紧绷着的面容，迈开大步走向前去。像块岩石一样沉稳、寡言少语而又自尊心很强的男子汉，竟然说出了只在文学少女的日记本里才能看到的真实的心声，这使我感激不尽。他的言行和心地所散发出的耿直、纯洁的气息，又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最高兴、最幸福，那我就会这样回答：

“在我的生活中，高兴和幸福是很平常的。这是因为我在创造着世上最美好、最理想的生活的国度里，同政治上最自主、思想上最进步、文化道德上最文明而纯洁无暇的人民一道，过着乐观的生活。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充满着喜悦和幸福。

“如果说我有特别高兴、特别幸福的时候，那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时候，是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可作为全国榜样的优秀人材，同他们论时局、论生活、论未来的时候。

“还有，同我们称为祖国的花蕾的儿童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可以说是决定我的一生的幸福观。

同朴永纯的谈话使我特别满意，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幸福观起了作用。朴永纯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革命者的榜样，是有良心的人的典型。后来，通过实践，我再一次证实，他是革命原则性特别强，对消极现象毫不妥协，处事正大光明的人。

1959 年，朴猎手率领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访问中国东北地区。在炎热的夏天，代表团在一个朴素而雅致的农家一间上房住了一宿。这个地方的农民，为了照顾每天踏着先烈的足迹辛辛苦苦进行考察的邻邦客人，把房间重新裱糊了一下，炕席也换了新的。

可是，有几个考察团成员素来怕虫子咬，半夜受不住臭虫咬，

一个接一个地卷起铺盖来到院子里，躺在草席上熬了一宿。坚持在屋里过夜的只有团长朴永纯一个人。团员们都判断团长是个睡得太死或者不怕虫咬的特殊体质的人。

第二天早晨，朴永纯把团员们召集起来，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他说：

“身为代表一个国家的考察团员，怕臭虫咬，就像个流浪者似地在草席上露宿，这不就等于辜负了这里的人们为了给我们张罗舒适的睡处而不辞辛苦的好意吗？难道连克服这点困难的耐性和自尊心都没有吗？往后，要是再出现损害代表团体面的行为，就视情节轻重，干脆调回祖国去。”

代表团成员们这才知道，这个游击队出身的刚毅、寡言的男子汉，是怕辜负东家的好意，整夜忍受着臭虫的折磨，坚持留在屋里的。后来，这个轶事通过战迹地考察团成员的嘴传到了我这里。

我们一到密营，马鞍山的儿童团员们就齐声喊着“将军！”争先恐后地冲出了原木房。孩子们银铃般的喊声，响彻了密营上空。我听到这一喊声的一刹那，一股像烈火燃烧样的激情涌上心头，快步走向孩子们。是他们，就是这些孩子，为了替被敌人枪杀、刺杀、烧死的父母兄弟报仇雪恨，跋山涉水，踏过林海雪原，披荆斩棘，千辛万苦地投奔革命军；现在正在这个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般冷酷无情、凄凉不堪的山沟里，冤枉地被扣上与“民生团”有关系的帽子，整个冬天忍辱含垢一心盼我们早点来。

民族排外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把超革命的“原则”和“阶级性”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惯于愚弄和迫害群众，他们把这些孩子看做革命军的累赘，便对孩子们置之不顾。他们说孩子们住在他们近处，密营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便只顾自身安全，到另一个

密林里搞了个“小王国”，严禁孩子们到那个树林附近去。这些像继父一样的人们，眼看着孩子们在数九寒天煮草根吃，衣不蔽体，却连一粒米也没有给他们送，一套衣服也没有给他们做。

用怜悯的目光看孩子的人，给孩子的伤口贴膏药、缠绷带的人，哈口气暖暖孩子们冻僵的双手和两颊的人，亲热地抚摩孩子们的人，孩子们悲泣的时候拥抱着孩子一起哭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上了“民生团”的名单，遭到了迫害。

尹昌范死后，独立团代理团长、神枪手金洛天带着儿童团员们开往马鞍山的时候，实在不忍看孩子们褴褛的衣着，拿出团后勤部人员保管的军服料子给他们做了衣服。孩子们流着眼泪向团长表示了感谢。但是，金洛天却只因这一善行，就被打成“民生团”处决了。在这个密营里，同情孩子有罪，冷待孩子有功。在这里，根本闻不到真正的人的气息、共产主义的气味。攥紧拳头潮水般朝我拥来的孩子们那几十双泪汪汪的眼睛，无声地控诉着那些丧尽人性、连最起码的人的情义都背弃的人的罪行。

气喘吁吁地跑来的孩子们，突然发生了动摇。跑在前头的个头最大的孩子像是遇到了什么障碍，停住脚步站在空地当中逡巡不前。接着其他的孩子们也像碰上绝壁的浪头一样停了下来，在稍远处一瞟一瞟地望若我。我望着那些踌躇不前的成群的孩子，向朴永纯低声问道：

“朴猎手同志，这些孩子怎么啦？”

“怕是因为害羞吧，您看看他们那衣着。”

我注意地看了看孩子们的衣着。他们名义上穿着衣服，其实几乎是一身裸体。他们的衣服烧破、撕破、磨破，实在破烂不堪，与其说是衣服，倒不如说是破布条或抹布片了。几个月来，他们的生

存一直受到威胁，同饥饿搏斗，他们的脸都像白纸一样苍白。

这些幼小的受难者的惨状，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在小沙河离别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英柱弟。论岁数，我弟弟也跟这些孩子是同辈。在齐腰深的芦苇丛中，同哲柱一起饮泣送别我的小弗弟的面容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把两个弟弟托给既不是亲戚又不是同姓同籍的邻居，离开小沙河已有四年，连一封问候信都没有寄去。我为自己这种无情无义感到内疚。1936 年春，我在东岗密营见到金惠顺的时候，她告诉了我有关英柱的零星消息：英柱曾在安图做过儿童团工作，1935 年春天或是夏天，英柱带着儿童演艺队到车厂子住了几天，演出了节目。她说，那时候是她给演艺队员做饭的。

金惠顺说，那时英柱弟唱的歌给她的印象很深。她还很流畅地背诵了那支歌的歌词。那是我在抚松指导演艺队活动的时候，新日少年同盟盟员和白山青年同盟盟员们唱过的歌。歌词如下：

大家都要小心腰板啦，
笑折了腰可没法治，
华佗扁鹊也治不了啊，
援嘲哟，玩个够，跳个够吧，
不由得肩耸足踏呀。

华馆、扁鹊是中国古代的名医。

金惠顺在东岗告诉我的消息，对我是很大的妄慰。可是我去看马鞍山的孩子们的时候，还根本不知道弟弟的行踪。我望着像被秋风吹到了一块儿的落叶一样挤在一起进退不得的孩子们那哀愁的眼睛，心里想：我们的英柱是不是也像这些孩子一样在什么地方挨饿

受冻？是不是也像这些孩子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想念着我这个无情的哥哥呢？……

怎么能给这些为了干革命一直跟到这个山沟里来的孩子们随便扣上“民生团”的帽子呢？那些狠毒、可恶的人们，难道连判断这些孩子不是“民生团”、也不可能是“民生团”的能力都没有吗？难道他们连可怜他们、照顾他们的一丝慈悲心和同情心都没有吗？立誓为了人类解放就不惜献出生命的人们，怎么能对身体最软弱、自立性最薄弱的孩子们这样置之不顾，致使他们落到这个地步呢？

我国著名的少年运动工作者、作家方定焕，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造了“婀琳伊”（朝语，意诶儿童——译注）这个词，第一次定了孩子们的节日“儿童日”。他在一篇题为《儿童日的诺言》的文章中向世人呼吁：

“……要给孩子们以比大人的待遇更高的待遇。

“如果说大人是根，孩子就是幼芽。因为根是根本，就坐在上头压幼芽，那棵树就会枯死。只有根子培育幼芽，那棵树(那家的运气)才会枝繁叶茂……”

这是他在迎接 1923 年 5 月 1 日“儿童日”时印发的传单中的一段话。这个嘱托，字字句句都蕴含着他对儿童的热爱。

我在彰德学校念书的时候，康良煜先生遇到学生家长也常常说过类似的话。他的呼吁是从《儿童日的诺言》照搬过来的，还是按自己的方式加工的，不得而知。每当他对家长们说，要尊重孩子，不尊重孩子，大人就得不到孩子的尊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里有一条真理。

要给孩子们以比大人的待遇更高的待遇，他们的这一呼吁，是只有爱护后代胜于爱护自己的那种人的心灵才能发出的崇高的理性

的呼声。

“没有孩子的世界，就等于是没有太阳的世界。”这句名言洋溢着对后代多么崇高的热爱啊！

在史册上留了名的世界上的伟人，都是酷爱孩子的。马克思是孩子们的忠实朋友，这不只是通过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文章才传下来的事实。这位伟人为了使可爱的孩子们快乐，有时做了他们的“马”，也做了“马车”，这个轶事，成了世人喜欢回味的话题。后代现在还缅怀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是因为他是为了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一生的优秀教育家。

人类一直由衷敬仰的东西方的所有伟人，都是孩子们的真正的朋友、导师和慈父。他们把对后代的热爱看做美德中的美德。

可是既不是贵族又不是资产阶级的马鞍山的主人们，口口声声谈论人，览口头禅似地大谈人类解放的这所密营的共产主义者们，为什么把孩子们弄成这个样子了呢？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这些孩子们，这些视革命重于生命的纯洁信念的花蕾，竟如此残酷地遭到践踏，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是非常具体地了解这些孩子的人之一。我比谁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车厂子同大人们一道怎样战胜了饥饿，在奶头山又怎样为人民革命军送了饭团、彻夜站岗放哨。这些孩子每个人的经历都像小说的情节一样生动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来自百草沟的刚刚九岁的李五松，站在大孩子们胳肢窝下，像被雨淋的雏鸡一样浑身发抖，还用冻僵的小手遮住裸露的膝盖。只看他的经历，就可以想象马鞍山的孩子们所经受的千辛万苦是何等的严酷。这孩子早在车厂子的时候，就已经亲眼目睹了集体饿死的情景。他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肚子饿的时候，就去抓冬眠中的青蛙

吃，或者到播了种子的地里去挖出种子来吃。

李五松的父亲也是在车厂子饿死的。那时，五松到地里摘来一把大麦穗，搓去皮，塞进父亲嘴里，可是没能救父亲的命。

李五松和他的小妹妹一起用草根树皮充饥熬过了麦口，后来跟随撤问奶头山的人民革命军离开了车厂子。可是他也因为是金洛天的内弟，被打成“民生团”嫌疑分子。

以刊、明直为团长的十四名儿童团虱在开往奶头山的几百里路途上，充分地发扬了他们通过组织生活锻炼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斗志和对革命的忠诚精神。前面有齐腰深的积雪和陡峭的山岭阻挡去路，后面又有敌“讨伐”队紧追不放。

行军第一天就断了粮。饿了，就摘下松针放进嘴里嚼，或者捏雪团往嘴里塞，聊以充饥。一块玉米饼十四个人吃一顿，这还算是吃得蛮好的了。露宿的时候，孙明直、朱道逸、金泰泉等个头大的高年级孩子，就像母鸡一样把未满十岁的儿童团员搂在怀里，给他们挡风，眯了一会儿就又轮流去放哨。

儿童团团长孙明直在卒领这支队伍方面，发挥了特出的组织才能和统率能力。他在王隅沟的时候，就把儿童团工作做得很好。有一段时间，他还到敌占区去在金在水的领导下搞过地下工作。他七岁起上私熟，不到十岁念熟了《千字文》和《明心宝鉴》。他富有眼力，又聪明，适合搞地下工作。他还是儿童团员的时候，就发动组织，清除了学校的日语教师等七个反动教师，早年就赢得了革命者们的信任。

孙明直一家，是世代继承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的坚强可靠的革命家庭。他的祖父，在“韩日合并”前后时期作为义兵队长进行了活动；父亲孙化俊是以百户长的身分搞地下秘密工作的革命战士。

他的堂叔金凤锡(本名孙凤锡)是我忠实的传令兵，在进行小部队活动的时候，不幸在祖国解放前几小时阵亡。

那些孩子抱着要跟革命军同生死的决心，忍饥挨冻地来到这深山沟，当富家的孩子们在螺钿饭卓上摆满山珍海味大吃大喝的时候，他们在篝火旁盖着干树叶子打盹还梦见光复了的祖国。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到底有什么罪？对这些可爱的花蕾，即使不能给他们预备锦衣玉食吧，难道连普普通通的粗棉布衣都不能给他们做，豆粥都不能给他们喝吗？

“孩子们，快把头抬起来。你们穿破烂的衣服，并不是你们的过错，快过来吧!”我张开双臂，急忙走近孩子们。

我的话音还没落，几十名大小孩子就簇拥着我，呜呜地放声痛哭起来。我领着哭泣的孩子们走进营房，有四五个好几天卧病不起的孩子倦缩着身子躺在一角，连一张毯子都没有。我问他们是什么病，孩子们都闭口不答。驻守密营的战士们也只说他们病入膏肓，没能说出准确的病名。只有朴猎手一个人知道他们得的病是心病。给碧玉般纯洁的无辜的孩子们扣上了“民生团”的帽子，他们怎么能回答是什么病呢？

我叫传令兵从背囊里拿出毛毯来。那是我在汪清的时候打了日军运输队缴获的仅有的一条毯子。我觉得哪怕是一条毯子，给患病的孩子们盖上，我的心也会舒坦一些。战士们看出了我的意思，都忙着翻背囊，想拿出自己的毯子来替换。

我把他们的毯子都推给他们，说：

“同志们，不用了。这些孩子病在床上，冻得发抖，我就是盖上一百条毛毯，我的心也不会暖。你们如果为我着想，最好还是先好好照顾这些孩子吧。”我的声音嘶哑了。密营的后勤部人员听了这

话都垂下了头。

“今天在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深刻地回味一下革命者的价值观。我们开始干革命，为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排除万难继续干革命，又为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破坏什么，而是因为热爱人，才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想，我们大家不就是为了从一切不义和陋习中解放人，维护人性，保卫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美好的东西，才向这个可诅咒的世道开战的吗？如果我们不同情受虐待的阶级，不怜悯在亡国的悲哀中痛哭的民族，又不热爱在贫困和无仅中呻吟的父母妻子，那么，我们就连一天也经受不住磨难，早就会回到暖烘烘的热炕头去了。

“我们身为共产主义者，怎么能不照料孩子致使他们落到这个地步呢！你们在踏上革命道路时充溢在胸间的对人的纯洁的热爱，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冷却了。现在我感到痛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革命，也可以说是为了后代的革命。如果我们不能给孩子们吃一勺饭，做一套衣服，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在干革命，怎么能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呢？

“后代是阶级的花、民族的花、人类的花。精心培育这个花，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任务。革命的未来，取决于如何培育后代。革命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今天我们是革命的主人；而明天将由那些孩子长大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我们要想对朝鲜革命忠诚到底，就必须培养将继承革命血统的坚强后备队。尤其是那些孩子，不是牺牲的战友们留下的子弟吗！想到对战友的情义，我们也应该爱惜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

“如果怕上级迫害，就对孩子们不理不睬，那么，这种人怎么能挺起胸膛面对敌人的枪口呢？你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庸俗卑

劣的人，躲在明哲保身的铁甲中，眼看着人们遭受灾难，也不表示同情，而是视若无睹。你们想一想，难道这是要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所为吗？

“欺侮后代，就无异于欺侮自己。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他们，或者在他们陷于困境的时候，又只顾自身安全，不去救他们，那么，到了将来，后代就不会理我们了。我们为后代作出的努力，将决定几十年后后代对我们的看法，决定他们建设的祖国的面貌。我们现在对后代的爱护越深，明天的祖国就将越富强，越文明，越美好。

“同志们！热爱后代就意味着热爱未来。我们的祖国，将由那些孩子建设成为百花烂漫的花园。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未来，让我们更好地培育和照料后代吧！”

那天，我在兵营里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的内容。

这可以说是我直到八十高龄的今天，始终坚持不渝的后代观。我现在仍然爱护和关怀后代，并从中感到最大的自豪和幸福。

没有后代，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乐趣呢！我们曾把铅笔问题作为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个议题，每年都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年，这些都是这一后代观的表现。我们对后代的热爱，还表现在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护上。

共和国首届内阁成员中，曾有个名叫李炳南的保健相，他在解放前就是儿科方面的著名博士，又是忠诚老实的爱国者。他为了参加四月南北联席会议，从汉城来到平壤时，应我们的邀请留下来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保健相。在他的优秀品质中，最突出的是酷爱孩子，还特别会哄孩子。

李炳南兜里经常揣着小拨浪鼓，用来哄哭的孩子。患重病哭叫不止的孩子，只要他摇几下拨浪鼓，就停止哭，乖乖地接受诊断。

他一面用连滑稽演员都相形见绌的鬼脸和叫人笑弯腰的俏皮话，吸引小病号的兴趣，一面眨眼工夫就进行了治疗。因为他有这种本领，所以无论他到哪里，都受到小病号的喜爱，成为他们贴心的朋友。

我的女儿庆喜患麻疹的时候，因为不出痊子，吃了不少苦头。加上，孩子还着了凉，得了肺炎。孩子总是叫着妈妈。每当小妹妹忍不住疼痛哭叫的时候，她的哥哥金正日就劝她说："庆喜，不要在爸爸面前喊妈妈！"政府医院的儿科医生们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保健相李炳南赶来看庆喜的病。他没拿出听诊器，只是仔细地观察，很快就下诊断说："是肺炎先于麻疹。"儿科的医生们立刻按保健相的处方，往小患者的嘴里吹氧气。一天后，庆喜就哭出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疹子也出得很好。

我问李炳南说：

"李先生，怎么样，这孩子哭是怎么回事？"

"这是好兆头。病好转了，孩子就要哭。三天后您女儿的病就会好的。"

李炳南掏出用金链、金壳和唬咱装饰的怀表，在庆喜的跟前摇晃。这是他哄小病号的时候和拨浪鼓一样当镇静剂使用的金表。我女儿见了，止住了哭，微笑了起来。三天后，她的病真地好了。

我对保健相熟练高超的医术，惊叹不已，说：

"唯，真妙。李先生的预言，怎么这样灵啊！李先生不仅是医生，而且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又是儿童心理学家。这么说，儿科医生就应该比谁都热爱孩子啦。"

"是的，不热爱孩子，就没有资格把听诊器贴到孩子们的胸膛上。"

1950 年秋，我在高山镇见了李炳南。当时，他一切都和从前一

样，却只有一点不同。他带着一块连表链都没有的不太好的怀表，必要肘才拿出来看看。我问他，他在哄庆喜肘用过的那块闪闪发亮的怀表哪里去了。他回答说，捐献给国家作军费了。李炳南的这种为战争胜利甘愿献出自己一切的爱国至诚和出于良心的真情，使我深受感动。我看到他那块怀表太破旧，后来就给了他一块新手表。

通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我再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一条真理：只有真心热爱后代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只有真心热爱人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对后代的爱，是人所具有的爱中最无私、最积极的爱，是在献给人类的颂歌中最纯洁、最美好的颂歌。共产主义者就是谱写这一颂歌的创造者，是为这一颂歌奋斗的服务者。

只要有了一名像李炳南这样的儿童的好朋友，马鞍山的儿童团员们就不至于落到那样险恶的地步了。

我想到，现在正是该使用我母亲临终给我留下的遗产——那二十块钱的时候了。这二十块钱，是母亲叮嘱我只有遇到非用钱不可的逆境时才用的。这钱是母亲含辛茹苦给人做活儿，一分一分积攒的劳动果实。

我小时候没拿过钱。我父亲一辈子未曾给过子女一文钱。笔记本或铅笔也叫母亲去买，不让我出入商店和集市。一个人，从小就尝到钱的滋味，长大了就会成为贪财奴，也会成为连祖国和民族都置之不顾的庸人。这是我父亲关于钱的一贯看法。

有一天，在病中的父亲忽然要我跟他一起去逛逛街，便领着我出了门。因病不出门的父亲，竟然跟我一起出去逛街，是很久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父亲中国话不太熟，所以他需要翻译的时候，有时就带我一起去。我曾是父亲忠实的中国话“翻译”。

“他病这么重，还要出门，看来一定是有了什么急事。今天他如此匆忙，是要去见什么人呢？”我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扶父亲从病榻上起来。我扶着父亲出门的时候，还根本没想到那天正是我的生日。由于父亲正在病中，所以，我也无心去想自己的什么生日。

父亲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家商店。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惊人的事情。“为什么把我带进商店呢？”我这么想着，呆呆地望着橱窗。父亲让我挑一块中意的怀表。这家商店里陈列着很多各式各样的怀表，有的表上还有孙中山的画像。我挑了一块没有孙中山画像的怀表，父亲便按表价付了三块五毛钱，语重心长地说：

“到了你也该戴表的时候了。为光复祖国而战的人，有两个必须爱惜的，一个是同志，另一个是时间。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意思是要你爱惜时间。你要好好保管它。”

“到了你也该戴表的时候了。”我把父亲这句话，解释为我已成年了。

我听着他的话，不知怎么，总觉得像是他临终前的遗嘱。实际上，这时父亲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他怀着这种预感把怀表和平生操劳的独立事业交给了我。这又等于是我的成年仪式了。

父亲给我买块怀表作为生日礼物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后来，我带若这块表，人了华成义塾，在那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组织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我在打游击战的时候，也按照这块表执行一天的作息；在确定攻击开始时间和秘密接头时间的时候，也是以这块表为准的。

我开始改戴手表，是在普天堡战斗前后时期。战友们劝我说，

我的怀表太旧了，看司令官的体面，也应当戴上新的手表。于是，我把用了十年的怀表送给了别人，开始戴新式手表了。

在我开始进行革命斗争以前，我的父亲一直没让我花过钱。如果说我自己到商店去花钱买过东西，那也只是我在吉林的时候。

我是通过这个过程养成了对钱漠不关心的习惯，读者们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一个人如果做了金钱和物资的俘虏，就会沦为眼中没有党和领袖、也没有祖国和人民甚至六亲不认的人间渣滓。这是我在总结我八十个春秋的人生时，想对后代说的话。

如此严格管束和监督子女，不让他们尝到钱的滋味，这是父亲树立的我们一家独特的家风。

但是，母亲在临终时第一次违背了这个家风，给我留下了她付出平生辛劳积蓄下的二十块钱的遗产。我觉得母亲饱经风霜的一生好像压缩成了这几张纸币。我珍重地接收了这笔钱。这二十块钱，对我来说，等于是一种护身符。只要把这笔钱带在身上，就不饿，不冷，也不怕。我觉得好像母亲经常在我身旁，以她全身心守护着我。我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决不为我个人的事花这二十块钱。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这笔钱作为母亲对儿子慈爱的标志永远保存下去。

然而，严酷的现实，多次动摇了我的这一决心。我曾不止一两次地把手插进兜里摸了摸这笔钱，但还是没舍得花。我碰到过无数次必须花钱的情况。

我同在罗子沟台地上救了我们一行的难忘的马老人证劲叮的时候，也曾打算用母亲留给的这二十块钱报答他的恩情的。一个人对救命恩人施礼，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一行在那个山窝棚里住了二十来天，把老人的全年口粮给吃光了，自己兜里放着钱却不拿出

来答谢，那么老天爷会如何责备我呢？可是，这位神仙般的老人，终于没有收下我的一片心意。他说："要光复祖国，今后还会碰到比这更险恶的情况，留着那时用吧。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又不需要钱，我收了它派啥用场。光用套子套来的野兽，也够我自己糊口了。"他边说边把钱推给我。

凝聚着母亲慈爱的这二十块钱，就几经波折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我的衣袋里。

用这笔钱给那些衣不蔽体的儿童团员做衣服穿，母亲也会很高兴的。"母亲，我拿着这笔钱离开您身边，已有四个年头了。几年来，我遇到过许多次难堪的情况，却也为将来着想没花这二十块钱，一直保存到现在，可是今天看来就非花不可了。我要给那些举目无亲的孩子做衣服穿。我知道今后还会碰到比这更险恶的关头，可我还是下了这样的决心，母亲，您也支持我这一决心吧。您不是很了解我酷爱孩子的秉性吗？"我遥望着安息在冰凉的土器店沟凄凉山岗的母亲，不禁在心里这样自言自语道。

"你拿这二十块钱到抚松城去买布来，给孩子们做衣服穿。"我向团政委金山虎命令道。

金山虎显得非常为难，可还是勉强接过了那笔钱。金山虎给地主当长工的时候，被铡刀铡断了一个手指头。他是在五家子的时候起就跟我们一道做反帝青年同盟工作的好汉。他比谁都熟悉这二十块钱的来历。

"这是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只好执行了，可是不知怎么我的手发颤啊！我知道这是怎么来的钱啊！"

金山虎说罢就到抚松城去，买来了七八匹一尺一毛钱的像华达呢的布。他虽然是个大力士，却说自己背着这些布，差点把腰都给

累断了。事不凑巧，他在归途上遇到土匪化的山林部队残余分子，布匹被抢走了，他也被绑在树上。政委力气大，像头大黄牛，也险些被冻死了。我们派小分队去救了金山虎，山林部队抢走的布也如数找回来了。

用这七八匹布，是不足以给密营的所有孩子每人做一套衣服的。我把给张蔚华写的信交给金山虎，派他再到抚松城去。他在张蔚华的帮助下，又弄来了大量的布匹。我们用这些布，给密营的孩子和摘掉了“民生团”帽子被编人新师的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都做了一套衣服。这样，我那沉重的心情，才变得轻松些了。

老实说，二十块钱算不了什么大钱，可是，当时我不禁感到心情舒畅。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马鞍山。

穿上新衣服欣喜若狂的孩子们，都纠缠着要跟我们一起走。我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欣然接受了孩子们的这一请求。除了几个年纪太小无法随队行军的和有病的孩子外，大部分孩子都随同南下的部队，踏上了艰难的长征道路。纵横驰骋打游击的革命军，带着一大群十多岁的孩子行动，这是一种冒险。虽然这是在游击战史上没有先例的违背一般常识的做法，但我还是决心带上这些孩子，在斗争烈火中锻炼他们，把他们都铸造成钢铁般坚强的战士。最困难的是跳过倒朽木，渡过河水。因此，我们在打仗、行军的时候，给队员们另行分配了保护孩子的任务。我们的战士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了孩子们。有倒朽木，就把孩子抱过去；遇到河，就把他们背过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弹，保护孩子。我们就这样培育了孩子们。

那时跟我到了白头山地区的孩子们，后来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革命军，通过激烈的游击战成长为优秀的军政干部。连没被允许随

军而暂时到大碱厂密营呆过一段时间的九岁的李五松，也做了孙长祥的传令兵，后来，到长白当了我的传令兵。1939 年 5 月，我率领部队进攻茂山地区时，他年仅十二岁。河水深，他蹚不过去，因此，我抱着他过了河。当年像母鸡抱雏鸡一样抱在怀里培育的孩子们，如今在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中起着骨干作用。

在马鞍山看到那些衣不蔽体的孩子的情景，我怒火中烧，受到的震动太大了。我决心，祖国解放了，就一定建立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供应衣服的制度。在重建惨遭战争破坏的国家的 50 年代后半期，我们就开始创造由国家负责供应孩子衣服的历史。这是只有在马鞍山体验过那种痛苦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才能创造的一种奇迹。我们每年支出几亿圆的资金给孩子们做衣服。

来我国访问的外国人士，有时问我，不收任何代价无偿地支出那么多的钱，国家不就受损失了吗，各自到商店买自己所需要的布做衣服穿，就可以了，何必由国家给孩子们做校服穿呢？免费供应衣服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拿什么来弥补呢？

这时我就给他们讲我在马鞍山会见衣着褴褛的儿童团员时的情景。在我们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没听过炮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不了解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所包含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只从财政核算的角度去考察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国家为人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其实并不是损失。为人民的福利支出的钱越多，我们党就越感到高兴；为后代而受的经济“损失”越大，我们的国家就越感到满意。

我坚信，在我国，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白头山的传统得到继承，国家给孩子做衣服的共产主义政策，今后也将继续坚持下去。

马鞍山时期的儿童团员们和抗日老战士们，和全国的所有儿童

一样，每年都按季节领到蕴含着金正日组织书记恩情的新衣服。

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李五松和孙明直领到组织书记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新军服，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想起了马鞍山的时期，激动得话也说不下去了。

三　革命战友张蔚华（一）

前面已经讲过，金山虎带着衣料刚回到马鞍山，我又派他到抚松县城去了。因为用二十元钱买来的衣料是不可能给所有儿童团员做衣服穿的。只有跟敌人打一仗，才能缴获一些布匹，可我丝毫也不想在这个很早就跟我建立了深厚关系的县城打白刃战。当时，我们组建了新的师，革命军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正处在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军事政治力量的阶段。在尚未准备好力量的情况下仓猝发出枪声，我们就有可能在抚松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且挺进白头山地区也会碰到许多困难。

解决布匹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找张蔚华请他给予帮助。他是大富豪的儿子，又是我的革命战友，是个忠于抗日救国宗旨的积极的革命组织成员。只有他，才能把我的苦衷当做自己的苦衷，全力以赴地帮助我摆脱困境。

金山虎一听我叫他冉去一趟抚松，就显出一脸疑惑不解的神色。这也难怪，因为他刚从那儿回来。我也很想让他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孩子们和新编的部队，不得不让他再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金山虎是向张蔚华做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张蔚华以张亚青这个小名，在五家子三星学校任教的时候，金山虎就在那里的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做青年工作。他们虽然不曾有过工作上的联系或交往，但是既然在那里做过青年工作，就比带什么介绍信都强。

“真对不起，每当遇到难事，总免不了叫你来做。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洋，是不是你的上司太难为你了？”

当金山虎为接受新任务来到我面前时，我对他这样说道。那时他同拯救了自己的小分队一道回到马鞍山，正在休息呢。

金山虎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瞧了瞧我，用沙哑的声音说：

“您跟我打迂回战，这可不像司令官同志哟。请您直截了当吩咐吧，让我执行什么任务？”

这句话使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那好，你明天早晨再去一趟抚松。我决定派你去见张蔚华。看来，还是得请他帮一下忙才行啊。你还记得那位在五家子当过小学教员的中国青年么？”

“您是说张亚青么？当然记得。他那戴着眼镜腑腑腆腆瞅着人的眼神，我是忘不了的。他吉他弹得动听极了。”

“很好。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好带去找张亚青。你要先在城里转一转，侦察一下，然后到小南门街找张万程的家。张万程是抚松屈指可数的富豪，是张蔚华的父亲。”

金山虎满面春风，挺起胸脯望着我，仿佛他要去野游似的，兴冲冲地微笑着。这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有种令人敬佩的庄稼把式的气质。一旦有事可做，他就兴高采烈，跑前跑后；反之就闷闷不乐，愁容满面。他的脸，好比是一架寒暑表，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有没有工作做时的情绪。

我用去一天中最珍贵的黎明时辰写好了给张蔚华的信。

那时不知是谁发明配给豆油桶安上双层底子，把信夹在里面，十分保险。金山虎提着这个豆油桶，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马鞍山。朴永纯为了把他扮成地道的豆油贩子，弄来一套比“苦力”穿的还破烂的油渍斑斑的衣服给他穿上了。

我焦躁地等待着张蔚华的消息。在那金山虎走后无法成眠的几天夜里，我的全部思绪都飞向了张蔚华，牙分秒秒都在我对他的渴念中流逝。

要是我能像金山虎那样，腰里掖着一条破抹布般的毛巾，扮做一个“苦力”，悄悄地溜进县城去跟张蔚华见一面该多好啊！要是能和张蔚华一起到我过去住过的小南门街走一走，见见第一优级小学时期的老师和同学，到阳地村去看看父亲的墓该多好啊！

如果我面前没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我去做，如果我身边没有亲逾骨肉、严密守护着我安全的战友们，也许我就会不顾一切冒着风险走访抚松的。然而，在我如此渴望去的那个地方，在我学生时代长期住过的抚松，我有很多旧相识，他们都知道在抚松军警中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抚松虽说是又一个我曾坐过牢的地方，是个阴森可怖的军阀巢穴，但是，那里却保有度过我少年时期的一段难忘的生活，有我父亲的坟墓，有我钟爱的中国朋友张蔚华，我始终不渝地热爱着这个盆地中的县城。

抚松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叫“东烧锅”的酿酒厂。1932 年 6 月远征南满时我就在那里和张蔚华相逢。这个酿酒厂一度改了名，自从人们知道我远征南满时在那里和张蔚华见过面就又恢复了本来的名称。在我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张金泉把那个酒厂酿造的标有“东烧锅”字样的名酒带来送给我，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抚松人的深情厚谊。我曾多次在那里同张蔚华谈过话。

我们就革命和未来抒发己见，谈了很多。张蔚华还把他爱人有身孕的事都告诉了我。那时的胎儿就是现今住在抚松的张金泉——张蔚华的儿子。

当张蔚华看到我们部队的雄姿时，惊叹不已地说：

“成柱，你的战士们真棒啊。我们在火车上相逢还不到一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建立了一支军队。你可真地做了件大事啊！现在可以大干一番了。真了不起!”

他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他那毫无保留的极口赞扬，使我几乎要发晕了。

“蔚华，你别把我捧上天了。我们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拿人作比方，可以说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对这个婴儿的出世，你给我的那几十支枪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对我们部队的诞生，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大功，你可是我们部队的催生婆之一啊。”

“太过奖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怎么骂我自己呢。我骂自己是个多么无用、多么软弱无力的人呀。成柱，你还是踞从前一样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你，而且坚信不疑。即使松花江江水倒流，我对你的情谊也是不会变的。”

突然，张蔚华紧紧握住我的手，以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

“那么成柱，你就让我加入你的部队吧。我也想拿起武器，挺起胸膛去抗日啊！你要是不答应我这一要求，我就不放你走出这个抚松。”

这一直截了当的要求，使我不禁万分高兴。

“蔚华，你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自从你的部队开到抚松来的那大起，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爱人也支持我……”

“那么你父亲呢？他能放你走么？”

“他放不放有什么关系，我愿走就走嘛。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国家都快亡了，还要什么家。干革命不能看父母的眼色！陈翰章也

是富家子弟，他能干革命，我也能干做救国军工作这样的事嘛。”

“你决心跟游击队走，这很好。不过，蔚华，干革命不能单靠武装斗争这一条战线。我希望你继续留在抚松，搞地下革命工作。”

“搞地下革命工作？那么说，你不收我参加游击队啦？”

“不是不收你，而是希望你在另一条战线上工作。教育、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地下革命斗争，也是很重要的战线，开不次于武装斗争。如果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搞不好团结人民群众的工作，武装斗争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正准备在抚松地区建立强有力的地下革命战线。我是希望你当指挥这一战线的司令员。”

张蔚华像泄了气似地垂下头，缓缓地擦起了眼镜片。

“成柱，你是存心要我退居敌人的枪弹打不到的第二线吧？因为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是不是？”

“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凭你的体质，爬山越岭打游击，是吃不消的。我瞒你什么呀。我不是不相信你的思想，而是担心你的体质。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到山里去吃苦，而要留在家里，一面开个照相馆，还继续当教员，一面尽力帮助我们的工作。富家子弟这个牌子多好啊！有了这个牌子，你完全可以拿它掩护自己，放手干革命嘛。”

第二天我又继续耐心地说服他。直到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劝告，这才结束了我俩的争执。当我离开抚松时，张蔚华送我，他说：

“老实说，我坚持跟游击队走并不是因为不愿意搞地下斗争，而是因为我渴望和你在一起。对我来说，没有成柱的生活，好比是没有小提琴的管弦乐。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念你。你呀，不管走到哪里，千万不要忘记我。我没有比你更亲近、更宝贵的朋友。你要千

万保重。”

那天，张蔚华流着泪送别了我。也就在这一天，我吸收他加入了秘密共青组织。

从那以后，一转眼过去了四个年头。四年的岁月，不算短。其间，我一直惦记着他，这份深情一直充塞着我的心头。

我焦急地等待金山虎回来。

金山虎提着豆油桶，到抚松城里走街串巷，卖了一阵豆油，了解到张蔚华开了个兄弟照相馆。说是照相馆，其实是领导抚松地区地下组织的中心。张蔚华在这里坐镇，一面搞生意一面联系组织成员。金山虎走进这个照相馆见了张蔚华，开口就问道："张先生，我能见你一面吗？"

张蔚华请他进了显影室。金山虎对张蔚华说：

"我是金日成将军派来的。他在离抚松不远的地方。我受他的委托来找你，看看你的日子过得怎样。"

张蔚华即刻认出了金山虎，高兴得不知所措。

"哦，金成柱！成柱就在近处？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现在路还比较远，不好走。日后我们在中途选好了合适的地方再通知你，那时候，请你去见将军好不好？"

张蔚华不大相信地端详着金山虎。当他接过我的信拆开读了一遍，才放心地微笑着说：

"那好，我就等你的信吧。请你转达我的问候，告诉他我接到他的信很高兴。也向他汇报一下，我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承诺，身体也很好。"

金山虎喜气洋洋地回到了马鞍山密营，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消息。他的汇报，可以说是 1936 年春天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仿佛被新

春的温馨熏醉了似的，心情激动得无法平静，独自在密营里漫步，直到脚脖子发酸。按我的建议，我们会见的地点定在抚松县庙岭附近的天然岩洞。

我们的同志听说我要会见的人是拥有几十垧耕地和几十垧人参圃、雇有许多家兵的大富豪的儿子，就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我去庙岭，说此行有危险，不能叫人放心。有个同志说：

“司令官同志，恕我冒昧直言，会见那个姓张的富豪子弟的事，请您还是慎重考虑。虽说他是司令官同志念小学时的同学，又是多年过组织生活的人，可是阶级本性能改变吗？无论如何，他不还是剥削阶级子弟吗？”

我当即拒绝了这个劝告：

“同志们为我的安全操心，我感谢你们。可是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劝告。你们大惊小怪地说什么阶级本性怎么样，好像自己的司令官要掉进什么陷阱似的。我不能不说这是对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张蔚华的亵渎，也是对我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亵渎。”

“司令官同志：我们在地方的时候组织上教育我们说，人的阶级本性是不会变吼绝不能同有产者妥协。参加革命军后也有不少指挥员这样教育我们。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这样一条原则：工人、农民同地主、资本家只能作斗争；认为只有这样一条道路：凡是剥削阶级，不管他是谁，都要打倒和清算。”

反对去庙岭的人，并不是用一两句训谕就能说服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坚持违背革命原理的超革命的主张而命令他们闭口不语。直到那时，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不少人对经典着作的论断采取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的态度，不能将它同革命实际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是丝毫也不能打折扣的绝

对的法规。要根除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要从原理上进行坚持不懈的教育。

我指出：

“对剥削阶级进行斗争，当然是对的。我也承认地主、资本家是我们的敌对阶级。但是，你们要明白，不能因为是地主、资本家，就一棍子打死。在地主和资本家当中，也有爱国的人和抗日的人。在座的金山虎也很清楚五家子的情况，叫赵家凤的地主对我们的革命活动不知给了多大的帮助。张蔚华的父亲张万程比赵家凤更积极地帮助了我们。1930 年秋，我们在五家子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张蔚华无偿地送给我他家用的几十支枪。你们都很清楚，为了获取你们手里的每一支枪，我们曾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同志为了获取武器献出了生命。而张蔚华一下子送给了我们需要用许多生命去换取的四十支枪。

“有什么根据不能信任张蔚华呢？

“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谈张蔚华一家过去待我们多么友好，给了我们家多大的帮助。但我一定要讲明白，对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片面解释，给我国革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如果按你们的看法，说像张万程这样的地主，不管他做了多么有益于革命的事，也因为他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人，就应当成为打倒的对象；相反，工农出身的密探，不管他做出了多么有害于革命的事，也因为他是属于基本阶级的人，就应当成为团结对象，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啊！

“评价人，共产主义者始终要站在正大光明的立场上。这就是说，不论其所属系统、政治信仰、阶级和阶层如何，好人就要评价为好札有功就要评价为有功。共产主义者评价人，始终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这意味着，不要定出某种框框，按这个框框去评价人，

而要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本人的思想与实际行动为主，作出正确的评价。评价一个人，如果把出身加以绝对化，就不可能保证科学性，这种评价就不能成为公正的评价。

“如果我们片面地只强调阶级性和阶级斗争，对人进行极左的评价，那将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毫无疑问，会把许多人推到敌对的阵营去。敌人正希望我们变成这样的睁眼瞎子，随便怀疑人、随便打倒人。

“同志们，我们都是在间岛成为反‘民生团’斗争的对象、经历过种种痛苦的人。你们在曾经同吃一锅饭、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中间遭到不信任的时候，不都捶胸痛哭过吗？你们是体验过这种痛苦的人，可是今天怎么能对一个不容任何怀疑的好人任意挥动那种令人诅咒的不信任的武器呢……”

我用这样的话说服了反对我去庙岭的人，然后带着几名警卫员离开了马鞍山密营。

有些人提出有产者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的看法反对我同张蔚华会见，这不能不说是过分的忧虑。我觉得，他们不假思索地说出的那些话伤害了我同张蔚华、我家同张家结成的友情，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是给有十多年历史——像松花江水一样长流不息始终如一——的我们神圣而根深蒂固的友谊抹黑的行为。我们的友情是用任何理由或诡辩都砧污不了的，是真诚而深厚的，是与整个革命的利益、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相符合的。

如果用有产者是剥削者这样一种尺度把世上的所有富人都认定为反动派，那么我们共产主义者就无须走改造社会使自己致富的艰苦道路了。

我是从小就不以有无财产和财产多少来评价人的。我评价人的

标准是，看他是否热爱人、是否热爱人民、是否热爱祖国。即使是富人，只要他爱祖国、爱人民，我就认为他是好人；即使是穷人，如果他不爱祖国、不爱人民，我就认为他不是好人。一句话，是以人的思想为主进行评价的。

我在回忆小时候肘已经谈到过，我少年时期的第一个同志康允范，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家有小果园，生活水平是我的万景台老家所不能相比的。可是我非常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比谁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我在这部回忆录第一卷里提到的白善行是个大富翁，却深受平壤市民的尊敬。使她成为富翁的是她那超人的勤俭节约精神：她一辈子吃的是人们不愿吃的粗茶淡饭，穿的是人们不爱穿的破衣烂衫，做的是人们不愿做的粗活。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占有大片土地、巨额钱财，并且残酷地剥削人民、搜刮民脂民膏致富的守财奴和践踏人伦道德、横行霸道、制造种种种会罪恶的道德败坏的有产者。然而，所有的富人和有产者并不全都是坏人。

白善行一辈子任劳任怨，辛勤劳动。她卖豆芽菜，卖豆腐，卖花，纺线织布，养猪，卖泔水渣，什么活都做；可从没有搽过脂粉。就这样，她克勤克俭，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财富。白善行从十六岁守寡，几十年如一日，付出血汗积蓄了万贯家财，就把这些血汗钱全部献给了社会福利事业。她首次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就是在松山里修建了叫做“松山桥”的石桥。平壤市民为白寡妇的积善行动所感动，赠给她“善行”之名，后来又取她的名字把松山桥改称“白善桥”。

当时平壤新市街有座府立公会堂(即公共礼堂——译注)，只许

日本人使用，禁止朝鲜人出入。白善行义愤填膺，慷慨地捐出好几万圆，独资修建了供朝鲜人使用的平壤公会堂。她盖的那座石造三层建筑，如今依然矗立在练光亭对面，保持着昔年的风貌。

白善行还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献出了巨额资金。平壤的光成小学、彰德学校、崇义女校，都是用她所捐赠的几十町步土地作为办学基金的。我也算是在白寡妇资助的彰德学校受了她一些恩典的人。

白善行每到她所资助的学校，就叮嘱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将肩负起朝鲜的未来的儿女。累点也不要贪睡，想玩也不要贪玩，不愿用功也不要丢下书本，要勤奋地学刀。你们好好用功，我们国家才能独立。

有一次，从汉城来的一个大官要召见她，转达总督府对她的表彰，但白寡妇一口拒绝了。

我从小就主张并坚持以思想、行动作为评价人的主要标准，这一点后来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拿这个标准去号召全民族一致行动起来，那么过去既不会有那么多的群众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旗帜之下；在统一祖国成为至高无上的任务的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南方民众和旅外侨胞团结在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之下，并肩高呼“我们的愿望是统一”。

如果我们不看人的思想，人的真心，而只按身分反对了所有有钱人，那么解放后郑准泽、姜永昌、卢太石、李智灿、金应相等有产者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根本不可能登上我国的政治舞台，也不会在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发扬那么惊人的忘我精神，建树那样的丰功伟绩。

我还用同样的观点和立场对待了中国的有产者，不然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和大地主的儿子陈翰章交上朋友，也不会吸收大富豪的

儿子张蔚华参加革命组织并和他立下永远保持友情的誓言了。正如陈翰章和张蔚华的生平所表明的，就是在中国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名望的人士中，也有许多是有产阶级出身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为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整个一生的周恩来，就其出身而言，也是清朝末年富裕官吏的儿子。

我认为，张蔚华之所以能够背叛自己的出身，同视资产阶级为敌对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携起手来，毕生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因为有了我对他的很大影响。对他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是他的父亲张万程，给了他以共产主义影响的是我和我的同志们。在我插入抚松第一优级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淳朴的忧国的少年。当时我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爱国少年。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是在我创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把组织扩大到各地的时候。那时我以我母亲和朴且石为中心，在抚松成立了可代替党组织的共产主义秘密小组，张蔚华也和郑学海、蔡周善一道加入了这个组织。从此，他开始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

自从我经史会长介绍进入抚松第一优级小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张蔚华一起念书。优级就是高级的意思。不幸的亡国少年金成柱和大富豪的儿子张蔚华同班同桌一起念书，看起来仿佛是历史的作弄；通过这奇异的组合，我们的史无其匹的友情开始发芽成长，开出了花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可是我们两人的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在一起”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从我的父亲金亨稷和他的父亲张万程之间的友情开始建立的。

我父亲得到孔荣和朴振荣的帮助，安全地逃出了馒江的土匪窝之后，暂时停留在叫做大营的朝鲜人聚居的村落里，托付老相识独

立运动者崔面长到县当局去弄一张准许他在抚松居住的许可证。可是县长不喜欢朝鲜革命者住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因此借口我父亲是流亡者，没有答应崔面长的要求。

正当这时候，我父亲听说抚松的大富豪张万程身患疾病正在寻求名医，又受崔面长的嘱托，便去给张万程治好了病。在这一来一往中，张万程被我父亲的书法迷住了。他本人也写得一手好字。以此为契机，他们两人就成了至交。我父亲托张万程向县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允许自己在抚松居住。崔面长也一面鼓动张万程，一面跟抚松首屈一指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史会长进行交涉。史会长就是抚松中学校长史春泰先生。因为他在县里兼任教育会会长，抚松人就管他叫史会长。他答应予以帮助。

打那以后，张万程到县政府去跟县长说："请你允许一个朝鲜的流亡者在抚松城里开个医院吧。我知道你是怕日本鬼子刁难才犹豫不决的。朝鲜人对霸占了祖国的日本鬼子作斗争，不是应该的吗？何况你又不是亲日派，允许他居住岂不是好事？这里又没有日本领事馆，你怕什么。只要瞒着由临江派来的领事馆警察和密探就行。请你不要反对金亨稷前来抚松居住。"

县长被张万程说动了，允许我父亲在抚松居住下来。

当我父亲恢复业已停办的白山学校，为取得许可而东奔西走的时候，张万程也以县商务会副会长兼教育会委员的资格，跟士绅们一道说通县当局，使我父亲得到了许可证。每当我家遇到生活上的困难，需要跑腿，他就跑腿；需要花钱，他就出钱，尽一切诚意给了我家无私的帮助。他们一家的这种帮助，我父亲去世以后仍没有中断。张万程想到我母亲带着孩子受苦受累，常常把食物和钱送给了我母亲。

我在吉林读书的时候，金亨权叔叔被军阀当局逮捕入狱。这真是祸不单行。父亲去世不久，叔叔又遭此大难，我母亲心如刀割，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找张蔚华的父亲，求他去向警察局说情。由于张万程的努力，亨权叔叔很快就被释放了。

张万程是位热爱祖国、主张维护民族主权的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可以不问世事、平安度日的巨富，可是他同情为光复祖国而不辞劳苦，日夜奔波的我父亲。我父亲去世后，他仍怀着炽热的同情心，把我当做独立运动者，支持我，保护我。

张蔚华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父亲只当我是一名纯粹的独立运动者。

抚松有军阀的爪牙和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但也有不少像张万程、史春泰、袁梦周、全亚钟那样有良知的士绅和爱国者，袁梦周是张蔚华的舅舅。我在第一优级小学念书时，袁梦周毕业于沈阳师范学校，来我们学校任教，后来当了校长。袁梦周教的体育课和风琴课大受学生欢迎，是大家最喜欢的科目。属于国民党左派的全亚钟是位思想倾向好的人。他一面开医院，一面开钟表铺，思想却相当进步。他哥哥全亚哲也是个很好的人。

我父亲和张万程的交情对我和张蔚华的友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父亲去张万程家给他治病、张万程来我家串门的时候，我也去张蔚华家串门，张蔚华也来我家温刁功课。每当张蔚华来我家时，我母亲就给他做朝鲜饭菜。他很喜欢吃朝鲜饭菜。张蔚华他们家则给我包饺子吃。像张蔚华喜欢吃朝鲜饭菜那样，我也喜欢吃饺子。山东出来的人都很会包饺子。张万程就是出生于山东的。

20 年代中期的抚松，市街呈井字型。东有东门，北有北门，西边有两个西门，南边有小南门和大南门。由大南门往北走一段，就

有张万程开的商店，冉往北走一段，拐弯就是张蔚华的家。我们走遍了这座县城的每条街巷和每一个城门。没有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玩过的游戏。我和张蔚华时常在学校操场上打网球，到松花江去游泳，还一起搞文娱晚会，上台表演。

张蔚华性格内向，刚直而热情。只要是伸张正义的事，他从不瞻前顾后，而是一马当先，锐身自任；对于不义之事，他不管对方是谁，总是义正词严，绝不宽容。他做事，一旦下了决心，就是上刀山也在所不辞。

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竟在学生面前无端遭到一个警察的毒打。眼看着这一令人吃惊的暴行，视老师为上帝的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我和张蔚华发表声讨演说，发动学生前去理论。我指出：警察毒打教师是对学园的侵犯，是对教职员和学生的严重侮辱。区区一个县警察署的臭警察竟敢肆意毒打教师，世上哪里还有这种天理难容的暴行嘶我们作为学生应该让警察当局向我们求饶。叫那个无赖汉来学校向老师脱帽请罪。

我们打着“严惩殴打教师的野蛮警察”、“保护教师的正当权益”等横幅标语，列队涌到县政府门前，呼喊口号，静坐示威，要求惩办毒打教师的警察。但是，县政府对学生们的正当要求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敷衍塞责。斗争失败了。

我们便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个警察。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同学们来报告说，那个殴打教师的警察要去戏院看戏。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决定在戏院的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个家伙教训一顿。但是若想痛打警察，又能安全脱身，就必须在他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行动。而戏台上总吊着一盏明晃晃的大汽灯，谁去击灭这只眼睛呢？正当大家讨论这个成败所系的关键问题

时，张蔚华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一任务。当天晚上，十几名学生按时进了戏院。等到戏演至一半，宣布中间休息时，张蔚华跳上戏台，用木棍一下子打碎了那盏大汽灯。与此同时，我高喊一声："打！"十几个字生一齐扑向那个警察，拳打脚踢，直打到他跪地求饶，我们才一阵风似地溜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张蔚华对我说：

"越想越痛快，今晚我第一次明白了用自己的力量惩治不义之事，是件多么痛快的事！"

"绝不能饶恕那种坏蛋，那些败类是我们所不共戴天的！"

我这么一说，张蔚华蓦地站住，换了口气，严肃地问我：

"成柱，小学毕业后，你准备上哪个学校？"

这完全是出乎我预料的。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小学毕业后的前途问题呢。于是淡淡地回答说：

"是啊，只要可能，很想上中学；可是我的家境，哪能允许我上中学啊？蔚华，你打算上哪个学校？，"

"我想到沈阳去，上我舅舅念过的师范学校。我父亲也这么说。要是你不反对，我就带你一起到沈阳去，咱们同上一个学校。师范毕业后还要一同去上大学……"

"亚青。谢谢你，可这是可能的吗？"

"怎么？为了学费问题？学费，你就不用担心了，有我哩。"

"恐怕我父母不答应。再说我也不想只顾上学念书。亡国奴还想上什么大学呀。"

"那么，你是要根据你父亲的意志去搞独立运动啦？你要去干革命，我也要跟你去。"

"可是沈阳呢？你不是说要上师范学校吗？"

“那是在和你一起去的条件下说的。你不一起去，就不会有我的沈阳之行。我呀，我很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升学，我也升学；你当共产党，我也要当共产党。”

那天晚上，张蔚华所说的要点就在这里。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压低声音说：

“亚青，谢谢你。可是你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做的事呗。”

“当共产党，要有个思想准备，有蹲监狱、掉脑袋的可能。你有这个准备吗？”

“这我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蹲监狱也行，掉脑袋也行。”

他这一不期然而然的宣言，简直使我发蒙了。他究竟受到什么冲动，发出这样的心声，我无法捉摸。可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对我说的话，是早已考虑成熟的理想和信念的表白。他是想把我的理想当做自己的理想，把我的信念当做自己的信念的。他不是先确定自己信奉的主义，然后找与之同调的朋友；而是先找好了朋友，然后选择了朋友所信奉的主义。他决定未来的方法，看起来十分单纯，实际上却是值得叫人寻味的。他这种立场完全基于对我的绝对信任和友情。他是真心向慕并且跟随我的。

我去华成义塾之前，他哭着要跟我一起走，也绝非偶然。和他分手，我也很不好受。在离别的前夕，因为他显得太难过，我不得不跟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夜晚。一天在我家，--天在他家；躺在一张床上，我竭力说服了他，彼此也互相抚慰了对方的心。到了动身去桦甸时，他一直送我到松花江渡口，洒泪而别。

那天，他问我：

“成柱，难道身分的壁障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么？”

“身分的差别与此毫无关系。你父亲不答应你，是因为他还舍不得让你过外地生活。”

“我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父亲是因为身分关系而束缚我的话，那么我为了你我之间的友情，甘愿做一个穷人。反正你要记住，不管你在哪里，做什么事，我迟早一定找你去。”

后来，张蔚华实践了这一诺言。我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瞒着家人，偷偷带着父亲的手枪，找我来了。

张蔚华的突然出现，使我目瞪口呆。

“成柱，我终于跳出家庭的圈子，来到了你的身边。看，这就是我的决心！”

他掏出了手枪，然后做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把脑袋往后一仰，凝视着天花板的一角。

“你父亲放你，真不容易呀！”

“什么放不放的，他是要我马上去沈阳，我趁机偷偷地跑到这儿来了。”

“你父母不会着急吗？”

“肯定乱成了一团，但不要紧。他们找不到我，就会派人来吉林的。他们会估计到十之八九我会到你这儿来。”

他没有猜错。几天后，他哥哥张蔚中领着家兵来毓文中学寻找弟弟。他听到弟弟就在我这里，就一屁股坐在地下，说：

“找到了就好了，我们还以为他被土匪绑走了呢。”

“蔚中哥，请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亚青的。”

我这么一说，张蔚中就说：“成柱，那我就放心回去了，把蔚华交给你啦。”他没向蔚华要回手枪，就带着家兵回抚松去了。

后来，我把张蔚华派到五家子和孤榆树，当了一年左右的教员。

之后，我劝他按父母的愿望升学念书，毕业后再回到我们的队伍致力于革命活动。他接受我的劝告，回家去了。

我和张蔚华的友情，就这样在循环不巳的悲欢离合中越来越加深了。

据悉，我和张蔚华重逢的那个岩洞，至今仍保持着原样。这处岩洞呈拐尺形，深约十五米，它深深地隐蔽在山野之中，用做秘密接头站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张蔚华一见到我，就泣不成声，不知所措。我也紧紧地搂住他散发出显影液气味的肩膀流下了眼泪。

“成柱，你怎么才来啊？怎么连一次都没有露面啊？你知道我是多么盼你来吗？”这是他的头一句问候。

“我何尝不想你啊。我也很想来抚松，很想来看看你。”

“那你该捎封信嘛！我不知道你的地址，可你是知道我的地址的!”

“蔚华，原谅我。我们住的间岛游击区，连个邮局都没有。”

“没有邮局？天下还有那种地方？”

我把我们四年来的苦难都告诉了他。他一边听着，一边老是用手背揩着眼泪。

“蔚华，你怎么老哭啊？或许你有什么不幸？”

我把话停下来，留心地察看着他的脸。

他揩了揩泪水，勉强做出笑容，说：

“因为你走过来的日子太惨淡了。想到你受那么多苦的时候我没和你在一起，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

“不，蔚华一直和我在一起。你一直在我旁边鼓舞了我。”

“谢谢你，你没有忘记我，就是我的幸福。别人都管你叫将军、

司令官，我也这样叫你吧。”

他突然没头没脑地提起了将军呀司令官呀什么的，我急忙摇着手说：

“蔚华，别人叫我司令官，你可不能这样叫我，一定要叫我成柱。我也不叫你先生，就叫你蔚华。成柱，蔚华！……这多么好听啊！

“蔚华，这期间你是怎么过来的啊？”

他像老头儿那样缓缓地摇着头，凄凉地笑了笑说：

“听了你的经过，我就没有心思讲我的了。在那鸡窝似的抚松小天地，我能有什么作为呢？只不过和你在华成义塾的同学康炳善一起，开了个‘兄弟书局’和‘兄弟照相馆’，把它作为据点领导着一些共青组织而已。”

他扼要地叙述了共青组织和抚松地区反日团体的活动情况。我对他的工作成绩表示了赞扬，并交给了他在抚松地区以共青组织为基础建立党组织的任务。

张蔚华接到这一任务，显出很为难的表情，说：

“成柱，凭我的能力，能做这么重大的事吗？我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也还很不够哩。”

“你领导共青组织已经有四年了，这也是很好的经验嘛。我准备常派金山虎政治委员来，有什么困难，就请他帮忙好啦。”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谈话从工作问题再转到生活情形的时候，张蔚华突然拉着我的胳膊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不得不依次告诉了我母亲去世、哲柱战死、英柱在别人家里吃眼下饭过儿童团生活的经过。我是很不愿意谈这些事的。因为我了解张蔚华，我怕他听了这些会唏嘘感伤，我的心

灵创伤也会因而再淌出血来的。我根本就不愿让我们作别四年后的相见罩上某种悲剧色彩。

果不其然，正如我所顾虑的，张蔚华听了我家的消息，就把脸埋在两只手里呜咽起来。

“这么说，成柱，你成真正的孤儿了！英柱也太可怜啦。我为英柱做点什么事好呢？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也好嘛。”

他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叮着我。我轻轻地摇了摇手，说：

“蔚华，他也长大了。他那个年纪，已经可以独力成家。无须对他多加关照了。”

他不理会我的话，执意地摊开本子等我回答。我只好往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安图金正龙家的地址。张蔚华若不是在正当有为的华年死于非命，肯定会为我在安图的英柱弟慷慨解囊的。

在庙岭岩洞会晤后，不久我们又在大营温泉村相逢了。那时我们的司令部带着二三十名队员驻在大营对面山谷里，我从这里去见张蔚华。张蔚华以洗温泉澡为名，也来大营住了几天。因为我们的部队挺进到抚松地区以来，敌人执拗地跟踪与我有过关系的人和亲朋至友，所以蔚华也为我们司令部的安全格外小心。

我和张蔚华一起洗温泉澡，谈了很多话。其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很自豪地说，按我的指点，他以在共青组织得到锻炼的骨干为核心，成立了党组织。当时他那迎着朝霞一般容光焕发的幸福的脸色，是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

在张蔚华住大营期间，我们还吸收由他带来推荐给我们的三名共青盟员加入了我们部队。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看到自己倾注心血培养的青年穿上革命军的军装、背着枪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脸上浮起了多么欣慰的微笑。这个微笑，的确是我永不能忘怀的。他带

来的三个青年中，有个叫延秘书的人，原先是个教员，他在我们部队进入白头山地区进行活动的时候，在密营里的树干上写了很多标语。他写的标语，如今还留在密营里。

在大营温泉的交谈中，印象特别深刻，直至今天还常常回想起来的是离别前一天夜里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问我：

“成柱，每当见到你，我就羞愧难当啊！”

“怎么回事？”

他脸上带着惭恋的神色瞧着我，我也好奇地望着他。

“我沾了早婚的光，还不满二十岁就娶了媳妇，四年前我成了一个孩子的爸爸，再过几个月就要当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当你率领部队南征北战历尽千辛万苦的时候，我却在家里生儿育女独享清福，这多么不害臊啊！”

“你尽说些什么呀！结婚，生儿育女，这有什么不对？是应当祝贺的事嘛！”

“可是你比我大一岁，还没有成亲呢。成柱，你说，你想老打光棍儿吗？”

“是啊，我还没有想过结婚的事。结婚要成为我关心的事，看来还得过好几年哩。”

“那就太晚喽。要是你不反对，我就在抚松给你找个对象。若是抚松找不到，就走遍沈阳、天津、长春、吉林、哈尔滨，一定挑出一个世人为之惊叹的倾国佳人来。”

“算了吧。那样的倾国之貌，还愿意到山里来啃粗玉米吗？”

“等着瞧吧，我非给你找一个杨贵妃那样的美人不可。”

张蔚华这样开着玩笑，使劲摇了摇我的手，随即离开了大营。

他那开玩笑时的笑容，至今仍不可磨灭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视网膜里。这就是张蔚华投给我的最后一次微笑。

我当然很清楚，他说的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不可能实现的诺言。然而我从他的玩笑中感受到了只有张蔚华才有的真挚的友情。不是张蔚华，又有谁能许下如此坦率、如此纯洁、如此炽热的诺言呀？

张蔚华回到抚松后，倾其全部心力和许多财力积极支援了我们的部队。由于他的积极主动的努力，大批棉花、鞋袜、内衣、药品、粮食、照相器材等支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我们部队的密营，从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在抚松地区的活动。我们用蕴含了张蔚华至诚心意的三千元巨款给每一个儿童团员和主力部队队员各做了一套新衣服，还购置了许多后勤物资。

大营警察分署的署长唐振东是我们熟知的人。我过去为同梁世凤进行合作去南满的时候，也在抚松跟他见过面。当我们再次来到大营的时候，他秘密地派人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要我们给他发一封恐吓信，那么他就装出一副被朝鲜人民革命军吓得不得了的样子，把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悉数送给我们。

他接到我们的“恐吓信”后，派大车多次给我们送来了猪肉、白面、豆油、针织品等后勤物资。靠他送来的这些物资，我们的警卫连过了二十来天很不错的日子。

那年秋天，张蔚华突然被宪兵队逮捕入狱。暗中出卖他的，是我念小学时的同学、当过白山青年同盟抚松县分会会长的郑学海。他起初喊着闹革命，跑跑颠颠地混了一些日子，后来叛变，当了临江宪兵队操纵的宣抚工作班的走卒。所谓宣抚工作班就是归顺工作队的同义语。当我率部挺进到抚松地区时，敌人为了刺探我们的去向，向各地派出了许多叛徒。

有一天郑学海找张蔚华说："我要找金日成，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张蔚华满有把握地回答说："知道，前不久我还见过他呢。"

因为郑学海曾在我指导下参加过青年运动，张蔚华压根儿就没有怀疑他。此后不久，张蔚华就被警察逮捕了。他推诚待人已成习惯。作为对地下组织的命运负责的党小组负责人，他过于天真老实、缺乏警惕了。对人抱幻想，缺乏警惕性，这使他变成了被五花大绑的囚徒。敌人妄图通过张蔚华查出我们司令部的位置，发现能够一网打尽抚松地区地下组织的线索，对他施加了种种严刑拷打。

张蔚华以沉默回答了酷刑。他冷静地意识到，如果敌人的拷打再加重，自己也许会不由自主地泄露秘密，说出我的地点和组织的线索，于是他决心以一死来保住秘密，便要求父亲设法让他回家住几天。张万程贿赂宪兵，提出了因病保释的请求。

敌人趁机予以假释后，暗地派特务严密监视他家，企图获得秘密组织线索和我们部队的踪迹。

他在自戕前夕对妻子说：

"恨只恨没能手握枪杆同金日成将军一起抗日到底。我只有用自己一人之死，换取同志们的安全，并以此报答金将军的信任和友情。你不要太难过。"

他写好寄给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敌人派特务正在秘密侦察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万望从速把司令部转移别处为要。"然后，走进照相馆暗室里，喝干一瓶显影药品升汞液，辞别了人世。这一悲痛的事件是1937年农历十月初二发生的。当时张蔚华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有为青年。

我的亲密朋友、忠实的革命战友、国际主义战士张蔚华就这样

离开了我们。

他为了我，为了朝鲜革命的司令部，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枪炮声震耳欲聋的中华大地上，撇下亲爱的父母妻子和彩虹般美丽的全部理想，壮烈地牺牲了。当时，他爱如掌上明珠的儿子张金泉才四岁，女儿张金禄刚刚出生。

恐怕再没有比人死于非命更可惜、更悲痛的事了吧。张蔚华虽然因疏忽被关进了监狱，但他是可以不走自杀之路的。只要用更多的钱贿赂宪兵队，敌人是会不了了之或打几个刑杖从宽处理的。然而他选择了自戕的道路，主动抛弃了人生的下一章。

人要活下去固然不容易，而要死也并不简单。死有千情万状，其中最痛苦的应该说莫过于自杀。前程无量的青年要自杀，更是需要非凡的果断和狠心的。自古以来，主动舍弃生命者，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的绝大部分是为自己而自杀的。而像张蔚华那样为别人而自杀的先例，是前所未闻的。张蔚华的自尽可以说是舍己为人式牺牲中最崇高、最壮丽的牺牲。他的牺牲之所以更悲壮、更庄严，我认为其理由就在这里。

接到张蔚华自尽的噩耗，我一连几天夜不成眠、食不下咽。我感到空虚，仿佛苍天哗啦一声在我身边崩塌下来；我感到胸口郁闷疼痛，好像重重地挨了一闷棍；我神魂摇荡，犹如从千丈悬崖坠入无底的深渊。在那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在我的胸中不知响起了几百遍悲愤凄咽的挽歌。

我后悔我没有听他的要求吸收他加入我们的部队。倘若他加入了人民革命军，不是可能还活在世上吗？这种追思不时地涌上心头，使我感到疼痛和惋惜。他申请入伍时，本应经过审查，批准他入伍。这是原则要求。一个青年坚决要求参军，不是应当予以批准吗？而

我却不按原则要求办事，让本应该站到第一线来的张蔚华退到第二线去了。我之所以不惜违背原则，否决张蔚华的入伍申请，是因为我对他过分的爱护。我不愿让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翻山越岭受苦受罪。我以为我自己能吃苦而张蔚华则不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他的偏爱。如果有人对此加以非难，我是无言以辩的。

申圭植、朴英、杨林、韩伟健、张志乐、金成镐、郑律成、韩乐然等几千几万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的爱国者曾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同样，许许多多中国战士也为朝鲜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爱的感情没有国界，科学没有国界，革命也没有国界。张蔚华、诺维钦科、切·格瓦垃、白求恩的事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张蔚华和诺维钦科是国际主义者的世界典范，过去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对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的支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国际主义的世界榜样。张蔚华的名字，在这些榜样的群体中像巨星一般闪闪发光。

今天，张蔚华在朝鲜人民中被誉为朝中友谊的象征。我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怀着虔敬的心情缅怀着为朝鲜革命建树了丰功伟绩的张蔚华。

四　革命战友张蔚华（二）

活着的人和死去的朋友之间，也能继续保持友情吗？果能的话，将以何种形式保持下去呢？

这是我的传令兵金正德在鸡冠砬子战斗中牺牲后，他最要好的朋友金凤锡向我提出的问题。金凤锡也是抗日游击队时期我的传令兵。金正德阵亡后，金凤锡长期沉浸在悲痛中，一直深情地悼念他。

那时，我回答说，活着的人和亡友之间也能保持友情，这种友情是以生者不忘死者，而死者常常浮现在生者的回忆之中的形式持续下去的。我接着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讲了我和张蔚华的友情。

这例子是我对亲身体验的表白。那时候，张蔚华去世已有好几年，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有时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和生前一样跟我畅叙友情。每当做过了这种梦，我心里就有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

金凤锡听了我的回答，又问：

“司令官同志，活着的人能为死去的人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看他很想从我的回答中听到些富于哲理的能当做自己座右铭的箴言，可我当时还没有这个准备。关于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友情维系，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确乎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那是连山野樵夫都可能有的平凡而朴素的想法。

“我认为，在活人能为亡友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很好地继承亡友的遗志。”

当时我对金凤锡只作了这样的回答。我想，如果别人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也会这样讲的。我的回答，的确是连山村樵夫甚至小学生都能作出的，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金凤锡却把它深深地铭记在心里。

金正德对他讲的遗言是要忠实地保卫司令官同志，直到祖国光复。金凤锡遵循这一遗志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直到光复祖国之日。后来他本人也牺牲了。

很好地继承亡友的遗志，是活人对亡友应尽的最崇高的情义。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我和我的战友们共同恪守的信条。

“为牺牲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牢记连长的遗言，坚决攻占那座高地!”

“按照烈士们的遗言，一定要光复祖国!”

在战场上，在宿营地和行军路上常常响起的这些口号，如实地反映了游击队员们要把牺牲的战友们的遗志坚决加以实现的意志和愿望。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们为了以忠实地执行革命任务的实际行动来尽到对已故战友的情义，竭尽了一切努力。我本人也为了以忠实地执行革命任务来实现与我们永别了的革命同志们的遗志，为了不辜负他们生前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进行了忘我的斗争。现在，我仍然以这样的态度和观点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革命任务。

但是，不能说这就是活人对亡友应尽的全部情义。以祖国解放这一大的变革为分水岭，根据新时代的环境和要求，情义的涵义更加丰富了。那些曾经认为只要实现了亡友的遗愿，就算尽到了活人对已故战友的情义的人，如今再不能就此感到满足了。他们想把牺牲在异国山野的战友们的遗骸迁到祖国来；想把被历史的荒烟蔓草

所隐没的战友们的事迹发掘出来传给后代；国家富强了，他们又想给烈士们竖立铜像；看到新的城市、新的街道建起来了，他们就想以烈士们的英名命名新的城市和街道。

对已故战友的革命情义，还集中地表现在对烈士子女的爱护上。我们凯旋祖国后，立即派人去寻找飘零在海外的革命烈士子女，像沙里淘金似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带回祖国，送到万景台革命烈士子女学院去读书；在国内进行了斗争的战士们的子女，也被送到这个学院，统统培养成为建设新朝鲜的生力军。

到了 70 年代，我们为了让子孙万代能够瞻仰生前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的仪容，在大城山朱雀峰上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在兄弟山区新美里的山岗上也建立了可称为第二革命烈士陵园的爱国烈士陵园。

所有这些举措都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了在最高的水平上尽到对已故战友的情义而发挥的崇高的同志爱和忠贞的情义。朝鲜共产主义者通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不仅在同活着的革命战友的关系上，而且在同已故战友们的关系上，都树立了值得万民称颂的榜样。

朝鲜革命者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同志爱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友情也是完全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以我个人的历史为例，只要回顾一下我同张蔚华的友情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如果有人以为我和张蔚华的友情以张蔚华之死而终止了，那就不能说是正确的。若说一个友人的死就是友情的终点，怎么能说它是真挚的友情呢！活着的人不忘死去的朋友，仅只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个友情是继续存在的友情，是具有生命的友情。

我和张蔚华的友情，在张蔚华死后仍继续保持着。张蔚华虽然与世长辞了，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张蔚华的崇高品质，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深深地沁入我的心灵。在抗日战争以朝中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的时候，最先浮现在我脑际的一大批中国同志和中国恩人中，居于首位的正是张蔚华。在解放了的祖国，当我一一回忆起许许多多曾帮助过我和我的一家，诚心诚意支援了朝鲜革命的中国恩人时，我的心情的确是感慨无量的。迎来了好世道，对恩人的怀念就更加深切。

每逢回忆起张蔚华，我就想到他的父母妻子。我对他一家想念最多的时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即在东北地区实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进行国内战争，战火席卷东北大地的时候。那也正是到处清算恶霸地主和买办资本家，打倒亲日派和民族叛徒的时候，于是我产生了这样的忧虑：张蔚华一家的人会不会也被划为专政对象，受到不适当的制裁呢？每当邻国发生波动，开展打倒某些对象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就为张蔚华遗属的命运担忧。

我在想，张蔚华虽然是立了很大功劳的革命烈士，但因为他是个主要搞地下工作的人，群众能把他这个大富家子不当反动派或叛徒看，而看做是共产主义者吗？我如饥似渴地期待和他的家人见面的日子。然而，新祖国建设、抗美大战、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等繁多的工作，使我不得不把许多事情推迟到以后去了。有许许多多我想找到和想见面的人，但是为了国事，我不得已把这一切系念暂置脑后，集中注意力于工作了。

我第一次听到张蔚华一家的消息是在1959年。这一年，我国组成一个抗日武装斗争战迹地考察团，把它派到中国东北去了。

我在会见考察团时，托付朴永纯团长说：

“朴猎手，在马鞍山密营，孩子们受冻挨饿、饱尝疾病折磨的时候，给我们送布送钱的那个兄弟照相馆主人张蔚华，你还记得吗？他牺牲已有二十多年了，可我至今还没有好好问候过他的父母妻子。你到了抚松，就替我向亡友的遗属转达我的问候吧。”

“记住了。我也想到了，到抚松去看望张蔚华的遗属，是应尽的情义。我们曾得到他多么大的帮助啊！”

朴猎手也像沉浸在无限的感怀之中，眨巴着湿润的眼睛。

“张蔚华虽是别国的人，但他无异于朝鲜人，无异于朝鲜革命家。他所建树的业绩，不仅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而且在我国的抗日革命史册上，也能占有光辉的一页。如果张蔚华的遗属不在抚松，搬到别处去了，你就请公安机关帮助，一定要弄清楚他们的去处。”

“我明白，即使找遍全中国，也一定把他们找到。”

考察团去了中国后，我急切地等待着抚松的回音。那时我们已经医好了战争创伤，完成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我在精神上有了一些余裕，可以去关心已故老战友和他们的遗属的命运了。

过了几个月，朴永纯终于给我打电报送来了我苦苦等待的消息：“今天在抚松见到了张蔚华遗属。首相同志的问候已如实转达。夫人不住地流泪表示了感谢，还送了考察团一张照片。我们正在倾注最大的努力搜集有关首相同志与张蔚华共同斗争的资料。具体情况准备回国后向您汇报。”

后来我从朴永纯的汇报得知，张万程于 1954 年下世，张蔚华夫人和她的儿子张金泉、女儿张金禄仍在抚松旧居过着俭朴的生活。

当朴永纯转达我的问候时，张蔚华夫人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常言说，天无时不变、人一辈子在变。可是金日成将军的友情却始终不渝。已经二十多年了，将军还念念不忘我的丈夫，我不知怎样感谢他才好啊！”

她作为回礼，把一张保存了几十年的照片交给考察团团长，托他转送给我，这张照片就是张蔚华和我的哲柱弟的合影。

这张照片，同那年秋天革命战迹地考察团搜集来的其他革命文物一起，陈列在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里。从这时起，我国人民才看到了张蔚华的面容。我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着这张照片，久久舍不得离开。这张照片对我的震动很大，简直使我产生了错觉，仿佛二十年前在大营分手的张蔚华并没有死，他活着来到了平壤。

直到那时，我国人民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张蔚华。其时身肩宣传部门要职的事大主义分子们没有广泛宣传我们党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以致没有多少人知道张蔚华是怎样帮助过我，为朝鲜革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知道张蔚华和我的关系的，只有几个抗日老战士。

我很想向随行人员夸赞张蔚华，说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多么出色的革命家，多么优秀的国际主义者。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储满了我胸间的怜惜之情、悼念之情终于像喷泉一样喷薄而出了：

“同志们，他就是我在抚松第一优级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他是我的朋友，忠实的革命战友。他的战友，有很多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张蔚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通过我们认识了朝鲜，在同我们建立友情的过程中，同情、支持和声援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本是个不干革命也可以锦衣玉食的人，但他自告奋勇参加了革命斗争，而且在革命斗争中为保护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今天我在这里看到这张照片，对张蔚华的怀念就更加深切。我们越幸福越

不要忘记像张蔚华这样的恩人，越不要忘记用鲜血支援了我国革命事业的中国朋友。”

从那时起，我国出版物便广泛介绍了张蔚华的事迹。像罗盛教和黄继光那样，张蔚华也成了我国人民无人不知的著名的国际主义烈士。我们的后代像缅怀金振和马东熙那样，以无限热爱和尊敬的心情缅怀着张蔚华。

我们的考察团抵达抚松的第二天，张蔚华夫人还对儿女们说：

“金日成将军和你们父亲从小学时起就结下了深厚友情，亲如兄弟。他们两位的莫逆之交不知有多么深厚，抚松的同学们对此无不羡慕。你父亲毅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能坚持斗争到底，也是因为有了金日成将军的影响和领导。所以你们的奶奶也总说，你们该称呼他老人家为伯伯。将军总是记挂着我们，时时刻刻想念你们父亲。金泉，你应该给伯伯写信，表示感谢并向他老人家问好。”

母亲的回忆，使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张金泉夜不成寐。1959年，张金泉长成一个美男子，那时他比他父亲喝下显影液自尽时大两岁，他代表全家人的心意，给我寄来了一封很长的信。

我接到那封信，思念呀思念着张蔚华，一连几天睡不好觉。由于我的问候和张金泉的来信，我和张蔚华之间的友情的血液，重又奔流在同一动脉里了。

活着的人与亡友的友情，可以说，通过活着的人对亡友的子女的爱护和关怀，也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与张蔚华的友情，在我和他的子女们的不断交往中，以新的形式更加深化和发展了。

打从接到张金泉来信开始，我的心总是想着那个容貌与性格全然不知的素昧平生的青年。他的信酷似他父亲的笔迹。我甚至这样想：连他的长相也跟他父亲一样该多好，而且不是在照片上，而是

在我的面前能亲眼看到他该多好啊！

然而这还不过是一种遐想。要想实现这一遐想，还需要通过许多难关，需要我自己的坚持不懈的热忱和耐性。我和张蔚华遗属之间有着一道叫做国境的冷漠的界线。国境，是个不体谅道义和友情的傲岸的壁障。

自从接到张金泉的来信，又过了二十多年，1984 年 5 月我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幸路经中国东北地区。东北的山野，是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是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历尽千辛万苦的地方。这个无异于我的故乡的山野，有着许许多多令我怀念的往事。它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渴望着旧地重游，却又不能如愿以偿，只能在梦中尽情遨游直至脚脖子发酸的地方啊。也许是考虑到我的这种心情，金正日组织书记才给我定了经过图们、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去苏联的路线吧。

我的视线久久地离不开那熟悉的连绵起伏的山峦。有多少人洒下鲜血倒在这块大地上啊！虽然岁月已经流逝了几十年，但在那戎马倥偬的年代里一同在篝火旁打瞌睡、同吃一锅野菜粥、一起被硝烟熏黑了脸的老战友们的面庞，却清楚地浮现在眼前，使我无法把视线从车窗外收回来。

当专列离开图们向前奔驰的时候，我想起了住在抚松的张蔚华的家小，便对随行人员说：

“这一带是我很早就想来看的地方。如果有时间，很想去看看打游击时的战友和朋友，也去看看埋有已故战友遗骨的战场；可是我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心里十分难过。抚松离这里只有几百里地，那里有张蔚华的遗属，给他们送一点礼物作个纪念才好。”

几天后，中国有关部门的干部给张蔚华一家转交了我的礼物。

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后，我回到祖国来，接到了张金泉的第二封来信，于是我邀他到平壤来。我还请胡耀邦总书记予以协助，使张金泉对我国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1985 年 4 月，张金泉终于带着妹妹张金禄和长子张琪踏上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访朝之路。正当山川草木一片新绿、百花争奇斗艳的春天，我在兴夫招待所见到了抚松来的贵宾。

在我看到走下轿车的张金泉和张金禄的瞬间，一股激情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张金泉长得随他父亲；张金禄的相貌仿佛是母亲的复制品，活脱也似的相像；张琪呢，好像是祖父母脸上一切美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面容都酷似他们的父母，这在他们肯定是值得高兴的，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满意的。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去世已久的张蔚华夫妇起死回生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全神贯注地打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希望能看到张蔚华的举止。接着，就像在庙岭和大营同张蔚华相逢时那样，我张开双臂将张金泉、张金禄、张琪紧紧地抱在怀里。

“欢迎你们!”

我跟他们打招呼，头一句用了中国话。在几十年的风浪冲击中，我的中国话的底子已经丢失不少了。可是从我嘴里很自然地迸出了“欢迎你们”这句中国话。有些人说，一个国家元首在外交场合用外语讲话，是违背惯例的。可是我完全无视这种惯例。张金泉一行不是为了搞外交来访问我的客人，我也不是为了搞外交而邀请他们的。会见战友的子女，还要讲外交，讲惯例吗！正因为这样，我在那天为他们准备的午餐会上，也没致祝酒词。这也是打破惯例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讲什么祝酒词了。来，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朝中友谊，干杯。”我用这样的话代替了祝酒词，张金泉

也非常高兴。

张金泉和他父亲一样，不大爱喝酒。我没有劝他多喝。我们只喝了三杯度数不高的地芬子酒。密特朗访问我国的时候，我也请他喝了地芬子酒。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这是专供日本天皇喝的名酒。三杯这个数字，很有意义。1932 年 6 月，在抚松十字街北面一家叫“东烧锅”的酿酒厂，我和张蔚华道别的时候，我们也只喝了三杯酒。

欢迎抚松贵宾的午餐持续了三个小时。不拘形式和惯例的午餐会，洋溢着一门团圆的家庭气氛。我们又到院子里谈了许多话。

那天的谈话，中心内容是关于情义的问题。我追述了抚松时期亲身体验的张万程和张蔚华对我们一家的情义，客人们也讲了我对他们的情义，对我表示了感谢。

“你的爷爷帮助了朝鲜的独立运动，你的父亲帮助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

我用这样一句话向金泉评价了张蔚华一家的功绩。

那天我对张万程和张蔚华的情义讲得特别多，这并不是单纯为了赞扬他们，而是我希望张金泉、张金禄、张琪等张蔚华的后代也都成为重情义的好人，成为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人的情义，不仅存在于封建伦理道德所讲的君臣、父子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朋友和同志之间。我认为交朋友讲信义这句话就包含有这种意义。所以，古代圣贤们以仁德和信义立言，认为仁者无敌。他们说，有德则有人，有人则有地，有地则有财，有财则有用。以“德人地财用”五个字所概括的古代东方哲学，的确具有深奥的道理，对现代生活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并不一概否定三纲五常，也不容许人为地把它同共产主义

理念对立起来，批评它同共产主义道德背道而驰的极端看法。臣子效忠国家有何不好，子女孝敬父母难道是违反常情的行为？我们反对这种道德观念把封建的国家社会制度加以合理化，驱使人民盲目服从，不许反抗；但在哲理方面绝不否认三纲五常所强调的人所固有的道德基础。

张蔚华和我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也不是父子关系。他献出生命保护我，这不能认为是从三纲的君臣有义出发的。他是为了不过是作为一名革命同志的我和革命的利益，才发扬了与三纲的要求迥然不同的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义。张蔚华建树的业绩之所以宝贵、伟大，是因为这个道义无比纯洁，无比崇高。

那次，张金泉一行代表他们一家和抚松人民赠送我一座雕有“二龙戏珠”的木钟和一幅中国画《多寿图》。《多寿图》画的是一个农家儿童提着一只篮子，篮里装满了硕大的寿桃。据张金泉解释，是祝我健康长寿的。

我作为回礼，回赠给张金泉、张金禄、张琪每人一只嵌有我名字的金表，还亲自给他们戴在手腕上。张金泉还在平壤接受了全面的健康检查，拔掉坏了的臼齿，镶上了金牙。

我和张金泉一行第二次见面，是在国境城市新义州的一个招待所里。我为踏上归国路程的他们，又准备了一桌午餐，同他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

临别，我赠给他们每人一架照相机。他们都感激不尽。我经过千思万虑，才决定赠送他们照相机作为纪念。张蔚华在抚松开兄弟照相馆的时候，还送过我们一架照相机。我赠送他们照相机，既是对张蔚华的回报，也是对他们表示一种希望，即希望他们继承张蔚华以摄影工作服务于革命的精神，希望他们学习这一榜样。那时张

金泉也像他父亲一样，在抚松从事摄影工作。

握别时我对他们说：

“我明天就要离开新义州回平壤去了。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要攀地位，不要出岔子。你们从小没有父亲，现在我就是你们的父亲。”

1987 年，张金泉偕同夫人王凤兰、次子张瑶、孙女张萌萌又一次访问我国。那时我先后七次会见了他们。这也是打破惯例和规范的。五岁的张萌萌是为庆祝我七十五岁生日而来的众多外宾中最小的朋友，也是代表张蔚华一家第五代的人物。

4 月 13 日晚，张萌萌同他爷爷、奶奶、叔父一起应邀来到烽火艺术剧场，观看了参加“四月之春友谊文艺节”的世界各国艺术团的联合演出。那天我在那个剧场第一次见到了张萌萌。我走出休息室，穿过中间过道步入座位时，同坐在前排的张金泉夫妻一一握手，然后一把抱起小萌萌举在空中。小萌萌一点也不认生，把自己的脸蛋紧贴在我的脸颊上欢笑。

顷刻间，场内几千名观众一齐向我们鼓掌。不知道我和张家关系的外国客人，也怀着做了这一场面的目睹者的喜悦，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祝福的鼓掌。

是啊，小萌萌，我就是你的大曾祖父。我把你抱在怀里，就更加想念你的曾祖父。你的曾祖父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如果他还在世，该多么疼你啊！他还不到三十岁就为我献出了生命。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这个恩才好。你是朝中友谊的第五代花朵。你的高祖父和曾祖父、我和我父亲都为这一友谊而献出了一生。你是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浇灌的大地上开出的一朵花。愿你为朝中两国的友谊开得更加鲜艳，为世人所称颂吧！

这是我在那雷鸣般的掌声震撼剧场的短暂时刻里所想的。我把张萌萌紧紧地抱在怀里，小女孩的小小心脏紧贴着我的心脏急促而均匀地跳动着。她那充满活力、热情迸发的脉搏触到我心脏的瞬间，可以说是我和张蔚华的友情连结到第五代的意味深长的时刻。张万程、张蔚华、张金泉、张琪、张萌萌……是的，在这个梯队里，我们两家的友谊饱经风霜，跋涉千山万水，传到了第五代。这是两家之间的友情，同时也是朝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因为这样，张金泉才把这个友情命名为“悠悠敌人情”。

人们看到我和抱在我怀里的张萌萌，一致确信朝中友谊将万古长青，牢不可破。

这天，为了作纪念，我在张蔚华和我弟弟哲柱合拍的照片上签了我的名字又送给他们。金泉表示要把它当做传家宝精心保管。

在张金泉一行逗留我国期间，我们给他们安排了专机和专列，配备了许多服务人员。他们作为张蔚华的后代，作为国宾，受到了应有的接待。

1992 年 4 月，张蔚华的后代为庆祝我八十岁生日，再次前来看我。这是他们第三次来访。张金泉夫妻、张琪夫妻、张瑜、张萌萌，还有住在北京的张金禄和她的爱人岳玉宾、女儿岳志云、儿子岳志翔等一行十二人来到了平壤。随着访问次数的增加，我和张蔚华后人的情谊愈加深厚，愈加热烈。

张金泉第三次来访时，作为纪念送了我一本他自己撰写的长篇手记《悠悠敌人情》。这是一部记述了打从我的父亲同张万程开始的我们两家友谊的书。写得很朴实，毫无虚夸。而笔调雄浑奔放，字里行间洋溢着手足深情，使我大受感动。我称赞他写得很好。张金泉就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忐忑地说，不知道是否把伯伯对我们的

深厚恩情写好了。

我作为回礼，把我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送给了他。

张金泉一行第三次访问我国的时候，我对他们说：

“用生命保护了我的外国人有张蔚华和诺维钦科两个人。当然，诺维钦科还活着，但他如果没有豁出一命的决心，是发挥不出那种牺牲精神的。在不容思索的瞬间作出那样的行动，可不是容易的事。”

听了这话，张金泉和张金禄由衷地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说，诺维钦科的功绩比他们父亲的功绩还要大好几倍，要不是他，该会出什么事啊！

“在我的一生中，帮助过我的人多得很。在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抢救了我的难忘的救命恩人很多。现在和你们一道的孙元泰先生的父亲孙贞道牧师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甚至这样想：为国家做好事的人，上帝也会保佑他，总有恩人来帮助他。这并不是唯心论。决心为人民贡献自己一生的人，不管在哪里，人民总会帮助他的。这是真理，是辩证法。”

我对他们恳切地说，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亲那样做一个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民的好儿女。

张金禄送我一件她自己亲手编织的绛紫色毛衣。她说，如果送别的东西，怕我不用，会被拿到国际友谊展览馆去，因此准备了能够放在我身边随时穿用的东西。想得何等周到。我感激地接过来，按照他们的希望当场就穿在身上，还作为纪念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张金泉向我表示一项意愿说，在他父亲逝世五十五周年的时候，准备立一个新的墓碑，很想请我写个碑文。

他能这样毫不见外地请我写碑文，我心里很感谢他。这证明他

是真心实意地把我当伯伯看待的。

“哦，已经五十五周年啦。记得你父亲去世，是农历十月吧……”

我沉浸在肃穆的心境之中，不由得想起了 1937 年那阴沉沉的秋天。

“是，伯伯。是 1937 年的农历十月初二，公历是 10 月 27 日。”

“别那么做了。不用我在你们立的墓碑上题词，我要用我的名义给你父亲立一个纪念碑。怎么样？”

我这一突然的建议，弄得张金泉和张金禄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面对面地发着愣。他们提的也不是什么大的要求。他们把我当做他们的一家之长，毫无拘束地吐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没想到我会提出出乎他们意料的纪念碑问题，不禁有些惊慌。

张金泉慌忙地说：

“那怎么行？给伯伯添麻烦可不行啊！只要您给我们题个字，我们带回去刻在墓碑上就好。”

“那也可以。不过，既然有红装就不要素装嘛！我在这里准备一个纪念碑，刻上我写的题词，派我们的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就做好立碑的准备吧。什么时候送好呢？”

“要这样，我们更感激不尽了。可是伯伯那么忙，我们又让您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怕是我太冒昧了……”

张金泉和张金禄不知如何是好。

“准备纪念碑，不需要多长时间。既然要立纪念碑，就在你父亲去世那天举行仪式才好嘛。”

张金泉和他的一行欣然同意了我的建议。他们说，回去后一定加紧筹备纪念碑揭幕式，同时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报告。

这样就将以我的名义给老战友张蔚华的茔地竖纪念碑了。我国

党史研究所的干部把纪念碑从平壤运到了抚松。中国的党和政府还派人到临江桥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的代表，10 月 27 日在抚松市张蔚华茔地隆重举行了竖碑仪式。中国的新闻媒体很重视这一仪式，作了广泛的介绍。

我亲手写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 张蔚华烈士的革命业绩是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光辉的典范。烈士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
> 金　日　成
>
> 1992 年 10 月 27 日

我们的代表回到平壤后，我看了竖碑仪式的录相，其盛况使我吃了一惊。那是只有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朝鲜的革命战士和中国的革命战士才能创造的友谊和道义的生动画幅。

活着的人和亡友之间的友情也能继续保持下去吗？

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能保持下去。现在也这样回答。我对张蔚华一家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情谊，在抚松举行的竖碑仪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回答是妥切的。

活着的人不可忘记牺牲的人。只有生者不忘死者，他们的友情才是巩固的、真挚的和永恒的。如果活着的人忘记了已故的人，那么他们的友情就在那一刻归于寂灭。我认为，常常回忆已故的人，广泛宣传他们的业绩，细心照顾他们的后代，忠实地继承他们的遗志，是活着的人对前一代人、对先烈、对已故革命同志应尽的情义。如果没有这种道义，就不会有历史和传统的真正的继承。

把纪念碑送走以后，我的心情轻松一些了。但是，即便竖起了千万个那样的纪念碑，难道能报答完张蔚华为我捐躯的恩情吗？

现在，张蔚华的孙子张瑜和外孙女岳志云按照他们父母的愿望，正在平壤国际关系大学就读。

每当怀念张蔚华的时候，我就去访问他们的宿舍。国家主席在争分夺秒的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做外国留学生工作，是不容易办到的。然而，我的辅助人员却毫无吝惜地抽出我的工作时间安排我去做张蔚华后代的工作。为他们消耗时间，我并不感到可惜。

当张瑜和岳志云用一口流利的朝鲜话向我拜年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十分惬意。他们讲朝鲜话的确讲得很好。我希望他们早日精通朝鲜语，习惯于吃朝鲜菜，同朝鲜人相处得亲密无间。

临近 21 世纪的世界政局极其严峻而复杂，但我和张蔚华一家的绵绵情谊是绝不会变易的。

我很早就表示过访问抚松的意愿，这个心愿至今仍没有变。我很想去抚松瞻仰坐落在南甸子的张蔚华之墓，只怕这一愿望终将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但愿在梦中能去到老战友的身边。

五　祖国光复会

新师的诞生，进一步壮大和加强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这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为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做好建党准备，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新师的诞生，成了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保证朝鲜共产主义者向国内腹地扩大武装斗争和把各阶层爱国力量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强大动力，为我们从卡伦会议以来坚持不懈地开展的统一战线运动实现划时代的转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南湖头会议以后，我们的统一战线运动集中力量于开展争取建立泛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活动，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它的旗帜下紧密团结广大反日爱国力量，无论是从我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内外形势的要求来看，都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实现自主独立的最可靠的途径是开展以民族大团结为基础的全民抗战，民族大团结是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争取独立事业的成败的关键——这是我们很早以来坚持不渝的思想。统一战线，同确立主体一样，是我们从抗日革命斗争初期起就一直坚持的最重要的宗旨之一。

从实现民族大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宗旨出发，我们为实现同各派民族主义势力和反日爱国力量的联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根据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斗争这一情况，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广大反日力量

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斗争。在这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成了广泛开展统一战线运动的宝贵基础。我们以这些成就和经验为基础，为了创造能够在全民族范围内开展统一战线运动的条件，并且为了迅速培养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骨干和主体力量，倾注了一切力量。

在30年代以前，也有人曾试图把民族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一个整体。

在朝鲜近代史上，开始谈论超越主义和主张实现民族大同团结的问题，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在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有代表民族主义和代表共产主义的两种力量。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暴力政治和经济掠夺的强化，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先觉们痛切地认识到了爱国力量的团结和民族大团结的必要性。从这种必要性出发，早期共产主义者们开始摸索同民族主义者合作，民族主义者们也试图同共产主义阵营携手。

这两个阵营的领导者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恢复民族主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他们共同作出努力，于1927年2月在汉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新干会。民众对这一团体寄予很大的期望和信赖，以至当年的爱国人士和史学家们甚至把新干会称为民族单一党。新干会一成立，那些一直对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目和对立深感不满的群众，就发出了欢呼声。

由于主义和主张的不同而互相疏远的共产主义运动者和民族主义运动者，虽然为时晚一点，但终于认识到统一团结的必要性，建立了单一的统一战线机构，是符合民众愿望和时代要求的大好事情。

新干会，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协同战线的第一个产儿，其宗旨和目的是爱国的和反日的。

由于实现了可以说代表全民族的两大力量的联合战线，新干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成了代表全民族的唯一组织。建立这一团体的宗旨，其名称就对之作了很好的说明。新干会这一名称是它的发起人依据“古木新干”这一意义，从中撷取了新干这个词。新干即指古木上长出的新枝干，正如这个名称所表明的，新干会追求的是在新的基础上团结全民族的力量。

新干会运动是由李商在、洪命熹、许宪等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进步的爱国志士们发起、推动和领导的，它提出了以促使民族从政治上觉醒、经济上振兴起来，巩固民族团结，拒绝一切机会主义等为内容的革新的、革命的纲领，会员的职业多种多样。新干会会员有三万七千多人，其中有纺织工、裁缝工等工人和农民，有开旅店的、开照相馆的，有记者、商人、医生、公司职员、教师、代书人、畜牧业者、印刷业者，有搞渔业的、搞运输业的，还有学生、律师、作家、银行职员、宗教人士等等，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新干会尽管提出了以左右各种力量合作来实现民族大团结的上好的宗旨和目的，但于 1931 年 5 月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对于新干会解散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共产主义运动者们说它解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则把责任推给共产主义者。有一个时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新干会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层人士的分裂和改良主义倾向，并且否认这一组织的爱国性质和它在民族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我不能同意这种虚无主义的看法。科学地分析解散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是好事；但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却不是好事。不能因为新干会的上层有一些改良主义者，就否定这个组织本身；也不能一概抹煞这个组织在民族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新干会解散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害怕朝鲜民族反日抗战力量的团结，便从中作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收买改良主义的上层。又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能够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和破坏活动，熟练地引导新干会前进的核心领导力量。

我们从新干会的解散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下定决心要由我们来主导爱国民族力量的统一，于是把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作为重要方针提出来，并为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所有民族力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过程中，培养了能够主导这一运动的骨干力量，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南湖头会议通过了成立泛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决议，从而成了使我国统一战线运动出现新的变化的历史性分水岭。

当时也是在国际上为了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展人民阵线运动，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对抗的时期。

从德国纳粹分子夺取政权的事件中受到很大刺激的法国工人阶级，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他们本国日益增大，深刻地意识到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社会党由于群众强烈要求统一行动，于 1934 年 7 月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缔结了反战、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公约。在这两党的影响下，曾被分裂的工会也合并起来。在这股洪流中，结成了“劳动、自由、和平人民阵线”。形势要求把这一阵线扩大和发展到同中产阶级的统一行动。1935 年 6 月底，小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加入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从而实现了所谓“人民联合”。同年 7 月 14 日，在巴黎举行了几十万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人民阵线示威游行。三党首脑莫里斯·多列士、莱昂·布鲁姆、达拉第肩并肩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1936 年 1 月，以三党为中心、以参加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进步团体的统一行动为基础的

人民阵线纲领得以正式发表，在同年4～5月间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人民阵线以压倒多数取得胜利。结果，萨罗内阁总辞职，产生了以莱昂·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内阁。人民阵线政府试图以提高群众购买力的方法克服经济危机，但没能取得成功；它虽然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却实行不干涉政策，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结果人民阵线政府被颠覆了。但它阻止了法西斯政权在法国的建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法国人民阵线运动的发展中得到很大的启迪，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提出了结成人民阵线的重要斗争目标。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把以立即打倒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世界革命作为当前任务提出来，而是把维护和平与民主、反对战争与法西斯的运动作为当前任务提了出来。可以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路线上的变化。第二国际系统的一些政党拒绝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但在法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人民阵线运动还是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1936年2月，在西班牙出现以阿萨尼亚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班牙人民阵线遭到佛朗哥的叛乱和德、意两国的武装干涉，陷入了困境。对西班牙人民阵线来说，在美、英、法主导下推行的所谓不干涉政策是个致命的打击。决定严守中立、禁运武器的错误的不干涉政策，招致了帮助叛军的后果。最初，苏联也采取了不干涉立场，后来看到这种立场绝对不利于人民阵线政府，才改变态度，向人民阵线政府提供了飞机、坦克等武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困境，激起了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同情。各国无数的志愿军奔向了西班牙。这样，西班牙就成了支持人民阵线的进步势力同法西斯主

义势力进行斗争的国际战场，使人联想起一场小规模的世界战争。这就是当我们在东岗成立祖国光复会的前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进展状况。我们从埃塞俄比亚爱国者对意大利侵略者的英勇抗战中，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共产国际及时地掌握了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把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展开反战、反法西斯斗争，防止战争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捍卫民主作为当前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从而起到了与世界革命领导机关的名义相称的作用。可以说，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有关联的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

对我们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新的敌人。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既没有改变我国革命的对象，也没有改变我国革命的性质。在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路线之前，我们已经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并按照这一路线大力推进了我国革命。

从南湖头会议以后，开始了建立一个泛民族的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的筹备工作。在这以前，主要是由我一个人单独研究和酝酿成立光复会的问题。金山虎、崔贤、朴永纯等几位同志偶尔也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但他们基本上采取了让司令官研究处理的态度。后来在敦化玉水川附近的一个山村遇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书生，他成了一个很好的进言者和讨论伙伴。

那个村子里有两家朝鲜人，我住进了其中一家。那时有一支在和龙地区活动的小分队来找我们，说他们带来了一个怪人。他们说，这个人是在和龙的一个山村碰到的。他猜到小分队要去找司令部，就一直尾随而来，说是一定要去见见金日成将军。小分队战士们考虑到不应把来路不明的人带到司令部去，便再三劝他回去。

可是他说："用不着操心，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咱们互不干扰。"

他就这样与小分队隔着一定的距离，若无其事地跟着来到了这里。

这个没见面就使我感到好奇的人，在跟我第一次见面时也表现得很古怪。尽管小分队的同志们向他介绍我就是司令官，可是这位古怪的客人却根本不听，一味地缠着我们说，看在他的诚意和一把年纪上，应该让他见见真的金日成将军。我是在给房东劈柈子的时候见他的，他可能是看我的样子不起眼，把我上下左右地端详了半天，才开口说："金将军岂能这么年轻，一个将军岂能像长工一样给人劈柈子，衣着还会这么破旧？"

在北满官地附近宿营的时候，一个新来的传令兵值班看守篝火时打起了盹，没发现一颗火星落在我的棉裤上烧了一个窟窿。所以我那本来就破旧的棉裤又多了一个补丁，我的衣着自然显得不像样子了。

这位客人，确实是一个怪人。他留着一把胡志明式的山羊胡子，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实际不过四十五六岁。

他说，他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传闻，因为我名声很大，很想亲眼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专程来找我。我回答他说，声张的喜筵没有吃头。他点了点头说，只看将军的穿戴，也能估计到有多么艰苦。

我们两人尽管年纪相差很大，但不知怎的，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他的自我介绍，就很豪爽，令人惊奇。

"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会儿投到这边，一会儿投到那边，是个忽左忽右、一事无成的人。"

我一生会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但从没见过初次见面就毫不隐讳地介绍自己是机会主义者的人。

只有无比正直和有良心的人，才是无比坦率的。坦率，是像白雪一样纯洁无污的良心的反映，是掩盖不住的良心的光芒。他用那么几句使我们感到惊异的坦率的语言，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从他那自我贬低、毫无做作的语言中，反而看到了他的高尚人格。

因为我们必须尽快赶到迷魂阵去，不能在此久留。所以，只要不让他感到失望，我想跟他简单地谈谈，就动身。

可是，当我们上路的时候，他不仅不回去，反而又跟上了我们。他说，见到了金将军，就舍不得分手了，允许他再一块走那么几个小时，一起谈一谈吧。不知为什么，我也舍不得和他分手。于是，带着他一起上了路。

一路上我们一直谈着话，忘却了疲劳。我只顾谈话，甚至忘记了下口令让队员们休息，以致金山虎靠到身边来提醒我该休息了。

这位客人就是在我们的党史里所讲的祖国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外号叫“烟斗老头”的李东伯。

很多人知道咸镜南道端川是李朝末期的参领、著名的义兵首领、共产主义运动者李东辉的故乡，但是知道它又是李东伯的故乡的人，恐怕没有多少。我们在行军路上才得知，他自幼攻读汉学，受李东辉的影响很大，并在李东辉的影响下参加了独立运动。他参加的是叫做军备团的斗争团体。其所在地是长白地区。

一提到军备团和姜镇乾，我们的谈话就更加活跃了。对于姜镇乾，他也很熟悉，并不亚于我。他说，他多次去过八道沟和临江，每次都跟姜镇乾取得联系，两人的关系很深。他在军备团里的职务是通讯事务局长。

庚申年“大讨伐”的狂风席卷长白地区时，曾经显赫一时的军备团也分崩离析了。李东伯大失所望，毅然出奔俄国找李东辉去了。他在赤塔找到了李东辉，也加入了高丽共产党。昨天的独立运动者一眨眼之间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者。随着这一变化，他很快被卷进了派系斗争的旋涡。

当李东伯谈到高丽共产党的时候，我想起了曾在五家子见过所谓高丽共产党党证的往事，于是问他认不认识边大愚。他说他们是老朋友，是莫逆之交。

我跟他说我在五家子边大愚的家见过高丽共产党的党证，他就问我见没见过盖了马铃薯图章的代表证？我回答说，我从没有听说过。他就开始讲起了马铃薯图章的故事。

1922 年 11 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上乌金斯克举行了上海派和伊尔库次克派的合并大会。他们以为只有在大会上占多数，才能在合并后掌握党的领导权，于是为了增加自己一派的代表人数，暗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伊尔库次克派甚至用马铃薯刻的图章造出许多假的代表证，让假代表出席大会。上海派干的舞弊行为，也不亚于他们。大会上，两派争执不下，闹得乌烟瘴气。边大愚大失所望，抱着回到民族主义运动去的念头，上临江去了；李东伯则受李东辉的委派，去了珲春。

“烟斗老头”在珲春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员，到 1925 年春去了汉城。他改名换姓出席了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二年又参与了“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运动。各种派系汇集的汉城，使李东伯不知不觉地重新被卷进了新的派系斗争的旋涡。他起初被拖入了火耀派，后来又加入了 ML 派，他就这样一身两任甚至三任，在忙忙碌碌、闹闹嚷嚷中过日子。

各派为掌握党的领导权而进行的卑鄙无耻的明争暗斗，甚至闹出了把一个中央委员装在麻袋里用棍棒乱打、用木枕乱砸，打破了脑袋的丑事，演出了向警察告密让警察把反对派抓去关进监狱的令人厌恶的丑剧。李东伯意识到，倘若继续留在汉城，就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戴上手铐脚镣或被乱棒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他重又回到了北间岛。

李东伯像一只没有篷帆、没有舵、没有橹的遇难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随波逐流。后来他终于诀别了派系斗争的大海，靠近了海岸，登上了北间岛这个陆地。他在龙井当新闻记者，完全回避了独立军运动和共产党活动。

然而，30 年代在间岛地区开始点燃的抗日运动的烈火，把李东伯再次推入了风浪的旋涡。他被火耀派系统的一个不三不四的小集团拉去当了和龙县三区书记，后来碰到间岛“大讨伐”，死里逃生。从那以后，他决心与世隔绝，便携眷逃到和龙一个深山沟里，当了私塾的教书先生，过了几年隐遁生活。

“看，我不是机会主义者又是什么呢？除了汉上派而外，所有的派别我都参加过，是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他像是给自己坎坷不平的前半生打上终止符似地，往烟斗里装上了烟丝。他抽烟抽得很厉害，甚至骑马行军的时候也拿出烟斗想抽一口，不免被小传令兵们数落一顿。可是他并不生气，一面把烟斗放回口袋里，一面像辩白似地咕哝说：“看我这脑袋，又忘了行军时抽烟会把老远的狗都叫来。”他抽烟绝不用纸卷起来抽，而是一定用烟斗抽。“烟斗老头”这个外号，也是这么来的。

“先生这样坦率，我谢谢您。可是我并不认为您是机会主义者。您不过是为了探索朝鲜社会应走的正确道路，这里看了一会儿，那

里瞧了一阵而已。在探索真理的路上，参与这样那样的党派，这绝不是机会主义。”

我这么一说，他十分惊异地说：

“我确实加入过许多党派嘛，还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先生曾决心过隐遁生活，在和龙的一个山沟里过了几年。可是现在丢弃这个决心，也不顾自己的一大把年纪，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单凭这一点，就能知道您不是机会主义者。能说这是出于机会主义者本心的作为吗？”

“您把我的内心看得这么透彻，我甘心向您投降。我这次又离家远走，是因为我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欲望，想把我花了几十年都未找到的‘法宝’，在我有生之年非找到不可。”

“我能结识您这样一位胸怀壮志、追求真理的先生，实在很高兴。从前，在我国，不乏像先生这样追求真理、投身正义运动的人。而如今，许多人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投降了敌人，或者遭到了这样那样的迫害，所剩无几了。先生保全了性命，真是万幸啊！”

我和“烟斗老头”的津津有味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抵达迷魂阵为止。在这路上，我对李东伯产生了感情。他也对我们产生了感情。

虽有“刚喜见又言别”之说，但这种离别是令人不好受的。可也不能让这位上了年纪的人跟我们走那不断发生战斗的漫长而艰险的路程。

在离开迷魂阵的前夕，我再三劝他回家。他却一声不吭，只是掀起短外衣的前襟，从里兜中掏出一张叠了四折的纸递给我。这是用朝汉两种文字混合着写的入伍申请书。

我顿时愕然了，即使太阳从西方升起，我也不会这样吃惊的。

“您那么大年纪，怎么能跟着我们跑啊？”

“这个您不用操心。乙支文德[8]。”和李舜臣[9]的麾下，还有过岁数比我大一半儿的老兵呢。所以年纪不能成为拒绝我入伍的条件。”

“那么在和龙山沟里望眼欲穿地盼您回家的夫人和孩子，谁来照顾啊？”

“欲充军而不能还觉得惋惜呢，何况我不是去充军，而是为救国大业来捐躯的，怎么能让我回家呢？将军也不是因为有人照顾卧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才走上了救国征途的吧？”

无论用什么话，都无法说服他。我终于认输了。为了纪念他的入伍，我把我十分爱惜、用了两年的手枪送给了他。

入伍一经批准，他就兴致勃勃地讲开了他决心留在我们身边的理由：

“您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留在将军身边吗？第一，当然是将军的满腹经纶，第二，是将军那条打了补丁的裤子和迷魂阵伤寒病患者们的哭声……我看到将军毫不犹豫地去看望被隔离的伤寒病患者，真是感触极深啊！不顾自己的危险去照顾部下，对部下的命运负责，这可不是像说话那么容易的！我见过许许多多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可他们都不能与您相比。我找到了朝鲜革命的真正主人、真正能够肩负起朝鲜命运的好主人、好领袖，这就是我决心留在这里的根本理由。没有纸上谈兵，没有空口说白话，只凭将军的这一优点，就足够使我这个山村书生深受感动啦。”

“还有第三个理由吗？”

“怎么没有，当然有。那就是将军那创造性的、实践性的思想方法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心。”

有一天，在行军休息的时候，我和“烟斗老头”就民族统一战

线组织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表明自己的看法说：法国、西班牙、中国这样的国家都有共产党、社会党、国民党这样的政党和工人团体，所以有可能以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来结成人民阵线，可是在我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党或合法团体。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统一战线组织，不是不可能的吗？

我抓起地上的白雪捏成两个雪团交给他，让他把这两个雪团合起来看看；同时我又捏一块小小的雪球往雪地上一滚，滚成了一块大雪团，比他手里的两个雪团合起来还大。

“您看，先生用联合两个政党的方法得出了一个团，我却用一个小雪球，运用它小小的向心力得出了比您那个团还要大的雪团。如此看来，难道还一定要有政党才能成立统一战线组织吗？”

李东伯像是看西洋镜那样呆望着我手里的雪团，喃喃自语道：

“这个道理确实奥妙。可是，雪团还是雪团，政党还是政党啊。”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然现象中，有不少在道理上跟社会现象相一致的情况。”

接着给李东伯详细地介绍了我们自从吉林时期起一直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团结各阶层反日爱国力量方面所积累的经验。

“统一战线并不是一定要把各政党和团体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的。如果把政党和团体绝对化了，那就要变成教条。只要有群众，有领导核心，就能成立统一战线组织。以目的和志向的共同性为基础，哪怕十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好，把他们都团结起来，这就是我对统一战线的看法。我们就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很早以前就开始推进了统一战线运动。”

李东伯拍打着自己的后脑勺，说：“教条主义仍然是个问题。”

说罢就呵呵大笑了。

“烟斗老头”说明了自己入伍的理由之后，说道：

“我来到将军身边，找到了能够有意义地度过晚年的工作。也就是发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当一个人发觉自己是一个于世有用的人的时候，我想可以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现在，我正变成一个这样幸福的人。”

“您找到了什么工作，觉得那么幸福啊？”

“我找到的工作，跟拿破仑的随从官大卫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大卫用油画描绘的史实，我要用文字记录在日记本上。我要记录的不是拿破仑军队的历史事迹，而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历史事迹。”

李东伯按照自己的决心，天天记日记。他有饿一两顿、甚至饿好几天的时候，却从没有过不记日记的时候。他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历史的撰写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入伍后起先在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后来当了祖国光复会机关刊物《三·一月刊》的主编兼出版所负责人。他搜集了许多文字材料和图片资料，每当秘书处转移地点的时候，就需要给他配备由好几个战斗员组成的运输队，帮他搬运十多个文件口袋和油印用具。

有一次金周贤劝他把这么多的行李整理整理，减少一半，结果遭到他严厉的驳斥。

“什么，你以为这是跟‘民生团’文件一样的东西吗？你虽然是指挥员，目光却不够远大。这些都是瑰宝，像我这样的人，一百个也换不来呀！你在军事职务上是团长，而在这些瑰宝面前可是一个小兵。你知道国宝是怎样创造的吗？”

从此以后，“烟斗老头”的行李再多，指挥员们也不发一声怨言，乖乖地给他配备了运输队。

他所记录、搜集、保管的那许多文件、日记、图片如果没有遗失，那就像“烟斗老头”所说的，会成为国家的万年财宝了。

有一次他闹出了手枪走火事故。因为他说话时常常提到拿破仑，有个警卫员就叫了他一声“崇拜拿破仑的老头”。这时李东伯手里拿着刚擦拭好的手枪，他说道：

“你这傻小子，我到底崇拜谁，这支手枪会告诉你。你听着!”

说罢，他就举起装满子弹的手枪，朝天扣了扳机。

由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枪声，老母顶子宿营地发出了紧急集合令，闹出了一场乱子。指挥员都主张要给他警告处分，要处分他禁止携带武器一个月。我建议饶他一次，可是军纪是铁面无私的。金山虎还是没收了他的那支手枪。

“烟斗老头”这样的宝贝来到我们的部队，对我这个本来有人缘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幸运。可以说是贤人从天而降，帮助了我。

在解决了一百多名“民生团”嫌疑分子问题、组建了新师、改善了马鞍山儿童团员的生活之后，我把全部力量集中到祖国光复会的筹建工作上。虽然经历了一些艰难困苦，但种种忧愁都称心如意地解决了，因而样样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而迅速。

“在祖国光复会的筹建工作中，李东伯跟金山虎成了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诚实可靠、无懈可击的助手。李东伯刚入伍，我们就让他当了祖国光复会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筹建委员会中起到了最核心作用的是金山虎和李东伯。金山虎负责做对外联络工作，因此经常在外面活动；在内部主管筹建工作的是李东伯。

在草拟祖国光复会纲领、章程和成立宣言方面，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文件的每个条款，我都跟他讨论，并且建议由他起草，

可是他拒不接受我的建议，说他的文字很古板，而且也没有信心能把我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结果是用由我起草、他补充的方式一个一个地拟好了上述几样文件。

在我们的讨论中，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是纲领的头一条。纲领的头一条必须简单明了地阐明祖国光复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团体，阐明它的宗旨、斗争目标和性质，因此，讨论就不能不慎重而激烈。

我按我早已想好的意见建议写明：两千万朝鲜民族要总动员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殖民统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我这么一提，他就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摇着头说：

“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感到遗憾。纲领的头一条里如果没有一点共产主义色彩，那些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能高兴吗？真正的人民政权，这句话，阶级性模糊，总觉得有点民族主义的味儿。”

后来，在白头山密营头一次会见朴达[10]的时候，他也对祖国光复会纲领的头一条提出了跟李东伯完全一样的意见。当时正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大大污染了我国的时候。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人几乎都把共产主义看做是与民族的理念相对立的思想，极力主张共产主义者只有丢掉狭隘的民族理念，坚持阶级原则和国际主义立场，才能从剥削与压迫下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

不少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极为简单地和机械地搬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一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获胜的可能性还没有成熟的历史时期。他们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系列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进行。在工人阶级要打倒的各国资产阶

级以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自居的情况下，如果全世界无产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所蒙骗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事业就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对各国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母国决不能成为祖国，因此，在国粹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必须站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边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这种观点出发，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对所谓的爱国主义抱幻想，教导人们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坚决抛弃民族主义的偏见，维护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时候断言，公社社员之所以不去进攻反动派的堡垒凡尔赛宫，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在普鲁士军队这个外来敌人包围着巴黎的时候发动国内战争，是违背爱国主义的。列宁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抛弃工人阶级的革命原则，各自高呼“保卫祖国”的口号，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的行径，谴责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

打着“保卫祖国”的招牌去帮助那些即使统统牺牲本民族也要增殖个人财富的发疯的资产阶级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既是对本民族的背叛，又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想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应打出“保卫祖国”的招牌，而应高举“反对战争”的旗帜，展开反战运动。

但是，殖民地附属国的情况则与之完全不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共产主义者高举解放祖国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就等于反对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民族革命、为阶级革命、为国际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和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犯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一明白的真理，不假思索

地把“工人没有祖国”这一论断加以绝对化，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做共产主义之敌加以排斥。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殖民地国家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真正的共产主义，可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鸿沟，只不过是前者更突出了民族性，后者更突出了阶级性而已；而在反对外部势力、维护民族利益这一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上，应当认为两者是一致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是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始终不渝的信念。从这一信念出发，我们始终一贯重视同爱国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为加强同他们的联合而作出了一切努力。

我们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朝鲜共产主义者为解放祖国而斗争是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认识到这并不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矛盾，不得不花费了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同时，我们以自己纯正的祖国爱和解放民族的实际斗争，向全民族证实了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爱祖国爱民族的爱国者，并且终于昂首挺胸地站到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来了。

我们这一长期的忘我斗争所结出的丰硕的果实，就是祖国光复会的成立。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祖国光复会”这个名称，在其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指出我们要以全民族自己的力量光复祖国，建立曾在东满游击根据地建立过的那种真正的人民政府。

李东伯专心致志地听完我的话，拍着大腿发出了欢呼。他说：

“这下好了！我这个睁眼瞎子沾了同您争论的光，已经不再是残疾人了。我完全赞成。”

纲领的其他条款，没有引起什么分歧。

这样，我们就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把解决政权问题作为朝鲜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并提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与权利、实现社会的民主发展、维护旅外侨胞的民族权利等各项政治任务。

纲领还提出了建设革命军队的任务，指明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应解决的各项经济任务，诸如在经济关系方面无偿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亲日地主的土地，没收日本国家和日本人占有的所有企业、铁路、银行、船舶、农场、水利设施和卖国亲日分子的全部财产，救济贫苦人民，保障民族工农商业的自由发展，建设民族经济等等问题。

关于保障民族工农商业的自由发展、建设民族经济的思想，是基于我们严格区别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鼓励爱国的民族资本，不剥夺并积极保护和支持民族资本家，把他们团结到反日联合战线里来的始终一贯的方针和路线的。那些主张要把包括反日的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所有资本家统统打倒的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和把虽然带有资本家的名称而在思想上有爱国志向、实践上有反日表现的所有民族资本家视为革命动力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还提出了社会文化方面的任务和对外工作方面的任务。

当初我估计在宗教徒、民族资本家和爱国地主等问题上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通过纲领第一条的讨论已具有同我们一样的世界观的李东伯的表现，简直令人吃惊，我刚开口，他就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对这些问题，金山虎、吴白龙他们反而表现了心胸狭隘的态度。

在我起草纲领、章程、成立宣言的时候，其他人准备了以筹委会名义散发的信和传单。

那一年的春天，我们度过了争分夺秒十分紧张忙碌的日日夜夜。

筹委会最后讨论纲领、章程、成立宣言的地方，是漫江村许洛汝村长的家。

“烟斗老头”欣喜若狂地说，那些口称搞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派分子连个像样的纲领都拿不出来，只是红着眼专事争夺领导权的勾当，而现在我们有了将更加辉煌地照亮朝鲜革命前进道路的新的灯塔。

到了 4 月末，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把成立大会的会场定在东岗树林，人也都转移到那里去了。接到邀请书的代表基本上都到齐了，可是，曾给我们回信表示准定出席的南满的李东光和全光(吴成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大会闭幕也没有前来出席。作为国内代表出席会议的有通过康济河的组织从碧潼来的天道教代表和农民代表；通过稳城地区党组织来的教师代表和工人代表各一人。

具有历史意义的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于 5 月 1 日开幕。此时正值春天，虽尚不是百花盛开，却已满山披上了春装。

大会开幕前夕，代表们个个心潮澎湃，兴致勃勃。通称东岗会议的这个大会，开了十五天。

大会上，先由李东伯宣读了各界致大会的贺词，接着由我作了报告。

我在报告中提出了在祖国光复会的旗帜下团结全民族，组成统一的政治力量的任务和为挺进到国境地区和国内腹地大力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而在国境一

带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赖以进行活动的新根据地的任务。后来这一报告以《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把整个朝鲜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为题，印成单行本发行。

我接着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提请大会审议。

在十大纲领中，我们对 30 年代的革命形势和我国社会经济情况及阶级关系作了正确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朝鲜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战略策略原则，还切实考虑到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各阶层爱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清楚地阐明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全体与会者对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都高兴地说，这样就可以朝着明确的斗争目标，满怀信心地开展争取朝鲜革命胜利的斗争了。他们一致地表示决心说，一定要积极完成纲领所提出的各项任务。

对《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的讨论又一次使代表们大为振奋。宣言的一字一句，完全抓住了与会者的心。尤其是宣言的下述一部分使与会者万分激动。这一部分表示确信说，只要全民族有钱出钱，有粮食出粮食，有技能和智慧的就出技能和智慧，两千万民众都同心同德，一致动员起来参加反日祖国光复战线，那么，朝鲜的独立就必将得到实现。宣言热烈号召人民群众都参加祖国光复会进行斗争。

通过了《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之后，就以谁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提议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他们说，发起成立祖国光复会的是我，主管筹委会工作的是我，纲领和宣言的起草人也是我，所以无须讨论，应以我的名义发表。而我却有不同的想法。祖国光复会是要团结全体朝鲜人民的反日力量，因

此必须具有民族的形式。我认为最好由一位从义兵运动或“三·一”运动时期起就积极从事朝鲜独立运动的德高望重、上了年纪的爱国志士做发起人。

事实上直到那时，朝鲜人民革命军主要是在满洲地区进行斗争，所以我以为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大知道我们的存在。自从我们在白头山建立起新的秘密根据地、开始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腹地以后，我们的名字才开始在国内人民中广泛传扬。记得国内报纸第一次介绍我们主力部队的活动和斗争，大约是 1936 年 9 月某一天的《每日新闻》。那时《每日新闻》登了一则消息说，长白县出现一支有一百五六十人的部队，然后附加了一句：“部队首领叫金日成”。以此为起点，国内报刊频繁地报道了有关我们活动的消息。

我向代表们坦率地呼吁说：大家坚持说因为发起人是谁，负责筹委会工作的是谁，起草了纲领和章程的是谁，所以应当以谁的名义发表成立宣言；可是只强调这些事实，推举我一个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以一些我国人民都熟悉的人的名义号召两千万同胞团结到祖国光复会里来，就会更有效。把我当做同胞民众的一个儿子，只当我不声不响地为民众做了点事情，不就行了吗。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应当推荐年高德劭、名闻遐迩的爱国志士做共同发起人。我接着建议应由李东伯和吕运亨做共同发起人发表成立宣言。

第一个反对这一建议的是李东伯。他说，什么年纪啦、名望啦，都无须考虑。实实在在地代表全民族肩负起光复祖国大业前进的领导者，只有金将军一人，就是找遍了国内外，也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人。不顾这一明白的事实，让他做发起人，是绝对不行的。他接着坚持说，祖国光复会的会长应当是金将军，发起人也应当是金将军。他参照我的建议，提议由我和吕运亨做共同发起人。

经过慎重讨论，最后我同意在用金东明这个化名的条件下做一个发起人。看我做了让步，李东伯也同意做一个发起人。

这样，在 5 月 5 日发表的《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就以金东明、李东伯、吕运亨三个联合发起人的名义落了款。

给我起金东明这个化名的是李东伯。当我坚持只有用化名才能同意做一个发起人的时候，他就不再坚持己见，默默地想了片刻，才提议说，姓还是照旧用金姓，名字最好用东方的“东”和明亮的“明”这两个字。他说，“金东明”这个名字，从代表民族的意义上看，可以成为一个意义丰富而深刻的名字。与会者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赞成。和“金日成”这个名字一样，“金东明”这个化名也是由别人给我起的。

我们发表的祖国光复会宣言散发到国内外各地后，有些地方还自行复制和散发，在复制的时候用本地有影响的著名人士的名字换了发起人的名字。我们允许根据情况灵活应用。祖国光复会的名字也一样，在东满称为东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在南满称为在满韩人祖国光复会。党史研究所发现的祖国光复会宣言中间或出现吴成仑、严洙明、李相俊(李东光)、安光勋等人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在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与会者一致的意见，我被推选为会长。

这样，在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个常设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我国第一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的成立，在加强革命的群众基础方面成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由于成立了祖国光复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就同抗日武装斗争密切结合，就在全国范围内更有组织更有系统地迅速发展起来，更

有力地组织和动员所有反日力量投入了光复祖国的斗争。

要把全民族所有力量集结到光复祖国的战线中来，这是我们从斗争初期起就提出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从多年以前就开始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筹备。

祖国光复会的成立，这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坚持不懈地为培养革命的主体力量而主动地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所结出的丰硕的果实。它成了又一次严肃地表明我国人民将依靠本民族的力量更勇敢地开展反日斗争的意志的历史契机，成了把以抗日武装斗争为主的整个朝鲜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的转折点。

祖国光复会的成立，由于符合朝鲜革命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因而在国内外获得了积极的支持，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处处发出热烈赞同的响亮的呼声。最先响应的是独立军部队。

祖国光复会宣布成立后，曾任朝鲜革命军政府参谋长的尹一坡来信祝贺祖国光复会的成立，并表示希望双方在反日战线上建立密切的联系。活动在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者朴某还不远千里来到满洲会见了祖国光复会驻南满的代表。他是个在上海、北京、天津等中国关内各地多年从事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是在民族主义运动者中间颇有声望的人物。他保证今后在国内外广大地区广泛开展祖国光复会的工作，并就将来组建全民族的武装力量“独立革命军”的办法问题同祖国光复会的代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正如李东伯在《三·一月刊》创刊号上以《天道教上级领袖某氏亲自来访我光复会代表》为题登载的消息中所写的那样，天道教道正朴寅镇接到祖国光复会成立的喜讯，也来访问了白头山密营。当时他保证，要让天道教青年党的一百万党员都加入祖国光复会。

李昌善、李悌淳、朴达及其他许多人陆续前来同我们会见，为

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祖国光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大和发展成了拥有几十万会员的泛民族的组织，它的发展史恐怕用几大本书也写不完。

1936 年 5 月，祖国光复会在白头山北麓的诞生，是为朝鲜革命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迎来了光复祖国的曙光的历史性大事。朝鲜革命的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就是这样从白头山山麓升起了新的晨曦。

注　　释

[1] 吕运亨(1886～1947)，独立运动者，出生于京畿道杨平郡。早年参与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高丽共产党”的活动，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奋斗。曾在汉城历任朝鲜中央日报社社长、朝鲜建国联盟委员长、劳动人民党委员长等职务。解放后，他在平壤受到金日成主席的接见，回汉城后为贯彻自主的政治路线和联共统一方针而斗争，后来被敌人杀害。

[2] 白南云(1894～1979)，出生于全罗北道高敞郡，在汉城当过教员。解放后任南朝鲜劳动人民党副委员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1948 年 4 月出席南北朝鲜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其后历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届教育相、科学院院长、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等职，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3] 姜永昌(1912～1965)，在金日成主席的信任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忠于党和人民的科学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时期，他在中国旅顺工大毕业后，被雇佣于日本三菱电气会社当工程师。解放后，他从南朝鲜来到共和国北半部，历任城津炼钢厂总工程师、冶金工业相、科学院院长等职。反动派企图诬陷他，但他始终相信党、跟着党，为在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中树立主体作出了贡献。

[4] 许宪(1885～1951)，爱国烈士，出生于咸镜北道明川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在汉城当过律师，曾为抗日革命战士做过辩护。解

放初期创建南朝鲜劳动党，并任委员长。后来回到共和国北半部，历任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综合大学总长等职，为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朝鲜战争时期牺牲。

[5] 四月南北联席会议：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永远分割国土和分裂民族、把南朝鲜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策划举行单独选举的形势下，1948 年 4 月在平壤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南北朝鲜五十六个政党、社会团体的六百九十五名代表和海外侨胞的代表。会议讨论了统一祖国问题。金日成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以《北朝鲜的政治形势》为题的报告，阐明了实现祖国自主统一的救国大计。

[6] 洪吉童，我国古典小说《洪吉童传》中的主人公。他武艺高超，富有正义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民间被传颂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7] 三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以划分解除日军武装的界线为名，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把获得解放(1945.8)的朝鲜分割成北南两部分的分界线。

[8] 乙支文德，高句丽的爱国名将，平壤人。公元 612 年，他在击退隋军侵略的萨水战役中，指挥军民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

[9] 李舜臣，李朝的三道水军节度使、爱国名将。他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铁甲船——龟船，在壬辰卫国战争时期(1592～1598)指挥海战，击毁日本侵略军舰船几百艘，杀伤敌兵数万人，粉碎了敌人“水陆并进”

的企图，为战争的性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幸在最后的战役——露梁海战中殉国。

[10] 朴达，抗日老战士，咸镜北道吉州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他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曾任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负责人。1938 年 9 月，因走狗告密被捕入狱。解放(1945.8)后出狱。他因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出狱后久卧病榻，专事写作，直至逝世。